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英国新任首相托尼·布莱尔传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引 言

5月1日是全世界劳动者庆祝的日子，可是1997年的5月1日对英国劳动者来说却别有一番意味，因为这一天打着民主社会主义旗号的、属于左翼政治力量的英国工党在大选中以绝对优势获胜，执掌了英国的政权；它的领袖，年仅44岁的托尼·布莱尔入主唐宁街10号，成了英国180多年来最年轻的首相。而立志要使保守党实现“五连冠”的前任首相约翰·梅杰则在大选后辞去了保守党领袖职务。

这次大选，工党虽然得益于两党制在选民中产生的心理作用，因为保守党已连续执政18年，实在是让人们感到太厌倦了，如果它真的像其领袖梅杰所期望的那样来个“五连冠”，人们就会发出“英国的民主政治要完蛋了”的呼声。自1830年后，这还是首次一个政党连续执政这么长时间；但是，工党同其竟敌——保守党相比，确实表现得更好一些。几年来的党内改革，使工党的力量大为增强，在选民中的支持率明显上升；保守党政府虽然握有英国经济形势比较好这张王牌，但还是比工党逊色得多。

工党能有这样好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党的领袖托尼·布莱尔。早在1994年布莱尔当选为工党领袖时，就有人预言他将成为下任英国首相。随着他对工党改革的推进，持这种看法的人越来越多，就连许多保守党议员都有这种看法，甚至保守党最有实力的元老，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都公开称赞布莱尔，隐含着承认工党将胜之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媒介所关注的焦点已经不是在这次大选中谁将获胜，而是大选会在何时举行，工党将赢得多少个多数席位。保守党在1992年大选时只有21席的多数，以后在补缺选举中几乎都吃了败仗，将议席丢给工党或其他小党，到1996年底时，只剩下了一席的多数，执政地位岌岌可危，只是靠着一些小党的支持才勉强维持局面。有的专家和媒体曾预言，大选将提前到1996年底或1997年3、4月份举行。从1994年起，在所有的地方议会选举、国会补缺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中，保守党都给了工党；各种民意测验也显示出，工党的得分率远远高于保守党，直到今年3月17日大选日宣布之时，工党仍领先保守党25个百分点，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这次大选的竞选活动一开始，就出现了十分反常的“一边倒”的现象。几乎所有的英国大报都一至表示支持布莱尔，就连过去一直在大选中帮助保守党的报纸也纷纷“倒戈”，这更促使力量天平倾向工党一方。

然而，工党在这次大选中赢得这样“火”，却是很多人未料到的。工党得了659个席位中的419席（增加146席），占总数的63.6%，比保守党多254席（保守党只得165席，减少178席），比所有反对党的席位加起来还多179席，这是本世纪英国历次大选所有政党取得的最好的成绩。有这许多的席位，为布莱尔和工党政府大展宏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布莱尔成长为工党领袖不是偶然的。从他的家庭影响和教育看，他应该成为一个保守党或自由党人，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他选择了工党，他属于工党。布莱尔加入工党并在党内成长起来的年代，正是工党陷入困境，党内斗争异常激烈，极左势力急剧膨胀并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他深切感受到工党的衰落及其原因，很早就立志要对工党进行改造。但是他的思想也有个发展过程，最初他也是站在左派的立场上，以后逐渐转向中左、中间、中右、右。他的立场转变几乎是与工党领导人立场的转变相一致的，从

富特到金诺克到史密斯，工党中央的立场也经历了同样的转变过程。富特曾与党内强硬左派首领托尼·本特在同一战壕里，与之一道向党内右派夺权，但是后来他转向温和左派的立场，反对托尼·本的极左路线。金诺克原来也是左派人士，当上领袖后逐渐转向中派，下台后又转向右派。这些情况表明，走左派的路线是没有出路的。然而，从富特到史密斯，在摆脱左的束缚上所迈的步子还不够大，最后，改造工党，使之走向现代化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在了布莱尔的肩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工党选择了布莱尔。

当然，布莱尔对工党的改造是在前几任领袖的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经过金诺克和史密斯的努力，工党已经有了一定的改观，1992年大选，工党虽然输了，但梅杰所领导的保守党仅获得21个多数席位，在议会中的行为能力已受到很大的制约，与1983和1987年时的境况不可同日而语；到1994年史密斯去世前，工党已具备了同保守党抗衡的实力，在地方选举等选举活动中都击败了保守党。所以有人说，如果史密斯不去世，他也能领导工党赢得大选。布莱尔从史密斯手中接过来的已经是一个比较团结、有力量的工党。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工党成全了布莱尔，工党为布莱尔搭起了通向首相宝座的梯子。

布莱尔与工党，到底是谁成全了谁？依笔者之见，双方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布莱尔改造了工党，使工党更加充满了活力，从而具备了赢得大选的足够实力；而工党则为布莱尔提供了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才干的舞台。

就布莱尔个人来讲，他确实拥有他的前任们所不具备的优点，他从小就有“反叛”倾向，成年后更是具有开拓进取精神。1983年，在极不利的条件下，他作出惊人之举一下子成为工党的议员，就是一例。他思想开放，不为工党左的教条和陈规陋习所束缚；他精明强干，对自己所承担的每一项工作都干得很出色。他仅用了11年时间，就从一个后座议员成长为反对党领袖。还有他当上议员前，他的才干就为党的领袖富特所赏识，以后，他更是得到了金诺克和史密斯的青睐。金诺克曾认定，布莱尔将来会成为工党领袖，而且是领导工党赢得大选胜利的人物。他当上工党领袖时，就有人预言，布莱尔如果当上了首相，会使英国发生像1945或1979年以后那样的变化。布莱尔任工党领袖后的所作所为，表明他确实不同寻常。就连他的竟敌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才能和魅力。撒切尔夫人曾称赞布莱尔有领导才能，有意志力和洞察力，并说如果他当上首相，绝不会令英国人民失望。而布莱尔也很想干一番像撒切尔夫人所做出的那样的事业。

这次大选结果一揭晓，世界舆论和政界立刻做出了强烈反响。法国《世界报》说，布莱尔的胜利“对欧洲是好兆头”，“当欧洲联盟正要进入历史上最重要的阶段的时候，对这一胜利应当表示祝贺”。因为，“尽管布莱尔对欧洲建设不太信任，但是他毕竟与他的那些前任不同，他的实用主义多于教条主义”，“他有能力推行一种连贯的积极的欧洲政策。他的国家对欧洲的事业会比人们所想象的更为积极”。

英国《金融时报》刊登文章说：“以德国总理科尔为首，国际社会对英国工党新政府一致表示祝贺。科尔说，他希望英国在欧洲发挥更具合作精神的作用。”

美国《华盛顿时报》载文说，布莱尔与克林顿的政治风格相似，他们“将会相处得相当融洽”。还说，“这两个人都是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都是带领他们长期萎靡不振的政党东山再起的政治上讲求实际的人。两人都因为这

样做而招致思想意识上的极端主义者的仇恨。”“两人都定期到教堂做礼拜”，“都读过牛津大学”，“都有一种进取心和政治热情”。

在国内问题上，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将布莱尔对工党的改革称为“布莱尔的革命”，并说，“工党抛弃了老的信仰，从而得到了政权”，“这次权力更迭事实上不是对撒切尔主义的历史否定”。

英国路透社甚至认为，“布莱尔的胜利将迫使爱尔兰共和军下令停火”。因为“新芬党在工党获胜后说，它试图在重建和平的进程中采取灵活态度”，布莱尔“在政府中的牢固地位将大大改善目前的政治气氛”。

看来，形势对布莱尔领导的工党政府十分有利，如果他真像人们所期望和评价的那样，他会利用这个大好形势干出一番事业来的。

托尼·布莱尔传

一、一位保守党人的儿子

如果按照“出身决定论”者的观点，谁也不会想到，也不会相信托尼·布莱尔会成为工党的领袖。这位工党最年轻的领袖并没有从家庭中接受任何工党和社会主义的传统，他的父亲是位保守党人。不过他从小就有远大的抱负，这多少是受他父亲的影响，也同他幼年时的家境有关。

父亲的沧桑家世

1953年5月6日，托尼·布莱尔出生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他是这个家庭中的老二，他的哥哥威廉·布莱尔比他大三岁。托尼的童年并不算十分幸福，父亲利奥·布莱尔是个事业心极强的人，总想通过个人奋斗而出人头地。利奥的一生是白手起家的典范，他是并不富裕的养父母带大的，可是他后来竟成长为一名大学的法律讲师，而且还当开业律师。

说起利奥·布莱尔的家世，可真够复杂的，用沧桑一词来表达一点都不过分。他是个私生子，出生不久就离开了生身父母。他的养父是格拉斯哥造船厂的装配工人，名叫詹姆斯·布莱尔，托尼·布莱尔的姓氏就是从那儿来的。詹姆斯·布莱尔夫妇与托尼·布莱尔的祖父母相识。起先，托尼只知道他的父亲利奥·布莱尔是被领养大的，但并不知道自己的亲祖父母是何人。直到约翰·史密斯去世后，《每日邮报》看出托尼·布莱尔有可能成为工党领袖，才研究了家的家谱并披露出来，他本人才知道自己的真正身世。

托尼·布莱尔亲祖父母的故事富有传奇和浪漫色彩，虽然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实，但也不可不信，因为无风不起浪。祖父名叫查尔斯·帕森斯，祖母叫西利亚·瑞卓维。他们俩都是演员，查尔斯的艺名是吉米·林顿。他们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一起演戏，在喜剧、音乐厅和戏剧小品中扮演角色。西利亚是个很不同寻常的女人，经历复杂。她不愿顺从自己父母的意愿在家过普通妇女所过的生活，在十五、六岁时就离家出走登上了舞台，并在17岁时与一个姓哈丁的人结了婚。在第一次婚姻中她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保琳·哈丁后来回忆说她母亲喜欢男人陪伴她。然而，演员的生活是很不稳定的，经常要离家外出，这可能使丈夫很不适应。丈夫不能忍受她的放肆行为，对她很不好，经常殴打她。最终他们分手了。

西利亚很快又结了婚，可是第二次婚姻也很不稳定。1923年，当她同吉米·林顿一起外出演出时，在旅途上生下了他们的儿子利奥。当她的丈夫知道利奥不是他的孩子时，同她离了婚。在她意识到这个私生子已给她带来耻辱时，她就让住在格拉斯哥的詹姆斯·布莱尔一家领养了这个孩子。

在利奥出生3年后，吉米和西利亚结了婚。9年后，即1936年，这时利奥已过12岁，他们想把他们的亲生子要回来。可是利奥不愿意离开布莱尔家。布莱尔夫人是他知道的唯一的母亲，并且他也明显地爱他的养父母。同时，布莱尔夫人也不愿意让利奥离去。所以，利奥还是留在了格拉斯哥，继续与养父母生活在一起。

布莱尔夫人从不对人谈起利奥的生父母，并且坚持说他就出生在格拉斯哥。利奥本人似乎也忌讳谈起自己的真实家世，甚至对他的儿女也讳莫如深。利奥成长在工人阶级家庭，所以在他少年时接受了不少革命思想。他在1938

到 1941 年间，也就是他 14 到 17 岁时，曾担任过苏格兰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书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共产主义思想吸引了很多青年理想主义者。有意思的是，就在同一时间，后来当过工党副领袖、右翼领导人的丹尼斯·希利是牛津大学的共产主义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利奥离开了学校，中断了接受教育，开始走上社会独立谋生，那时他才 17 岁。他先是在格拉斯哥的一家公司当办事员，1942 年入伍，在军队中表现不错，1947 年复员时已是一名少校。利奥是个有志向的青年，退伍后他就去爱丁堡大学攻读法律。一年后，1948 年，利奥回到格拉斯哥完了婚事。新娘与他同岁，名叫罗瑟琳·考克登，出生在一个叫多尼戈尔的乡村小镇务农家庭。她父亲去世后，便随母亲来到格拉斯哥，母亲带着她嫁给了一个屠夫。

当利奥结婚的时候，他用了“布莱尔”这个养父的姓，而在此前，他还一直用生父的姓——帕森斯。为了纪念他的生父母，他将他父亲的原名和艺名（查尔斯和林顿）联合起来作他的中间名字。有了孩子后，他把他养父的名字和生父的艺名（詹姆斯和林顿）给长子威廉作中间名字；把自己的中间名字给了次子。所以他的次子，即我们书中的主人公托尼·布莱尔，全名是：安东尼·查尔斯·林顿·布莱尔。托尼是安东尼的昵称。不过利奥从未告诉过他的孩子们这些名字的来历。

温饱但不很幸福的童年

利奥一家的生活很不稳定，经常搬家。托尼出生时，他们家正住一个小平房中，地址是：爱丁堡佩斯利巷 5 号。他的出生证上记载，他父亲那时是一名低级税务监查员。但是那时，胸怀壮志的利奥正在攻读法学博士学位，希望从事学术生涯。然而利奥的经历是很坎坷的。后来，生活所迫，他们全家又迁回了格拉斯哥，以后又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生活了 3 年，在那里，利奥讲授法律。托尼后来回忆说：“我小的时候，经常漂泊不定，直到最后在德汉姆定居下来。”“我从未感到很稳定地生活在某一个地方。”托尼恰好 5 岁时，就是 1958 年夏，全家搬到了德汉姆城，总算定居下来，他在这里一直呆到 17 岁。在德汉姆，利奥·布莱尔的家境逐渐好转起来，利奥的社会地位逐步改善，收入也不断提高。利奥不仅在大学当讲师，有固定的收入，而且还干开业律师，有时还到酒吧里为人朗读一些东西挣钱。虽然他们家的房子还是租用的，但利奥一家已开始步向中产阶级。尽管如此，托尼并不十分敬佩他的父亲。他后来曾对人谈起他父亲说：“爸爸的律师业务很兴隆，而且还到全国各地讲课。他还是个精明的自我宣传者，不时地出现在当地的电视上。但我确信我看不起他胜过现在我的孩子看不起我。”

利奥·布莱尔一家刚来到德汉姆时境遇还比较艰难，人生地不熟，找不到合适的安身之所。考瑞斯特学校的校长坎农·约翰·格儒伍给他们在学校楼顶层安排了一套房子，很简陋。利奥一家在此处住了几个月，然后迁到在附近租的房子里。

由于大学法律讲师的工资高而稳定，所以一到德汉姆，利奥就把两个儿子都送进了私立学校。威廉 8 岁时进了考瑞斯特学校，托尼则去了西山学前

班。后来，托尼到了8岁时，即1961年，也上了考瑞斯特学校。该校座落在一所天主教堂附近，起源于教堂唱诗班，“考瑞斯特”就是唱诗班的意思。可是布莱尔家的两个孩子都不是唱诗班的成员，只是普通的学生。与其他私立学校比较起来，考瑞斯特学校的收费是低的，这是学校在建校时就定下的大政方针，以致于让一个普通办事员能供得起孩子念书。所以，如果一个办事员能送一个孩子来上学，那么一个律师送两个孩子是不成问题的。托尼后来也说：“我们过着十分好的、够标准的中产阶级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跟真正好的比还是有差距。托尼说：“我们可能已享受到了私人教育的特权，算得上是极少数，但是我们不能在周末去乡村别墅，不能出去打猎。”

一名优秀的小学生

布莱尔家的老二在学习上是很聪明的，被认为是可以跳级的那一类。在第一年末的考试中，他名列全校第三。他还是个守规矩的孩子，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他在童年时代有叛逆行为，虽然对人总是露出玩皮的笑。格儒伍校长对这种笑记忆很深刻，还说他是在小学中真正属于好孩子那一类人，是学校中的骨干力量。作为小学生的托尼，还对《圣经》了解很多，是个严肃的基督徒。给人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托尼善长体育，开始是田径运动，后来是板球和橄榄球。他是这两种球的校队队员，曾赢得学校的苏格兰杯，还是1965—1966年学校的最佳橄榄球手。

1963年，就是托尼·布莱尔10岁那年，一场重病结束了利奥·布莱尔的律师生涯和政治生涯，泯灭了他的政治抱负。这可真是意外的打击，他才40岁，正当英年，却失去了说话能力。对一位大学讲师和开业律师，特别是正在争取议员席位的保守党活动家来说，没有说话能力简直不可想象。这场重病完全是由过度劳累造成的，那时利奥除了主业和副业外，还担任着德汉姆保守党协会的主席。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曾一度中断了他的学业，所以他有很强烈的紧迫感，总是玩命地工作。

父亲的不幸对托尼振动很大，也许就是这时候，托尼产生了他的政治抱负。这多少有点要继承父亲的事业的味道。托尼自己说这件事是“影响我人生的事件之一”。格儒伍校长说：“有一天大约8点30分——我们通常在9点钟开始工作——布莱尔夫人来到学校说：‘利奥遭受了可怕的打击，您可以照看托尼一天吗？’然后便把他留给我，我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安慰他。他被那件事搞得心神不安。”他还说：“我想我使他得到了安慰，我们一起念祈祷文。托尼有很强的宗教信仰，我总是能用这种方式帮助他。”

10岁的托尼这时已成熟到能够理解他父亲未竟的事业：“现在你能猜出对他的打击有多么大。他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是非凡的人，一名开业律师、法律讲师和一位初出茅庐的政治家。”这种惊人的挫折将父亲的干劲传给了托尼·布莱尔。“在他病后，我父亲将他的野心传给了他的孩子。这具有某种强制力。我感到我不能让他失望。”此时他的哥哥已离家去了位于爱丁堡的费蒂斯公学读书，寄宿在那里；他的妹妹萨拉在父亲病情好转后患了风湿性关节炎。托尼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他必须协助母亲挑起家庭重担。“我早年似乎是在进出德汉姆医院中渡过的。我父亲的病在我早年给我留下

了极深的印象，使我感到生活将是一场斗争，而且有许多人会在这种斗争中败下阵来。”

利奥·布莱尔病情稳定后，全家迁到了离德汉姆市一英里外的郊区，住进了一所新建大楼中有4个居室的套间。利奥得病后，全家的收入受到了限制。不过，托尼说：“我们仍然过得不错，但已远不如从前。”利奥继续留在德汉姆大学。大学的头头们真不错，在他努力恢复健康时，学校给他提供资助。不过，利奥有根顽固的旧观念，在他的收入明显减少后坚持不让妻子出去工作，甚至在她主动提出去找份工作以帮助家庭度过难关时，他仍充耳不闻、固执己见。

保守党的候选人

父亲热诚的保守主义思想倾向对托尼影响很大，在他们居住的地区，工人阶级力量较大，共产主义思想很有影响。然而，利奥·布莱尔却通过努力工作使自己 and 家庭的地位不断提高，甚至还当上了德汉姆保守党协会的主席。利奥曾经说过：“我准备争取任何空出来的保守党的席位。”这种从政的热情对托尼肯定会产生影响。所以毫不奇怪，在托尼12岁时曾当过学校模拟选举中保守党的候选人。那是1966年大选前5天——3月26日发生的事情。据这一年7月的校刊——《考瑞斯特》报道：“在这一星期内，候选人们在院子中发表演讲。他们是科瑞斯托佛·斯考特（自由党）；托尼·布莱尔（保守党）和斯蒂芬·道瑞克（工党）。格儒伍回忆道：“大约提前两周内，孩子们奔走游说。之后选举日到来了。命运之神似乎要对他说：‘保守党迄今为止不错，但仅此而已。’因为在这一天他病了。其他某个人不得不参加进来并争取赢得选举。”

据校刊说，一个叫里查德·斯蒂沃特的人取而代之成为保守党的候选人，并在模拟选举前夜发表了最后的演讲。“第二天早上，投票站开门了，选票已印好。3月28日，星期一，选举结果出来了。”斯蒂沃特以绝对优势获胜，得62票，工党候选人得26票，自由党得24票。然而在这一年的正式大选中，却是工党获胜，哈罗德·威尔逊领导的工党在威斯敏斯特宫获96席的多数。自从1964年的大选后，选民戏剧性地从自由党转向工党。

28年后，在1994年领袖竞选期间，上述那件事不可避免地被当时的知情人回忆起来。托尼·布莱尔本人说他不记得它，也想不起来是否受了父亲的影响而站在保守党的立场上。他对那件事的解释是：“我们都不得不扮演某个角色，因而也就被归属于他所扮的那个角色之类。”他给人的印象是，他窘于他很久以前戴过的政党标签，毕竟绝大多数人的政治观念还是固定的。使布莱尔可以感到自慰的是，克莱门特·艾德礼曾经是保守党人，哈罗德·威尔逊曾是自由党人，而且不是在中学，而是在大学。

矛盾的成长环境

托尼·布莱尔至少到了十七、八岁时才有了他自己稳固的政治信念。尽管他父亲的价值观是保守主义的，而且他们家周围天主教的影响较大，但是托尼还是没有避开德汉姆的大环境的熏染，吸收了许多社会主义的思想。他声称他自己受到了强有力的地方传统的影响。他对60年代发生在该地区的规

模盛大的矿工集会记忆犹新，而且对之大加赞美。

德汉姆煤矿社区是经过艰苦的努力才团结起来的。1882年特立姆顿·格兰德矿井爆炸，使74人死亡，至今当地的民歌仍对之有所反映。“沼气”或爆炸性气体是煤矿最大的危险，特别是在泰恩这个地方周围。泰恩以它的“爆炸井”而闻名。1919年，该地县政府掌握在工党手中，这是工党控制的第一个地方政权。彼得·李是这个工党政权的第一位领导人。后来，彼得·李的传记作者杰克·劳苏（当时是德汉姆的工友，后来成了下院议员）满怀胜利的喜悦写道：“在英国，这是第一次工人被称作统治者。”彼得·李的传记于1949年出版，其序言是艾德礼首相写的。布莱尔出生时，艾德礼是反对党领袖。序言中说：“他是矿工社区勇敢、正直、人道的象征。他在这里服务得很好……在他任职的日子里，年轻的一代认识到了什么样的人的风貌能赢得他们现在享受到的利益，什么是他们不得不克服的力量。”

到布莱尔家来德汉姆生活时，泰恩县的绝大多数矿井都已关闭了。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传统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英国伦理社会主义》一书的作者把彼得·李和他的社区看作是源于英国18—19世纪的政治改革者威廉·科贝特（1762—1835）的传统：“他的自我完善、朴素、勤劳、负责和利他主义的工人阶级的理想被传下来，以致于最终形成了托马斯·伯茨、彼得·李、杰克·兰森斯和成千上万不知名者的像他们一样的伦理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这些人在本世纪前半叶生活在德汉姆的矿区中、奔宁山区的纺织城中和遍布英国的工人阶级社区中。”

托尼·布莱尔就是在这样矛盾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方面他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基本上都属于中产阶级的，但另一方面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却具有工人阶级的色彩。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他后来会成为工党的重要现代派人士。他既没仿效他父亲成为保守党人，也没有像许多生长在工人阶级社区的人那样成为工党传统派人士。有一种误解，好像英国的中产阶级只生活在英格兰南部，其实不是这样，只不过是英格兰南部中产阶级较多罢了。布莱尔的德汉姆考瑞斯特学校的同学，后来成了作家兼诗人的詹姆斯·芬顿评论布莱尔说，事实上他的特色和背景是北部中产阶级，布莱尔的特色从他8岁以后就没有改变。

反抗学校的陈规陋习

布莱尔13岁这年，即1966年，读完了小学，然后便离开德汉姆来到爱丁堡，进入费蒂斯公学读书，在这里度过了他的风华正茂的少年时代。这是布莱尔成长的重要时期，他第一次离开家庭独立生活。托尼是通过获得一项奖学金进入该校的，并成为学校的寄宿生。他又一次步了他哥哥威廉的后尘。

费蒂斯公学的本名是费蒂斯学院，它是苏格兰最有名的公学之一，由威廉·费蒂斯爵士建于1870年。它精美的“仙女城堡”中的哥特式塔是爱丁堡郊区的一个胜迹。与托尼·布莱尔同期在此读书的一个小伙子在60年代晚期将费蒂斯学院描述成一个有感染力的荒凉的地方。它名为“公学”，实际上相当于英格兰的私立学校，基本采用英格兰的教育制度。这里更多的孩子都坚信英格兰国教而不是苏格兰国教。

托尼来这里后，开始时住在他哥哥住的那所楼中。那时，很多公学都有一种非常陈腐的习俗，低年级的学生要为高年级的学生干一些杂务，而且作为严格的纪律规定下来。被派定为高年级学生做事的低年级孩子叫“费哥”，实际上就是仆人。托尼对这种习俗和纪律非常痛恨。他被派定为管整个年级的大班长当“费哥”。此人叫迈克尔·加斯科伊涅，现在是爱丁堡的律师。迈克尔回忆说，布莱尔是乐观的、能干的：

“布莱尔要给我擦鞋，把我的军腰带擦干净并在上面涂上黄铜色的油。如果我看着不满意，就把它扔回给他。如果下午是体育活动时间，他还要为我把玩橄榄球的全部用具都摆在床上，或者如果是打板球，就摆出我的白色球服……我们经常要求他们为我们准备吐丝（面包片），必须是一英寸厚，比这薄了或厚了都不行，还得抹好大量的黄油和果酱。每当此时，布莱尔都会冲进隔壁的厨房，制出特别好的吐丝来。”

虽然加斯科伊涅没有发现布莱尔对待他有任何的敌意和不情愿，然而布莱尔却从内心里讨厌侍候人，终于有一天他忍受不住了，以致于逃离了学校。为此事，他父亲还被召来了去见校长。校长麦克英托什博士说，托尼·布莱尔必须接受学校的规章。布莱尔本人对自己这次违纪行为的解释是，他离开学校仅仅意味着晚返回学校一天左右。这次事件后，学校也采取了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布莱尔在第一学年末时被调到了新建的一座楼。这是一座方形、看上去低矮的白色混凝土建筑。楼主管叫艾瑞克·安德森，现在是伊顿公学的校长。他是个自由主义者，要按“现代公学的模式”管理他的房子。这更符合布莱尔的心愿。

展示体育和表演才能

起初，布莱尔像他在德汉姆考瑞斯特学校那样守规矩和因袭传统。这从他在体育活动中的成就可以看出。在第二学期，他在校橄榄球队得到了个位置。在第二学年，1967年夏季学期，他当上了校板球队的队长。以后，在他的带领下，他的队赢了7场比赛，输了一次，平了一次。然而，当他长大一些后，打橄榄球和板球，特别是当板球队长，对他来说是太受约束了。他开始迷上了更少规矩的篮球运动，而且打篮球，他还有身高的优势。

第二学年，14岁时，布莱尔被选中在楼里担任一种负点角色的角色。这是楼主管喜爱他的象征，也是少年时代被出乎预料地提升的一种经历。当时的校刊——《费蒂斯人》还注意到了此事，并对之做了评论。楼主管安德森确实喜欢布莱尔，他教布莱尔英国文学。他是位研究苏格兰诗人和小说家华尔特·司各脱爵士（1771—1832）的专家，还是布莱尔所喜爱的小说家。可是，当布莱尔越来越表现出反“成规”的倾向时，安德森就不断地在学校法规的强制力上与他发生争论：“他肯定不是个模范学生。当然，有60个学生，每个人都有点反抗精神，都在试验学校规章的效力从而使之打折扣。不过托尼在这方面是个专家。我认为学校的有关吸烟、饮酒等规章，只要他在场时，就很难贯彻下去。他属于那种你得经常斗争去让他定期理发的孩子之类。”

不过，不管怎样，安德森似乎已将布莱尔能力的某些方面引上了他自己所喜欢的事情上，那就是戏剧。在学校的公共生活中，布莱尔被人记得的主

要方面是，他是一个演员。不管这是否与他神秘的祖父母祖传的演出能力有关，布莱尔很早就知道他能掌握观众。16岁的时候，在安德森的影响下，他同其他5个孩子一起组成了个演出小组，演出并制作“当代戏剧作品”。有人评论布莱尔的表演是杰出的。

除了参加演出小组的活动外，布莱尔还是一个辩论社的成员。辩论社经常讨论一些反映时代特点的主题，如在1967年讨论了越南问题和货币贬值问题，1969年讨论了议会有关罢工的议案和英国对尼日利亚的干涉问题。

学校的“反对党领袖”

在费蒂斯公学，特别是在后几年的岁月中，布莱尔逐渐给自己树立起了具有超凡魅力的反叛者和反主流文化领袖的形象。反主流文化在当时的青年学生中已形成一股潮流。有一个房屋监管人后来将布莱尔描绘成是学校中的“反对党领袖”。他是惹眼的但却是冷漠的，有一张大而傲慢的嘴。比他小的孩子们对他肃然起敬。他总是要跨越规章限制的边缘，但又总能用他的魅力使违规不成为现实。同他住在同一座楼房中的一个小老弟说，当时对学生来说头发是个大问题，学校规定学生不能留长发，标准是不能盖住领子和耳朵，就是要在领子上耳朵后。可是布莱尔有办法，他把黄油等东西涂到头发上，使之下垂在领子里。很多孩子都学他这样做。领带也是个大问题，可是布莱尔的总是松的。另一名校友说，布莱尔对每件事都发出疑问，如“从让低年级学生为高年级学生当‘费哥’到被要求在夹克衫上钉扣子的数量”。绝大多数老师都发现布莱尔是刺眼的：“一些孩子有叛逆精神是由于他们的无知，而托尼有叛逆精神是因为他要怀疑所有我们所遵奉的价值。在寄宿学校里肯定要有大量的规章，诸如白天应该干什么，什么时候应该遵守什么规章。它们必须是简明易懂的。托尼总是对这些规章发出疑问。”

有的老师认为，布莱尔后来的生涯就根植于他学童时的态度。

托尼的哥哥曾当过班长，而且名字还被列在《费蒂斯人》的醒目的“校领导人”的名单上。可是托尼却从未当过班长，尽管他具备当班长的充分条件。按当时学校的制度，凡品学兼优的学生都要当班长，可是布莱尔反对这种制度。然而，布莱尔是个聪明的反叛者，而不是个简单的麻烦制造者。他勤奋努力，博览群书。他的一个老师说他“不是最聪明的那个人，但他有一个好头脑”。他修了英语、法语和历史，成绩都是优秀。正因为这样，他后来才有机会进入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读法律。

另一位老师对他评论道：

布莱尔是反叛者，但却是成熟的一个。他在感情上能够自我控制，总是谨慎小心以免对别人失礼。他平易近人，但又不喜欢让人过多地了解自己，以防人们捕捉住他的弱点。他聪明但不浅薄。他总是迷人的，从不绷着脸或者表现出心绪很坏。他对应如何在他人面前表现自己总是保持清醒的意识。他只是在那些他可以成为“太阳”的场合才乐于在群体中。他很注意门面。他很有洞察力和判断力。别忘了他是个超群的演员。

在费蒂斯公学的后几年，布莱尔的楼主管艾瑞克·安德森对他印象不好，说他很让人生气。1970年，安德森离开该校去艾兵顿学校当校长，由鲍勃·罗

伯特接替他。罗伯特也认为布莱尔是让人生气的孩子，“他是我遇到的最难对付的男孩”。学校里的男孩，挨班长和楼长的揍是常有的事，布莱尔也不例外。不过，罗伯特是费蒂斯公学里揍过布莱尔的唯一的一名教职工。他揍他是因为他持久地轻视学校的规章。罗伯特是位很严格但守旧的教师，他与布莱尔一点都合不来。

他天生一副好身材，16岁时就有6英尺高（1.8米多），是个大个头。当时费蒂斯校园里常播放流行摇滚乐，而且还演出通俗音乐会，对学生们有很强的吸引力。就毒品而论，在费蒂斯几乎没有真正的毒品，学生们可选择的麻醉剂就是烟和酒。就性而论，当时孩子们被允许每周去城里3次，找异性是“进城”的主要吸引力之一。不过布莱尔从不在学校规定的时间进城，以免给人留下自己失足的痕迹，给自己找麻烦。然而他的父亲还是被召去同校长和楼主管谈话，利奥·布莱尔说：“他总是越过墙到卖鱼和炸土豆条的店里与女孩们搭讪。”

情场得意

在他的最后一个暑假，这时他17岁，他遇到了一个比他还具有反叛意识的女孩，叫安吉·亨特。她是苏格兰一个橡胶种植园经理的女儿，出生在马来西亚，与布莱尔相识时才15岁，正在一所私立女子学校读书。她与布莱尔从未结伴出去过，但从两人相识后便成了好朋友。就在布莱尔离开费蒂斯前后，1971年，她因不遵守纪律而被学校开除。她像布莱尔一样，持久地对学校的规章发出疑问，而恰恰是这种疑问使这些规章不断完善。被开除后，她去了牛津的圣克莱尔学院，成绩优秀。14年后，她来到已当了议员的布莱尔身边工作，成了他私人办公室的头，并且是他最亲密和最信任的顾问。

费蒂斯公学有一套防范性问题发生的制度，女性几乎不能跨进学校的大门。不过这种防范体系在逐渐被打破。1969年在《费蒂斯人》上登出了一条欢迎“三位女士”来访的醒目消息。1970年秋，即布莱尔最后一个学年开始的时候，学校破例吸收了两个女生，其中一个插在布莱尔那个班里。她名叫阿曼达·麦肯西—斯道特，父亲是当地地方法官和上院中立议员。她后来成了独立制片人。她说：“我是他（指布莱尔）的女朋友。他是如此聪明，如此有魅力，而且非常有趣。他可以戏弄辅导老师而又受不到惩罚。我猜那是因为他比绝大多数人都聪明的缘故。”对布莱尔后来的生活经历，所有费蒂斯公学能谈出他们看法的男孩和辅导老师都表示惊讶，唯有斯道特小姐对他表示理解。她说她对布莱尔加入工党一点都不感到奇怪，他应该这样。布莱尔自己后来说，他是从20岁起——比斯道特小姐认识他时晚两年——才成为左翼的（确切说是中左）。在布莱尔于1971年离开学校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与斯道特小姐保持着朋友关系。

社会实习

从费蒂斯公学毕业后，布莱尔的学业间歇了一年。但他并未闲着，而是接触社会，相当于“社会实践”。他先是在德汉姆呆了一段时间，后来去了

伦敦，他从前只到过伦敦一次。他还在法国度过了一段时间。他说在这段时间里，他“涉猎了音乐事业，帮人组织爵士乐音乐会”。此外在建筑工地干了几个月，在巴黎时当了10天的招待。当招待是不成功的。更成功的是，他在法国一家保险公司干了一段时间，当他回到英国时，法语已很流利。

布莱尔不是典型的公学培养出来的人。他虽然学习成绩优异，并且有公学出来的人所应具备的自信心，但他绝不是传统的高才生。他有一种强烈的表现欲和领导欲，但却不是通过当被委任的班长而是通过作反叛者的榜样来体现出来的。他自己对公学制度持贬底的态度。他在1991年说：“公学制度的问题是，你终于成为一个高能力的考试机器，但你必定不能得到很多自信心。”可以说，布莱尔在读公学期间开辟了使自己乐在其中的空间，而不像其他某些政治家和公众形象那样，如温斯顿·丘吉尔、内维尔·张伯伦和查尔斯王子，这些人都读过寄宿学校，但他们的经历几乎没有什么乐趣。总的来说，虽然费蒂斯公学不很令布莱尔满意，但是他的自信心、作风和自我约束力与费蒂斯有着密切关系。

二、牛津大学的摇滚歌星

牛津大学，这所世界最古老、最有名的大学之一，以盛产英国首相而著称，布莱尔是毕业于这所大学的第 30 位英国首相。布莱尔后来的政治生涯不能说与牛津没有关系。在这里，他学到了他赖以谋生和借以从政的法律知识，形成了他的政治、哲学思想和信念，培养出了做为一个政治家所必备的素质。

布莱尔在经过了一年的“社会实践”后，于 1972 年考入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攻读法律。在这里，他为自己树立了两种形象：无拘无束的“小流氓”和认真探索政治、哲学和社会问题的社会主义者。

一个十足的小流氓

在 70 年代早期，就是布莱尔上大学的那个年代，大学中流行着一种风气，就是把自己打扮得怪里怪气。有人把这称做是一种灾难，对那些后来要成为名人的人，那时不是上大学的好时候。本来就有叛逆性格的布莱尔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那股风中。他的头发几乎快垂到了肩上。他父亲回忆说，他第一次去牛津找他——只是偶然地去那里——时，遇见了一个长发大学生，衬衣裂开着露出肚脐，一个大陶瓷十字架套在脖子上，一件黑色人造皮长大衣配着红衬里。“我惊异这到底是谁。然而他却喊道：‘喂！爸爸！。’”

在第二学年，托尼·布莱尔就成了一个叫作“丑陋的流言”的摇滚乐队中的主要歌手。他在乐队中的表现具有戏剧性。乐队中的低音吉它演奏手马克·艾伦把布莱尔在演出时的特征形象地描述为：“从顶读到底，配着整齐刘海的长发——看来有点中世纪的味道；一件只能说是箍在脖子上的、带喇叭袖子的梯恤衫，裸露出一块大面积波纹状的躯干；此外，还穿一双带古巴式女高跟的牛仔靴。这是个活灵活现的出身显贵的流氓的形象。”

由于他父亲的缘故，布莱尔选择了读法律，尽管他本人想读历史。法律是个学起来很乏味的专业，因为它涉及大量死记硬背的东西，一点也不能为智慧自由奔放提供机会。他选择了圣约翰学院却没有什麼明显的理由。这是一个清一色的男子学院，一个相当麻木和保守的地方。而他哥哥所去的白利欧德学院却是更进步、更激进的学院之一。布莱尔在学院里肯定是惹人注目的。他的一个同时代人大卫·查特说：“他看起来与众不同。他不喜欢干破坏性的事情。他是活泼可爱的。”尽管蓄着长发，穿着令人难以容忍的衣服，但他仍然是一个谨慎的反叛者。他喜欢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但不去冒犯别人。

布莱尔参加了圣约翰学院的射箭俱乐部。其实该俱乐部和射箭没有任何关系，它完全是个聚餐俱乐部，不过却是牛津最古老的聚餐俱乐部。它的主要职能是召集聚会，特别是在夏季。有时会员们哼着小调绕圣约翰的公园走。这只不过一种淘气行为。会员们有时还都戴着硬草帽，穿着夹克衫。会员都是男性，妇女只是在“女士日”时被允许作为客人参加活动。

在第一学年中，布莱尔常常同苏意·帕森斯小姐一起出去玩。帕森斯小姐被认为是牛津最美的女孩之一，她与布莱尔的朋友安吉·亨特一起在圣克莱尔学院读书。据布莱尔的一个朋友讲，他在牛津期间还有几个女朋友，而且常常被更多人的追求。

出色的歌手

不过布莱尔是相当敏感的年轻人，他从来不与性问题沾边，他还决心戒绝“毒品”，在摇滚乐中严肃起来。他在“丑陋的流言”乐队中表现突出，他有副真正的好嗓子，非常高而有力，特别是他知道所有的歌词。更令乐队中其他人佩服的是，他有着高超的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有一次演出中，鼓突然出了毛病，节奏乱了起来，队员们都有些惊慌失措，呆住了；观众们不知怎么回事，焦急地望着队员们，队员们也望着观众。恰好这时，布莱尔站了出来，巧妙地处理了这种窘况。他抓过麦克风对观众说：“我们是‘丑陋的流言’，希望你们过得愉快。我们现在是在××地演出，由一个爵士联盟和一个弦乐四重奏队资助。欢迎你们来！你们过得愉快么？我在台上听不见你们说什么。你们在基督圣体节过得好吗？”他几乎把所有搪塞的话都用上了，队员们为他能把所有这些废话聚到一起而感到惊讶。他们趁机在后台忙来忙去，将鼓修好。

应付类似这样的场面几乎成了布莱尔的专利。在后台对付诘难者；在前台打发那些带着贝雷帽的学生歌迷们；与那些如潮水般拥在台下的穿着印花服装的姑娘们周旋，而这些姑娘95%都叫阿曼达（布莱尔最近的一个女朋友就叫阿曼达）。乐队的人都认为，这个小伙子是真正有幽默感、迷人、有魅力的。一个叫艾伦的乐队队员回忆说：“我能记得，他站在后排，拿着我的低音吉它……我看着他，想道：‘我们这里有一个不平凡的少年爱神领衔歌手。这家伙将去向何方？’”

除了参加摇滚乐演出外，布莱尔还参加演一些滑稽时事讽刺喜剧和小品。为了演出这些剧，他还必须做出一定的让步。因为这些剧都创作于30年代，剧中的角色都不是留长发，所以他要把头发剪短才行，而他又不愿意那样做，最后达成妥协，他在登台时必须把头发扣在帽子底下。

认真探索政治问题的有志青年

在牛津，托尼·布莱尔的另一面却不大为其他摇滚乐队成员和那些歌迷所了解，这就是他对道德与宗教问题的探索。与在费蒂斯公学时不同，他虽然还是个反叛者，但已不是表现为对一切都发出疑问，而是要探寻出一条反传统的路来。除了演出外，布莱尔的绝大多数业余时间都是在学院外度过的，主要是在酒吧和其他学院的聚会中。他参加了许多社会团体，而且在其中努力工作。他读了大量的书，而且对法律系学生来说内容是相当广泛的。他对政治思想非常感兴趣，读了很多有关这方面的著作，从里查德·淘尼（1880—1962，英国经济历史学家）到威廉·莫里斯（1834—1896，英国诗人、艺术家，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与圣约翰学院的少数对政治和宗教感兴趣的人建立了密切关系。这个非正式的志同道合者的小集团却是以一个澳大利亚的成年学生为核心的，他叫彼得·汤姆森。布莱尔说他是“迷惑人的”和“对我影响最大的人”。

布莱尔是通过另一个正在读PPE（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澳大利亚

人杰弗·盖洛普结识汤姆森的。布莱尔与盖洛普一起在一个叫“圣约翰演员”的团体中编写并制作小品，在第二学年开始时，布莱尔制作了一个小品，盖洛普在里面扮演一个澳大利亚乡下佬。后来，盖洛普介绍布莱尔与汤姆森相识。汤姆森那时 36 岁，正在圣约翰读神学，是澳大利亚一个圣公会教堂的牧师。

这个“非常紧密的朋友团体”的引力中心就是汤姆森的“巨大热情”以及咖啡和香烟。这个团体中的学生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指点江山，即将他们的理论观点武断地发表出来。一般一周聚会两到三次，汤姆森圈子中的各种人物都将到场，通常是在他的房间里，高谈阔论一直到深夜。这个小团体中的人有杰弗·盖洛普、马克·佩里、大卫·加德纳（后来是《金融时报》住布鲁塞尔的通讯员）、奥拉亚·奥突纳（乌干达难民，后来在 1984—1985 年当过乌干达外交部长和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和安卧尔·维拉尼（印度研究生）。这些人的共同点是对英国传统教育制度不满，然而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是口头革命派，只不过是摇滚乐和射箭俱乐部中造反而已。

团体中的盖洛普和汤姆森两人是很“政治化”的人。盖洛普是“国际马克思主义集团”的成员，是个有献身精神的革命者，他自己说他是“左翼的非常活跃分子，推进马克思主义路线”；汤姆森是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加德纳说“我认为我恰好属于工党左翼”；马克·佩里对政治和宗教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是“反成规的自由左翼分子”。汤姆森的神学是广泛的、反传统的和政治激进主义的。只有奥突纳是英国低教会派的基督徒。在来到牛津时，布莱尔的宗教信仰是有名无实的，他的政治立场也未形成。卷入汤姆森圈子的讨论使他把这一切都改变了。

汤姆森他们经常反复讨论的有三个内容很宽泛的题目：神学与政治的关系；改革或革命；社会的概念。这最后一个论题引发于汤姆森对一个苏格兰哲学家的推崇，他叫约翰·麦克马瑞，汤姆森在神学院时读过他的作品，他对布莱尔的思想形成也影响很大。布莱尔说过：“如果你要真正了解我是怎样一个人，你必须看一看一个叫约翰·麦克马瑞的人，全在那儿。”

从某种意义上说，布莱尔的社会观念直接源出于麦克马瑞。麦克马瑞被认为是 30 年代英国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家之一，曾在伦敦大学当哲学教授。由于他的语言清晰，很受大众的喜爱，经常定期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电台上发表讲话。但是当他移居到爱丁堡后，就逐渐销声匿迹了，到二战时，几乎没有多少人还记得他。

汤姆森对麦克马瑞非常推崇，认为他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汤姆森说：“他探讨共同体这个概念。他曾说，人类存在最崇高的境界是友谊。应该用它来取代那种‘如果你为我做这，我将为你做那’的交易关系的观念。我们应该发展这样一种共同体意识，在那里，人们为相互的福利而承担义务。”

麦克马瑞把他的哲学目标定为向现代哲学的出发点挑战。现代哲学认为人首先是个体的，然后他或她才选择如何与共同体中的其他人建立关系。麦克马瑞坚持人只有在同他人的关系中才能存在。实际上，他的“以他人为中心”的观念不是对现代哲学的挑战，而是对自由主义的挑战。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是：个人应当是自由的，可以做任何他想干的事，只要他们不伤害他人。麦克马瑞认为，这种观点是从一个不真实的假设出发，因为它假定人们存在于真空之中，而且只有在他们选择这样做时才会侵害他人的利益。

麦克马瑞认为，自由不可能是绝对的，因为人的个性是通过他们在家庭和共同体中的关系而形成的。布莱尔在 1993 年发挥了麦克马瑞的这个观点，他说：“在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中，我们并不失去我们的个性；通过那些关系，我们至少部分地获得我们的个性。”在麦克马瑞的观念中，哲学应该以作为社会缩影的家庭为起点。

麦克马瑞的哲学正好把亚当·斯密的“社会与自爱是一致”的观点颠倒了过来。斯密认为，如果我们追求我们的自我利益，我们会使共同体受益。而麦克马瑞则认为，通过追求共同体利益，我们会使共同体中的个人受益，包括我们自己。

实际上，麦克马瑞的学说并不是最早向西方的传统自由主义挑战的哲学。本世纪的一批英国伦理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如 T.N. 格林和 L.T. 霍布豪斯，也相信利他主义是自我利益的最高形式。霍布豪斯的观点可以概括为：男人和女人的特征应该这样形成——他们像为自己那样来为他人认真而勤奋地工作。

麦克马瑞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把这种基督教社会主义和对自由主义批判联系起来。这种自由主义后来实际上为保守党人所继承。所以确切他说，麦克马瑞的哲学是基督教社会主义和对自由主义保守党人的批判的结合物。这种哲学构成了后来布莱尔的与众不同的政治哲学思想的基础。布莱尔说：“自从我读过麦克马瑞的书之后，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时间，但是他的书仍然摆在我的书架上。我同意他是有影响的，甚至是非常有影响的。这种影响不是在细节上，而是在一般概念上。”麦克马瑞的“以他人为中心”的哲学使布莱尔的政治哲学思想定下形来。布莱尔认为，麦克马瑞的哲学“对我似乎是人类状况的切合实际的解释。在基督教哲学理论和中左政治之间似乎存在一致性。在那时，我虽然还没有把这些事情搞清楚，但它们一直对我有影响。它们是使人成型的影响。”

麦克马瑞在 30 年代时曾研究并翻译过卡尔·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他写道：“社会越多地接近于家庭模式，就越以共同体的形式来实现，或者像马克思所说的，就越接近一个‘真正的人类社会’。然而，在被早期马克思影响时，麦克马瑞却拒绝马克思晚期的思想，特别是有关攻击宗教的论述。

麦克马瑞在宗教上造诣很深，尽管他直到很晚才正式加入教会。他的普遍共同体的幻想从根本上说是宗教性的。到了他的晚年，他更强调宗教在改造世界上的作用，而认为政治不是使世界变得更好的方式。但是他的这种思想没有对布莱尔产生影响。

汤姆森牛津小圈子中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人人都像关心自己那样关心他人利益的社会。然而在如何建立这样的社会问题上，他们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他们经常辩论的问题是“如何把共同的理想变成现实”。盖洛普和加德纳主张用政治革命，汤姆森则争辩要用精神更新。当时布莱尔的观点并不明朗，汤姆森总想争取到布莱尔的支持，他劝布莱尔去教堂参加活动。他说他最初遇见布莱尔时，他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虔诚的基督徒

关于布莱尔早年是否信教的问题，说法不一。他父亲从来未信过教，他母亲是不是教徒无从考证。他的小学校长坎农·约翰·格儒伍说布莱尔是个笃实的教徒，但在费蒂斯的一个同代人却说布莱尔最不感兴趣的就是宗教，宗教是“你同他联系的最后一件事”。在爱丁堡时，布莱尔曾在贫民区参加学校的“校外服务”，管理这项工作的学校牧师罗纳德·塞尔比·赖特说：“托尼对宗教并不真感兴趣。”布莱尔自己则说：“我曾一直信上帝，但我变得有点脱离它了。我不能理解它的意义。彼得（汤姆森）把它看成是有关政治的，而不是神学的。宗教变得更少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我开始在更多的社会内容上看它。”

在牛津，布莱尔在第二学年底时开始去学院的小教堂，而且是国教教堂。他准备让圣约翰的助理牧师格雷厄姆·道给他行坚信礼。当时道很高兴，因为他认为布莱尔来自一个对社会活动感兴趣的团体，而不是更普通的英国低级教派的团体，或者安分守己的知识分子团体。他还认为布莱尔正在寻求某种有活力的东西，以便去改变社会，并且给人一种是已经发现某种让人激动而又新鲜的东西的大人物的印象。布莱尔虽然不反对道的一些神学观点，但是更对实际改变社会感兴趣。对布莱尔来说，社会主义似乎已成了第一位的东西，不过他把社会主义同基督教联系起来。道至今仍保存着布莱尔借给他的书，如《什么样的革命？》、《一个基督徒和共产主义者的对话》。

布莱尔一直保持着宗教信仰，不过这很少为人知晓。在牛津时，即使是他最好的朋友、无神论者马克·佩里，虽然知道他是个基督徒，但不知道他行过坚信礼。在1991年12月访问纽约时，高登·布朗的顾问杰弗·穆尔根对一件事感到很惊讶，就是在一个又累又困的星期六夜晚后，布莱尔在刚黎明时就起来去找教堂。1992年，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约翰·史密斯成为工党领袖后，布莱尔的宗教信仰才变得明朗起来。

远大的政治抱负

在牛津期间，布莱尔的政治抱负已开始形成。他开始同别人讨论进入内阁的可能性。奥拉亚·奥突纳说，对这一点“他非常上心。那肯定是他认真讨论的一种选择之一”。布莱尔开始考虑将来，并形成了他要做某种事情的观念，这种事情明显地与他的伦理目标，即利他主义有关，而不是一般的生涯。

然而，布莱尔在形成他的政治抱负时，还没有明确地通过现存政党来实现抱负的观念。虽然圣约翰的政治组织都是左翼的，但绝大多数人既不对工党感兴趣，也不对学生政治帮派感兴趣。人们认为学生政治是现存政治中最有害的一种。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在学生中影响较大，在左翼新思想中占支配地位。正如彼得·汤姆森说：“我们都真的对马克思感兴趣。”然而他又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正确答案。盖洛普所参加的“国际马克思主义集团”的宗派主义的“正确”路线“把我们吓得屁滚尿流”。“我们没有办法去走马克思主义集团的少数人的行动路线。那一定是不能联系人民的某种东西。”

当时，英国政党政治的背景是，两大党一致的政策，即“共识政治”已开始失去效力，无论是爱德华·希思的保守党政府还是哈罗德·威尔逊的工

党政府都找不出解决英国所面临的各种危机的办法来。1970年2月在保守党上台前，希思领导的影子内阁曾在塞尔斯顿饭店集会，做出了要搞自由经济政策的决策，似乎给人一种找到了新办法的印象。可是在希思上台后，迫于国内各种危机的压力，又放弃了既定的方针。然而，危机不但未消除，反而愈演愈烈。1973年的中东战争使石油价格几乎成4倍地上涨，与此同时，国内煤矿工人罢工不断，为了维持能源供应，希思宣布“三天工作周”。在内外压力的夹击下，希思政府在1974年2月的大选中下台。然而工党虽然赢了大选，但得票率和获议席数都明显下降，两大党失去的选票被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政党夺了去，两大党都给人一种走向衰落的印象。可是工党并未看到自己面临的危机，它仍然在旧思想的束缚下，在欧洲许多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已放弃传统的政策后，工党还要在英国推行国有化。

在英国，要想从政，你就必须参加某一个大党，否则将一事无成。可是直到1975年离开大学前，布莱尔还未做出对政党选择的决定。就他当时的思想状态而言，保守党和自由党是不可能被考虑的。当时他对托洛茨基的著作很感兴趣，并试图对之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但是从未深入过，而且东欧所发生的事情又使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可是，在被问到是否打算加入工党时，他的回答是：“噢，不，那会被认为是可怕的右翼。”

像他的宗教信仰一样，布莱尔的社会主义倾向对那些不太了解他的人来说也是隐蔽起来的。在他作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特别是工党的政治家出现时，很多他的同代人都感到惊讶。布莱尔在牛津时虽然已有了坚定的政治立场，但还不是一个活跃分子。在1974年的两次两大党势均力敌的竞选中，他都没有卷入其中。也就是说，在工党获得了胜利的两次大选时，他还不是它的成员。在牛津，他没有在大学“工党俱乐部”里做任何事情。他所参加的政治活动都微不足道。在第一学年，他参加了在公共场所的占座抗议活动，其目的是为了保住大学一级的学生联合会不被降为学院一级的联合会。在后几个学年，他参加了两次反对“民族前线”（一个法西斯组织）的示威游行，该组织曾在牛津市政大厅组织多次会议。他还被一个女朋友硬拉去牛津学生联合会的辩论社看迈克尔·赫塞尔廷（现保守党副领袖，党内左翼首领）发表演讲。当时赫塞尔廷正在他的上升时期，刚刚在保守党年会上出了风头。他给布莱尔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演讲并没有使布莱尔感动。

1974年夏，布莱尔第二学年结束时，盖洛普和汤姆森离开牛津回到了澳大利亚。在他俩走之前，刚刚考完试之后，他们3人一同去苏格兰进行了一次旅行。同行的还有从澳大利亚赶来的汤姆森的妻子海伦，以及盖洛普的女朋友。他们全都挤进一辆租来的汽车里，驶向爱丁堡。他们经过了3年前布莱尔离开的学校，然而布莱尔对母校并没有多少热情。倒是汤姆森对爱丁堡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经过多方打听，他们找到了约翰·麦克马瑞的住处。鉴于麦克马瑞已84岁高龄，大概身体相当虚弱，他们决定汤姆森一人走进去见他。这位自信而健谈、信仰麦克马瑞15年之久的澳大利亚人被这位老者震慑住了，在他面前有些结舌。他说：“这个矮老头神志十分清楚，是个严厉的不吸毒者。”一年后，这位苏格兰哲学家去逝了。

这次旅行后，汤姆森回到了澳大利亚，继续在学校当牧师。他几乎不知道他曾帮助一位潜在的国家领导人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当然他同布莱尔

仍保持着联系，布莱尔每次去澳大利亚都要去看他。1990年，就在布莱尔与高登·布朗一起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他们俩又见了一面。汤姆森说，他“自从离开牛津后，思想状态已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实质性的东西未变。他已深化他原有观念的政治方面的理解。如果他能使人民和他在一起，他能做伟大的工作”。汤姆森于1993年，57岁时退休，然后去了东北维多利亚的山区经营牧场，“照看我的不断增多的牛”。

在汤姆森离开英国的同时，杰弗·盖洛普放弃了马克思主义。1986年他当上了西部澳大利亚的州议员，并成为澳大利亚工党一个右翼派别的成员。

在牛津的最后一年，布莱尔与马克·佩里同3个女大学生同住一套房子里。佩里称这所房子是“相当潮湿、极其肮脏、非常寒冷的房子”。

布莱尔在牛津的学术生涯总起来说是相当不连贯的。圣约翰学院的院长里查德·萨森先生（一位杰出的中世纪历史学家）在“院长收藏”（一种由院长写的年终报告）中对布莱尔这样描写道：

“1973年早期：组织性很好。有把事情拖到最后一分钟才做的倾向。但对很多事情有强烈兴趣。

1973年6月：很乐意做组织工作，但不很令人满意。

1974年2月：似乎异常幸福。

1974年12月：有真正理解专业原则的迹象。

1975年3月：透过他的一些思想可以看出，他的思维还不够严谨。”

布莱尔于1975年6月从牛津毕业。据他的律师办公室的领导亚历山大·欧文说，他没有能取得第一级成绩，因为他根本没有尽力。而马克·佩里却认为这个成绩对布莱尔来说是公平的。他认为布莱尔取得了好的第二级。

在布莱尔离开牛津时，他肯定是左翼分子，并已准备把不受欢迎、正在衰落中的工党作为他政治兴趣的载体。他的信仰虽然还正在形成过程中，但已经可以把他描述为伦理社会主义者。约翰·麦克马瑞对他有支配性的影响。他还读了一些其他伦理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著作。

很多人的政治思想是通过他们父母的影响而形成的，但是，这种情况不适合于布莱尔。布莱尔的小学校长坎农·约翰·格儒伍说：“父亲对此还相当执著，说：‘噢，他不久将改掉他的信念。’但是他没有。”布莱尔的基本信仰从他20岁后就没有改变。他是一个世俗保守党人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儿子。

布莱尔毕业两周后，他的母亲死于喉癌，年仅52岁。如果说布莱尔的社会主义倾向还受了一点家庭影响的话，那就是母亲的善良和对社会的关心。在他年轻时，没有太多地去看他的父亲，但他母亲总在他的心目中，他们俩很亲密。彼得·汤姆森曾在德汉姆与布莱尔家一起住过，他说：“完全明显地，她给托尼打点行装，而托尼敬慕她。她还有非常深的社会意识，并且我认为托尼已变成她要他做的那种类型的人。”母亲的去逝对布莱尔刺激很大，这不仅在于他对母亲的死感到悲伤，还在于人必然要死的这一点使他突然意识到生命是有限的，因此如果你要干成某件事，就必须行动起来坚持不懈地干下去。

很多人在离开大学的时候，并不真正知道他们应该干什么。布莱尔也是这样。他进入了律师界，来到伦敦，开始了他的开业律师培训，然而这只是

由于法律以外的其他领域对他缺乏强烈的吸引力，并不是出于别的更有意义的动机。当一名开业律师（他再次继他哥哥的后尘），而不是一般的初级律师，对布莱尔来说可以使自己有更多的表现自己的机会。他的通俗歌星的日子结束了，于是他把法律当成了使自己出头露面的基地，而不是一种事业。当然客观上，开业律师的劝导性公开讲话技巧是从政的很好的基础训练。事实上，议会下院议员中比任何其他职业群中有更多的律师。

对布莱尔进入律师界的动机有不同的说法。他自己说，在牛津时，他还没有进入议会的想法。可是杰弗·盖洛普却说，在布莱尔的第二学年，“他开始把政治看成他的将来，他开始做好从政的准备”。马克·佩里也说，当他同布莱尔一起迁到伦敦时，政治肯定在他头脑中成了他的职业。

三、选择工党

在英国，许多政治家的成长道路都是：毕业于名牌大学—当律师—加入某一个大党—当下院议员—进入内阁或影子内阁。布莱尔就是沿着这样一条路线走下来的，不过他开始律师生涯和入党几乎是同步进行的。

布莱尔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不久，就加入了工党，这一举动使那些不太了解他的人感到惊异。有人认为布莱尔是个没有根的政治家，其实不是这样，他并不是天外来客，一夜过后突然坐在了工党领袖的宝座上。要想了解布莱尔为什么选择工党，有必要对工党的历史作一简要的回顾。

从劳工运动中产生的政党

英国工党与本世纪同龄，建于1900年。1900年2月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上，成立了一个组织——劳工代表委员会，当时创建这个组织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创建了后来在英国政坛上居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工党。直到1906年正式使用工党这个名称之前，人们并没有怎么注意这个劳工组织。工会在成立这个组织时起了最主要的作用，所以实际上是工会缔造了工党，正因为这样，工党与工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人说，工党只不过是工会在议会中的政治代表。当初工会创建工党也正要通过工党使工会代表进入议会。参与创建工党的还有几个社会主义团体，它们是独立工党、费边社和社会民主联盟。这几个团体的政治主张有很大差异，其中社会民主联盟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不过由于劳工代表委员会没有接受它提出的“应在承认阶级斗争，并以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手段社会化为最终目标的基础上组建工人政党”的议案，便于第二年退出了该委员会。独立工党比较有力量，起初在工党中发挥重要作用，工党的许多领导人都出自这个团体。30年代，独立工党从工党中分裂出去后，费边社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了工党主要思想库和干部培养基地。

这个新成立的劳工组织虽然很不健全，但却显示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1906年1月大选，劳工代表委员会推出50名候选人，出人意料地获得29席，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劳工代表委员会第一次组成了自己独立的议会党团，并在这一年的议会召开时，采用了“工党”这个名称。不过，此后直到1918年前，工党一直在徘徊中前进，虽有所发展，但不显著。其根本原因是它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和纲领，也谈不上有理论基础，当时创建工党的人也没有明确的建党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它还不是真正的政党，只是职工大会在议会中的一个代表机构，目的只是把工人代表选进议会，去争取通过一些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立法。

1918年，工党宣布了它的社会主义目标。因为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激发了英国人民向往社会主义的热情。这一年2月，工党代表大会通过了费边社领袖悉尼·韦伯起草的新党章。党章第四条第四款规定党的目标是：“要使从事体力或脑力劳动的工人获得他们的全部劳动成果并享受最公平的分配，从而使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和可以实现民主管理及控制企业与公用事业的最佳体制成为可能。”同年6月，工党大会还通过了韦伯夫妇起草的党纲——《工党与新社会制度》。党纲中申明“工党要尽最大努力使私有制和被它所毁灭的千百万生命一同埋葬”。同时提出新的

社会制度的基础是：为了一切劳动者的利益；实现世界上每个人在物质条件上的平等；广大人民在最大限度民主上参加政治、经济管理。党纲还提出实现社会改造的四项原则：第一，实施“国民最低生活标准”，包括最低工资、起码劳动条件和 48 小时工作周；第二，工业的民主管理，主要是强调工业国有化的必要性；第三，国家财政政策的改革，主要是对高收入者征收重税来补贴社会公益事业，征收直接资产税以偿还部分战争费用；第四，剩余财富用于公共福利事业。

1918 年党章和党纲使工党具备了一定的社会主义目标的纲领，同时工党也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这时的工党，在思想上、理论上基本是受费边社会主义的支配。费边社会主义虽然同科学社会主义是对立的思想体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但它否定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度，主张通过渐进的方式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改善劳动者的生活和地位。

1918 年党章和党纲的制定被认为是工党的重建，这对工党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在这一年 12 月的大选中，工党共提出了 361 名候选人，比过去最多的一次多 4 倍还多（1910 年 78 名）。大选结果，工党获得 57 个议席，比过去多出 15 席。更为重要的是，工党在许多选区中的支持力量已超过自由党。

工党的辉煌岁月

重建后的工党显示出了左派的特征。最突出的例子是 1920 年在工党的支持下职工大会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英国结束对苏俄新生政权的干涉。伦敦码头工人在其领袖欧内斯特·贝文的率领下采取行动，宣称如不将“傻乔治”号轮船上运往波兰的军用品搬走，就拒绝为该轮装货。这次行动后，一个“行动委员会”成立了。工党和工会的抵制在改变劳合·乔治政府的政策和进一步防止英国干涉苏俄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

1922 年是工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英国政党政治史上的重要分界线。在这一年 11 月的大选中，工党在多数选区都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共 414 名。选举结果，工党获得 142 席，比以前增长了一倍还多。虽然保守党在议会中仍占明显多数，但工党席位总数已超过自由党，工党成了议会第二大党和第一反对党。

在 1923 年的大选中，工党总共获得 191 席，比前一年多 49 席。这是个不小的进步。保守党虽然得的议席最多，为 258 席，但未过下院席位总数（606 席）的半数。在自由党的支持下，工党以少数党的资格组成内阁，开始了它第一次执政的生涯。历史上第一届由工人选票推举的社会主义者为首相的工党政府诞生了，尽管是少数党政府。当时的中国进步人士胡愈之先生撰文写道：工党内阁的出现，“这是一场革命。而且这次革命意义重大，或者竟不在 1789 年的法国革命、1917 年的俄国革命之下”。

麦克唐纳为首相的工党政府由于是少数党政府，所以不可能完全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它在行动上受到了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很大制约。它的社会主义纲领没有得到直接的施展，有时还不得不做一些与其社会主义目标背道而驰的事。然而，工党政府还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做了一些有利于工人阶级和

其他劳动群众的事情，如救济失业、改善社会福利设施、改善卫生和教育设施。麦克唐纳政府最大的成就还是在外交上，特别是在对苏政策上。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一直处在西方大国的封锁之中。列宁早就盼望与英、美等国建立邦交关系，但是始终遭到两国资产阶级政府的阻挠。1920年2月21日，列宁在与英国工党领导人兰斯伯里的谈话中，表示愿意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或美国总统威尔逊会谈，消除对立。列宁甚至让兰斯伯里电邀劳合·乔治赴莫斯科会谈，和平解决争端。但劳合·乔治根本没有诚意。直到1924年工党上台前，无论是英国自由党还是保守党政府都没有承认过苏俄政权。而麦克唐纳工党政府上台仅1个月，便于2月1日无条件地正式承认了苏联，并主张尽快谈判解决两国间的争议问题。工党政府的这一壮举，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其他资本主义大国纷纷效法英国，形成了一个承认苏联的浪潮，彻底改变了苏联在外交上被动、孤立的局面。继英国之后，意大利、挪威、奥地利、希腊、瑞典、中国、丹麦、墨西哥、法国都在当年承认了苏联。

麦克唐纳工党政府在正式承认了苏联之后，便主动为订立正式条约而作出努力。4月14日，以赖柯夫斯基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在伦敦同以首相兼外交大臣的麦克唐纳为首的英国代表团开始谈判。经过谈判，双方基本上接受了英国提出的方案，并于8月8日签订英苏一般条约和通商条约。条约首先激起保守党人的强烈反对，他们坚持在下院辩论前不许签字。而不经政府签字，条约是无效的。麦克唐纳以积极的态度推动批准条约的工作。他表示要进行一场争取条约通过的战斗，要制止他们把条约否决。在议会辩论时，许多自由党人也加入了反对英苏条约的行列。然而，麦克唐纳并未屈服于这种压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后他以辞职来要挟反对派，终于通过英苏条约。对工党政府在建立英苏邦交中做出的贡献，苏联外交部门也承认说：“这为苏联同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建立新的关系开辟了道路。”

工党政府同苏联建交影响了它的执政地位。保守党抓住这个机会大造舆论，说工党政府屈服于左翼的压力，接着便开始了强烈的反苏宣传，这影响了许多原先同工党合作的自由党人，使他们同保守党人联合起来推翻工党政府。在1924年10月的大选中，工党失败下台，保守党获得显著胜利。

1929年，保守党内阁任期届满，6月举行大选。这时的工党，虽然自身状况不太好，内部独立工党分裂倾向严重，财政收入情况不佳，党员人数下降，但是由于当时经济危机已经到来，失业情况严重，人们对执政党普遍不满。大选结果，工党第一次成了议会多数党，获得288个席位；保守党得260席，自由党仅得了59席。工党再次上台执政，但还是少数党政府，因为它的席位未占半数以上。新的工党政府还是由麦克唐纳组阁。由于还是少数党政府，受制于议会其他两党，工党政府在内政上没有什么成就。值得称道之处还是在外交上。工党的对外政策确实有自己的全新风格，与保守党大不相同。最带有政治敏感性、与保守党针锋相对的就是处理英苏关系问题。1927年，保守党政府将工党建立起来的英苏外交关系断绝了，当时工党在议会为苏联驻伦敦的外交人员饯行。1929年它刚一执政，就立即恢复了英苏邦交关系。

第二届麦克唐纳工党政府只执政了两年时间，便在内外交困中垮台了。1931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又火上浇油，最终导致工党内阁的垮台。1931

年8月23日，麦克唐纳辞职，次日清晨，他奉英王之命组织了一个得到自由党和保守党支持的“国民内阁”，他任“国民内阁”首相。近中午时，麦克唐纳向他的工党同僚们宣布了他的令他们惊讶不已的决定。很多原工党内阁成员未参加新内阁。领袖“背弃”了自己的党，于是党开除了自己的领袖。分裂使工党的力量一度下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工党的力量才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30年代，在战争的危險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工党表现出了自己是维护和平的中坚力量。在慕尼黑阴谋时期，全国劳工理事会公开声称反对向希特勒让步；工党议会党团对慕尼黑协定投了反对票。据说丘吉尔还为此事打电话给艾德礼说：“你们的声明给不列颠民族增了光。”有好几次，工党和工会的三个执行机构——议会党团、全国执行委员会和总理事会，要求张伯伦政府改变政策。大战爆发后，开始工党决定不参加政府。到1940年4月，张伯伦的国民内阁领导作战不利，使盟军遭受惨重挫折，这时在保守党内形成了一个与张伯伦对立的新“营垒”。5月，议会举行了一场大辩论，工党决定对政府投不信任票。张伯伦虽经受住了挑战，但他的威信已大大降低。随着战事的发展，迫切需要组织一个联合内阁。张伯伦询问工党领袖艾德礼，工党是否愿意参加他本人领导下的政府。最后的答复是，工党愿意参加由一个人领导下的政府。于是张伯伦立即辞职，首相职位落到了丘吉尔肩上。这样工党就在一个非常时期，以最正统的方式参加了政府，成为参政党。在战时内阁中，工党干得相当出色。5名内阁成员，工党占了两名：即艾德礼和格林伍德。此外，工党还分得了许多其他重要职务，这一方面是由于工党在组阁中起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是工党在社会上有根高的声望。1940年9月，战时内阁扩大为7人，贝文进入内阁。在内阁中组成了一个工党三人小组。战争期间，丘吉尔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战争和外交事务上，国内的许多行政事务都是由艾德礼主持的。丘吉尔出国时，艾德礼作为副首相主持内阁会议。与丘吉尔的内阁相比，艾德礼主持的内阁处理事务迅速，作出决议快而不拖拉。参加战时内阁不仅使工党为战争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而且也使工党的领袖们丰富了治国经验。

到此时，工党已彻底取代了自由党的议会第二大党的位置。英国政坛上罕见的三党竞争的局面结束了。工党仅经过40年的发展，就迅速崛起，突破英国两党制格局的限制，挤走自由党而成为两党竞争的主角之一。工党的崛起与自由党的衰落是政党政治史上人们最感兴趣的事件之一。

工党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是1945年大选的胜利和其后的工党政府的改革。现今英国的福利制度就是那时奠定的基础。现在的许多英国史学家都把1945年作为一个里程碑。

1945年5月，对德战争结束，欧洲战场上的战事停止，战时内阁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两党争权夺利问题变得突出了。丘吉尔估计，大战胜利后他个人的巨大声誉对保守党会有很大价值。于是，他对工党提出了两个方案让其选择，或者马上举行大选，或者把战时联合内阁维持到打败日本。艾德礼考虑到要到秋季工党年会时才能同全国执行委员会商量，然后作出答复，于是提议联合内阁应该维持到秋天，同时工党也可以有较多的时间去组织竞选和准备选民名单等。可是丘吉尔却不讲情面，他决定听从他的保守党竞选顾问

们的主张，坚持要尽快举行选举。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内阁中的工党大臣们只好在5月底前卸任。大选定在7月份举行。

在正式选举前，许多观察家和政治家，包括丘吉尔本人和像斯大林这样的“左派”都认为保守党会稳操胜券。可是，选举一揭晓，一个极富戏剧性的结果使全世界为之震动。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工党以意想不到的绝对优势击败了“战争领袖”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其得票率和下院议席分别超出对手的8%和146席，成为战后英国的第一个执政党。工党的席位增加了一倍，达393席；而保守党的席位则减少了一半，为213席；自由党无可挽回地衰落了。这个戏剧性的变化不但使局外人感到意外，就连工党领袖艾德礼本人也没有这个思想准备。这次大选多年来一直是历史学家们争论和分析的课题。

从根本上说，工党获胜是因为迎合了当时人们希望变革、要求公平的潮流。30年代的大萧条充分暴露了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要求国家干预经济的呼声越来越高。工党高举起国有化、公平化、福利化的旗帜，对广大英国选民有很大的吸引力，为它赢得了用来实现自己目标的第一次实践机会。

艾德礼政府在大选胜利的鼓舞下，在全党一致的支持下，在内政外交上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在内政上，国有化和“普遍福利”是工党的主要施政纲领。

国有化纲领对工党具有特殊意义，在工党社会主义学说中，国有化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和对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要求。这是工党同保守党和自由党相区别的重要标志。

艾德礼政府执政头三年，立即将国有化纲领付诸实践，接二连三地推出8项国有化法案，包括：英格兰银行、煤业、民用航空业、通讯业、国内运输业、电业、煤气业和钢铁业等。除钢铁工业国有化法案因遭到保守党的反对而延至1951年才生效外，其他法案均在议会顺利通过，并于1947—1949年先后生效。工党大臣们在辩论中得意非凡，财政大臣道尔顿竟情不自禁地朗诵起诗作，赞美工党创造“无可比拟的美丽英格兰”的“奇迹”。这些国有企业在整个工业部门中的比重达到20%，这些原私营企业中约200万名工人也为国家全部接收。

社会保障政策是工党社会主义大厦的又一重要支柱。它是“国家干预”思想在分配领域中的延伸。这一套法案包括国民保险法、国民医疗保健法、国民救济法、教育法、住房法等等。社会保障法案本着“一视同仁”的原则，不分等级差异，向所有的人提供同样的医疗服务和“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保障。

维持这套社会保障制度的资金来自政府补贴、雇主交税和捐款以及个人投保等三个方面。艾德礼政府厉行累进所得税，提高最高收入等级纳税标准，降低免税额，仅降低遗产税额一项便使交纳遗产税的人数扩大1/3左右。这些政策对促进社会财富再分配，使其向更加平等方向发展，拯救工人阶级的苦难，缓解社会矛盾起了一定作用，因而受到工人阶级及社会其他阶层的普

冉隆勃、王振华等著：《当代英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37页。

参见王小曼：《战后英国工党的发展道路》，载于张契尼、潘琪昌编《当代西欧社会民主党》，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

遍欢迎。

1948年，工党政府首相艾德礼颇为自豪地宣称英国在世界上第一个建成了“福利国家”。按照工党的解释，“福利国家”的内容是：混合经济、充分就业、全面福利和公平分配。艾德礼认为，工党已找到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一种把个人自由与计划经济、把民主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制度”。

工党右翼理论家克罗斯兰认为“至少在主要方面，到1957年英国已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工党左翼理论家哈罗德·拉斯基认为，他们与无产阶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有着“共同的理想”，“能够领导英国人民解除身上的锁链”，“而英国工人阶级将在全世界促进工人阶级的团结，从而最后赢得新的世界”。

在外交上，工党政府采取联合美国、对抗苏联的政策。它把军事力量日益膨胀的苏联当成主要敌人，积极联合、推动、配合美国走上与苏联对抗的“冷战”道路，促成马歇尔计划的形成和实施，积极配合和推动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工党政府实际上成了“冷战”的急先锋。

艾德礼工党政府时期正是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殖民体系开始瓦解的时期。工党政府对英国的殖民地采取了比较务实的态度，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战后不久它就撤出了南亚次大陆，承认了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锡兰等国的独立，还在美国的压力下撤出了巴勒斯坦，走上了“非殖民化”道路。

艾德礼工党政府是战后以来历届政府中作出重大决策最多、最有特色的一届政府。它的一些重大决策，如国有化、福利国家、加入北约，奠定了以后几十年英国内政外交的基本格局。同时，这届政府还具有象征意义，它表明在英国政治生活中，工党是一个推动改革和进步的政党。

工党政府的国有化和普遍福利政策深受英国工人阶级及许多其他阶层人士的欢迎，因此1950年2月大选，工党再度获胜，继续执政。不过工党所得席位却大大减少。工党虽然得到1326.6万张选票，保守党只得了1250万张，但由于选举制度（英国实行的是单选区多数制）的作用，工党的议席数从原来的393席减为315席，而保守党的则由213席上升到298席。如果再加上自由党的9席和其他党的3席，工党在议会中只拥有5席的微弱多数。与此同时，工党领导核心的成员都年老多病、精力衰退，一些重要领导人不久去世；再加党内斗争激烈，使党的威望下降。领袖艾德礼深感通过立法的困难，只好于1951年10月又举行大选。这次大选出现了奇怪的现象，工党虽然得到空前多数的选票（1400万张），但得到的议席却比保守党少26席（工党得295席，保守党得321席，自由党和其他政党共得9席），保守党拥有17席的多数。工党只好让出政权，开始了长达13年的在野历史。

工党陷入困境

工党自1951年下台后，开始走下坡路，在与保守党的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在60—70年代虽然赢过4次大选，但执政时间累计才有11年时间，而

《泰晤士报》，1948年1月4日。

参见王小曼《战后英国工党的发展道路》，第43页。

冉隆勃、王振华等著《当代英国》，第38页。

且政绩平平。自 1979 年起，竟连续 4 次输了大选，持续 18 年在野。工党如此不顺，一方面是因为不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及时改变纲领政策；另一方面是激烈的党内斗争，自耗了党的力量并转移了党的注意力。

布莱尔成长起来的年代，正是工党走下坡路的时候。1953 年他出生时，工党处于在野地位，党内左右两派正就工党的对苏政策问题斗得不可开交。艾德礼政府的外交政策是由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一手制定和实施的。贝文原来是工会最重要的领袖，在 20 年代领导过工会反对英国政府干涉苏俄革命的运动，那时他是亲苏的。可是二战结束后，他却认为苏联对英国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他推行联美反苏的外交路线，积极推动冷战的展开。但是他的这套政策却遭到以卫生大臣安奈林·比万为首的左派的坚决反对。左派认为，这种对外政策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的味道，完全是保守党外交政策的继续。左派活动家纷纷写文章抨击贝文的外交政策。在工党年会上，左派多次提出动议，要求修改英国的对外政策，对苏联采取较为和解的方针，但都被右派领导拒绝。1949 年，根据北约重振军备的要求，财政大臣盖茨克尔提出了一个增加军事费用的预算案。这时正逢英镑宣告贬值，英国经济面临严重困难，所以在预算案中又提出削减全国疗养费用。比万认为这破坏了他制定的全民免费医疗制度，一怒之下辞去了他在内阁中的职务，以示抗议。另两位左派大臣——贸易大臣哈罗德·威尔逊和供应大臣约翰·弗里曼——因同情比万也一同辞职。左派还反对政府支持美国发动的侵朝战争和重新武装西德的政策。以比万为首的 70 多个工党左翼议员在工党议会党团内部形成了一个反对派，即比万派。他们得到一些选区工党的支持，并利用比万主编的《论坛》周刊作舆论工具。这时，比万派约占工党议员总数的 1/4，党内形成了两派公开对立的局面。1951 年工党在大选中失败，党内斗争激烈、在选民中信誉下降是重要原因之一。

工党下台后，左派不但不吸取教训，反而觉得不再需要照顾党的执政地位了。他们在一些左翼工会的支持下对右派领导的外交政策进行更猛烈的批评，并在许多问题上在议会中与右派作对。1954 年 2 月，工党议会党团就重新武装西德问题进行讨论表决时，左派坚决反对，右派的提案仅以微弱多数获通过。比万为了表示抗议，退出影子内阁。左派的多次造反激怒了右派领导，1955 年，右派领导决定把比万开除出工党议会党团。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 1957 年。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使比万改变了他原来的立场，左右派重归于好。可是工党却于 1955 再一次输掉了大选。

1959 年，麦克米伦保守党抓住英国经济形势较好的有利时机，提前举行大选，又一次击败工党。面对接连 3 次、一次比一次惨的大选失败，在野十几年的处境，工党领导集团一方面觉得必须改变长期在野的局面，因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如果长期不能执政，势必要衰落下去，更谈不上实现什么民主社会主义了。另一方面，他们认识到应该进行一次空前彻底的自我检查，工党失败的原因是党的纲领不能吸引大多数选民。随着英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中间阶级越来越扩大，而工党原有的社会主义目标和国有化方针对这些人没有吸引力，进而把他们推向了保守党一边。为了扭转工党的困难局面，右派领导人主张去掉工党的意识形态色彩，以改善本党在选民中的形象。为此，工党就应该修改含有社会主义内容的党章第四条。而党内左派则与此针锋相对，认为工党之所以成其为工党，就是因为有了党章第四条，绝对不能触动这一条，工党不能放弃公有制原则和实行国有化的方针。

1959年10月大选结束后，面对党内一片沮丧情绪，工党右派领导人再也忍不住了，决定和左派摊牌。盖茨克尔召开特别会议，总结失败教训。他强烈呼吁修改著名的党章第四条中的公有制内容，代之以“混合经济”的内容。由于左派得到了多数工会代表的支持，右派领导无法取得多数的支持，特别会议没有作出决定。

1960年10月，在工党年会上，右派又一次提出修改党章的动议，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多数工会代表反对下，右派的提案被否决。不仅如此，年会还通过决议，无条件地肯定了党章第四条原来的写法，并责成工党执委会起草一个决议，以供未来的工党政府作为实行进一步国有化的纲领。

1963年，布莱尔10岁这一年，布莱尔家和工党都发生了重大事件。布莱尔的父亲利奥·布莱尔因中风失去了说话能力，结束了自己的政治和律师生涯。这年11月，党的领袖盖茨克尔因病突然去世，此时他年方56岁，正处在他的精力和威望极盛的时期，许多人都认为他肯定是未来的首相。盖茨克尔的去世使右派失去了领导重心，结果选出了原属左派、后转变成中派的哈罗德·威尔逊出任工党领袖。这时，工党左右派都感到党在野的日子太长了，如果还不上台执政，将要衰落下去，两派必须停止争吵，拥护新领袖的领导，以争取大选的胜利。这样，两派都有合好的愿望，而新领袖威尔逊本人也具备把两派团结在一起的条件和能力。到1964年大选时，威尔逊在党内的最高权威已是一致公认的。工党给人们的印象是，它至少同它的对手一样团结。1964年10月，工党在大选中以4席多数险胜（工党得317席，保守党得304席，自由党得9席），结束了长达13年的在野时期。党内两派也暂时停止内讧，党内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1966年，这一年布莱尔上了中学。由于威尔逊工党政府在下院中仅有微弱的多数席位，很难有所作为，因此，在当政17个月后，威尔逊决定于1966年3月提前举行大选。布莱尔在学校搞的模拟选举活动中担任了保守党的候选人，虽然表现不错，但却输了。这次大选工党得了363席，保守党只得了253席，自由党得12席，其他小党共得2席。工党在下院有96席的多数，大大超过正常任期所需要的足够多数。然而，选举的成功同时也带来了负面效应。这意味着，工党议员们今后可以在议会中更随意地批评自己的领袖，甚至在议会外拒绝支持他们自己的政府，而无须顾忌会因此而威胁党的执政地位。很快，工党内又战火重开。

工党内部斗争的一个焦点是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问题。在60年代初保守党政府提出加入欧共体的申请时，工党内多数人，尤其是左派持反对意见。在1966年大选中，威尔逊提出了“在条件适当时英国将参加共同体”的主张，遭到左派的反对。经过斗争，威尔逊终于取得了党内多数的支持，于1967年5月再次申请加入欧共体。在议会就此议案进行表决时，工党有35名议员投了反对票，50名弃权。但是，法国戴高乐总统以英镑贬值、英国经济疲软、不宜于此时加入共同市场为借口，否决了工党政府的申请。

工党内更加激烈的斗争还是在内政上。从5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繁荣时期到60年代中期工党执政时已渐渐消逝，经济增长趋于停滞、下降，失业问题严重，通货膨胀率上升，国际支付状况恶化，特别是英镑危机不断，终于导致1967年的英镑大幅度贬值。威尔逊政府为缓和英镑危机而推行紧缩政府开支、提高一些消费品的间接税和冻结工资的政策，引起左派的不满和反对。

威尔逊政府越来越向右摆动，这使党内左派感到失望，于是工党议会党

团内部的左派势力重新集结起来，组成了“论坛派”。在这之前，工党内部就已出现了一些左派组织，不过他们基本都是在议会外活动，并且观点庞杂，步调不一，没有对工党领导权构成直接的威胁。而“论坛派”则是在议会内活动并奋力夺取党的最高领导权。“论坛派”因以《论坛》周刊为活动基地而得名。其成员许多是记者、作家和工会活动家。接替比万任《论坛》主编的富特就是一名知名的记者。“论坛派”的崛起是工党日渐左倾和右派逐渐失势的标志。不过在60年代下半期，“论坛派”的影响还比较有限，其主要活动是批评威尔逊政府的内外政策。

1970年6月，英国举行大选，结果工党失败。工党只得了287席，保守党得了330席，其他各党共得12席。爱德华·希思领导的保守党拥有31席的多数。这次大选结果有些出人意料。直到投票那天（6月18日）的民意测验还显示工党将获得胜利。一些观察家认为，恰好在选举日前3天公布的不好的贸易数字对工党的支持者起了坏作用。但这还不能构成工党失败的全部原因。工党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保守党的状况比以前大为改善，另一方面是工党内部斗争，特别是工会与工党政府的冲突降低了工党的威信。

工党下台后，党内斗争有激无缓。大工会的领袖继续向左倾转变。“论坛派”便同左翼工会以及议会外的各个左派团体互相配合，遥相呼应，开始有步骤地在党内争夺权力，直至最高领导权，以便能够直接参与制订、贯彻党的政策，而不仅仅是充当压力集团。

1974年2月英国大选，保守党希思政府因世界性石油危机的冲击，再加没能处理好同工会的关系，因此威信下降，仅得了297个席位，失去执政地位；工党虽然得的席位最多，301席，但没有占议会总席位（635席）的半数（其他小党得了37席）。工党以少数党资格组阁，威尔逊再次成为英国首相。同年10月，威尔逊宣布进行新的大选，结果工党得了319席，保守党得277席，其他党得39席。工党在下院中的多数席位增到33个，但是十分有限，工党政府的地位并不是非常稳固。新的工党政府面临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整个西方世界正陷入一场以滞胀为主要特征的严重经济危机中，英国自然不能幸免。威尔逊政府原定的目标都成为泡影。而偏偏在这种时候，党内斗争又日益加深。

工党右派在左派步步紧逼的声势面前试图守住阵地，于1974年联合中间派议员组成“宣言派”，同“论坛派”对抗。工党内部斗争升级。这之后，右派还相继成立了“争取工党胜利运动”和“社会民主联盟”等党内组织，以抵抗左派的进攻。然而右派仍处于明显劣势。1976年，威尔逊感到难以应付经济危机和党内斗争加深的危机，以及政府地位日益不稳的危机，于3月份突然辞去职务。继任首相和党的领袖卡拉汉虽属右派并力图为右派支撑局面，但已无力扭转大局。不久，富特当选为枢密院长，在同年10月的党的年会上，他又被选为副领袖。左派已进入最高领导层。

在党处于逆境时入党

布莱尔加入工党的时候，工党虽然处于执政地位，但日子很不好过，党内斗争日趋激烈，政府所面临的危机此起彼伏。1975年，在英国是否留在欧共体内的问题上，工党内部左右两派斗争严重激化，布莱尔就是在这个事件后不久加入工党的。卡拉汉接替威尔逊的职位后，工党政府更加陷入内外交

困之中。对外它同以国际货币基金为形式的全球资本的要求发生了冲突；对内同工会的冲突越来越激烈，以致于发生 1978 年底至 1979 年初的罢工浪潮，促使工党政府下台。而正是在工党处于逆境的情况下，布莱尔却成为党内积极的、有野心的成员。1980 年，布莱尔开始寻求议员席位，而此时，工党内部正潜伏着更为深刻的危机。由此可以看出，布莱尔在党内没有根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他不是没有根，而是正年轻。他周围的年岁较大的政治家都打上了党内旅系斗争的印记。他的政治方向仍然是在 80 年代初左派革命的最激烈的红色热流中塑造出来的。布莱尔在他被选为领袖后说：“就我的阶级背景来说，如果我要做的全部事情是行使权力的话，我应该加入别的党。”

布莱尔入党时，使工党分化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欧洲问题。当 1975 年 6 月 5 日全民公决投票时，他还在牛津。他投票赞成英国继续留在欧共体内，这与国家 67% 的人和哈罗德·威尔逊内阁中的绝大多数人一致，但却和工党内大多数人相抵触。工党左派领袖托尼·本曾提议进行全民公决，后来工党失去政权、党内左翼控制了党的领导权时，他又许诺工党再上台后要使英国脱离欧共体。在这个英国政治的中心议题上，布莱尔个人的信念是前后一致的，尽管在党中央的政策摆向反对欧洲时，他在公共场合不得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十分能干的支部书记

布莱尔来伦敦后的最初几年住在伦敦西部厄尔斯宅第的一个地下室中，同大学时的朋友及律师伙伴马克·佩里在一起，那是只有学生才肯住的地方。此处属于切尔西选区的瑞德克莱夫分选区。切尔西选区的席位是保守党人尼古拉斯·司各脱的安全席位，其临近的芬奇利选区属于保守党的新领袖玛格丽特·撒切尔。撒切尔夫人在这一年 2 月份的领袖选举中被党内现代派推上领袖宝座，并着手进行对保守党的改革。而此时的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于第二年辞职让位于詹姆斯·卡拉汉）正被缠身于在工业问题上的与托尼·本的持久战式的斗争中。同时，工党仍然梦想实现“使财富和权力向有利于工人及其家庭”的不可逆转的转移。工党在竞选宣言中做了上述许诺，而且还要通过已不可能实现的国有化和“计划契约”纲领来实现这个目标。工党及工党政府都忽视了来自于撒切尔夫人的威胁，这位保守党的新领袖正在探寻使保守党和英国兴旺起来的道路，她要求保守党人“相信自由和自由市场，有限的政府和强大的国防”。

切尔西选区工党的瑞德克莱夫支部已死气沉沉。当布莱尔来这里时，正是该支部两名资格最老的党员决定努力使之振兴的时候。这两人是桑迪·普林格尔和提姆·鲍尔顿，他们后来分别是切尔西工党的主席和市议员。那时，他们写信给分选区的全体党员，要求他们出席在普林格尔家举行的会议。

布莱尔是到会的 20 人之一。普林格尔说他“想到有这些年轻人在周围很受鼓舞”。在他主持的第一次会议上，普林格尔成了支部主席，布莱尔成了书记。支部书记是党的选区总委员会的自动成员，总委员会是选区范围所有党组织中最重要的机构，它负责挑选下院议员候选人。这样一来，布莱尔就有机会熟悉工党内部的运行机制，这对政治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普林格尔发现布莱尔“非常聪明和有魅力”，是个“十分能干”的书记。他们成了相当要好的朋友。普林格尔认为布莱尔是个“有能力的小伙子”，他的政治立场像老的左派或论坛派（有别于新的更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工党左派）。普林格尔说：“在他对待成规的态度中，他有明确的激进观点，并且对成规有强烈的不敬。”

工党的律师

在加入工党的大约同一时间，布莱尔还加入了工党律师协会，这是一个建于1949年、已成为工党集体党员的组织。在协会成员名单中，布莱尔的身份是“法律学生”。布莱尔于1975年9月开始学习为期一年的法律课程。

为了实习当开业律师，通过律师考试，学生们必须在一系列事务所中取得“学徒”的资格。事务所实际上就是一群开业律师合用一间办公室。在那时，事务所不给学徒们付薪水，所以伦敦律师协会（拥有律师资格授予权）给他们提供奖学金。正是为了争取奖学金，布莱尔邂逅后来成了他夫人的切丽·布斯小姐。获得奖学金后，布莱尔和布斯小姐都在亚历山大·欧文的事务所中当学徒。欧文17岁时在哥拉斯哥大学加入工党，并是约翰·史密斯的朋友。史密斯是他的法律学生伙伴。1970年，欧文在北亨顿选区（伦敦郊区）竞选议员席位，没有成功；而史密斯却于同年首次在北拉纳克郡选区（苏格兰中南部）当选为议员，占有工党的安全席位。当布莱尔开始在欧文的事务所工作时，史密斯在工党政府内是个刚升起的新星。所以与欧文的接触将对布莱尔的生涯产生重要影响。

实习结束后，布莱尔就留在了欧文的事务所中当开业律师。欧文说布莱尔是个很好的律师，是杰出的，在处理案件时很善于切到点子上，拥有运用英语语言的杰出技巧。与他的夫人布斯一样，布莱尔擅长就业法，尽管在英国能挣大钱的是搞商业法。不过他的一个朋友说：“他实际上基本是个极其能干的商业律师。”

干开业律师这一行是很辛苦的。布莱尔说：“当我是个开业律师的时候，我是只云雀，我有时早6点就开始在事务所里工作，处理案件。”虽然布莱尔处理的绝大多数案件是商业上的，但他却获得了就业法专家的名声，并且为许多工会做代理人。这为他将来的政治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为就业法不久就成了政治上的战场，而且与工会建立密切关系是相当有益的。欧文的事务所还做工党的代理人，这样布莱尔也就成了工党的律师，尽管他第一次帮助工党打官司时已不在这个事务所了。

布莱尔在处理瑞格·普任提斯的案子中为捍卫工党的利益尽了自己的努力。普任提斯曾是工党政府教育大臣，后又任海外发展国务大臣，是东北纽汉姆选区的议员。他起初属工党左派，后来逐渐变成右翼分子，号召建立一个“民族统一的政府”。1975年6月，他被他所在的选区工党取消了议员候选人的资格，选区工党总委员会以29对9票通过了取消他在下次大选中当本选区工党候选人的决定。然而在执行这个决定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这促使工党内许多人支持左派提出的要定期对全部工党议员进行强制性重选的主张。在1979年后的“左派革命”中，提出这种主张的人取得胜利。从推进党内民主的角度说，布莱尔赞成这种主张，但是他不赞成左派为净化意识形态而提出的其他主张。普任提斯的两个支持者——两名学生——向法院起诉

选区工党的官员，可是正在他们两人在法庭中极力为他辩护并有可能获胜时，普任提斯却叛向保守党，使他们的努力变成徒劳。

普任提斯的叛变行为为工党左派向右派发起进攻提供了有力武器，定期重选议员的倡导者科瑞斯·穆林说：“罗伊·詹金斯和雪莉·威廉斯及所有其余他们的人都赞扬他，并发表讲话说普任提斯是个多么伟大的社会主义者。然而他却转过头来说：‘我实际上是个保守党人，我甚至不是个自由主义者，不是一个温和分子，我是个保守主义者。’这表明他的支持者是多么愚蠢。”

涉足处理这个案件对布莱尔唯一的帮助是使他确信工党需要改革党内民主机制。在这段时间，布莱尔的政治野心还不是很明显的。在切尔西工党呆了一年多后，他和马克·佩里跳了槽。开始他们打算转移到有强大的工党组织的某个地方，但后来还是搬到了一个保守党占优势的选区——玛丽里本，他新近的女友切丽·布斯刚好在这里。布莱尔在玛丽里本的工党组织中不积极，虽然切丽·布斯是积极分子。布莱尔住在圣埃德蒙巷分选区，布斯住在邻近的劳兹—汉米尔顿巷分选区。她是玛丽里本选区工党总委员会成员。

迷上政治

1979年，布莱尔搬到了泰晤士河南岸的一个地方，住在一位也是当律师的朋友家里，他叫查尔斯·法尔科内尔。他们最初是在苏格兰的费蒂斯学校里相识的，法尔科内尔说他们那时相处的不好，因为他们是“情敌”，法尔科内尔与布莱尔的女友阿曼达·麦肯西—斯道特好上了。1976年底，他们在伦敦又相遇了，他们都是开业律师并在同一座大楼里办公，不过不是同一间办公室。法尔科内尔于1991年39岁时成了一名皇家法律顾问。

在法尔科内尔家居住这段时间，布莱尔开始迷上了政治，写了他发表的第二篇文章。这是一篇笔调刚健、清晰的作品；思想倾向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的，不如说是自由主义；内容是有关移民服务的随意权力问题。文章发表在1979年8月18号的《旁观者》上。

在随后的两年间，布莱尔用“安东尼·布莱尔”这个署名为左翼的《新政治家》杂志撰写了8篇文章，此外又为《旁观者》写了一篇。在德汉姆考瑞斯特学校时，人们习惯称他“托尼”，在费蒂斯偶尔有人叫他“安东尼”。在1982年的补缺选举和1983年的大选中，他用了“托尼”这个名字。从那以后，“托尼”就被人沿用下来。

他在《新政治家》上发表的文章都是关于就业方面的。这些文章给他挣来了45镑的稿费，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些早期的作品中，表现出布莱尔对罢工行为持支持的态度。他主张对法律许可的中等规模罢工的定义应该更宽泛一些。在一个案子中，他支持钢业工会，呼吁私营企业中的钢铁工人站出来参加罢工以支持他们的国有企业中的同志。在这个案子中，布莱尔为钢业工会做了代理人，作为回报，在1994年工党领袖竞选时，该工会执

按原来的制度，现任工党议员是下届大选本党当然的议员候选人。1979年工党年会通过了左派的提案，规定现任议员不再是下届大选当然的候选人，其候选人资格需经区工党重新审定。——作者注

布莱尔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费蒂斯人》上，是为该刊百周年纪念而做的，内容是关于费蒂斯学院戏剧百年回顾，极其乏味。——作者注

行委员会第一个提名布莱尔为工党领袖候选人，并号召它的会员投布莱尔的票。

在搬到法尔科内尔家的同时，布莱尔就把党组织关系迁到了白特西工党的法尔费尔德支部，法尔科内尔已经是该支部的成员。这一年，工党在大选中惨败。大选后不久，法尔科内尔与布莱尔一起去参加一个会议，会上工党白特西选区的新当选议员阿尔夫·达波斯报告了议会内工党人士们的低落情绪。很多人认为卡拉汉是相当不孚众望的，在基层党员的心目中，他是位诸如出售紧俏商品的商人之类的人。达波斯认为，工党在某些方面的失败是惨重的，但不是所有的方面。大选过后，几乎所有的新议员都去看望了党的领袖卡拉汉。达波斯说，卡拉汉显得很沮丧，对一切都感到厌倦。这些新议员觉着卡拉汉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

站在党内左翼一边

布莱尔在工党内开始他的政治生涯正是哈罗德·威尔逊和詹姆斯·卡拉汉领导的工党政府在 70 年代遭受严重挫折的时候，所以对当时的党内斗争状况印象极深。他认为那时，实用主义的工党右翼步步退却，已达到精疲力竭的地步，工党政府确实是不孚重望。1994 年领袖竞选期间，他批评这届工党政府道：“实际上，在两个主要政党之一指导下的政府已变得太集权、太官僚和太不关心公民的基本权利。任何一个政府，不管公民授予它多大的权力，都不能忽视公民的基本权利。”

卡拉汉从威尔逊手中继承了一个软弱的、没有方向的政府，它过去没有、后来也没有多少朋友。尽管经济危机已经减缓，丹尼斯·希利在 1976 年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里争取到了一笔贷款，通货膨胀开始下降，人们生活水平在上升，但政治危机却变得越来越尖锐。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卡拉汉采取了限制收入的政策，结果却引起工人和工会的反对。工会曾与工党订下“社会契约”，在工党执政期间，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互相谅解。然而，事态的发展令人失望。在工党政府遇到困难时，工会不能顾全大局，过分追逐局部利益，破坏了受欢迎的“社会契约”。从 1978 年底到 1979 年初，英国罢工迭起，劳资冲突加剧，这就是人们所称的“不满的冬天”。在工会掀起的罢工浪潮中，不仅卡拉汉领导的工党政府垮掉了，而且工党内部的团结也受到严重破坏。在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的不信任案的迫使下，卡拉汉宣布提前于 1979 年 5 月份举行大选。结果保守党赢得 339 席，工党只得 269 席，自由党得 11 席，其他小党共得 16 席。保守党以 43 席的多数上台执政。工党下台。

在那期间，以右翼为主的工党政府和议会党团与以左翼为主的议会外党组织形成尖锐的对立，分歧越来越大。有人称这是“党”与“政府”的对立，因为在许多人的词语中，“工党”只是指议会外的党组织。左翼对工党政府感到非常失望。那时，布莱尔是站在议会外党组织即“党”这一边的。

在那时候，谁也不会想到布莱尔会在 15 年后成为工党的领袖。法尔科内尔说，布莱尔成为工党领袖，“那是相当令人惊奇的”。不过他承认那时布莱尔已具有了某种果断、自律、有点让人着迷的品质。这些品质是成为一个政党领袖所应具备的。 —

四、经受党内斗争的洗礼

1979—1983年是工党历史上最为困难的时期，工党跌到最低谷，面临生存危机。而此时也是党内斗争最为激烈的阶段。对布莱尔来说，这时期是他在党内发展起来的关键阶段，他经受了异常严酷的党内斗争的洗礼。

工党走上极左的道路

1979年大选失败，工党下野后，左派更是咄咄逼人，加快了争夺领导权的步伐。他们打出的旗号是以追究党的领导层在大选中失败的责任为名，要求彻底改变党的政策和党章规定的权力结构，加强党内民主。在1979年的年会上，以托尼·本为首的左派提出了修改党章的三个提案：1) 改变党的领袖只由议会党团选举产生这一制度，领袖要由工会代表、地方党组织代表和议会党团一起选举产生；2) 现任议员不再是下届大选时当然的议员候选人，其候选人资格需经选区党组织重新审定；3) 取消领袖控制制定党的竞选纲领的权力，而改由党的执委会掌握此权力。这三项提案的目的是要削弱议会党团和领袖的权力，同时加强左派占优势的工会、地方党组织和工党执委会的权力。后两项提案获得通过，这是工党30年来所进行的最大的改革，左派取得了夺取领导权的一个决定性的胜利。年会过后，卡拉汉辞职，左派的富特当选为领袖，至此，左派掌握了最高领导权。

工党走上极左的道路，左派不仅控制了党的领导权，而且还推行极左的路线。有的学者将这一阶段工党的变化称作“本的革命时期”，意即托尼·本的思想主张在党内占居了统治地位，尽管他本人并未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这一时期正是托尼·布莱尔的一系列政治主张酝酿、形成的时期。

站在党内改革的最前沿

1980年，布莱尔26岁，这一年对布莱尔来说有两件很有意义的事，一件是他与切丽·布斯结了婚，另一件是他们夫妇俩都开始寻求进入议会。头一件事意义更大。抛开生活上的意义不说，从政治事业来讲，一方面，切丽一家都是工党人士，对他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切丽一直是布莱尔的并肩战友；另一方面，婚后他们迁到了工人阶级较集中的伦敦东北部的海克尼区，更便于了解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和工党内部存在的问题。为了便于参加党组织的活动，他们将组织关系转到了南海克尼选区工党的女王桥支部。他们是当时英国社会变化的一个缩影：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涌入城市中心，而传统的工人阶级则分散到了远离市中心的地区。这时期，工党内部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威尔逊—卡拉汉时期的失败使很多工党的新党员感到困惑、迷惘，对工党的前途丧失信心；一些人的思想受工党外的和平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冲击；还有一些人受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而工党内传统的势力又显得相对软弱，对这些外来的冲击抵制不利。托尼·布莱尔看清了这种形势，他认为传统的工人阶级已不再是工党的阶级基础，现在党内缺少的是那种能起到沟通新旧党内力量的桥梁作用的人，而他正是这种人。于是他开始构建他自己的改造工党的方案，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扩大党员队伍，广泛吸纳新党员。他任领袖后正是这样做的。

布莱尔对党是忠心耿耿的，在改革工党方面，他始终站在最前沿。在金诺克就任工党领袖之前，他的许多政治观点就与当上了领袖后的金诺克相近。他是“一人一票制”的积极倡导者，把它看成是推进党内民主的重要措施。但那时，左派的一些主张，如单方面核裁军、英国退出欧共体、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他还是赞成的。

自1980年起，布莱尔的思想变化轨迹是与工党政策演变的轨迹相一致的，只不过他总是比别人快一个节拍。这并不能表明布莱尔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也不说明他的信念有了动摇，因为没有一个人工党政治家以及其他政治家的政治主张能保持10年不变。

在海克尼时期，布莱尔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工党的政治活动中。正是在这里，他开始行动以实现他进入议会的志向。在这里，他还与不少政治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后来使他受益非浅。在这些人的影响下，布莱尔在工党汹涌的政治斗争漩涡中确定了自己的位置，而不是被搞得晕头转向。他是伴随着工党全党性的危机而成熟起来的。

布莱尔和切丽于1980年9月6日第一次作为女王桥支部的成员参加了海克尼工党的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关于“一人一票制”的讨论。当时，在改革党的领袖选举制度上，存在着两种尖锐对立的观点。两种观点都被提交给这次会议进行讨论，以便为来年1月份在温布里举行的党的全国特别代表大会做准备。在这次会议上，布莱尔和切丽提出了一个议案，建议党的领袖选举不应仅仅局限于议会党团，而应由工党全体党员参加，每人都有一票的权利。另一个议案是由支持托尼·本的左派分子提出的，主张党的领袖应由议员、选区工党和工会三方组成的选举团来选出，三方拥有选票比例是30%、30%和40%，按照这个方案，工会在领袖选举中占有有利地位，工会的领导人握有很大的权力。

会上争论十分激烈。虽然双方互相都没有什么恶意，但很难用某一个词来形容争论的激烈程度。双方的议案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想打破议会党团对领袖选举的垄断权，试图扩大议员以外工党成员的选举权。但是本派分子不愿把这种权力直接赋予每一位党员，而是要把它交给选区工党总委员会的代表和工会领袖。“一人一票制”当时被视为危险的右倾观点，它得到了正准备分裂工党、另建社会民主党的“四人帮”的支持，而且自由党实行的就是这种制度。

当左派夺取党的最高领导权的攻势正猛之时，右派也试图进行抗争。1980年8月，前外交大臣大卫·欧文、前运输大臣威廉·罗杰斯和前教育大臣雪莉·威廉斯三人联合发表声明，要求工党掀起反对极左的运动，否则他们将退党并成立新党。这一政治动向立即引起舆论界的重视，他们三人被称为“三人帮”。这三人在1977年都参加了工党内的一个右派组织——“劳动胜利会”，并在反对左派的斗争中紧密团结在一起。右派的抗争丝毫无济于事。左派继续进攻，在1980年的年会上，通过了一系列左派内外政策的决议，诸如扩大国有化、控制进口、增加公共开支、单方面核裁军、退出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及不部署美国巡航导弹等。右派防不胜防，节节败退，再也无法忍受。

1981年以前，在工党领袖的选举中，只有下院议员有选举权，普通党员没有选举权。1981年，改变了领袖选举制度，由议会党员、选区工党和工会按30%和40%的比例组成选举团，但工会是投集团票，普通会员实际上也没有选择自由，1993年，工党实行“一人一票制”，取代了工会的集团投票制。——作者注

于是“三人帮”开始积极活动。他们曾劝说希利加入他们的行列，遭到拒绝。于是他们自己开始了行动，大卫·欧文退出影子内阁，雪莉·威廉斯声称她不参加议员竞选。此时正好另一位重要右派人物罗伊·詹金斯任欧共体主席4年届满之后回到伦敦。詹金斯多次会晤欧文，商量成立新党。于是“三人帮”成了“四人帮”。“四人帮”中也是三男一女并都是英国政坛上的知名人士。其中詹金斯是核心人物，曾任过工党政府财政大臣和党的副领袖。由于欧洲共同体之争，他辞去了副领袖之职。欧文曾任外交大臣，能言善辩，年青有为，对问题很有见地，被认为是个难得的政治人才。罗杰斯多次担任过重要大臣职务，颇得人们敬重。威廉斯夫人也多次出任大臣之职，是英国政界名人，妇女界颇受欢迎的领袖，在当时的英国，她是仅次于撒切尔夫人的女政治家。

从当时党内斗争的形势看，布莱尔夫妇当时提出那种建议是有一定风险的，它很容易被攻击为是反党言论。布莱尔夫妇的提案只得到了少数人的支持，本派分子及支持者占了上风。这与当时整个工党内的斗争形势是相符合的。在1981年1月24日温布利全国特别代表大会上，上述本派分子的方案被正式通过，并一直被使用到1993年。约翰·史密斯使“一人一票制”得以实行，但是选举团制并未废除，只是在选举团各个部分内每一个成员享有一票的权力。实际上每一个党员的权力是不平等的，几百名工党议员与几十万个人党员和几百万集体党员享有差不多相同的权力。而且有些人可以投几次票，比如：一个议员既能在议会党团投票，又能在选区工党投票；如果他是工会会员，又可以在工会投票；如果他是费边社成员，又可以投一次票；最多的，一个人可以投七、八次票。在1993年，史密斯还实现了将选举团的构成改为三部分，各占1/3，工会的地位与作用被削弱。

1981年，工党领袖选举制度的改革是以党内左右翼的斗争形势为背景的，选举团制有利于左派推举出代表左派利益的领袖来，因为当时大工会和多数选区工党都走向左倾，而议会党团则为右派所把持。左派在这个问题上所取得的胜利，为它以后争夺党的最高领导职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左派的胜利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1981年1月25日，也就是工党特别代表大会通过削减议会党团权力的决议通过的次日，“四人帮”在欧文家发表了《石灰屋宣言》，正式宣布成立业已得到9名工党议员支持的“社会民主理事会”，紧接着他们又匆匆拼凑了包括本人在内的一百位知名人士的签名登在《卫报》上，表示支持声援该组织。3月26日，“四人帮”等几名工党议员不顾领袖富特的一再劝阻，在伦敦宣布成立了社会民主党。工党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分裂成为现实。虽然卡拉汉、希利等重要右派人物仍留在党内，但“四人帮”一下子就从工党内拉出了一支拥有8万名党员，27名下院议员的队伍，使工党遭受巨大损失。工党的分裂和新的社民党的出现，曾震动了英国和整个国际舆论界，这是自1922年工党成为英国第二大党以来，英国政局出现的最大变化。

可是左派对右派的分裂的反映是，这只是党在前进中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党的力量减弱只是暂时的。左派不仅未收敛自己向左滑行的行为，反而继续向右派夺权。“四人帮”分裂出去后，党内右翼的代表是副领袖丹尼斯·希利，而左派正努力使托尼·本取代希利的职位。不过左派没有成功，本只以差1%的选票而败北。金诺克及其支持者的态度起了关键作用，他们投了弃权票。金诺克实际上也是个左派，但这次他却没有支持本，他的态度转变在

工党历史上是个转折点，表明左派的攻势已被遏制住。在这次斗争中，布莱尔的立场与金诺克很相近，在第一轮投票中也投了弃权票，而在第二轮投票中则投了希利的票。

其实，左派并不是铁板一块，实质上只不过是各种反对右派力量的联盟。托尼·本曾一度是这个联盟的头子。可是在本竞争副领袖职位前，这个左派联盟已经开始瓦解。首先是具有很强实力的金诺克从联盟分离出来，另组成一个温和左派，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左派联盟。这批温和左派的中心人物就是布莱尔的海克尼工党各支部的那帮朋友，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艾伦·哈卧斯，他的妻子玛姬·雷曾是切丽的同房女友，在切丽结婚之前，她俩一直住在一起。哈卧斯自称是个非共产主义者，他对当时控制着伦敦工党左派的托洛茨基集团非常反感。在认识布莱尔时，他已经是一位坚定的左派反对者，后来他成了布莱尔的得力干将，在布莱尔当上工党领袖后任议会工党的书记。就像安吉·亨特、彼得·汤姆森、高登·布朗一样，他也是布莱尔在偶然的机会里结识的，但却彼此十分信任、忠诚的朋友。

背弃托尼·本的不仅是金诺克，由托尼·本一手建立起来、以动员左派力量并确保本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为宗旨的“工党协调委员会”，在1981年这个关键时刻也背叛了本，投入了本的敌对阵营。工党协调委员会建于1978年，曾一度与英国共产党关系密切，后来它看到极左没有出路，开始向右转，聚到了党的领袖富特和副领袖希利的旗帜下。后来在金诺克任领袖后，又积极支持金诺克。该组织的政治主张是开展一场全国性的要求充分就业的运动，加强工业化，抑制工党和保守党政府对公共开支的削减。

不过托尼·本的左派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有许多青年人都聚集在了本的旗帜下。这些人成立了“党员群众动员委员会”，试图将党内的左派组织再聚集起来，包括工党协调委员会和“战斗倾向派”。在竞选副领袖的斗争中，该组织是本的主要支持力量。然而，党员群众动员委员会认为本的落选只是本个人的失利，而整个左派却因更加纯洁而获得了巨大进步，它为此而欢呼，并且开始为下一步新的斗争制定计划。不过它里面也有一部分人持另一种态度，主要是工党协调委员会的人。工党协调委员会这时已经改变了性质，而且不能忍受与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战斗倾向派共处于一个联盟之内，于是在那次斗争后退出了动员委员会。

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还有一件对左派不利的事。在选举团制度建立起来前，工党议会党团（就是议会工党）曾于1980年9月选举迈克尔·富特为领袖，接替詹姆斯·卡拉汉。富特是位左派人物，但威望较高，为党内中间派所接受。在托尼·本争夺副领袖职位的斗争中，富特明确表态反对本对希利的挑战。富特的态度影响了工党协调委员会，使它觉得本没有成功的希望。

工党协调委员会的领导机构是一个执行委员会，执委会由全体成员选举产生。1981年，布莱尔的朋友艾伦·哈卧斯被选进执委会，他本来就不是左派。在他的竞选宣言中，他声称：“我坚决支持从党员群众动员委员会中分离出来的决定，坚决支持寻找新的促进左派团结的方式和途径的决心。它将建立在非新列宁主义的基础上。”从哈卧斯的话中可以看出，他的当选是工党协调委员会将要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的信号。

哈卧斯担任工党协调委员会负责吸收成员的书记，1982年，他曾动员布莱尔加入该组织。工党协调委员会已经变成了冲击“本主义”的有力武器。哈卧斯说：“我同布莱尔经常探讨如何使党现代化，如何打破左派斯大林主义的霸权。布莱尔考虑建立一个新的组织的可能性，我很自信地告诉他一个新组织早已建立。”不过此时的布莱尔与海克尼小集团的大部分成员不同，他明显地没有完全脱离左派。哈卧斯认为，为了帮助他摆脱左派的影响，还必须继续劝说他加入工党协调委员会。

海克尼集团成了工党协调委员会的核心，并开始在伦敦向左派发起反击。与此同时，它积极活动，到各个城市去寻找支持者。不过在早期的秘密推翻本的统治而另建一个新左派的过程中，布莱尔并未卷入其中，但他对这种活动是持赞成态度的。

1932年4月，保守党在毕肯斯菲尔德选区空出了一个席位，于是有了一场补缺选举的竞选，布莱尔成为工党的候选人。这使他面临着到底站在党内哪个阵线上的问题，因为得到党内哪一部人的支持对于能否取胜是非常重要的。布莱尔早已有了竞选议员的打算，所以做了充分准备。他给人的印象是：很精于竞选之道，而且有着丰富的经验。刚当上候选人，他就去了位于泰晤士河南卧尔卧斯大街的工党总部了解党的政策。那时，工党还没有专门负责补缺选举的组织机构，也很少有参加补缺选举竞选的人来总部查寻文件。而布莱尔却不辞劳苦地四处奔波，非常严肃认真。他试图全面掌握党的路线、政策。他非常机敏、干练，经常提出各种问题，比如：“如果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该怎样回答？”

布莱尔在竞选演说中特别强调欧洲经济共同体问题。他认为，欧共体剥夺了英国选择自己所必须选择的经济政策的自由，此外，英国还为欧共体的农业政策付出了代价。这两点是英国退出欧共体的根据，而只有工党才能使之实现。这明显地是左派的观点。但这时他却在公开场合声称他是一个中间派。他说他希望党能结束目前的左、右派对立的分裂状态，重新团结统一起来。他赞成本的一些观点，但不赞成本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他不再把本当成重大改革的焦点人物来看待。他呼吁党内各派都放弃过去的分歧，把注意力放到揭露政府的阴暗记录上来，全党应齐心协力把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布莱尔一再强调他不是本的支持者。当一家杂志说他是支持本的律师时，他马上写信给这家杂志表示抗议，声明：“我不是本的支持者。”在信的结尾，他写道：“再不能发生类似的误解。我支持工党的现任领导，工党的工作计划，以及使英国脱离欧共体和单方面核裁军的主张。我尤其支持反对配置三叉戟导弹和反对美国控制的导弹发射舰游弋在我国领海的运动。我以一个工党党员的名义这样，而不是以本的支持者的身分。”

上述布莱尔的主张都是当时工党中央的政策，做为一个补缺选举的候选人，他只能如此，可以想象不同中央保持一致会是什么结局。所以并不能只从政策主张上来判断他的倾向性。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是与现任领导保持一致的。当时党的领袖迈克尔·富特的态度也是这样，他既是欧共体的反对者，同时又是本的反对者。以后的实践证明，同党的领导人站在同一立场上，使他获得了在党内发达起来的保障。在富特时期是这样，在后来的金诺克时期和史密斯时期也是这样。富特曾是本的坚定支持者，但是自从卡拉

汉于 1966 年接任领袖职位后，富特逐渐开始反对本党的使工党极左化的破坏性行动。

提出改革工党的构想

补缺选举结束两个多月后，1982 年 8 月，布莱尔携妻子切丽去澳大利亚旅行。在那里，他拜访了牛津大学时的老朋友彼得·汤姆森和杰弗·盖洛普，还回到了他 5 岁以前度过 3 年岁月的小村庄。这时的盖洛普在一所大学里当政治学教授，他邀请布莱尔给他所在系的研究生和教员开设研究生课程讨论班。表面上看，布莱尔是在妻子的陪伴下在地球的另一侧休闲，但实际上他是在远处，在 9000 英里以外，静观工党内部左、右两派斗争的表演。他认识到，托尼·本在 1981 年副主席竞选中的败北是一个转折点，因为他分裂了左派。布莱尔说：“1981 年本的竞选活动不仅被视为他自己个人命运的标志，同时也是党内开始远离左派的标志。”

在澳大利亚，布莱尔发表了许多演讲，其中心内容是怎样使左派和右派在党内协调统一起来。他当时提出的一些方案现在看来有些过时，但一些带有战略意义的观点是有先见之明的。在经济政策问题上，布莱尔认为，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是急需的，而无计划的经济膨胀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因此政府必须对工业建设所急需的资源加以调节、干预。他还主张通过价格管制来对付通货膨胀。他的这些主张与当时工党中央的政策相吻合。

从他对党内右翼的批评中可以看，那个时候的布莱尔还持有一些左派的传统论调。他说，右派的问题是长期陶醉于《金融时报》、《泰晤士报》、《卫报》等报刊对他们的赞誉中，而不习惯受到挫折和冒犯。经历磨难是痛苦的，但却是非常必要的。可是仅仅两年后，他也受到了这种赞誉。《金融时报》把他描述为“一个最有希望的新人”。

在澳大利亚的演讲中，他也提到了后来他努力将之改变了的党章第四条第四款。他说在传统的第四条所表达出来的“社会主义与接受混合经济的夹缝中，工党并不好生存”。他看到了党章第四条的问题，也许从那时起他就立下了要修改它的志愿。

在澳大利亚，布莱尔对党内左派提出了严厉和深刻的批评。他承认“左派力量曾经促使我们党进行重新思考”，但是，现在该是左派进行重新思考的时候了。他说：“左派崇尚民主，但是民主不应该被视为一种抽象的东西，也不应仅仅是党内的东西。党必须同选民建立民主的关系。这里核心的词是关系。如果党完全变为一个人民党是荒唐的，因为这只能使党做表达选民主张的工具，起个学舌者的作用，尽管那些观点是有价值的。同样，把选民抛在一边，只考虑驾御党这部机器也是荒唐的、不可取的。”

民主就是党与选民的联系。这是布莱尔在后来的政治生活中一直坚持的论题。他批评左派道：“在民主问题上，左派的立场并不统一。他们倡导党内民主，但却拒绝‘一人一票制’。”他们大谈非集权主义，但却与大多数权力被赋予的观点相距甚远。

在布莱尔当上议员、有了一个可以实践他的主张的选区前，他就开始考虑一个问题：“工党应该是什么样子？”地方党组织应该从其党员根植其中的社区中发展起来。布莱尔认为，工党必须向外扩展，并不断吸纳新党员。而当时的工党则被有些人看成是：一个没有党员队伍的群众党；一个没有共

同信念的思想改革运动；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人民党。

此时的布莱尔很清楚，所谓党的统一的思想基础不应该、也决不是马克思主义。但是作为可选择对象的伦理社会主义还没有发展成熟。党必须寻求一种比马克思主义更现代化的政治哲学。

布莱尔在澳大利亚的演讲中所表达出来的思想足以说明，他早已开始着手于工党的重新建设。他不仅是一个敏锐的、有深刻洞察力的思考者，而且还是一个严肃的思考者。他早已思考的许多问题后来都成了尼尔·金诺克重建工党的核心内容。布莱尔那时就在倡导后来金诺克所实行的战略，即把温和左派与右派统一起来，形成一股力量，以使党从日益衰落的状态中走出来。在 1983 年大选失败之前，布莱尔已开始做这项工作，说服党内的人们，让他们认识到这一战略的重要性。

1982—1983 年是布莱尔在党内的政治立场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从他的澳大利亚演讲中可以透视出他那时还属于“温和左派”，他的演讲稿读起来似乎就是左派写的。不过那时他已开始自我标榜是中派分子，而且左派的倾向一直不是十分明显。不过与当时党内以罗伊·哈特斯利和约翰·史密斯为代表的右派比较起来，他与他们有着明显的差别，而与属于“温和左派”的尼尔·金诺克、罗宾·库克和杰克·肖比较接近。确切他说，这时他已踏上了由左派向中间派、向右派转变的道路。他已经“背叛”了自己原来的立场，但很难说这种背叛是见风使舵。在 1983 年他当选为国会议员时，他已完成了这种转变，成为党内的右派。温和左派与新右派的结合，在 80 年代末形成了布莱尔归属其中的党内现代派，而工党内原来的强硬左派与老右派则演变成保守派。

80 年代早期，即 1980—1983 年，是布莱尔政治发展中的重要时期。不仅工党在这期间发生了重要变化，而且布莱尔本人对工党也有了较深刻的了解，特别是对工党未来的改革和发展有了一个基本的构想，而这是包括金诺克和史密斯在内的所有工党领导人所不及的。

工党内派系十分复杂，过去曾分为强硬左派、温和左派、中间派、老右派、新右派。此外还有极左的托洛茨基派组织。1995 年 1 月英国《独立报》文章将工党内除了托派外的派系分为 7 个：以托尼·本为首的强硬左派、以波得·海恩为首的新传统派、以约翰·莱斯特为首的旧风格工党派、以罗伊·哈特斯利为首的老右派、以罗宾·库克为首的左翼现代派、以杰克·肖为首的现代派和以莫·莫勒姆为首的极端现代派。其中强硬左派和新传统派站在托尼·布莱尔的对立面，三个现代派是布莱尔的坚定支持者，另外两个派系是布莱尔可争取的对象。—作者注

五、跻身议会

在布莱尔与切丽结婚后搬到海克尼居住时，他俩就启动了进入议会的愿望。在英国，要想从政，必须首先进入议会下院，因为下院是政治家的活动舞台；而要进入下院，必须首先加入某一个政党，特别是能轮流执政的大党，没有政党的支持是很难当上议员的，虽然也不时地有独立派议员当选，但却微乎其微，而且也难有所作为。

初战失利

其实，布莱尔早就产生了当议员的愿望，在他选择律师为职业时，实际上就已有从政的打算，而当议员是从政的必经之路。只不过那时，要当议员的想法还不十分明确，也没有任何实际行动。1980年11月，他在靠近他的家乡德汉姆的米德尔斯伯勒选区向工党组织申请议员候选人的资格，这是他第一次为进入议会而采取的实际行动。不过结果令人沮丧。当时有17人参与竞争，按规定，要被接受为议员候选人的候选人，他必须得到该选区工党所属的一个支部或附属于选区工党的一个地方政治组织的提名。布莱尔在一个电工工会的分会获得了提名，但在初选时就失利了。一位叫斯道特·拜尔的高级律师赢了这场竞争。其实，这场竞争的结局早已不争自明。拜尔得到了当地市镇工会的鼎力支持，该选区的议席已被他垄断。布莱尔虽被电工工会提名，但该工会已与拜尔达成协议，它只是为布莱尔提名，而在正式投票时则投拜尔的票。布莱尔进入议会的第一次努力就这样失败了。普通与市镇工会的地区书记汤姆·伯力森说：“我认为布莱尔在竞选活动中是一个初学者，虽然他有一种非凡的魅力，但他太年轻，是一个生面孔。我不认为他能获得北部地区的席位。”

与强硬左派做斗争

回到海克尼后，布莱尔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与本集团的斗争中去了。他认识到，他必须首先从工党的基层组织做起，获得它的支持。虽然在女王桥支部他只是刚刚到来4个月的支部成员，但在1981年2月举行的每年支部例会上，布莱尔却试图取代强硬左派的书记麦克·代维斯。他说服当地的市政官（工党人士）麦尔·莱吉特去动员那些老太太们走出大楼参加会议，他的朋友们也大力号召人们投他的票。为这样低的一个职位而四处奔波，挨家挨户地游说，确实是煞费了苦心，但也是极其必要的，因为他毕竟是个新来者。最后，布莱尔以17票对15票战胜了代维斯，当选为支部书记。一个在场的人说，他看到了布莱尔眼中闪烁着亮光，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确实是这样，这时，布莱尔毫不隐讳地宣称他要成为一名议员，而此时正是在人们看来不易暴露自己企图的时候。

就在布莱尔当选为支部书记那天，工党前任副领袖乔治·布朗同许多人一道在《卫报》发表的声明上签了名。这个声明是“四人帮”搞的，以寻求对他们的《石灰屋宣言》的支持。当时，工党右派中的4个议员（罗伊·詹金斯、大卫·欧文、雪莉·威廉斯和威廉·罗杰斯）不堪忍受左派的统治，准备分离出去，另立新党。《石灰屋宣言》就是呼吁人们支持建立“社会民

主理事会”的。3月份，社会民主党就诞生了。

对布莱尔来说，《卫报》的声明是非常重要的事件。乔治·布朗的弟弟罗恩是南海克尼的议员，乔治曾毫不隐讳他说是他帮助他弟弟谋到了这个职位。为此，布莱尔的岳父布斯先生还斥责他是搞“裙带关系”。这时，罗恩已59岁，他很欣赏布莱尔，说：“他紧紧追随我，他支持我关于欧洲的一切主张，他是一个机敏的人，非常能干。”罗恩想培养布莱尔为继承人，而这正合布莱尔的心愿。可是，女王桥支部的许多人等不及罗恩到退休，他们认为他是一个极右分子，并认定他也是“四人帮”的同情者（事实也是如此），所以想把他赶下台。他们采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要求罗恩宣布同新成立的社会民主党断绝关系。罗恩给女王桥支部写了封信，表示自己已与社会民主党断绝了关系。可是在支部会上，经过激烈辩论，仍有一些人认为从罗恩的信中看不出他已经断绝了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新制定的工党议员候选人重选制度开始运作。布莱尔是罗恩的坚定支持者，他与其他支持者一道组织起来保卫罗恩，而这使布莱尔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最后，在布莱尔等人的帮助下，罗恩·布朗还是成功地再次当选。重新当选后，他很快就背弃了社会民主党。不过罗恩的背叛行为却深深地伤害了布莱尔，使他在布莱尔等支持者心目中的形象大大受损。如果他继续为自己的信仰而奋斗，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左派这时得意地对布莱尔他们叫嚷着：“我们一直告诫你们，这小子是个叛徒。”布莱尔他们无言以对。在后来的选举中，罗恩·布朗终于没有保住席位，他很为此难过。

在“四人帮”分裂工党时，很多人为新党诱人的前景而动摇，因为当时工党给人一种走入死胡同的感觉，而且在工党日益走向左倾、保守党又向右转的情况下，中性的社会民主党正好填补这个力量真空。可是，布莱尔并没有被社会民主党所诱惑。虽然在政策主张上，除了实行比例代表制外，他与社会民主党没有什么分歧，但他认为“四人帮”离开工党是错误的，他相信工党能够改革好，而且也应该进行改革了。他对托尼·本有敌意，因为本先前在党内所倡导的是一种错误的变革。后来的事实证明，布莱尔的见解是正确的，社会民主党没有什么发展前途，许多加入了社会民主党的人又都回到了工党的怀抱中来，罗恩·布朗就是一个例子。正是因为与社会民主党人没有什么政见分歧，所以在布莱尔当上了领袖后，曾邀请自由民主党内前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回到工党中来。他说：“当然，我们热烈欢迎80年代初期离开工党的人们回来，因为那个时期，离开工党是可以理解的。工党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时期。”

在对待党内左派的态度上，布莱尔经常与他周围的人发生分歧，其中的一个人就是约翰·劳合。劳合曾与布莱尔并肩战斗支持罗恩·布朗重选议员，不过他是工党的极右分子，是党内右派首领、党的副领袖丹尼斯·希利的崇拜者。在他眼里，布莱尔具有左的倾向。他们经常在海克尼选区工党总委员会里，就如何同极左派进行斗争、采用什么策略发生争吵。布莱尔总是呼吁党要团结统一，而劳合则认为布莱尔的这种左的倾向是错误的。他说：“布莱尔总是说，我们可以感化他们，争取他们。而我则告诉他：不，他们都是垃圾，我们应该把他们清除出去。”在党内斗争上，极右派与极左派往往采

社会民主党成立后不久就与自由党结成了竞选联盟。1988年两党合并，组成社会自由民主党，简称自由民主党。——作者注

用同样的斗争方式。

当中间派也是很不容易的。在像劳合这样的工党右派认为布莱尔有左派倾向的同时，本派分子却认为他具有右倾色彩。布莱尔有一个朋友是本的支持者，1981年时他回忆道：“当我第一次遇到托尼时，他根本没有被认为具有左派倾向。我们那些真正的左派都认为他是一个右翼分子。切丽也不是左派，尽管她比布莱尔更提倡男女平等。”不过，布莱尔虽然是中间派，但那时，他在党内主要是同左派交往。当然也有同右派交往的机会，1981年，亚历山大·欧文（布莱尔当见习律师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将布莱尔介绍给约翰·史密斯。不过那时史密斯在党内的地位还比较低，他正在等待着本的左倾浪潮的退潮，1982年，他被任命为工党影子内阁的能源大臣。

走中间路线

1981年秋，布莱尔又一次在补缺选举中被提名做议员候选人的候选人，结果与第一次一样，没能成功。这次是在北部的一个叫提塞德哨那比的选区，两年后，该选区的绝大部分被划入南斯托克顿选区。这次是由于左派的阻挠而失败的，这促使他采取更坚定的走中间路线的立场。

为了给自己提供更广阔的活动舞台，布莱尔决定先争取地方议会议员的职位。于是他在1982年的地方选举中参加了海克尼市政议员的竞争。英国的地方政府也都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海克尼一直为工党把持。当时许多工党的地方政府与保守党的中央政府发生对抗，地方政府自搞一套，对中央政府的政策持消极态度。与此同时，在工党所控制的地方政府内部也充满矛盾和斗争，主要是左派和右派围绕如何对待保守党中央政府的政策问题。当时工党内有个左派组织叫“82目标”，此时正积极行动，试图夺取对海克尼政府的控制权。按英国的地方选举制度，地方议会议员由各分选区选出，一区一人，与国会下院选举一样，也是由各政党先提出候选人。布莱尔决定在他所在的女王桥分选区参加竞争，他觉得他在这里有影响。可是参加该分选区议员工党候选人职位角逐的共有5人，经过初选，他排在第四位，获胜的希望微乎其微。不过这对他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新的海克尼议会已为工党强硬左派所控制，如果他当选了，在这个议会中与强硬左派们共事也是很难受的。布莱尔并没有出席正式确定工党女王桥分选区议员候选人的会议，他被切丽·布斯叫走去处理一个法律案件。在会上，与会者普遍有一个强烈的想法，就是如果布莱尔想被人们考虑的话，他应该出席这次会议。有人根据他没出席会议就断定他绝不会当选。被布莱尔所取代的前任女王桥工党的支部书记麦克·代维斯说：布莱尔已来这个支部一年多了，“但是我们并不确切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这话不无道理，更确切些说是人们不知道他向哪里去。不久，布莱尔在保守党人把持的毕肯斯菲尔德选区的补缺选举中被推举为国会议员候选人，这一举动使女王桥工党支部的人感到十分吃惊。

出色的议员候选人

毕肯斯菲尔德的补缺选举是由该选区的保守党议员罗纳德·贝尔于1982年4月去世引起的。该选区是保守党最安全的选区之一。不过此时，对保守

党来说，该选区已不再是很安全的了，因为新成立的社会民主党与自由党结成了竞选联盟，有一种咄咄逼人气势。联盟已连续多次在补缺选举中获胜，冲击保守党的安全席位。1981年11月，保守党克罗斯比选区的席位就被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雪莉·威廉斯夺去。

由于形势对自由党—社会民主党联盟十分有利，工党对这次补缺选举兴趣不大，所以人们也不太关心谁将成为工党的候选人。不过，布莱尔还是采纳了约翰·史密斯等人的建议，尽最大努力去争取这个席位。参加工党候选人角逐的有4人，其中之一是约翰·赫利，他是斯劳镇议会的负责人。一开始，赫利就有一种错误认识，他认为当地党组织已经选定了布莱尔，而不是他。其根据是，在初选会议上，党组织的负责人提了两个对布莱尔十分有利的问题，使布莱尔处于优势。其中一个问题是关于城市住房的调查文件，赫利应当对此很熟悉，可是却一无所知，布莱尔则对之了如指掌。这使赫利对自己能否成为正式候选人的前景非常失望。事实上，他是过高估计了党组织中反对他的力量，因为就当时工党的组织制度状况而言，地方党组织还没有那么大的权力来操纵候选人的人选。

布莱尔最终击败了其他三人而成为工党的候选人。从某种程度上讲，布莱尔得益于他优雅的举止。毕肯斯菲尔德工党的主席道格·万尊当时在选举现场，他说：布莱尔喜欢出外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当他走过人群时，显得非常诚挚、热情，与那些炫耀工党分发的纪念品的人们形成鲜明的对照。

布莱尔的妻子切丽为了选举的目的，这时在公开场合正式称自己的名字是切丽·布莱尔。她以全部精力投入了为丈夫助选的活动。她以一位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名义，到处分发以“来自切丽·布莱尔的一封信”为标题的传单。这完全是保守党议员的妻子为丈夫助选的风格。切丽在传单中写道：

“作为女权运动的成员，10多年来，我相信只有工党才真正关心妇女的福利。当经济萧条时，妇女总是第一个受害者，不仅是因为失业，而且还因为政府开支缩减的重负也要压在她们身上……我知道托尼将会干得很好，他会关注我们选区的工作，我希望你们在5月27日投他的票。”

在竞选期间，切丽尽力做一些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妻子所能做的一切，并充分发挥她的女权主义者的政治身份所能发挥的作用。除此之外，她还动员她的父亲托尼·布斯和他的未婚妻帕特·菲尼克斯在娱乐业为布莱尔竞选，因为菲尼克斯在当地的娱乐界是个大明星，她比当地的政治家有更多的崇拜者。

尽管有这么多人鼎力支持布莱尔的竞选，但是客观形势对布莱尔十分不利。1982年4月1日，布莱尔被选为工党的候选人，第二天阿根廷占领了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人称福克兰群岛），这件事使工党在国内政治斗争陷入不利境地。4月3日，在工党领袖迈克尔·富特提出英国要采取行动的要求后，下院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派遣一支庞大的舰队去距离本土8000英里之遥的马岛与阿根廷开战，夺回马岛。三个星期后，英国军队攻占了南乔治亚岛，5月1日，英军袭击了马岛。随着5月27日投票日的到来，有关战争的消息主宰了整个竞选活动，英国人的民族热情被大大激发了起来，玛格丽特·撒切尔一下子成了民意的代表者，保守党政府成了维护英国民族利益的中坚力量，而其他的政治力量则相形见绌，包括当时非常引人注目的自由党—社会民主党联盟。

在马岛战争问题上，布莱尔同工党一样，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布莱

尔所表达出来的态度不能为充满爱国热情的选民们的拥护。他对《星期日电讯报》说：“我赞成派一支特遣舰队，但同时我希望协商解决这一问题，我相信不应该仅仅僵硬地有军事行动这一种选择，我们需要在一些事情上做些妥协和让步。我不认为福克兰岛人（绝大多数是英国人——作者注）的希望应该决定我们的立场。”对布莱尔的这番话，媒介有不同的评论。《卫报》称之是对英国所应采取行动的细致的分析。而《每日电讯报》则说：布莱尔对福克兰战争的立场是“胜利属于阿根廷”。其实布莱尔真正的意思是：英国的军事力量是有限的，应该在生命的死亡和正在争论的问题间做适当的平衡。然而布莱尔似乎对别人对他的误解听之任之。

不管怎样，这次竞选活动使布莱尔得到了一个引起工党领导层注意的机会。工党领袖富特对候选人布莱尔有很深的印象，在竞选期间，他在毕肯斯菲尔德对 BBC 电视台晚间新闻记者大大赞扬了布莱尔一番，他说：“我们对他今天在这里所讲的话感到非常骄傲，不管结果如何，他将是英国政界中很有前途的人。”富特是很少这样赞扬工党的候选人的，在第二年早些时候，他在勃门德西选区甚至拒绝为彼得·泰切尔签名。工党的领袖富特和副领袖希利分别属于左派和右派。有趣的是，他俩就布莱尔到底属于党内哪一派互相逗乐。当富特问谁应当是工党下一个认真考虑的候选人时，希利说：“布莱尔是我的支持者。”在此前，他还授意一些刊物宣传“工党右派支持布莱尔”。可是富特却对希利说：“他似乎属于我。”

这次竞选还使布莱尔有机会结识许多党的上层人士。在竞选期间，工党的许多头面人物都来到过毕肯斯菲尔德这个被称作“保守党的城市远郊”的地方，只有托尼·本除外。约翰·史密斯也来过这里为布莱尔助选。在这里，布莱尔还见到了尼尔·金诺克。他对布莱尔也有很好的印象。80年代以来的三位工党领袖都来到毕肯斯菲尔德，为他们的继任人祝福。

布莱尔给选民们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与其他候选人相比，他更具有吸引力，他显得有很强的责任心，不是华而下实。在毕肯斯菲尔德的林荫小道上，布莱尔受到了人们的热情接待，他给人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充满睿智、富有魅力、令人愉快，但并不狡猾的伦敦人。而他也比较积极主动、平易近人，乐于应酬人们对他的热情接待。在处境艰难的情况下，他的这种行为是令人称道的。

这次选举受到了马岛战争的严重冲击。从南大西洋传来的诸如加尔铁里将军（阿根廷的统治者）罪行的报道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尤其是在投票前几天，英国军队在马岛的圣·卡洛斯湾登陆以及其后的战况消息纷纷传来，保守党候选人提姆·史密斯利用战况大作文章。报上登了一幅他专心致志地听收音机新闻的照片；他还手持一封撒切尔首相的信在选区内四处游说：“我们希望选民们支持政府对南大西洋危机的反应，支持我们的国内政策。”两天后，毕肯斯菲尔德的选民们响应了撒切尔首相的号召。保守党意外地赢得了选举，保住了席位，没有像人们预想的那样被社会民主党夺去。

布莱尔和工党面对不利的局面，尽了最大的努力。为布莱尔竞选的最后一张传单的题目是：“为什么保守党正在投托尼·布莱尔的票？”在投票的那天晚上，BBC 电台还广播了富特对布莱尔赞扬的话：“他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令人愉悦的一流候选人，我们希望他成为工党议会党团的一员。”然而，

这位第一流的候选人却不仅没有当选，而且还落到第三位。他只得了 3886 张选票，不到 10%。无论对工党还是对候选人本人来说，这个结果都是很惨的。这是对候选人对他身后选民的号召力的第一次测试。据一些媒体报道，布莱尔不能掩饰对失去当选机会的失望，当选举结果公布时，他虽然面带微笑，但却显得尴尬和僵硬。他佩戴着一个象征工党的玫瑰花饰物，看上去就像一个演喜剧的丑角。

卧薪尝胆

这次失败后，布莱尔承认：从他踏上政治道路的时间和所处的立场来看，他还不是一个合格的职业政治家。不过有时候他也抱怨客观环境对他不利。有一次他说：“请相信我，1982 年在毕肯斯菲尔德的补缺选举中为工党去奋斗是不明智的举动。迈克尔·富特正忙于处理领导层内部的问题，托尼·本分管政策，亚瑟·斯卡吉尔领导工会，我们大家处在福克兰战争中。”这最后一点是有点强词夺理，因为当他决定参与竞争时，马岛战争还没有爆发。不过布莱尔的话基本上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那时，工党正处在衰落的最低谷中，而绝大多数工党人士及其支持者并没有认识到工党正面临着彻底垮掉的危机。所有申请工党席位的人都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工党的在野党地位要持续 18 年之久。竞选的失败使布莱尔确信，工党需要革心换面，重新崛起。

布莱尔很快就从失败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积极投入了为在下一轮机会中夺取胜利的准备。此后的一年间，他一方面从事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思考一些问题、撰写政治论文，另一方面积极参与了党内反对强硬左派的斗争。

从故乡回到伦敦后，他就像学者一样把自己投入了书堆中，整天思考问题、撰写文章。毕肯斯菲尔德选区工党很器重他，邀请他在来年大选时当本选区工党的候选人；与此同时，他的妻子切丽·布莱尔也被选为一个选区的工党候选人，真是夫妻比翼齐飞，同时向议会进军。切丽的选区是西撒尼特，那也是保守党的安全选区。

布莱尔对是否接受毕肯斯菲尔德选区工党的邀请犹豫不决，来向好朋友亚历山大·欧文征求意见。欧文认为令人迷惑的事情经常在政治生活中发生，他劝布莱尔继续努力扩大他的运气。但布莱尔还是决定不去毕肯斯菲尔德，他要集中精力对选区边界情况进行调查，这可能会在选举前产生一些好的效果，并震动千变万化的政坛。

在从事调查研究、思考问题、研究工党的政策的同时，布莱尔还积极参与了反对党内强硬左派的重要派别组织——战斗倾向派的斗争。1982 年，工党在海滨城市布莱克浦举行了一年一度的代表大会，即年会。会上，富特取得了巨大胜利，他赢得了大会多数代表的支持，决定采取行动反对战斗倾向派。对这个派别组织，布莱尔在他几星期后的澳大利亚演讲中是这样评价的：

“战斗倾向派是一个公开的托洛茨基主义集团的成员，它们之间的联系可以追溯到 1960 年的‘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它由 64 个专职人员组成，其中有 34 个在地方工作。战斗倾向派分子说他们这个组织仅仅是卖他们的宣传品——‘战斗’手册，实际上，它是一个秘密的阴谋团体，是党中之党。”

在 1982 年的年会上，工党执行委员会（工党最有权威的机构）经投票通过了一个决议，决定建立党内各种组织的登记制度。想要获得资格的组织必

须证明它遵守党的章程，而党的章程又使党中之党成为非法。根据有关部门向大会提交的一份报告，战斗倾向派是党中之党，因此，很明显，战斗倾向派将不能被登记。

上述工党全国执委会通过的决定就是布莱克普尔年会取得的主要成就，布莱尔对整个过程十分熟悉。工党执委会曾就如何对付战斗倾向派问题向亚历山大·欧文请教过法律方面的建议，而布莱尔就是中间的联络人。富特后来说：布莱尔“对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这是我们把他当作右派的原因”。布莱尔还提出过建议说：“登记制度使我们可能用一种周密的、公平的方式把托洛茨基分子踢出工党。”

1982年，工党执委会所采取的行动，标志着工党驱逐战斗倾向派成员的开始，不过这在法律上可是一个雷区，有人告诉富特，如果产生法律纠纷，战斗倾向派可能占有优势。而且从道义上讲，战斗倾向派也有一定的优势。因政治观点不同而被清除出党的做法很难为党内左派接受，人们对30年代和50年代党内右翼对左翼的清洗还记忆犹新。被左派所把持的地方党组织对执委会此举也抱抵触态度。在年会就此问题进行表决时，10个选区工党的代表有9个投票反对建立登记制度，只是由于多数工会的支持，执委会的提案才被通过。而工会又是采用集团投票制，基本为工会领袖所操纵。此时，一些大工会领袖都是右翼分子。

工党在取得了反对战斗倾向派的初步胜利后就遇到了新的麻烦，因为一旦建立起了登记制度，左派就要分裂出去。布莱尔所属的温和左派不愿看到这个结局，有些犹豫不决。工党协调委员会的态度也是如此，它支持年会的决定、赞同富特的领导，但是反对将战斗倾向派清除出去。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工党协调委员会内部存在分歧，同年10月，该组织的执行委员会以7票对2票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工党协调委员会同登记机构合作相处。但这只是个临时性的措施，作为一个民主的组织，工党协调委员会的立场应于1982年11月21日在纽卡什尔召开的每年例会上，由它的全体成员最后决定。

这又引发了一场新的竞争。对工党协调委员会来说，这次会议将是非常关键的时刻，因为它决定该组织未来的发展方向。布莱尔的朋友文伦·哈卧斯是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他清楚全体成员可能都参加例会并投票，结果可能是势均力敌，所以事前的动员工作非常重要。他请布莱尔和切丽去协助他。有150人出席了会议。在会上，持对立观点的两派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工党执委会的路线以72比61的票数获胜。在会上，布莱尔做了即席发言。当布莱尔突然站起来时，坐在他旁边的哈卧斯感到大吃一惊，哈卧斯后来说：“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布莱尔在没有做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即席演讲。他说：‘我想打断一下，因为讨论过分极左化，这都是胡扯。’当他继续讲话时，我担心他会一时找不出所要讲的东西来。我当时想，他太冒失，是个新手，缺乏经验。然而，他讲得很好，既自信又有勇气。”

工党协调委员会决定与“登记派”合作而疏远战斗倾向派。战斗倾向派最后的抗争就是走上法庭，它试图取得法院的一个禁令来阻止工党将它清除。布莱尔做为亚历山大·欧文的顾问出庭来为工党辩护，结果战斗倾向派输了。随后，工党执委会找了一个适当的理由，将战斗倾向派的5名成员开除了。

然而，反对战斗倾向派的斗争才刚刚开始，面对日益临近的大选，工党

的前进道路上仍有许多艰难险阻。当时的形势对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十分有利。1982年12月，保守党的议员们催促撒切尔夫人于来年6月举行大选。按正常任期，保守党政府还有一年半的时间（从1979年5月的大选算起），但是形势越来越表明撒切尔夫人很有可能在1983年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因为马岛战争后，撒切尔夫人的威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她可乘此时机动员选民支持她。而工党此时仍是内争不已。1983年2月，在勃门德西的补缺选举中，由于左派的捣乱，工党遭受沉重打击。当地工党选择了彼得·泰切尔为候选人，他在竞选中倡导战斗倾向派的极端反议会的观点；而且这里的工党组织公开向党的领袖富特挑战。正因为这样，富特在下院说：“泰切尔并不是工党确认的候选人，从我本人这个角度讲，他将来也不是。”最后，泰切尔以1万张选票之差将席位输给了自由党人西蒙·赫格斯，而这原来是工党的安全席位。补缺选举的失利，更增加了即将来临的大选的压力。

工党反对新选区界线划定的行为也给它带来一定的麻烦。工党想采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但在上院失利。由于安全议席的减少，工党的议员候选人也不得不减少，因为推举候选人参加竞选要付出很多费用。此外，当工党在法院向新的选区划界发出挑战时，它拒绝为新的选区推举候选人。这种局面使布莱尔这样的新人面临的压力更大了，因为那些被淘汰下来的候选人和议员把注意力转向了其他选区。这从布莱尔在30岁生日临近时所说的话中可以看出：“我对竞选已感到非常绝望，我看到前途暗淡。”他甚至拒绝参加在西撒尼特的选举活动，不去为他的夫人切丽·布莱尔助选。

新的希望和失望

然而，正当山重水复疑无路时，柳岸花明又一村。这年4月，布莱尔又重新获得了希望。由于选区边界的重新划定，在靠近布莱尔家乡德汉姆的煤城塞奇菲尔德意外地空出了一个席位，为许多还没有成为候选人的人带来了新的希望。然而开始布莱尔并不占优势，他与塞奇菲尔德没有多少联系，尤其是4月底的一些民意调查表明，当地的工党似乎有意让一个叫莱斯·哈克菲尔德的人来填补这个空缺。哈克菲尔德是党内强硬左派分子，曾是米德兰选区的议员，由于选区边界的变动，他的席位让保守党人夺去了。看来布莱尔又没希望了。

自尊心往往会使人产生强大的动力，有一件事大大刺伤了布莱尔的自尊心。4月28日，在他生日的前一个星期，布莱尔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初出茅庐者参加了工党的一个集会，在这个集会上，切丽·布莱尔、托尼·布斯和托尼·本都发表了演讲。西撒尼特的工党主席瑞格卧德说布莱尔是一个“活动过度的人”，他还提醒布莱尔“你是一个候选人的丈夫，并不是候选人”。集会大厅里人头攒动，托尼·本以掌握工党时代脉搏的口吻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切丽·布莱尔还对人说，她非常高兴同两位托尼站在一个平台上，他们开启了她对社会主义的追求。至于第三个托尼（即布莱尔）对此怎么想，

英国的上院除了是立法机构的一部分外，还是个司法机构，无论是民事案件还刑事案件，上院都是最后的审判机构。—作者注

英国采用的选举制度是简单多数制，在某一个选区胜者得全票，而且只有一个席位，所以选区的划定十分重要。—作者注

她没有提到。海克尼的人普遍认为，切丽的政治主张与布莱尔是相近的，尽管可能比他左一些。但是切丽对托尼·本对她的启蒙作用的认可并不比布莱尔对本的认可多。在毕肯斯菲尔德的补缺选举活动中，从有利于党的团结出发，布莱尔曾说过：“我非常赞同托尼·本的一些观点。”在那次集会后返回伦敦的路上，布莱尔曾与本讨论了战斗倾向派，他俩的分歧归结起来就在这个问题上。本认为工党 1979 年大选的失败，就是因为党内缺少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而战斗倾向派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尽管他不同意该组织的某些观点和做法。切丽也与本有许多分歧，她反对本的关于党内民主的主张，后来当她于 1983 年冬季进入了工党协调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后，更加强了她的这一看法。她曾声明道：“工党不仅仅是一些积极分子的党，它应该成为社区的一部分，与社区建立起民主的联系并融为一体。”这个观点与布莱尔的完全一样，这表明他们夫妇是有共同语言的。

在失望与希望的交替中，布莱尔迎来了他的 30 岁生日。他的妻子切丽为他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生日聚会。几乎与此同时，撒切尔夫人威胁下院考虑她关于那周地方议会选举的暗示。3 天后，5 月 9 日，星期一，撒切尔夫人宣布提前举行大选，时间定在 6 月 9 日。不知是铁娘子的傲慢举动激起了布莱尔的爱党热情，还是由于那次集会上那位工党主席和切丽·布莱尔的话刺激了他的自尊心，布莱尔决定立即返回塞奇菲尔德，就像亚历山大·欧文曾经劝说过他的那样——去扩大他的运气。这一次他碰对了，成功了。切丽后来回忆说：“有一天他北上了，自此再没回来。”

工党在“自杀”

工党面对突然到来了大选，匆忙上阵。就在布莱尔北上的同时，在伦敦，迈克尔·富特召集了会议，起草工党的竞选宣言。会议决定重印两个月前发表的竞选文件，而没有争论政策上的分歧，只是加上了一个富特写的序言。会上，只有影子内阁财政大臣彼得·肖发了言，提议将一些东西删除掉，以使宣言简短些。影子内阁教育大臣尼尔·金诺克在会前给富特写了封信，表达了他对宣言的不满。但在会议上，不满者都没有开口，其中一个叫吉罗尔德·卡夫曼的人事后在私下里把这个宣言称为：“历史上最长的自杀文件。”

这位工党人士的话不无道理。这个题为《英国的新希望》竞选宣言是工党有史以来最左的纲领。宣言不顾英国社会客观现实的变化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机械地坚持工党原来的目标和基本政策。宣言保证，工党一旦执政，将使公共开支达到 115 亿英镑，并在 5 年内使失业人数减少到 100 万以下。宣言还提出，要使英国退出欧洲经济共同体，实行单方面核裁军，尤其是允诺要重新实行国有化，并加快步伐，赋予工会更多的权利。《泰晤士报》对这个宣言评论道：“工党保证向人们提供天堂般的生活，但这种天堂生活要靠向人借贷才能实现，而借贷总是要偿还的。这个宣言不但没有为英国带来新的希望，相反却是绝望。”像工党这样极左的竞选宣言只能是吓跑一大批选民。这次大选工党只得了 209 席，远远少于 1979 年大选（1979 年工党得 269 席），是 1935 年以来最少的一次；工党的得票率仅为 28.3%，是 1918 年以来的

约翰·任托尔：《托尼·布莱尔》，第 115 页。

参见彭尼·朱纳：《妻子·母亲·政治家——玛格丽特·撒切尔传》，花城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56 页。

最低点。

毛遂自荐被提名

就在工党“自杀”的时候，它未来的领袖却只身一人北上来到他的家乡德汉姆。他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追求目标，正奔忙于原属德汉姆选区、现在属于塞奇菲尔德的特里姆顿村庄。在英国，要成为议员，首先要得到某一个政党的正式确认成为该党的候选人，而要成为工党的候选人，必须先得到它某一个组织的提名。布莱尔到特里姆顿村来就是要争取得到该村工党支部的提名。约翰·伯顿，该村的工党支部书记后来回忆说：“他给我打来电话，问我他是否可以来看望我，因为我是特里姆顿村庄的党支部书记。他搞到一张选区工党的书记名单，发现特里姆顿没有提名任何人。我告诉他‘行，你最好晚上来，因为我们支部的5个人将开一个选举后的总结会议’。”一个星期前，在地方选举中，伯顿和他的伙伴特瑞·卧德刚刚被重新选为塞奇菲尔德地方议会的议员，“我们正准备发一封给选民的感谢信，并举行一个聚会，大伙喝酒庆贺一下”。

晚上9点钟，布莱尔的汽车停在了特里姆顿9号街外。他后来回忆说，他几乎没有勇气钻出车门，差点儿开车返回。但他还是鼓起勇气叩开了一间小茅舍的门。伯顿把他迎进屋并让了座。5个人都在房内。其中的保罗·特里彼特后来回忆说：

“离大选都不到一个月了，他还没有被提名。他来到一个没有为人提过名的支部，去一个陌生的房子见一些陌生的人，他说他当时想：‘我到这来干什么？’他坐在车里犹豫了一两分钟，然后想到：‘我既然已经来了，那最好还是进去吧！’”

这个聚会的最重要的事项就是看电视上播放的足球赛，那是欧洲霸王杯的最后决赛。5个人正边喝着酒边看球赛。布莱尔说他非常喜爱足球，他加入了看球赛的行列，看得很投入，与他们一起为球员叫好。由于有加时赛，布莱尔不得不陪这几个人再多看半小时。直到球赛结束了，他们才问他：“我们为什么要为你提名？”他们讨论了这个问题。有人说：“我们为什么把提名给一个刚刚进来的、破坏了我们看球赛的人呢？我们与他素不相识，他谈话装腔作势，他来自伦敦，我们为什么要考虑他呢？”其中最难对付的是地方议会议员特瑞·卧德，他是一个左翼卫生服务协会的积极分子。他向布莱尔提了许多卫生服务方面有争议的问题，布莱尔回答得都很好。卧德虽然对布莱尔有很深的印象，但还是没有被说服，他想提名一个强硬左派的真正社会主义者。

支部书记伯顿站在党内右派立场上，他说他很喜欢布莱尔。布莱尔向他们谈了许多关于改革工党、拓展党的基础的观点；还谈了他对欧洲问题的看法。他说他不同意党的欧洲政策，因为他认为英国将在欧洲发挥更大的作用，他相信未来属于欧洲。但是伯顿也是没有被说服。

彼得·布儒克斯，一个社会工作者，对布莱尔印象也很好。他回忆道：“他非常诚实、开朗，当我们和他交谈时，我们能够感觉到这一点。这个家伙很开诚布公，他说的与他内心的想法是一致的。他说他需要这个提名，他非常渴望从事政治活动，渴望取得议席，因为他认为他可以为国家的未来做贡献。从他个人角度讲，他并不需要这么做，因为他是一个从事企业法的高

级律师，他需要提名并不是为了金钱。”

支部的另一个成员是个年青人，叫西蒙·霍班。布莱尔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也未表态。布莱尔继续说服他们。他向支部的几个人讲述了他在毕肯斯菲尔德的表现，最后打出了富特这张牌，拿出了那次竞选时富特留给他的信，信上说像他这样有能力的人应该进入议会。支部的人都很爱戴他们的领袖富特，而且他们知道富特是个左翼分子。由此他们推断，布莱尔一定是比较激进的人，虽然他们并不知道布莱尔的倾向。5人中的特里彼特首先被布莱尔打动了。他觉得布莱尔对所有的问题回答得都很好，一切都很自然，而且这个年青人外表英俊、口才好、很有人情味。他心里想：“如果你确实需要这个提名，那就给你吧！”不过这事要集体决定。

支书伯顿比其他入更喜欢这位年青人的特殊气质。不过他原来已另有打算，他也有意竞争塞奇菲尔德的议员职位。然而本地区议会的主要领导人华任·麦考特也对这一职位感兴趣，伯顿担心如果竞选不成功，会开罪地区议会的领导们，甚至可能被赶出他所在的支部。他认为提名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反而会好些。同时，伯顿也承认，布莱尔比他更具有当选的实力。“当我一看到托尼时，我就知道他才是合适的人选而不是我，他比我更能把整个党推向前进，改变党的面貌。”

经过认真讨论，5人中有4人同意为布莱尔提名，只有特瑞·卧德反对。9天以后，布莱尔被提名为该选区工党候选人的候选人。这对他的政治生涯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伯顿、布儒克斯、特里彼特、霍班和另外一个叫费尔·威尔逊的人后来成了布莱尔竞选班子的核心人物，为布莱尔跻身议会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伯顿回忆说：“如果布莱尔那天不去找他们的话，他和他的朋友们不可能在后来的选举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险些失去参赛资格

与布莱尔竞争塞奇菲尔德工党候选人职位的有强硬左派人物莱斯·哈克菲尔德。但是他的支持者们并没有认识到，他对选举候选人的代表们的影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因为塞奇菲尔德是个新选区，选区工党是由原来的许多党组织合并而成的，各个党组织政见分歧很大，因此强硬左派的力量不是太强。

按工党的规定，议员候选人要在一次选区工党的代表大会上由代表们从若干个被提名者中选举出。所以布莱尔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拜访每一位选举会议的代表即选举人。保罗·特里彼特没有上班，驱车带着布莱尔四处奔波，并向他介绍每一位选举人的情况。布莱尔在同选举人谈话时很讲策略，他并不是生硬地劝他们说：“投我的票吧！”而是说：“我很有可能成为候选人名单上的第一人。我知道你们现在已经有了选择要支持某人，但是如果你支持的人失败了，而我有可能当选的话，你是否会转向投我的票呢？”布莱尔的策略是正确的，因为当时确实大多数人早已拿定了主意，突然去让他们改变主意是不现实的。

与此同时，伯顿做为支部书记，很快召集了特里姆顿村支部的党员大会，因为提名一个候选人必须经全体党员大会通过，不经这一关，布莱尔的名字就上不了选区工党的候选人名单，更不可能在选举会议上被投票。提名大会在5月14日，星期六举行。特里姆顿村支部共有200名成员，可是参加提名

大会的只有 15 人。布莱尔在会上发表了大约有 5 分钟的讲话。他显得很紧张，自己感觉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而且自我感觉话讲得很糟，是一生中最糟的讲话。讲完话后，他认为肯定不会被大会提名了。不过伯顿认为布莱尔讲得非常好，只是有点紧张。最后大会以 12 票赞成、3 票反对通过了给布莱尔提名的提议。塞奇菲尔德是提出工党候选人的最后一个选区，在整个过程中，布莱尔都很幸运。

上面提到的 5 个人全身心地投入了竞选活动，他们被称为“著名的五人”。为了便于联系，布莱尔搬进了伯顿的房子里。提名后的第二天，伯顿拜访了塞奇菲尔德选区工党的书记乔治·佛格森。佛格森写了封信，上写：“我特此宣布接受你们关于安东尼·查尔斯·林顿·布莱尔的提名。”至此，布莱尔的提名过程就算最后完成了。实际上，布莱尔的提名是绕过了许多工党繁琐程序的障碍获得成功的。选举候选人的选区工党代表大会将在 5 天后，即 5 月 20 日，星期五举行。

布莱尔的主要竞争对手哈克菲尔德是个很有实力的人物。他自 1967 年起就一直是纳尼顿选区的议员，后来由于选区界线的变更，使得这个席位极有可能在大选中落入保守党手中。于是他及早采取行动，寻找新的出路。开始，他把目标放在了威根这个工党的安全选区，与罗格·斯道特竞争工党候选人的资格。然而结果没有遂他的心愿，他在选举候选人的会议上以 100 对 113 票输给了斯道特。当晚他就驱车直奔塞奇菲尔德。当布莱尔来到此地时，哈克菲尔德已经在这里上上下下疏通关系达两个星期了。到了 5 月 7 日的时候，那时布莱尔刚刚在海克尼过完生日，塞奇菲尔德工党的许多人已经准备把哈克菲尔德做为候选人了。

哈克菲尔德背后有强大的左派网络的支持。他曾经是工党的右翼分子，在卡拉汉内阁中任过工业部的低级大臣，后来成了工党全国执委会的成员，但却转变成比托尼·本还左的人。他的立场转变非常快。据知情者透露，当他在 1978 年加入全国执行委员会（那时已成为左派的权力基地）时，对战斗倾向派还怀有敌意，他曾建议有关部门调查战斗倾向派的专职工作人员，看他们是否要求国家的福利。但是到了 1982 年 9 月，当战斗倾向派在温布利体育场举行会议时，他是参加会议的唯一的工党议员，在会上他还抗议工党领导层对战斗倾向派的“政治迫害”。不过在 1982 年，他失去了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职位。

在竞选塞奇菲尔德工党候选人期间，哈克菲尔德犯了一个错误，降低了他在人们心中的威信。那是在一个全国煤矿工人协会举办的集会上，有许多保守党和自由党—社会民主党联盟的候选人参加了会议，并发表了讲话。这使工党的人感到很尴尬。因为他们原以为这些人不会来参加工会的会议。BBC 电台的“今晚新闻”节目拍摄了会议的实况，当时它正在制作一个题目为“没有工党候选人的选区”的报导。会议主席建议找一个幸运听众坐在主席台上，这个人就是哈克菲尔德。当哈克菲尔德坐在主席台上时，他正面对着“今晚新闻”的摄像机。人们对此议论纷纷。这不仅是因为在这个会议上保守党人发表了讲话，而“今晚新闻”又是有反工党倾向的，更因为哈克菲尔德坐在主席台上，显得非常突出，好像他已是当选了的议员似的。塞奇菲尔德选区

英国的内阁大臣分高级、中级和低级，高级大臣一般是各部的主管大臣，中级大臣一般是各部的国务大臣，低级大臣一般是各部的政务次官。—作者注

工党主席佛格森没有出席这个会议，但他对哈克菲尔德的作法的反映是：“人们可能认为我们已经有了倾向性，让他成为最有希望的候选人。我个人认为，让任何人坐在那个位置上都是不合适的。”

当布莱尔和他的支持者向选举候选人的代表们奔走游说时，形势已越来越清晰地表明，大多数代表对哈克菲尔德的看法与佛格森一样，对他的行为感到反感。当然，仍然有一些人还是支持哈克菲尔德，他的优势并未完全丧失。

布莱尔的5个干将都没有参加竞选的经验，而且只有伯顿一人是选举候选人会议的代表。不过伯顿在该选区非常有名气，他是毕晓普·奥克兰职业足球队的前锋，一名物理教师，一个民间乐队的弦琴演奏师，还是一位工党的地方议会议员，当地的很多人都喜欢他。伯顿自己说：“一些代表在学校里与我接触，一些代表踢球时与我在一起，一些代表与我有这样那样的联系。”

“著名的五人”中的费尔·威尔逊是后加入的。他在布莱尔来了一周之后来到塞奇菲尔德，本来是想寻求提名的。他直到两月前，1983年3月才加入工党，动机只是因为他支持核裁军运动。不过他在一个公民服务协会中非常活跃，为协会做了不少法律上的工作。当他找到伯顿时，伯顿明确告诉他，他们将支持布莱尔，还说：“他是内阁首相的料。”于是威尔逊也加入了伯顿他们的行列。

竞选活动是令人振奋的。保罗·特里彼特说：“这是一个幸福的时刻，一切对我们来说都那么新鲜，对托尼来说也一样，我们正踏着新的土地，我们把一切干得很好。”特里彼特本来已经成为战斗倾向派的成员，并且离开了工党。为了帮助他从前的老师约翰·伯顿竞选地方议员，他于一个月前又重新加入了工党。他帮助布莱尔竞选的最初动机仅仅是因为它富有挑战性，令人感到十分刺激和兴奋。虽然他后来很崇拜布莱尔，但是最初他对布莱尔的印象并不深。

为了竞选，布莱尔匆忙制作了一份个人简历。在个人背景一栏，他写道：

“1955—1975年，我住在德汉姆城。开始在城里，从1963年到1975年住在海辛克利夫的新房地产开发区。1972—1975年在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攻读法律专业，1975年毕业，获法律学士学位。”

1975—1976年，我是伦敦法院学校的学生，于1976年夏天通过了职业考试。

1976—1977年，我是亚历山大·欧文（皇家法律顾问）的学生。在最后的学习阶段，24岁，做为一个实习高级律师，我在事务所里得到一个职位。自1977年以后，我在律师事务所从事法律工作。”

简历还介绍了布莱尔所从事工作的性质、主要服务对象，以及经手过的主要案子。在“从前的议会经验”一栏里，他没有忘记拉上富特这面大旗，他是这样写的：

“在福克兰战争期间，我参加了毕肯斯菲尔德的补缺选举，竞争一个原属保守党的议席。我得了23000张选票。我落选了（不出乎人们的预料），但是获得了宝贵的经验。迈克尔·富特于1982年5月26日在BBC‘今晚新闻’节目中说：‘在我看来，布莱尔将为英国的政治做出重大贡献。’”

在“出版作品和讲演”一栏中，他写道：

“我在《卫报》、《新政治家》、《观察家》、《工党周刊》上发表过

文章。这些文章涉及了工会、法律、民权、种族关系问题。我讲授工会法多年。1982年6月，在运输和普通工会（这是英国最大的工会之一）德汉姆分会的周末集会上，我作为会议的主持人在会上就工党问题做了演讲。在澳大利亚，我被邀请在一些大学做关于工党及其未来的演讲，后来演讲被编辑成册，在澳大利亚出版。”

在党内任职一栏中，他是这样写的：

“我曾经在3个伦敦选区供职，是每个总委员会的成员。我现在是南海克尼选区总委员会中的一名运输和普通工会的代表。我是工党律师协会执委会的成员，负责工会和地方政府的法律。”

关于家庭状况，布莱尔写道：

“我妻子切丽·布斯，出生于利物浦。现在是一名高级律师（在1976年全国职业考试中已升到最高级别），她擅长孩子的保护和收养工作。她父亲是一个演员，叫安东尼·布斯，主演过《鞠躬尽瘁》。安东尼和帕特·菲尼克斯都帮过我竞选国会议员，他们将很高兴继续这样做。我和切丽没有孩子。”

简历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观点和意图概述”，即竞选纲领：

“我一直想回到东北部来代表这里的公民，如果参加选举，我将住在选区，我将成为一个专职的议员。切丽的工作也可以转到北部。

我认为一个议员有两项任务：一是同他代表的公众一起工作，了解他们；二是向议会反映本选区选民的要求。

我相信一个统一的工党可以提供积极的办法让人民能够理解并感受他们每天的生活。我主张党的政策由党的代表大会决定，如果发生分歧，必须在党内以民主方式解决，不应该诉之于新闻媒介。我的意思是，党员不仅有自由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力，也有贯彻党的决议的义务。”

由于比较匆促，布莱尔的简历显得有些粗糙，有些说法不很明确，比如“我相信一个统一的工党……生活”这句话就很抽象。但是不管怎样，透过简历，还是能够对布莱尔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这份简历是塞奇菲尔德工党在拟定候选人名单之前所拥有的唯一的有关布莱尔的文件。拟定候选人名单的工作将于5月18日在塞奇菲尔德选区最大的城市斯潘尼莫尔的市政大厅进行，拟定名单同时，就是进行初步筛选。负责这项工作的选区工党执委会为左派所操纵。当时获得提名者共16人，包括布莱尔和哈克菲尔德。可是，在执委会草拟的名单中只有6个候选人，而布莱尔的名字不在名单上。很明显，他们支持哈克菲尔德。

由于在全国范围内大选的竞选活动已经开始了，所以竞选议员候选人的程序必须被大大压缩。拟定名单的第二天，选区工党总委员会的负责人将在斯潘尼莫尔再次碰头，审查通过这个名单。这是一个决定性的会议，因为它最后确定谁有资格参加议员候选人的竞争。约翰·伯顿带着一个特殊使命来参加这个会议，这就是增补布莱尔为议员候选人的候选人。伯顿回忆说：“他们先把整个被提名人名单查阅了一遍，考虑已获得提名的人，哪一位还可以增补到候选人名单上。当查到布莱尔时，我站起来说：‘我得到一封迈克尔·富特写来的信，信上说他希望布莱尔能尽快被吸纳入议会。’没有人想到这样一封简单而普通的信件，竟很快发挥作用了。”在这次会议上，仅增加了一

名候选人，就是布莱尔，而且布莱尔仅有一票的优势，42 比 41 票。真是太惊险了！当伯顿从总委员会返回把这个消息带回来时，焦急等待着的布莱尔和他的支持者们都兴奋地高呼：“乌拉！”整个房子顿时沸腾起来。

第二天，布莱尔就来到德汉姆教堂，他是信上帝的，而且他就是在这个教区生活、上学和加入工党的。早在几天前的一个晚上，约翰·伯顿就去了特里姆顿的圣玛丽·麦格达林教堂，像布莱尔一样去祈祷上帝保佑他们竞选成功。不过布莱尔并不知道伯顿此举。

以弱胜强当选为议员候选人

两天后，星期五的晚上，119 名代表在斯潘尼莫尔市政大厅举行了塞奇菲尔德工党候选人的选举大会。在投票前，候选人名单上的 7 个人分别做了 5 分钟的演讲，再用 5 分钟回答问题。当莱斯·哈克菲尔德被推到前台回答代表们提出的问题时，他已经意识到形势不太妙。布莱尔和伯顿虽然经验不太丰富，但也并不是胸无点墨。伯顿早已准备好了几个写着问题的纸条，分发给一些与他关系好的代表。其中一个问题是哈克菲尔德的反对者斯道特事先想好的，内容是：“哈克菲尔德先生，当你想争取的议席因竞争双方势均力敌而可能为任何一方得到时，你是否会允许对手指责工党说它的在任议员有许多缺点，因此不应该得到这个席位呢？”

最尖锐的一个问题是：“运输和普通工会支持登记制度（指反对战斗倾向派的登记制度——作者），那么哈克菲尔德先生将怎样继续反对它呢？”哈克菲尔德是支持战斗倾向派的，而登记制度就是针对战斗倾向派而设计的。运输和普通工会是英国最大的工会之一，在工党事务中很有发言权。提出上述问题的琼·米尔斯先生是运输与普通工会北部地区的领导人，他解释道：“我们必须让参加选举大会的人看到哈克菲尔德的本来面目，使他曝光。因为德汉姆地区的老百姓反对托尼·本的政策，所以我们要让哈克菲尔德支持本的政策的面目更清楚一些，使人们认识他过去是什么样子。”

塞奇菲尔德的人们一直有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最典型的事例是：有一次该选区的前议员代维·瑞德在一次集会中与两个年青的共产主义者进行的辩论，赢得了与会者的喝彩，而瑞德“从党内的政治面貌来看是中右派”，是该地区反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化身。所以在 1983 年的时候，如果考虑到富特和党的代表大会也反对极左派的话，那么塞奇菲尔德的左派们就更没有时间来支持战斗倾向派分子了。这对布莱尔是十分有利的，使他最强大的对手减少了获胜的机会。

布莱尔是最后一个出场演讲的。他显得非常机敏、思想活跃、精力充沛。他在演讲中提到了欧洲问题，因为有一个代表事先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英国应该在欧洲发挥作用，而且工党正在改变以前的对欧洲政策。

选举采用多轮投票的方式。第一轮投票，布莱尔所得的票数刚好超过 1/3，但是他排在第一名，哈克菲尔德排第二。在以后的几轮投票中，布莱尔都居前列。经过 5 轮投票，布莱尔终于击败了哈克菲尔德。约翰·伯顿将每次投票的情况都记录下来。第一轮投票，布莱尔得了 39 票，哈克菲尔德得 27 票；第二轮投票剩下 6 个候选人，布莱尔的票数上升到 53 票，后者未变；第三轮投票时只剩下 4 个候选人，布莱尔减少了两票，而主要对手的票却增加到 32 张；第四轮投票有三个候选人，布莱尔的票猛增到 58 张，主要对手

的票未变；最后一轮投票只剩下布莱尔和哈克菲尔德两个候选人，结果是 73 比 46 票。

塞奇菲尔德工党的书记乔治·佛格森说：“我相信妇女们都投了布莱尔的票。”在最后一轮投票结束后，选区工党主席米克·特仁斯在宣布结果时竟忘记了说出获胜者的姓名：“我们产生了一名新议员，让我们向他致以热烈的祝贺。”“他叫……什么？”在别人提示下才说出“布莱尔”这个名字。

布莱尔竞选一个工党安全选区候选人成功的消息不胫而走。他首先给自己的妻子切丽打了电话。他的朋友和支持者得知这个消息后都奔走相告。那天晚上午夜时分，在苏格兰宾馆，工党影子内阁内政大臣罗伊·哈特斯利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当他打开房门时不由大吃一惊，玛丽·高迪女士穿着睡袍站在门前，而她平时是很注意衣着的。那时她正在为工党工作，给他当顾问。她丈夫詹姆·高迪是高级律师，过去曾与布莱尔同住一室。当海特斯利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时，她问：

“你听说过布莱尔吗？年青的布莱尔做出了惊人的壮举，他起先并没有被列入候选人名单，他四处奔走，敲开每一家的门，结果，他成功了。”

在此之前，哈特斯利并不记得布莱尔是谁。后来他说：“从那时起，无论什么人说布莱尔坚强、有力时，我总想起那个星期五的午夜，玛丽·高迪敲我房门的情景。如果有什么时候历史学家会注意他的话，就是那一时刻。”

在自己的党遭受惨败之时一举成功

布莱尔一被选上候选人，就立即和特里姆顿的“五人帮”一起投入了当地的大选活动。切丽和她的父亲托尼·布斯以及帕特·菲尼克斯都赶到塞奇菲尔德来帮助他竞选。

布莱尔的竞选演说写得比较仓促，因为当他被选为候选人时，离大选投票日只剩下 20 天。在欧洲问题上，他显得比较矛盾，有时在演讲中，他称：“我们将协商脱离欧洲共同体，它已耗尽我们的自然资源并破坏了许多工作。”但有时他又声称他是个亲欧洲派。不过当时工党内许多人在欧洲问题上的态度是矛盾的、混乱的、前后不一致的。比如前面提到的工党影子内阁内政大臣罗伊·哈特斯利，曾一直支持英国做为欧共体的一个成员，但在 1983 年的竞选演说中，他却没有提及欧洲问题。而且，布莱尔一直认为，在公众面前，必须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不能公开与党的政策唱反调。党内可以有争议，但必须保持在党内，不能公之于新闻媒介。在欧洲问题上，当时布莱尔是不太赞成工党使英国从欧共体撤出的政策的，所以他说他是个亲欧派，但在公开场合又不好直接申明自己的观点。这就是布莱尔在争取议会席位时的矛盾心境：既对党无限忠诚，又试图改变现状。

由于工党在竞选中提出了非常左的纲领，等于自我毁灭。而撒切尔夫人不仅借助了马岛战争的余威，而且也提出了较切合实际的竞选纲领。此外，自由党—社会民主党联盟也从工党那里分走了一部分选票。1983 年 6 月 10 日，投票后的第二天上午，大选揭晓，工党遭受有史以来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不过，它未来的领袖却以 8281 张的多数票当选为国会下院议员。工党跌到低

谷之日，正是布莱尔跻身议会之时。

在大选日，布莱尔的父亲利奥·布莱尔亲到现场，他感到非常骄傲，尽管他与儿子的政见不同。切丽·布斯帮助布莱尔作了一些竞选工作后，便回到 300 英里之外的西撒尼特为自己竞选，不过她被保守党和自—社联盟挤到了第三位，幸好还保住了担保金。

大选过后，布莱尔给特里姆顿所有帮助过他的人写了感谢信。其中给彼得·布儒克斯的信是这样写的：“这是我平生最想做的事情，我在你的帮助下有机会使之成功。我希望你对我的忠诚能得到回报。”约翰·伯顿是使布莱尔走向成功的最重要人物。大选结束后，布莱尔在汽车上对伯顿说：“我只说一次，今后再不会说了。我永远无法报答你为我所做的一切。”伯顿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了布莱尔身上。1994 年从教师职业上退休后，他一直给布莱尔做选区的助手。他是布莱尔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就这样，布莱尔在特里姆顿刚结识的朋友们的帮助下，经过艰苦的努力，再加上各种运气，一举成功，终于成为议会下院的议员，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从此他平步青云，很快成为英国政坛上的一颗新星。这一年他正好 30 岁。

在英国，议员候选人要交一定数量的担保金，如果候选人所得的选票太少，担保金则不退还本人。这种作法主要是为了限制那些毫无希望的候选人参选。—作者注

六、工党的神童

1983年，是布莱尔政治生涯的重要里程碑，因为在议会民主制的国家里，进入议会是所有政治家的必经之路。布莱尔在他刚刚30岁的时候，就实现了他从政道路上的第一个目标。此时，对他的党来说，也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

工党最年轻的议员

1983年的大选是工党的奇耻大辱。大选后不久，取代富特为工党领袖的尼尔·金诺克对工党人士说：“记住你们在那可怕的6月10日上午时的感觉，谨记当时的所感所想，并告诫自己：‘1983年6月9日，我们将永远不会再经历那样的日子。’”

在这种情况下跻身议会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早在一年前，布莱尔在澳大利亚的演讲中就曾预言，工党虽然处于很不利的境地，但现行的选举制度会帮助工党稳拿200个席位。他的预见很准，工党得了209个席位。不过这对工党来说是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保守党在议会里拥有144席的空前多数，而工党在新议会中只有32个新议员。布莱尔则是这32人之一。他一到下院，就对工党议会党团的残部进行了通盘考察，然后得出结论：“升迁到工党高层，不应花费我太多的时间吧？”在新的工党议会党团中，年仅30岁的布莱尔是最年轻的议员。左派实际上已经破产，许多左派议员在这次大选中落马，就连强硬左派的领袖托尼·本都失去了他在布里斯托尔的席位。不过左派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失败，托尼·本甚至谰妄地自认为左派获得了成功，他将这种悲壮的、具有英雄气概的失败视作道义上的胜利。但是布莱尔则认为，失败就是失败，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都是失败。不仅如此，他还担心工党会就此土崩瓦解，以至于必须重新建党。在以后的4年中，布莱尔一直有这样的担心，因为工党还没有从内耗中摆脱出来，在是走向团结还是继续分裂下去这个问题上，工党内部还没有形成共识。面对这种状态，布莱尔有时会感到非常沮丧，甚至认为自己是一名生不逢时的议员，尽管他从未真正地想要放弃他的议员席位。

成功的处女演说

进入议会将近一个月的时候，1983年7月6日，布莱尔在下院发表了他的处女演讲。在演讲中，他断言工党虽已分裂，但是在就业问题上，党内各派甚至包括已分裂出去的工党人士还是能够达成一致意见的。他通过描述他的选区的政治传统来论证他的观点。他引述了他的前任们的话：

“人人都认为每年把成千上万的孩子，在没有可能被持续雇佣前景的情况下抛到劳工市场上，是一种极为悲惨的行为。这导致了許多童工在毫无希望的职业中盲目地随波逐流。他们没有接受过适当的训练，他们感到自己是多余的，前途渺茫。”

布莱尔在演讲中抨击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对失业现象的大量回升漠不关心，甚至暗自得意。在英国议会中一直有这样一个传统，即新议员的处女演讲不应该是引起争议的。可是，布莱尔却打破了这个传统，尽管他

一再否认他所讲的事实是有争议的。布莱尔说，他的选民在失业后不仅要蒙受被迫无事可做的耻辱，而且他们甚至不知道怎样支付诸如结婚成家的费用，他们也不知道何时才能有机会得到本属于自己的社会福利。

布莱尔特别强调现实生活中人们安居乐业的愿望。他攻击保守党政府的年度预算只对那些拥有3倍于平均收入的富人有利，这是与保守党为民众谋利益的低税收政党这一神话相抵触的。他引述了伦理社会主义的观点：“我之所以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是因为我信仰它。社会主义最为符合一种既合理又道义的存在。它代表合作，而非对抗；代表友谊，而非猜疑。它代表平等，并非因为它想要人们变得都一样，而仅仅是因为只有通过在经济环境中的平等，我们每位个体才能得到正当的发展。英国的民主极其依赖于所有公民在享受公共福利时的共同感觉。”

这就是布莱尔当时的政治信仰。以后他一直坚持这种信仰。

支持金诺克为领袖

发表这个很引人注目的演讲并不是布莱尔作为新议员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在此之前，他就参加了工党新领袖的选举活动。大选过后，迈克尔·富特就宣布辞职，随后便开始了领袖选举的竞选活动。参加竞争的有4位候选人：尼尔·金诺克，罗伊·哈特斯利、彼得·肖和艾瑞克·海佛。本来托尼·本是最强有力的竞争者，无奈他未当选上议员。按规定，只有议员才有成为领袖的资格。不过强硬左派也提出了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艾瑞克·海佛。在竞选期间，人们最关注的是候选人在欧洲问题上的态度。肖和海佛都坚决反对英国继续为欧共体的成员。而金诺克则坚决认为：英国加入欧共体已有10多年之久了，工党必须接受这一现实，而不应漠视它。当时工党内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的潮流正在扭转，金诺克的观点正代表了这一新的趋势。实际上，在4个候选人中，金诺克最具有实力，而且又得到了富特的支持。富特有意在对金诺克最有利的时机宣告辞职。所以，这次竞选结果是不争自明的。布莱尔在这次选举中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他支持金诺克为领袖，哈特斯利为副领袖。

在随后的9年中，布莱尔有意靠近金诺克，与他建立起一种很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使他在党内青云直上，以至于到了1992年金诺克辞职时，布莱尔已成为工党副领袖的有力竞争者。布莱尔自称是金诺克政治上的核心伙伴。实际上起初他只不过是一位受到新领袖的青睐并被提拔的后座议员，在新领袖心目中的地位不是太高。而且最先支持金诺克的是约翰·史密斯和罗伊·哈特斯利。不过到了金诺克领袖生涯的末期时，布莱尔已经居于党的领导核心之内，他与金诺克为实现工党现代化这一目标而并肩奋斗。

在改革工党问题上，布莱尔的思想在当上了议员后有所变化。在1982年澳大利亚演讲中，布莱尔虽然预见到金诺克会成为党的领袖，并宣告新领袖的行动方针是：将从极左派中分离出来的中派与右派联合。但是，1983年工党灾难性的失败促使他重新思索党的基本路线和国内战略。在1982年，他还认为工党依靠现有的政策能够击败保守党，因为这些政策已经体现了英国社会和经济所发生的变化。但是，现在他修订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工党必

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否则就决不会有胜利的希望。

不过布莱尔的主张却被左翼指责为修正主义。在大选后不久，强硬左派在布莱尔选区中的斯潘尼莫尔组织了一次集会，会上充满了对布莱尔的敌对情绪。当布莱尔发表演讲、阐述了他的一些主张后，左派议员丹尼斯·斯基诺抨击他背弃了社会主义原则。斯基诺还指着与布莱尔竞争过塞奇菲尔德议席的莱斯·哈克菲尔德说：“他才是真正的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人。”斯基诺的话引起了在场人们的大声喝彩。会后，布莱尔对他的代理人约翰·伯顿说：“也许我做错了，我不该说那些事情。”

伯顿答道：“你不必对那些事缄口不语，你不必向党靠拢，相反地，工党应该向你靠拢，应该朝你指的方向加以变革。”

实际上，说布莱尔是一个无耻的修正主义者是不公正的。在富特、金诺克、史密斯分别任工党领袖的3个时期中，布莱尔始终站在工党现代派一边，而且与自己的领袖保持一致。这3位领袖按政治倾向划分，分别属于左派、中间派和右派，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只有采取当时的立场才能得到党内多数人的拥护。

与布朗同为党内神童

在下院，普通议员还不能享受独有一间办公室的待遇，必须两人合用一间。开始，布莱尔作为一名新议员被分派与一位有极左倾向的议员戴维·尼立斯特同处一室，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尼立斯特是战斗倾向派的成员，虽然富特于1982年就采取措施反对战斗倾向派，但直到金诺克在1985年年会上猛烈抨击战斗倾向派时，这一斗争才算获胜。而尼立斯特和他的另一位同志直到1991年才被开除工党议会党团。

幸好，与尼立斯特同处一室的时间并不长，几个月后，布莱尔就找到了一位令他非常愉快的伙伴，这就是后来成为他的挚友的高登·布朗。在布朗于1987年成为影子内阁大臣之前，一直与布莱尔在威斯敏斯特宫中共用一间办公室。他俩相识后，很快变得彼此非常熟悉，两人有很多相似之处。与布莱尔一样，布朗在演讲时也是充满自信、富有说服力，而且透出某种机智。布朗的第一次演讲是关于贫困状况和就业问题的，他列举了一系列这方面的统计资料。保守党的负责社会保障和就业问题的一位官员为了说明就业问题不是很严峻的，讲了这样一个例子：“做一名玻璃清洁工几乎不需要什么设备——一个水桶，一、二块抹布，一架梯子足矣。”布朗对此评论道：“当首相在选举期间定期地谈到可作为就业机器的梯子时，我不知道下届保守党政府将会有什么更高的招术。”他常用“上你的梯子”来讽刺保守党解决失业的措施。

布朗仅比布莱尔年长两岁，但他的资历却比布莱尔深厚得多。他在进入下院之前就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政治家。他是苏格兰地区的工党主席，在党内有一定的地位；出版过几本有关苏格兰政治方面的著作；70年代早期在爱丁堡大学读书时，就已是一名由公众选出的学生政治家，当时布莱尔正在牛津大学就读；1979年在约翰·史密斯的家乡——南爱丁堡选区第一次被作为国会议员候选人。苏格兰工党的政治主张不同于英国其他地区，尤其是伦敦，但是布朗和布莱尔都发现，他们在工党所存在问题上的共识竟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布朗是苏格兰地区工党反对本主义的领导人，曾经与本主义新左派

所提议的一系列过激行动，如对由苏格兰工党执委会推举出来的领袖迈克尔·富特进行非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很有意义的是，为了抵制来自本主义者的威胁，布朗已着手为扩大工党的党员基础而工作。他开始构想在党内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制计划，依据他的计划，那些现在向工党交纳政治基金的工会会员（即工党的集体党员）将被吸收为工党的个人党员。这一想法表明布朗是相当有远见的。

在与金诺克的关系上，布朗与布莱尔不同。布莱尔在1983年领袖选举中对金诺克和哈特斯利持同样支持的态度，而布朗则是一位纯粹的金诺克分子。布朗一当上议员，就加入了金诺克参与领导的左派“论坛”组织，因此在领袖竞选中，布朗自然成了金诺克竞选班子的成员。“论坛”曾是一个强硬左派的组织，成立于60年代，因以《论坛》周刊为活动基地而得名，在70—80年代工党左派夺取党的领导权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该组织逐渐为温和左派和中派所把持，于是强硬左派分子分离出去，建立了另一个左派组织——工党议员论坛集团。

布莱尔是工党中左派组织“工党协调委员会”的成员，不过该组织只是在基层有影响，作为一个派别组织，在议会中从未起过什么重要作用。布莱尔一直持这样一种看法，即参加议员的派别组织没有什么价值，因此他不愿在任何这种组织中工作。他认为，作为通向工党改革之路的方式，正当的争辩和工作业绩要比为派系组织工作更有价值。不过他的这种看法和态度并没有持续多久。1985年，他在布朗的说服下加入了已变了质的“论坛”，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一组织已成为金诺克分化强硬左派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它将成为通向影子内阁的一条有效途径。

布莱尔与布朗的政治伙伴关系一直持续着。起初，布朗的地位和职位相对较高，因此在工党内的活动更为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而且他以前还在新闻部门当过记者和编辑。布莱尔对布朗能常在报上发表文章，尤其是能透露政府一些文件的内容深感羡慕。一般的议员能在《卫报》第8版上发表点小文章就感到很高兴了，而布朗则常常问津许多报纸的头版。至于布莱尔，甚至做不到让工党的刊物公布他的“伟大思想”，费边社（隶属于工党的一个政治团体）就曾拒绝发表他在1983年大选后写的一本关于社区的小册子。布莱尔对他的朋友布朗非常佩服，深为他的能力震惊。当时，党内很多人都把布朗看成是潜在的领袖人选，而且从未设想过布莱尔会当上领袖。

受到史密斯的赏识

尽管布莱尔和布朗这两位工党的新星都是金诺克的追随者，但最初却是通过党内右派的支持才得以在党内发达起来的。约翰·史密斯早已慧眼看到了他们的才干。史密斯认识布朗是在70年代中期，当布朗担任他的家乡南爱丁堡选区的候选人的时候，他认识布莱尔则是通过他的朋友亚历山大·欧文的介绍。史密斯很欣赏布莱尔的律师才能，称他是一位绝顶出色的律师，经常向别人举荐他。

有抱负的新议员来到议会后的首要目标就是使出自己浑身的解数，尽快使自己由后座议员成为前座议员。反对党的前座议员在议会里可以直接面对

政府各部的大臣，向他们提出质疑。要想尽快成为前座议员，就需要多参加辩论，多在议会中抛头露面，并在辩论中展示自己的才干，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同时还要熟悉议事程序和有关议会的法律。而达到这个目的的通常方式是接近议案审查委员会，甚至成为它的一个成员。因为作为一名议案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他所提出的议案更容易被委员会审查通过，从而有机会拿到议会中去辩论。

约翰·史密斯在新的影子内阁中担任劳工大臣。为了起草一个反对保守党搞的工会法的议案，他需要从议案审查委员会会员中挑选两名后座议员来帮助他，他选中两名新议员，这就是布莱尔和布朗。布莱尔早在进入议会之前，就曾在倾向于工党的《新政治家》杂志上发表文章，反对后来在1982年成为劳工法案的泰比特议案。1983年，保守党劳工大臣诺曼·泰比特的继任者汤姆·金提出了一项旨在打击工会的议案，提出：在选举工会领导人、决定政治集会和罢工等重大事务前，工会会员要进行秘密投票。这使布莱尔得到了在议会中展示自己的机会。

1983年11月8日，布莱尔在下院就上述议案发表了第一次演讲，表明了他与金和另一位保守党新议员迈克尔·豪德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这次演讲与他在议会中的处女演讲不同，这次他没有与对手就英国的政治问题进行激烈的舌战，也没有表达任何对未来美好前景的许诺，而只是从法律角度对保守党议案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这样做可能是为了迎合那些与汤姆·金等人在原则上并无分歧的人们。其实，布莱尔和工党多数人对保守党议案所反映的主要原则也是赞同的，尽管布莱尔在演讲中称该议案是“不正当的、令人惊骇的，是一种羞辱”。不过，布莱尔非常巧妙地抨击了保守党政府的“国家干预”，说这个问题“不在于秘密选举是好还是坏，而是在于国家干预和独断工会内部事务是否正义”。因为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其实，保守党反对国家干预是有选择的，全凭对它是否有利。在工会问题上它就是在强化国家干预，而且有着很强的政治目的，意在打击工会和工党的势力。工会为工党提供的政治基金是工党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保守党的财政来源主要是企业的捐赠。上述的工会法案要求工会在决定提供政治捐赠时要进行秘密投票，但却没有要求企业也承担同等的义务。很明显，保守党政府是在偏袒某一方。保守党在提出工会法时是打着扩大工会内部民主的旗号。布莱尔抓住这一点抨击道：这项法案“与民主无关——完全是干涉英国工会成员们出于自己的选择而自由组织社团的权利”。

总的来讲，布莱尔和他的两位战友——史密斯和布朗，在这次辩论中的表现还不错。当时年轻的劳工部低级大臣艾伦·克拉克在日记中提到了这次辩论，他心有余悸他说：“工党有一支非常强硬的队伍。小个子约翰·史密斯，脸圆而胖，极富魅力，是一位爱丁堡的律师，正当年富力强。还有两个小伙子极聪明，他们就是布朗和布莱尔。”

这位保守党的低级大臣和约翰·史密斯一样拥有一双慧眼，他没有看错人，仅仅一年后，布莱尔就在议会内展露头角，在下院会议大厅中的座位由后排转到了前排。

侧的前排；其余的坐在后排，为后座议员。在大选中获胜的政党为执政党，奉女王之命组成内阁；在大选中获议席次数多的政党为反对党并组成影子内阁。影子内阁起着后备政府的作用。

升为前座议员

1984年11月，这时工党正陷入煤矿工人大罢工所造成的困境中，而布莱尔又一次在自己的党处于逆境时交了好运。有一天，议会下院反对党领袖尼尔·金诺克把布莱尔请到他在下院的办公室来，布莱尔感到十分意外。金诺克的顾问查尔斯·克拉克描述当时的情景道：“托尼绝对在因害怕而发抖。他一点都未意识到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都干了些什么？他根本不会想到他会成为前座议员。这是他第一次被召去见自己的领袖。他被震惊得几乎倒在地上。”当金诺克提出要让布莱尔当前座议员时，布莱尔沉默了很长时间。于是金诺克问：

“难道你不想当前座议员吗？”

“不，我当然想。”

“那好，听着，我想把你吸收到我们班子中来，就这样决定了。”

“我也想成为这个班子中的一员。”

“那么你还有什么事吗？”

“我就是有点吃惊。”

由于这届议会中工党的议员相对往届较少，所以有大约1/3的工党议员是前座议员。前座议员就是影子内阁成员，被分派去了掌握政府各部门的情况。布莱尔在进入下院后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就跻身于影子内阁，成为影子内阁中最年轻的一员。他是自1968年的大卫·欧文以来升迁最快的一位议员，所以很自然地受到媒介的重视。《金融时报》形容他是一位“最有前途的新人”。

在影子内阁中，布莱尔被分配到财政部，在副领袖兼影子财政大臣罗伊·哈特斯利手下当一名地位最低的大臣。在得到金诺克青睐的同时，布莱尔也受到了哈特斯利的器重。哈特斯利在自己当选为副领袖前，曾在毕肯斯菲尔德的补缺选举中第一次见到布莱尔，那时他就对布莱尔有深刻的印象。除了布莱尔在努力工作中所表现出的智慧和才能外，还有一点使哈特斯利十分赞赏，这就是他有礼貌。哈特斯利说：“托尼是我所见到的最有礼貌的人。礼貌是有资格当选的一个小条件。我已参加过大约50次补缺选举，但我认为只有两位候选人事后致信于我，托尼就是其中之一。可见他的特别之处。”布莱尔进入影子财政部后，哈特斯利对他的这位新下属的印象就更好了：“他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优秀。他极其勤勉，做事总是很有能力。如果他在下院不得不去处理很棘手的事情，他总是能做得很圆满。”

在布莱尔得到升迁的时候，另一位工党的神童高登·布朗却谢绝了对他的提升。他自己声称当一名后座议员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并可以更有效地抨击政府，但实际上是不喜欢给他安排的角色。有人曾提议让他担任影子内阁苏格兰事务办公室的一个职务，但是他不想只成为一个苏格兰政治家，不愿被固定在这个角色上。第二年，他进入了约翰·史密斯领导的影子贸易和工业部。

布莱尔很显然是雄心勃勃的，但他努力避免给人留下他是春风得意的印象。他心里也非常明白，前面的路是很艰难的。当时，工党已连续输掉两次大选，对一个以议会为主要活动阵地的政党来说，长期在野是很危险的。哈特斯利说他与金诺克都不懈地坚决主张工党需要赢得政权。他们寄希望于

1987年的大选。但是布莱尔却不寄这种希望，他在当上议员之前就曾对工党的未来进行过认真思考，他认为工党在1987年不会获胜，尽管他预料到1987年大选后他可能会进入影子内阁（实际上比他预料的要早许多）。他很明白，工党不上台执政，自己的任何政治抱负都是空想。他不像有些人那样老是做着当首相的白日梦，也不像保守党的新星赫塞尔庭那样给自己定了一个何时当上首相的时间表。布莱尔有句格言：“我相信在政治上你若算计过多，反会失算。因此没有理由去担心。如果事情要发生，它就会发生，如果事情不会发生，那么，生活还有许多内容。老是念念不忘政治抱负的人们，通常既会引起危险，又会以失败告终。”

在新闻界享有较好的声誉

布莱尔成为前座议员不久，就开始在工党内和新闻界享有较好的声誉。他的妻子切丽·布莱尔在其中很活跃的工党协调委员会是个在基层党员中很有影响的左派组织，布莱尔通过这个组织与左翼基层党员保持着密切联系。该组织后来演变成“工党现代派”的一个阵地，力图改革工党的政策和内部机制。1985年春天，在地区工党代表大会期间，工党协调委员会举行了一系列的外围集会。在一次集会上，布莱尔发言道：“我们正在推进党的机制的现代化，把党发展成为一个适合于竞选的组织，并加强党员队伍的建设。”集会的组织者，工党协调委员会的书记保罗·考卧瑞说：“这是一次非常非常有趣的演讲，我深为他讲到的三大主题所震动，特别是他当时所谈的有关伦理问题。我对他的演讲风格印象很深，他是那种深思熟虑的风格。由此我想到了两点：‘我从没听到有人像他那样讲话’，和‘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伙子’。”

布莱尔首次在新闻媒体上亮相是在1985年3月6日的“问答时刻”节目中。能被邀请上电视节目，对一位正在发展的政治家来说是意义重大的一个步骤。在这方面，布莱尔在3年时间内赶超了布朗。在这次的电视节目中，布莱尔口齿清晰、充满信心。他首先谈的一个主题是保守党和工党都支持的合情合理的内容：“如果我被允许从实际而确有助益的一点谈起，说一说大家都意见一致的有关公共秩序的新的立法领域的话，那么，就会有許多措施可用来加强反对种族主义和抵制足球流氓行径的立法。”

自由党—社会民主党联盟成立的时候曾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有人说这个联盟是通向未来的力量，它在民意测验中的成绩也很不错。在电视讲话中，布莱尔承认工党与联盟追求的目标是一样的，以此表达了他对这个联盟隐含的赞誉：“如果你们能够接受实质上已经存在的共同一致反对政府的舆论这一事实的话，那么国民们就只能作出如下的抉择：采纳联盟充斥着华丽词藻和美好理想的政策，或者支持能将理想变为现实的工党。”

在议会辩论中展露头角

布莱尔这一时期的主要精力用在了发展他在下院的声望上。对一位想得到最高职位的政治家来说，在下院中的表现是一项极其必要的考验。1985年1月，身为影子内阁财政事务的一个发言人，布莱尔与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展开了一场争辩。他请求劳森共同拒绝接受“政府干预永远错误，市场力

量永远正确这一荒唐的教条”。这话激起了劳森对他的奚落：“没有人总是正确的，甚至那些可敬的大人物也不例外……经验表明，从整体来看，尽管市场会产生错误，但市场修正自身的错误要比政府干预来得更容易。”不过这位财政大臣显得还是比较大度，随后他就给对手找了个台阶：“下院中两派的分歧在于反对党讨论问题，而我们解决问题。”

在与劳森的交锋中，直到 1987 年，布莱尔也没有发现与他有任何观点上的接近。4 月 29 日，在新的大选被提上议事日程前不久，保守党的这位财政大臣出示了一份表明削减税收不会增加就业的财政研究报告。布莱尔与劳森又进行了一场较量。当布莱尔讽刺这个报告“很出色”时，劳森乘机挖苦布莱尔：“可敬的伟大人物读过它了吗？”

布莱尔反唇相讥，嘲笑他道：“我已读过了。委托这位可敬的先生审查这项报告是错误的，仅仅因为不喜欢报告的结果就摒弃它也是错误的。”

尽管布莱尔抨击过自由市场的“教条”，但是劳森仍像许多其他保守党人一样，感到他的这位对手在与他辩论时并未表现多少意识形态上的不一致，布莱尔的辩论更多地是从法律上找问题。劳森对布莱尔有过这样的评价：“我常为他是工党党员而感到有些惊奇。无疑他是工党曾有过的社会主义信仰程度最低的领导人。约翰·史密斯是一位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从骨子里、实质上来说属于工党右翼。我觉得托尼·布莱尔不是——我并不是想给他制造麻烦——但我的确感到他不是一位社会主义者。”

在大选中再创佳绩

在遭受了 1983 年的惨败之后，工党虽然更换了领袖，但是直到 1987 年大选，工党并没有多少改变。金诺克的主要注意力放在了恢复党的团结上。他认为工党的失败，主要原因是工党内部不团结。他原属工党左派，不过比富特温和些，上台后逐渐转向中间派的立场。经过几年的努力，工党的团结状况确有很大改善，在公众中的形象也有所恢复。然而，1983 年大选后，保守党在撒切尔主义的旗帜下，对英国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收效颇佳，撒切尔夫夫人和保守党的威望日益提高。撒切尔夫夫人抓住有利时机，又一次宣布提前举行大选。

工党带着与 1983 年大选时实质上相同的政策进入了竞选运动。就经济政策而言，无非还是有关税收、消费和债务方面的许诺，再就是要搞大规模的重新国有化，即把被保守党政府私有化了的企业再重新国有化。对这次大选的结局，布莱尔早有预料。临近大选几个月内，工党的表现更是令人沮丧的。1987 年 1 月，在格林威治选区的补缺选举中，工党竟败给了自由党—社会民主党联盟，在以后的民意测验中甚至位居第三。布莱尔认为，照这样下去，工党有可能被联盟超越而走向穷途末路，这种情况在 1983 年大选后差点发生。不过，布莱尔所担心的情况终究没有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个叫彼得·曼德尔森的人。曼德尔森于 1985 年 10 月被任命为工党的宣传工作的负责人，他曾在伦敦周末电视台的“周末世界”节目供职，那时就很活跃，他还是一位地方议会议员和国会研究专家。他的祖父赫伯特·莫里森在二战时曾担任过内政大臣。现在曼德尔森渴望重返中央政治舞台。在工党内

盛行互相给贴派别标签的年代，他属于右翼分子，曾在 1983 年为罗伊·哈特斯利竞选领袖职位效过力。在任命他为宣传部长时，在金诺克心目中他并不是第一人选，但是他是金诺克的助手查尔斯·克拉克的好朋友，而且是能被左右派处于势均力敌状态的全国执委会接受的折衷人选。他成了工党 1987 年高度专业性的竞选运动的主要设计师之一。

不过，在这次大选中，布莱尔并没有从曼德尔森设计的竞选运动中得到多少好处。他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提高知名度的。但是在 1987 年大选后，曼德尔森为布莱尔提供的帮助越来越多。然而，与工党的另一位神重高登·布朗比较起来，布莱尔的知名度还很有限，在许多领域还不为人所知。除了在几次涉及到法律问题的事件中吸引了一些新闻媒介的注意外，他在下院之外还属于无名鼠辈之列，如果说还有点引人注目的地方的话，那就是，他是前座议员中最年轻的一位。布莱尔的一位来自南海克尼工党的朋友约翰·劳合，于 1986 年 8 月当上了有左翼倾向的刊物《新政治家》的编辑，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工党影子内阁财政部有一支强大的队伍，这是重要的。”这话实际上是在褒奖影子财政大臣哈特斯利。随后他笔锋一转，评价了一番这支队伍的其他成员：“欧纳·麦克唐纳奋斗得如此艰苦，却没产生太多的效果，泰瑞·戴维几乎表现不出一丝奋斗的迹象。托尼·布莱尔这位聪明的青年律师是这支队伍中最年轻的成员，他费尽心机地钻研他的主题，然而他的热情并没使他在这支队伍中的份量增加。”

对老朋友的这种评价，布莱尔感到怒不可遏。他打电话给劳合说：“你竟然说我是无足轻重的。”劳合慌忙解释说，他的意思是说布莱尔没有经验。布莱尔仍怒气未消，说：“你的文章并不是这个意思。”布莱尔之所以对朋友大发雷霆，主要是因为他感到劳合把自己与麦克唐纳和戴维相提并论使他受到极大伤害。对此二人，布莱尔与劳合的看法一样，都认为他们是粗俗可鄙的。布莱尔常常在影子财政部会议之外声言影子财政部成员们都是“完全死气沉沉的”。

在这次大选中，布莱尔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并不太好。他将很多时间放在了他自己的选区塞奇菲尔德，而该选区几乎不算一个边缘选区，也就是说工党在这里获胜是不成问题的，只要布莱尔还是该区的工党候选人，他就能保住自己的席位。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他几乎没有上过 BBC 的电视新闻节目和竞选专题节目。更糟糕的是，他唯一的一次公开亮相也是令人困窘的。在 3 月 31 日工党的新闻发布会上，布莱尔和布朗抨击了保守党的住房和教育政策。布朗这时是影子内阁地方事务的发言人，他工作十分繁忙，要视察乡村地区，还总被地方电视台邀请去。布莱尔的讲话表明他缺乏经验，他说：保守党提高私人房租的计划只是撒切尔夫人个人的想法，而且是一个“未受抑制的和不健全的大脑”的产物。当时撒切尔夫人的声望正处在鼎盛时期，说她的大脑是“不健全的”肯定引不起人们的共鸣，反而要让人反感。那次新闻发布会的主席、影子内政大臣格拉尔德·考夫曼立即解释说，布莱尔不是在对撒切尔夫人心智的稳定性提出质疑，而是在抨击撒切尔主义的准则。不过，在撒切尔夫人退休后，布莱尔修正了他的关于她有一个“未受抑制和不健全的大脑”的看法。尽管他还认为“她把有自知之明的概念混同于拒绝听取他人的意见”，但他承认自己对她的坚定和清醒很是钦佩的。

总的来讲，在 1987 年 6 月这次大选中，工党的竞选工作还是很成功的，虽然又输给了保守党，但保守党在下院的多数席位已比 1983 年大大减少。不

过保守党还是拥有 102 席的多数席位，对工党来说，仍算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工党和保守党所得的选票都有所上升，不过工党的得票率仅增加了 3.2 个百分点，达到 31.5%。然而，布莱尔在塞奇菲尔德不仅保住了席位，而且所得的多数选票还由 8281 张增加到 13058 张。他又一次在自己的党遭受打击时交了好运。

对这次大选结果，工党上下没有任何可抱怨的，因为它展示给英国人民的是一个根本不适合公众需要的施政纲领，而且还是以似乎是很合理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只有到了这时，在连遭三次大选惨败的打击后，工党上下才真正开始认识到需要大幅度地改变党的政策了。在整个 1983—1987 年间，工党仅在欧洲问题和一些无关紧要的经济问题上做了些政策调整。现在看来，不对工党的政策动大手术是不行了，对工党自身的一场改革已提上了议事日程。

七、受到领袖的青睐

1987 年大选后，布莱尔在党内进步得更快了，而且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到 1992 年大选前，他已成了工党的核心成员。

被人们认为具有当领袖的潜能

大选过后，布莱尔产生了问津影子内阁大臣职位的政治雄心。每次大选过后，总有一些老的面孔离去，新的面孔出现。工党的影子内阁成员不像保守党那样完全由领袖任命，而是由议会党团选举产生，每年都要选举一次。其间出现职位空缺，先由领袖任命，待年度选举时再重选。布莱尔决定抓住年度选举这个时机，积极活动，为自己创造通向权力的机会。布日彦·古尔德是 1987 年工党竞选运动的主要设计师之一，人们期待他在这次影子内阁选举中同样表现出色。布莱尔也看中了他，向他讨教。古尔德承认在布莱尔身上有一种好的特质，不过“他对我的观点不感兴趣，但向人请教是他寻求支持的一种手段——他问我是否我认为他太年轻太缺乏经验而不能尝试进入影子内阁。我说：‘我认为你完全有能力去进行尝试。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第一次没获成功也不要失望，而应该继续努力。’”

布莱尔对自己的处境非常清楚，他意识到，虽然他具有某些优点，而且是很有益的，但更重要的是组织和盟友的支持。要想成为影子内阁大臣，最首要的是使自己的名字进入候选人名单，而这个名单是由党内各种派别组织提名产生的。当时有 3 个初步的名单，分别由右派、强硬左派和论坛集团的竞选组织筹划提出的。虽然拥有选举权的议员们不可能盲目接受任何一个名单的全部内容，但能使自己的名字进入其中任何一个名单就已经是初步胜利，这意味着他或她已经得到了某派力量的支持。布莱尔的名字在论坛集团提出的名单内。

论坛集团即论坛派，原是一个左派组织，后来演变成为中派组织，成为那些能干的中派前座议员们爬上影子内阁大臣职位的“机会之梯”。到 1983 年后，该组织的力量得到大发展，几乎吸收了大约一半的工党议员。布莱尔是经布朗的说服于 1985 年才加入到这一组织中来的。此举使他后来受益非浅。以前布莱尔还一直不原加入这种派系组织，声称他对派系组织不感兴趣，厌恶这种派系政治。在得到论坛集团的提名过程中，布莱尔得到了他的朋友、东纽卡什尔选区的议员尼克·布朗的帮助。论坛集团在决定自己的提名单时要进行一次秘密投票，尼克·布朗为布莱尔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帮助他了解论坛集团内每个成员的情况。在论坛集团进行正式候选人选举时，布莱尔勉强被通过。尽管这样，这对布莱尔将来的政治生涯来说仍是很有意义的一步。布莱尔当上领袖后，许多人宣称自己在那次影子内阁候选人选举时就第一个注意到：布莱尔具有将来成为领袖的潜能。来自德汉姆附近的一位议员贾尔斯·拉迪斯在那次选举中失去了在影子内阁中的职位。他声音曾对布莱尔如是说：“看，托尼，你是代表未来的大人物，我认为我们在尼尔（金诺克）当领袖时不可能获胜，我认为你才是我们的希望之星，而且我将尽快地尽我所能帮助你进入影子内阁。”

影子内阁分两个层次，一个是包括所有的前座议员，另一个是只包括影子内阁大臣和一些国务大臣。后

在大选中表现出色的布日彦·古尔德在影子内阁选举中高居榜首，不过他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影子财政大臣的职位。在原影子财政大臣罗伊·哈特斯利的帮助下，约翰·史密斯得到了这个职位。哈特斯利在政治立场上与史密斯一样属于右翼，他离开影子财政部后来到内政部。而古尔德则来到了地位仅次于影子财政部的影子贸工部，布莱尔则被任命为他的副手，负责伦敦城的事务以及消费者事务。他们二人曾在哈特斯利领导的影子财政部内共事一年之久，古尔德任秘书长。

工党的另一位新星高登·布朗也很顺利，他接替了古尔德原来的职位，在史密斯手下当秘书长。由于史密斯占据了古尔德想要的职位，两人从此结下了夙怨，这种夙怨在5年后的领袖选举中发展到了顶峰，不过两人的对立并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因素。古尔德是一个工党现代化者，后来他成了布莱尔的坚定支持者。工党的两位新星在人际关系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布朗是尽可能地紧密跟随史密斯；而布莱尔则是对党内的各种主张兼收并蓄。

在古尔德手下负责伦敦城的工作对提高布莱尔的知名度很有好处。古尔德说过：“最聪明的人应该被授予这项工作。如果他们证明自己能够胜任，那么，这样的工作很明显就是启动其他事务的发射台。”古尔德本人及其他许多人都喜欢干这种工作，其理由之一就是，能够得到新闻媒介报道的机会。正如古尔德所讲的：“从事伦敦城的工作，其好处之一就是确实能使你的名字经常在报刊的金融版上出现，尤其是在星期日的报刊上。有一个时期，我和托尼发现我们的名字每隔一个星期就会出现在《观察家》杂志的扉页上。”

与约翰·梅杰对阵

十分凑巧，布莱尔的这次升迁，使他有可能会直接与保守党未来的领袖直接对阵。作为古尔德的副手，布莱尔的第一项议会工作就是负责完成反对政府提出的财政议案的事务，这项工作在大选前就已开始，但被大选中断了。布莱尔发现，自己暂时只需要面对新上任的财政部秘书长约翰·梅杰和负责通过这项议案的财政大臣诺曼·莱蒙特。布莱尔在发言中非常彬彬有礼地赞扬了莱蒙特，感谢他对自己所提出的问题给出了最详尽的解释说明。对布莱尔的赞扬，莱蒙特第二年在BBC电视台的“今晚新闻”节目中给予了回报，他评价布莱尔道：“他是一位非常卓有成效的议会工作者。他不是为演讲而演讲……他直截了当地提出率直的问题。我的确曾在委员会中通过了这项财政议案，当时他是我的主要辩论对手。我对他做的工作之多和起立发言时快速思考的能力印象很深。”很久以后，当布莱尔成为工党领袖时，正是莱蒙特向保守党发出了警告：“保守党政府正面对来自新一任朝气蓬勃的托尼·布莱尔领导班子的值得纪念的挑战。这种挑战之严峻，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布莱尔已把工党急剧地推向政治舞台的中心。”事态的发展证明莱蒙特的预见是正确的。

政策反思运动的干将

1987年大选后，工党开始反思自己的政策。在9月份的布莱顿年会上，

金诺克发起了对工党政策进行反思的运动。作为这个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号召工党党员们自觉地到基层去做调查研究，进行一次再教育。这场运动被学者们称为“文化革命”。面对连续3次大选失败，摆在工党面前的已是一种简单的选择：要么进行政策革新，要么永远衰落下去。争辩是否应该坚定信仰已经是毫无用处的，尽管强硬左派还在这样做，但已不能再吸引多少人。当时有人还提出了另一种选择，即与自由党—社会民主党联盟做一项交易，达成一项协议，组成竞选联盟。许多人对这种策略很感兴趣，认为这是使工党能够上台执政的希望所在。但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不合英国政党政治的传统，搞不好会使工党彻底垮掉。而且，这样做还意味着工党将不得不接受自—社联盟所主张的选举制度改革计划，因为这是自—社联盟的核心要求。英国一直实行的是简单多数制，而不是像欧洲大陆许多国家那样实行比例代表制。简单多数制对大党有利，有很多不合理的东西，使小党难以发展起来。在1983和1987年的大选中，自—社联盟所得的选票与工党相差不多，但所得议席却寥寥无几，选举制度在里面起着很大作用。所以，自—社联盟极力主张改革英国的选举制度，采用比例代表制。这种改革从理论上讲是与民主的发展方向相一致的，所以也得到了许多工党人士的赞同。在1987年的工党年会上，竟有15项动议是力倡实行比例代表制的。

对选举制度的改革，布莱尔是赞成的，但他不像许多人那样盲目。1987年9月4日他在《新政治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阐述了自己对比例代表制的看法。他说：“工党内热心于比例代表制的人没有把这种制度主要地建立在宪法原则之上，而是把它作为获取执政地位的策略。他们赞成比例代表制所隐含的一个前提是：工党不再能在议会中赢得多数席位；而且通过多数席位政府的前门得不到的东西，可经由组成联盟和选举协定这样的后门大量获得。这种想法是建立在危险的幻念基础上的。”

布莱尔这里所说的幻念，是指那些热心于比例代表制的人所认为的：现在“反撒切尔主义音”居大多数。依据这种看法，多数选民就会把选票投给反保守党的党派联盟，而比例代表制又有助于这种党派联盟获得更多的席位。但问题是，在比例代表制下，就不能保证在大选中产生以工党为首的联盟。

布莱尔在选举制度改革问题上的辩论是强有力的。但他的主要注意力还不是在这里，他所关注的是工党的内外政策，他极力坚持工党需要作出根本性的改变。他认为：

“工党的真正问题是它为什么得不到足够选民的支持。不管我们是维持现有的选举制度还是改变它，也不管我们是单独进行竞选还是结成竞选联盟，工党都必须正视这一问题。比例代表制之争只不过是近来为逃避对工党前途作出决定性选择的借口。

“一个联盟仍必须决定它的经济政策、工业政策，决定在防卫事务、外交事务或工会法上意欲何为……在一个不应该以任何方式谋私利的联盟中，工党为获取权力所作出的任何决定都将被证明是不正当。”

布莱尔在《新政治家》上发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之前，在1987年7月1日的《泰晤士报》上发表了另一篇文章，对1987年工党大选失败原因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把保守党获胜的主要原因归结于玛格丽特·撒切尔所宣

布的施政方案。但是他坚持认为保守党的施政方案反映了“一种个人责任的极端观点”。这些措施是建立在个人选择在任何方面都不依赖社会提供的机会基础上的。他抨击撒切尔夫人的政策道：“撒切尔夫人对教育问题的解答就是允许学校脱离制度……对人们关心的养老金问题的回答是让个人承担自我保险。国民健康保障制度之所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仅仅是因为它在公共医疗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假若它不存在了，政府决不会再把它创造出来。没有智能，也没有政治动力被提供，来用以改善我们作为社会成员而非个人所应做到的一切。”

批评撒切尔夫人的政策决不意味着布莱尔赞成工党过去所推行的政策。虽然在许多公开场合他声称对工党的政策进行反思并不是对这些政策进行修订和损害，而只是对之进行全面的十分重要的重申，是为了解决如何把原则付诸实施；但是在私下里他却说：摧毁与重建仍是他密切关注的两个主题。在一篇文章中，当他提到工党需要作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深刻变革时，高度评价了撒切尔夫人的政治成功，说她成功的关键在于总是边破坏边再造自己的选举支持力量。

对工党政策进行反思有三个重点，即工会法、核防御和私有制。在私有制问题上，布莱尔的态度十分明确，他坚持工党应该放弃完全收回被保守党政府出售了的国有企业的计划。他批评以往的工党政府在解决贫困问题时没有运用竞争机制。但是他反对保守党政府的让外国人来接管英国的一些效益不好的企业的作法。在这点上，他好像有点“保守”，给人一种他是经济国家主义者的印象。他的这种立场遭到保守党人克拉克的讽刺：“外国人不应该被鼓励来我国投资，英国人也不应该披鼓励到国外投资。”布莱尔认为：“如果英国工业的整个决策机构都转移到英国的控制之外……那么就不能保证我们能控制我国的工业前途。”在这方面，布莱尔的观点与传统的工党政策相接近。

受到金诺克的信任

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布莱尔更加得到了金诺克的信任和喜爱。为了便于对政策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金诺克成立了7个政策反思小组，其中一个是有关系就业和工会问题的，叫“在业人员”小组。开始，负责这个小组工作的是影子内阁劳工大臣迈克尔·米切尔，可是在头两年间，这个小组却拿不出金诺克想要的任何东西来。于是，金诺克把布莱尔安置到了这个小组中，他确信布莱尔能呈出令他满意的结果来。

当时工党内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就是防御政策。布莱尔在这个问题上很少直接表态，而他在初进议会时是支持单方面核裁军政策的。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还是能间接反映出来。他在他家乡选区塞奇菲尔德的支持者中是可以讲在别处不能讲的话的，而且他的那些忠实伙伴都是他的政治观点的宣传员，是政策反思的宣传者。有一次，《卫报》考察了工党基层组织对政策反思运动的意见，约翰·伯顿、费尔·威尔逊和保罗·特里彼特都被召去发表意见。特里彼特的话表明他已完全从一个激进分子变成了温和的现实主义者：“在这儿我们是孤注一掷的，孤注一掷地去获取下次大选的胜利。大多数政党在一次大选遭受打击时都开始着手对一些政策加以改变。在它们已遭到3次沉重打击之后，所有的政党都开始改变政策。认为仍有人在说没

有什么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一想法是不可信的。”

威尔逊说：“党内有些人通过注意民意测验和党外选民的想法，说工党的政策反思意味着我们将结束代表平民利益的政治史。但是这些人相信工党若放弃争取工人阶级就会赢得选举，而不是因为争取了工人阶级才获胜。不过我对工人阶级还没有那种蔑视。”

所有这3个人都谈到无核防御政策必须放弃，包括因支持核裁军而加入工党的威尔逊在内。伯顿说：“我很愿意承认党内每个人都相信核武器的存在从道义上讲是不正当的。但我不认为值得为争论这个问题而在3次大选中都以败北告终。我们可以在教育、医疗和就业问题上做尽可能有益于工人阶级的好事。”

被安排到有关就业和工会问题的“在业人员”政策研究小组后，布莱尔努力工作以取得金诺克的信任，同时也增加工党议员们对他的支持，为他再次进行被选入影子内阁的尝试作准备。他的努力更增强了金诺克对他的偏爱，其标志就是金诺克派他代表影子内阁去调查1987年10月股市暴跌的情况。古尔德看到了金诺克想提拔布莱尔的迹象，他说：“那时，总有两三个人被认为是强有力的崛起者并想在影子内阁中寻求职位，尼尔（金诺克）善于提拔他们，这次他将为托尼架起一座梯子。”对古尔德的议论，金诺克表示同意，而且他还对布莱尔撰写报告时的“辩论才能”大加赞扬：“好处之一是报告从不会太冗长，他能用每个人都能理解并从中获益的语言来表达观点。”

这期间，布莱尔每两周就要为《泰晤士报》的一个专栏写一篇文章，他因此而获得了一个十分有用的议会外的讲台。这引起了他的议会同事们的注意。布莱尔曾撰文赞成电视播放下院的情况，认为“通过上电视、出风头而进行政治工作是宣传的最好形式”。他懂得利用新闻媒介的技巧：“我们今天的新闻是快捷的。如果你不能把你所要宣传的东西归纳成一个句子甚至一个短语，那么就忘掉它。如果把两种思想或意见结合起来，那么大众传媒不会重复二者，而是二者择其一。为避免误解，在新闻媒介为你传播一种政策或见解前，要把它的主要线索清晰地分解出来。对新闻广播提要应多加思索。”

布莱尔仅用了5年的时间就由一位普通议员变成受领袖宠爱的影子内阁成员，除高登·布朗外，与他同期进入下院的人都没有他升迁得快。这时布莱尔35岁，正是精力充沛、雄心勃勃之时。比他大两岁的布朗时年37岁，已是影子内阁财政大臣约翰·史密斯的助理，地位十分重要。布莱尔决心紧步布朗的后尘。为此，他就需要抓住一切机会展示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政治锋芒。

1988年夏，有一桩金融丑闻又使布莱尔得到了大出风头的机会。当他刚刚从日本旅行回国，来到议会大厦中的议员休息室时，一位新上任的工党督导员艾兰·麦克尔拦住了他，向他讲述了麦克尔的南威尔士选区的一些选民因一个投资团体经营不善而损失了钱的事件。麦克尔后来回忆说：“托尼拎着手提箱走进来，我告诉了他这件事，我原以为他已经有所耳闻。我们谈了大约5分钟，他看上去有点发呆的样子。我深信他还不了解这件事。但是10分钟后，他就打电话给我，说他已在考虑这事。给我印象根深的是，他迅即对事态做了分析，得出了结论并反复进行核查。他抓住了这件事的核心问题。”

古尔德很愿意让自己的助手去为维护领取养老金者的利益而战，并在这个过程中引人注目。尤其是这个战斗是直接面对保守党政府，是它管理不善才使得这些养老金领取者丧失了生活积蓄。古尔德把这个事件交给布莱尔，让他继续处理。他觉得许多影子内阁成员都处理不好这件事。他认为布莱尔处理错综复杂的事态、领会其中关键环节的能力是无容置疑的。布莱尔显露了他的政治锋芒，他提出政府早就应该充分了解那个投资团体是可疑的，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布莱尔使保守党政府陷于困窘之中。

最年轻的影子内阁大臣

这次布莱尔大出风头正是时候，因为不久，这年的11月，工党就进行了影子内阁的重新选举。布莱尔又一次获得成功。不过还是他的好朋友布朗高居榜首，看来他与布朗之间，在政治资历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在议会和影子内阁中，布朗的表现比布莱尔更受到人们的称赞。就在影子内阁选举前两个月，布朗与政府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进行了一场经济学上的辩论，激烈抨击了保守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布朗的演说被普遍称为是“一种敏锐的袭击”，使劳森都折服。布朗的高超政治技能使布莱尔相形见绌。布莱尔也认识到了这点，所以在选举过后不久，在一个引人注目的场合，他谦逊地对人们说：“我还年轻，不过已有了一些向好的方面改变的趋势。我非常幸运，但我也清醒地意识到，政治历史上有许多被推测是上升之星的人最后却如流星般陨落的事例。”

影子内阁选举结果揭晓时，布莱尔正在伦敦广播电台接受采访。他得知消息后首先打电话给妻子，让她分享喜悦。然而，更大的喜悦还在后面。这时，金诺克已有意让布莱尔担任影子内阁劳工大臣之职，因为他觉得目前任该职的迈克尔·米切尔在革新这一领域的政策时一直不够大胆。但是，米切尔在工党左翼、甚至中左翼中仍有很强大的后盾，金诺克有所顾虑，不敢轻易拿掉米切尔。金诺克曾形象地描述当时工党内权力分配情况：“所有影子内阁中职位的分配就如同一副拼图玩具。在那件事（指提升布莱尔为影子内阁大臣——作者注）发生前一年我就想以一种特殊方式来组合。但因为党内各种力量的制约，我就不能以我希望的那种方式来配置，因此只好把其中的一块放到一边。”

就这样，在党内斗争因素的作用下，布莱尔转而当上了影子内阁的能源大臣，取代了约翰·普雷斯科特（布莱尔任工党领袖时，他被选为副领袖）。这一年布莱尔35岁，是最年轻的影子内阁大臣。从后座议员到影子内阁大臣，他只用了5年时间。

布莱尔初来影子能源部时，许多人都不服气，有人把他描述为“一位被金诺克派来的眼睛明亮、天真幼稚的能源部发言人”。不过，不久人们就改变了这种看法，他很快就得到了显示自己能力的机会。布莱尔被授予了一项非常重要的议会工作，即为抵制保守党能源大臣塞西尔·帕金森搞的电力私有化而战。这是对他的一次更大的考验，他在影子贸易和工业部任职时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涉及到工党在公有制问题上的立场。

在最初的议会辩论中，布莱尔所坚持的完全是工党传统的立场。在1988年12月的一次关于电力工业的辩论中，布莱尔首次以影子内阁大臣的身份发言。他说：“我们很自豪，把工业纳入了公有制。当我们执政时，它将被恢

复为服务于英国人民的公共机构，而不是为追求私人利润而运营。”当时，在所有制问题上，工党内部还未达成共识，多数工党的前座议员们都反对私有化，希望实现重新国有化。

尽管布莱尔在与对手战斗时所用的武器并不先进，但他在战斗中表现得却很出色，他又一次在与对手的较量中获得了充分的利益。本来帕金森是很受撒切尔夫人赏识的，但是在与布莱尔交锋后，却被体面地降职。他显示出缺乏利用他特别丰富的经验和进行快速反应的才智。在一次交锋中，布莱尔说：“这位国家的大臣说他正在引进真正的竞争”，“在他的演讲中继续提到竞争，好像他提到竞争的次数越多，竞争就变得越真实。”而帕金森的每次插话都使他遭到更重的挫伤。同时，电力私有化政策也确实存在一些漏洞，给布莱尔提供了发起进攻的机会。

在 1989 年 10 月工党年会上，布莱尔发表了演说，这是他第一次在年会上的演说。按规定，除非是重点发言，不在全国执行委员会内的影子内阁成员，发言时都必须站在地板上，而不能站在讲桌后面，而且只允许讲 3 分钟。但是 3 分钟对布莱尔来说足矣。布莱尔在演讲中抨击了保守党政府的电力私有化政策：“我们不想让它推迟，我们不想让它耽搁，我们不想让它延期，我们只想摒弃它，在这儿，现在以至永远。”这番话迎得了热烈的掌声。

演讲中，针对保守党政府打算出售核电站，布莱尔阐发了他的环境主义观点：“取代已令人厌倦的托利党 80 年代的议程——私有化、环境污染、物价上涨……我们在 90 年代给国家展现出一个新视野，在那里保护能源像生产能源一样重要……在工党治下，环境将支配我们的能源政策，而不是能源政策支配环境。”不过，布莱尔的这种环境主义观点并未坚持下去，以后他也提到，“工党政府建造更多核能站的可能性不能被排除”。

工党的政策反思运动历时两年之久，到 1989 年春即将结束时，金诺克与古尔德之间产生了矛盾。金诺克害怕古尔德在公有制问题上向工会中的守旧势力让步太多。作为负责当时最大的私有化行业——电力的影子内阁大臣，布莱尔被迫在金诺克与古尔德的争执中选择自己的立场。就在政策调查研究小组的报告得以完成的时候，古尔德惊异地发现他办公室中的布莱尔竟然是金诺克派来的人。后来，古尔德被调到环境部任职，对金诺克更忠诚、也为金诺克所喜爱的高登·布朗被调来负责影子贸工部的工作。

在最棘手的工会法问题上大显身手

一波刚过，另一波又起。在政策反思运动刚刚结束，金诺克与古尔德的争执刚刚消逝的时候，布莱尔很快发现自己又陷入了另一场麻烦之中。

1989 年 10 月，工党又进行了一年一度的影子内阁选举，布莱尔因在电力私有化问题上，使保守党政府困窘而得到了回报，他这次得票位居第四，仅在布朗、史密斯和罗宾·库克之后。随后，金诺克对影子内阁的安排进行了大调整。布朗取代古尔德为贸易和工业大臣，布莱尔从能源部换到地位更重要的劳工部。他与布朗的差距正在缩小。

在新的岗位上，他立刻就面临着一项更为复杂、意识形态色彩更浓、对

指保守党，因为保守党的前身是托利党。用“托利党”这个称呼更含有指责它是守旧的政党的意思。——作者注

工党来说关系更大的工作，即处理工党在工会法上的政策问题。

在 60 年代以前，英国的工会同政府的矛盾不太突出，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工会能够与政府相配合。虽然工会与工党有着亲缘关系，工会更支持工党政府，但对保守党政府也能采取合作的态度。到了 60 年代，随着英国经济问题日益严重，工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也不断加剧。

进入 50 年代后，已明显表现出，同西方主要国家相比，英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远远落在了后面。比如从 1950—1964 年，英国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仅为 2.6%，而其他西方国家都在 3.5% 以上；人均年产值，从 1950—1960 年，英国只增加 1.9%，而法、德、意等国的增长率都是 4% 到 5%。人们普遍认为，英国经济发展落后于其他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设备陈旧、投资不足、竞争能力不强。而政界右翼人士和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工会权力过大、工资增长过快则是资方宁愿把资金投在国外而不愿投在国内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认为，这是英国经济发展落后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在 60—70 年代，工会的权力问题是英国国内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这期间，无论是保守党政府，还是工党政府，都试图削弱工会的权力，然而都不但没有成功，反而被工会搞下了台。尤其是 1978 年底到 1979 年初，为了对抗卡拉汉工党政府的限制收入的政策，工会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浪潮，其规模和激烈程度超过战后任何时期。罢工不但涉及工业部门，而且遍及铁路运输、政府机构、学校、医院、道路清洁部门。这次工潮不仅导致工党在大选中失败，从而换来了保守党的强硬人物撒切尔夫人的执政，而且也使工会在英国公众中的威信扫地，从而给撒切尔夫人整治工会提供了充分理由。此时，工会在英国公众的心目中已经成了一股邪恶的势力，是一个魔鬼。

撒切尔夫人对付工会所运用的一个重要武器就是法律。1984 年，英国爆发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煤矿工人大罢工，撒切尔夫人趁机对整个工会发动了进攻。保守党占多数的议会通过了新的《工会法》，对罢工实行限制。该法案规定：未经工会全体会员投票赞成，工会不得发动罢工，否则，罢工则为非法。罢工者不得在自己罢工地点以外的地方去设置第二纠察线；法院对罢工中发生的纠纷有裁决权，对于不服从裁决的工会，法院有权惩罚，如没收工会的资产等。这样，不仅剥夺了工会领袖可以决定是否举行罢工的权力，而且还大大限制了罢工的威力，同时还使政府增加了对付工会的司法武器。新工会法的严厉程度远远超过了 1968 年 12 月威尔逊工党政府所提出而被工会否定了的《代替冲突》白皮书。在削弱工会的权力上，前几任首相想做而没有能做到的事情，撒切尔夫人做到了。

对工会恨之入骨的撒切尔夫人要置工会于死地而后快。1987 年，撒切尔政府又提出了改革工会的新办法，规定如果未经工会会员投票，工会领导人就号召罢工，会员有权阻止或向法院提出控告；各工会全国执委会每 5 年改选一次，选举必须在中间人监督下以秘密投票方式进行；工会如在纠纷中拒绝执行法院的裁决，工会财务托管人应停止向工会拨付资金；法律不再保护一些工会规定的某个企业只能雇佣该工会会员的制度；罢工之后，工会不得驱逐未参加罢工的工人，或者处分工人。撒切尔夫人此举的目的主要在于进一步削弱各级工会领导人的权力，使他们在没有获得多数工会会员同意的情况下，不能随便宣布罢工。有些政府官员说，这是一个“把工会还给会员”

的计划。工会和工党的部分领导人反对这个计划，但是社会上也有很多人赞成这种做法，因为过去罢工频繁，不仅造成经济上的巨大损失，而且有些罢工，如公交、水电、煤气等行业的罢工，还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便。人们对罢工已感到厌烦。撒切尔夫人正是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和工人运动的低潮，对工会的权力进行不断的剥夺。

如何对待新工会法，处理同工会的关系，是令金诺克最为头痛的问题。在政策反思运动期间，金诺克对左翼的影子劳工大臣迈克尔·米切尔在对工会法的政策审查上所做的工作甚不满意。1988年3月，米切尔第一阶段的研究报告被拒绝接受，这是所有的7份研究报告中唯一被拒绝的一份。一年后，重新写就的最后报告一经完成就被枪毙了。它提出的很多观点都是不切合实际的，比如它建议抵制对工会财产的查封。而这一点并不是保守党政府所要做的，而是法庭为了能有效地执行工会法而采取的手段。若按米切尔报告的建议，工党和工会将同法院站到对立面。

布莱尔是米切尔领导的“在业人员”政策研究小组的成员。他和金诺克的办公室主任查尔斯·克拉克受命一起组织了一次“救援工作”。布莱尔把亚历山大·欧文请来帮忙。欧文曾是布莱尔当律师时所在的事务所的负责人，现为议会上院工党发言人，他设计了一个方案，在1989年工党年会召开前3个星期拿了出来。他提议建立一个由专家组成的“劳工法庭”，其职能是阻止那些对工业事务一无所知，而且对工会带有偏见的高等法院法官们在裁决工业纠纷时过份侵害工会的利益。“劳工法庭”方案被加进了米切尔主持搞的政策研究报告中，他被迫发表了一项“澄清声明”，表示这个方案并不是他的思想。通常情况下，当某人发表此类声明时，人们就知道他一定是遇到麻烦了。米切尔正是这样。几个星期后，米切尔离开了影子劳工部，去就任地位相对次要的影子社会保险大臣。他留下的空缺就由布莱尔来填补。

布莱尔深知，他要想在这个新岗位上干好，必须迅速推进革新政策的步伐，甚至不能等待对原有的政策进行细致的考察。他不敢奢望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会帮助他进入工党未来可能的领袖行列。

1989年11月，布莱尔在处理政府提出的“社会宪章”最新草案问题上露了脸。6个月前，当这个宪章的第一个草案制定出来时，撒切尔夫人指责它“更像一个社会主义宪章”。而那正是工党所支持的草案，布莱尔说，工党支持那个宪章的原因是：它将提供给英国人民所有他们有权利要求的东西。但是新草案却做了许多改动，主要是限制了工会领袖们的权力。在辩论中，布莱尔陷入很被动的境地：与保守党的观点针锋相对，就会引起选民的反感和保守党人的嘲弄，因为宪章的许多内容是适合英国现实情况的；原则上肯定宪章的内容就会开罪于工会领袖们。布莱尔又一次得到了工党领袖金诺克的鼎力支持。金诺克对布莱尔说：“不管何时别人问你，‘这是金诺克的观点吗？’都回答‘是的’。”

当时工会和工党不得不在“社会宪章”和“企业只雇佣工会会员”之间做出选择。大部分工会领导人都知道接受社会宪章已是大势所趋，但又不愿在公开场合承认这一点。布莱尔显示出了他处理困难问题的能力。在一星期之内，他说服了除全国印刷工会外的所有相关工会的领袖，排除了敌对意见。

这是工会原来享有的权利，它要求本企业的雇主拒绝雇佣那些不参加工会但却想从工会争取到的条件中受益的工人。——作者注

在 11 月 6 日关于社会宪章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布莱尔宣布他全部接受了这个宪章。布莱尔完全代表了工党的态度。在党派斗争中,工党是以退为进。保守党原打算利用社会宪章削弱工会,进而打击工党,它所运用的一个武器就是强调“不加入工会是公民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这一原则。但上述原则同时就隐含着“加入工会也是公民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工党接受了这一原则,支持社会宪章,就使自己赢得了随时可以抨击政府没有兑现它所承诺的“加入工会的权利”的权力。

全国印刷工会在接受社会宪章问题上是与布莱尔最为敌对的。布莱尔在说服各有关工会领袖的过程中,曾试图与该工会的领袖托尼·杜宾斯交谈,但杜宾斯坚持拒绝与布莱尔会晤。杜宾斯对工党在工会问题上政策的改变大为震怒,在布莱尔宣布工党接受社会宪章后的当天,他要求布莱尔到该工会主席的办公室,向他做出自我解释。布莱尔如约而至,但却被迫洗耳恭听对手单方面的大喊大叫。当时的一位在场者描述这次会面是“特别的”。然而言词激烈是杜宾斯无能为力的表现,他想为扭转局面做点什么,但已是无可奈何。

布莱尔在工会问题上的政策不仅受到像杜宾斯这样的工会领袖的攻击,还遭到工党内许多上层人物的非议。在一次布莱尔缺席的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他受到了痛斥,原因是他的政策改变的方式“不民主”。在议会工党的一次会议上,布莱尔也遭到一些人的“袭击”。对他这样一位精明的影子内阁大臣来说,似乎不应该发生这种事。不过,布莱尔也有许多支持者。在影子内阁中,约翰·普雷斯科特令人惊讶地表示充分支持布莱尔。这是一个要他们俩互相尊敬的重要示意。普雷斯科特曾担任过影子内阁劳工大臣,全盘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声称自己赞成工党改变对工会的政策,认为工党与工会的关系应该从以前附属关系转为一种建立在合法权利基础上的合作关系。这些合法权利中的一条就是“加入一个工会的权利同时就意味着不加入一个工会的权利”。普雷斯科特的助理麦克·科瑞温说:“布莱尔是仅有的一位能理解这一点的影子内阁成员。”

工党内反对布莱尔工会政策的人还是占少数。意味深长的是,许多保守党人在私下里也抱怨布莱尔。劳工大臣诺曼·福勒在这一年的 12 月份提出了一个劳工议案,原以为会使布莱尔陷入困境,然而他却失望地发现他的这位对手在一定范围内是自由的。布莱尔在下院对保守党议员们大加嘲笑:“他们在哪儿都穿起保守党最漂亮的衣服,把手放进魔术师的帽子里,希望拉出一只白色的、好看的、眼睛明亮的、活泼的、在现场跳跃的兔子,但相反他们却发现自己正抓着一只死狐狸。”布莱尔再次让保守党人处于困窘之地。

金诺克要培养他做接班人

布莱尔的出色表现使他更加得到了领袖的恩宠。这时金诺克已开始倾向于让布莱尔当他的继承人。据金诺克办公室的海瑞特·哈曼女士回忆:“1990 年 1 月的一天,当布莱尔走进金诺克的办公室时,金诺克说:‘下一届工党领袖来了。’我笑了,因为我以为他是在开玩笑——我没觉得这话是荒唐可笑的,而是不了解他说这话是认真的——我注视着他,才感觉到他是完全认真的。”

金诺克早就慧眼识才,把布朗与布莱尔看作是未来工党领袖的人选。有

一段时间也很赏识古尔德。但是在 80 年代末的时候，他还是更倾向于让布朗接他的班。1988 年初，在刚刚经受了一个选举失败后的沮丧时期后，金诺克开玩笑地对布朗说：“你是可用的人才，工党可能需要你。”但是在后来的几年间，布莱尔逐渐赶上了布朗，特别是布莱尔在处理工会问题上的表现，使金诺克认为他比布朗更具有工党所需要的勇敢进取精神。

其实，布莱尔很早就得到金诺克的宠爱和着意培养。古尔德——这位早期就受到领袖青睐的人——回忆道：“当我在 1986、87、88 年前后还是尼尔·金诺克眼中蓝眼睛的男孩时，每当影子内阁发生不是经常会有有的辩论时，我就发出我想发言的信号。尼尔·金诺克几乎总是在他结束演说之前，辩论即将结束时把我带进去。他知道或者希望，正如在那种时刻通常会发生的事，我将会说一些非常有助于他的话，然后他就能扳回优势，进而结束讨论。但我注意到近些年来托尼充当了我那种角色。从 90 年代开始继续如此。托尼，作为被召来做这事的适宜人选，通常说些相当令人震惊的平凡的话，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有力地支持了领袖。”

赶超布朗

到了 90 年代，布莱尔确实进步很快，这与他的好朋友、工党另一颗新星布朗形成鲜明对照。布朗在担任影子内阁贸工大臣时，却没能完成政策反思研究工作。后来在负责处理英国电讯业重新国有化这一难题时也是一再地犹豫不决，不像布莱尔那样能迅速完成任务。有一份材料透露，在金诺克的办公室，“他说：‘工会将说些什么？’金诺克办公室的人员说：‘还要我们来告诉你工会将要说的内容吗？’高登恰恰不去聚焦，不会做这事，不愿冒险，尽管工会将会反对此事。”也许，正是由于布朗过早地展露锋芒，使得人们对他的期望过高。政治生活就是这样，出头过早反而变成坏事。

在布朗的威望下降之时，布莱尔已逐渐证明自己具有当领袖的才能与忠诚。金诺克后来回忆说，那时布莱尔甚至在私下里都不对他正在追随的工党的前进方向和步调表示最轻微的不满。但是当他被给予改变工党政策的机会时，他马上快速采取行动，其速度之快令人赞赏不已。布莱尔与布朗两人的政治竞赛，1990 年是个转折点，在此之前一直是布朗占上风。到 1990 年，布莱尔已经开始严肃地准备考虑当领袖的抱负，这两位工党的神童间的平衡开始打破。

就在 1989 年底布莱尔因处理工会问题而声望大增时，又发生了一件对他来讲是意义重大的事。工党的中央总部宣传部长彼得·曼德尔森被选为与塞奇菲尔得紧邻的哈特尔浦选区的工党候选人，该选区是工党的安全选区，只要成了工党的候选人，就不争自胜。起初，布莱尔在塞奇菲尔得的密友约翰·伯顿也对哈特尔浦的席位感兴趣，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曾为了布莱尔在塞奇菲尔得退出竞争，现在他又为了曼德尔森再次退出竞争。伯顿自己在解释他退出竞争的理由时说：“因为托尼需要彼得，他本来将会支持我，但我知道他需要彼得。我意识到彼得将是一个极有价值的人。”

曼德尔森与布莱尔关系很密切，在他为当上候选人而努力奔波时就住在布莱尔在特里姆顿的家里。在哈特尔浦的竞争中，他轻易地取得了胜利，布

莱尔的支持起了很大的作用，尽管布莱尔并不是他唯一的支持者。曼德尔森一直是金诺克的一名正式的顾问，后来他又开始扮演布莱尔的顾问这一更重要的角色。得到像曼德尔森这样的工党资深的政治家的支持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工党新政策的阐发者

到了这个时候，布莱尔已具备了大多数竞争工党最高职务的人所具有的资格：他操着标准的英格兰口音，是正宗的英国人；他有着很好的演讲和雄辩才能；他在电视采访中表现良好；他得到了下院的敬重；他通过“在说着通向权力的真理”（美国短语）已显示出某种强劲的迹象。而这又恰逢工党的日子比较好过的时候。执政的保守党正陷入重重危机之中。自从1990年4月撒切尔政府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实行新的人头税并引起暴动以来，政府就一直不得人心。保守党内部在欧洲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内阁大臣尼尔·劳森于1989年辞职就已暴露出这种分歧已达十分尖锐的程度。保守党左翼力量的代表迈克尔·赫塞尔庭此时正加紧步伐向撒切尔夫人的领导地位发出挑战，形势能发展到何种地步还很难预测。而此时的工党已完成了政策反思，并兴奋地展望着下次选举。工党对工会法态度的转变是一个重要的和象征性的转变。

就在上述这种形势下，布莱尔获得了把工党的新政策与他自己联系起来的机会。1990年10月1日，工党在海滨城市布莱克普尔召开了一年一度的代表大会，布莱尔得以有机会在年会中站在讲台上发表演讲，这是他第一次有这样的机会，以前虽然也在年会上演讲过，但不是站在讲台上，而是站在讲台前的地板上。这一回他做的是重点发言，所以有这样的机会。当他走向讲台时，当然有些紧张，因为大会的讲台近年来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地方。讲台的后面是一排4个巨大的影印字——“真正人民”，倾斜着、俯临着讲台。大会的主题词是“展望未来”，这容易使人们回想起1945年的“让我们面向未来的”工党宣言。在讲台的前面，坐着一排排的工党积极分子。

布莱尔的演讲在一片欢呼声中开始并进行着。演讲很快直截了当地进入了一系列意在得到掌声的政治口号式的声明中：“我们作为即将到来的工党政府将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是恢复工会的权力。”他承诺工人有加入工会的权利（但忽略了维护不加入工会的权利）；承诺在关于妇女产假问题上要做得更好；承诺更严格地实施医疗制度和安全法；承诺一项最低工资制。在每一阵掌声之后，他都像在集市摊位上售卖物品一样叫着：“新的权利。”

然而，在谈到教育问题时，他却没有得到他所希望的掌声。他允诺在工党政府治下：“不存在走后门买卖工作，而是在前门公开地提供就业机会。没有什么工作计划可以设计出来解决失业，而只有通过教育，真正的教育。那就是工党提出的方案。”在说最后这句话时，他仰视着前方，期待着掌声。可是没有人鼓掌。他快速低头看了一下讲稿。真是意想不到的灾难性的打击，他找不到现在讲到什么地方了。布莱尔突然意识到丢了一页讲稿。此时，正面对着立体声录音机的他，感到台下充满了敌意。其实，对台下的听众们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篇非常出色的演讲中的一点小小的毛病而已。布莱尔不愧具有超凡的演讲才能和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他停顿了一下，将讲稿乱堆在讲桌上，很快准备出了一段与他的演讲内容相连贯的话：“那就是它为什么

如此重要，以致于我们意识到工党的教育方案是包含了一项供英国讨论的新议程的教育方案。”他的讲话又恢复了流利。

在那一定让他感觉像 80 年一样漫长的 80 秒钟后，他的演讲又回到讲稿的原文上。他攻击了保守党解决工业事务的作法：“正是他们不能避开政治冲突，不能掌握合股经营的潜力。正是他们接受了 70 年代的议程，因为他们对 90 年代的问题给不出答案。”演讲重新获得了代表们热烈的掌声。

会后，许多代表议论起布莱尔演讲中出现的意外。出现这种事故，使人们对他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但他处理这次意外事故的能力又激发了人们对他的爱戴。

成为工党领导核心的成员

不过，这次工党年会很快就被人们忘记了，因为保守党内出现的变化更引人注目。就在工党年会举行的那个周末，财政大臣约翰·梅杰和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最终在欧洲问题上战胜了撒切尔夫人，迫使她同意英镑加入欧洲汇率机制。7 个星期之后，撒切尔夫人宣布辞职。对撒切尔夫人的离去，布莱尔在第二年有个特殊的评价，他说这是保守党最近几年来最大的错误，因为这使保守党迷失了方向。这一评价与他几年前所说的撒切尔夫人是“心智不健全的”形成对照。

撒切尔夫人宣布辞职后，她的财政大臣梅杰接替了她的职位。布莱尔曾描述梅杰的特征是“性情平静、晴灰白头发、较低技巧”。梅杰一当上首相，执政党和反对党便都陷入随时有可能举行大选的气氛的包围中。尽管工党在民意测验中领先，但保守党的支持率也有所回弹。梅杰一直在寻找举行大选的时机，他觉得趁工党未及做充分准备，尽可能提前举行大选。而工党则尽力迫使梅杰推迟大选。工党看上去很有信心而且做好了充分准备，但实际上它的竞选策略有问题。工党的策略是被设计用来对付撒切尔夫人的，在梅杰上台后并未有多少改变，而梅杰不仅是撒切尔夫人的继承者，同时又是她的对手。

此时，工党在政策上也存在严重问题，1989 年结束的历时两年之久的政策反思运动只是一个否定过程，它否定了旧的政策但还没有建立起新的东西。1987 年大选时，一位评论家的话对工党仍然适用，他说工党对社会问题所作的承诺“类似于一个有安全问题的航空公司极力兜售它飞机上的高质量的饭食”。除非选民相信工党能提供一个强大的经济，否则无论是医疗保健制度还是就业新权利，都不能劝使他们投工党的票。

当工党为大选所作的准备工作得以加强时，布莱尔日益担当了一种领导人的角色，甚至金诺克都承认布莱尔是个可信赖的党的管理者。他和约翰·史密斯、高登·布朗、玛格丽特·贝科特一起被看成是领导核心中的人物，这些人在 1991 年 4 月 18 日的工党政治广播中被介绍给全国人民认识。政治广播是一种可重复放映的介绍人物传记的电视节目，每次 30 到 60 秒钟，通常是在竞选运动之初被搬上银幕以在选民中树立起本党领导集团的形象。电视画面上，布莱尔身穿皮夹克，站在德汉姆的一座被明媚的阳光照耀着的教堂前的桥上，身边是他的女儿凯思琳。画外音是：“他 37 岁，是影子内阁大臣中最年轻的，出生在爱丁堡，一位律师演说家的儿子……。”接下来是一阵布莱尔对机会的看法：“每个人都有大量由才能与潜力构成的财富，我们没

有利用它。我们没利用它的原因是我们没有给人们提供发展他们自己的个性、构造他们自己的特质、确切地意识到他们能成为什么人的机会。如果他们获得了机会，就能随己所愿地成就自己。现在，你们不能为人们做每件事，不能为他们管理他们的生活，不能为他们作出所有选择。但你至少能提供给他们我享受到而许多人没有享受到的那类机会的通道。”

布莱尔的上述见解是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展示了他作为一个大众政治家的口齿流畅，而且还抓住了“英国机会”这个大选年的主题。尽管那时布莱尔的知名度仍旧很低，但在工党的民意研究中，他是个新星。在定期在中间阶层选民中搞民意测验的电视节目里，他比其他任何同事出现的频率都高，而且形象也更好。民意研究者们回忆，只有一次他没有得到高度评价，当时他谈到了他在伦敦有一个家、在他的选区还有一个家的问题，这听起来好像他在抱怨拥有两处房子。

这时工党内部领导核心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史密斯的威望已达到拥有实际领袖地位的高度，同时，布莱尔、布朗和贝科特的实际地位也在上升。布莱尔预见到史密斯将继承领袖职位，他常告诉朋友们，他认为工党将因没有足够的变革而失利于即将到来的大选，其隐含之意就是金诺克要下台。已在富特和金诺克之间改变过选择轨迹的布莱尔，现在正在转向史密斯。这更使金诺克处于不利的境地。金诺克办公室的主任查尔斯·克拉克说：“他（指金诺克）认为他们对约翰（史密斯）太忠诚了。是这样的。在很多场合下，托尼和高登都赞同尼尔（金诺克），但今后将不会如此了。”

在1991年早些时候，工党内曾流传一些人鼓励史密斯取代金诺克为领袖的谣言。当时党内许多人，包括一些像布莱尔一样钦佩金诺克的人都被保守党刚刚做出的改变领袖的做法所诱导。不过史密斯强烈拒绝讨论向金诺克挑战的建议，尽管他不否认“如果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工党领袖职位出现空缺时”自己将成为一名候选人。

这期间，布莱尔的威信不断上升。在1991年工党布莱顿年会上，布莱尔本人已被作为未来的领袖人选被人们谈论。他在大会上的演讲也表现出了领袖演讲的气魄，他引用了只有领袖人物才使用的警句：“运用所有的权力为每个人谋利益。”他谴责了政府的失业记录，并用“整治犯罪并整治犯罪的原因”这一口号发展了“社会内聚力”的思想。他用了一个类似于两难的手法来抨击保守党政府治下治安状况：“没有人除非傻瓜会为几星期前损毁我国城市面貌的骚动找借口。但除了托利（指保守党人）没有人会忽视这些恶行在其中繁殖的社会绝望心态。”这次演讲很出色，它不仅没有再发生1990年那次演讲中出现80秒钟间断的失误，而且使党内其他几位要人都显得逊色，其中包括金诺克和史密斯以及布朗。

如果对1987年到1992年的5年间，布莱尔的经历做一番回顾，就会发现他升迁的速度是不平常的，他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开始他是一位年轻、有才能的前座议员，之后，几乎每年都上一个台阶。到1992年，他已成了一位领袖人选。一些好事的观察家们甚至愿意在布莱尔当未来领袖上押赌注。乔治·埃列特是塞奇菲尔德的出租车公司的老板，定期接送布莱尔和他的家人在飞机场和车站之间往返。还在1991年时，他就问过以赌赛马为业的比利·戴：布莱尔“到本世纪末若当上了首相你给我多少钱”？埃列特对人评

价布莱尔说：“我认为：他是多么英俊的一位议员，在工党内我们不常见到。他穿着整洁，电视形象很好。我自己有赛马，你看，我是个在押注的人，因此我认为一个好的运动机会来到了。我过去常听托尼演讲，他来得正好。我想，如果我们有一个机会，这个人就能抓住它。”

1992年大选，是英国政治史上曾有过的为时最长的一次竞选运动。1990年11月，约翰·梅杰一当上首相，就急切地想要寻找时机举行大选，以使自己成为真正是由选民选举出来的首相。竞选序幕已经拉开。然而梅杰当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冒这个风险。1991年3月，工党在蒙茅斯的补缺选举中获胜，使得梅杰更不敢轻举妄动。此外，直到这年9月份，工党在民意测验中一直居领先地位；以后的大部分时间工党也是略微领先。然而，工党的好势头只是一种假象，布莱尔对大选结局早有预见。就这一点来讲，他是很不寻常的，这表明他有一种很强的政治判断力。他的助手詹姆斯·布纳尔认为工党会赢得大选胜利，并与布莱尔以一瓶香槟酒作赌注。当时，几乎每个人都认为工党会赢，尽管保守党在梅杰上台后情况已大为改善。

在整个竞选运动中，布莱尔的悲观看法好像是没有根据的。到投票前一周，布莱尔更孤立了。这周的一次民意测验结果显示，工党领先7个百分点。布莱尔为之困惑，或许这时他该做一做当内阁大臣的梦。然而，很快，形势急转直下，连领袖金诺克都感觉到选民们正倒向敌对的一方。各种民意测验都显示梅杰的声望突然升高。倾向于保守党的报纸也向工党发起了凶猛的攻势，发行量最大的《太阳报》刊登了一篇长达9页、标题为“在金诺克大街上的恶梦”的文章；《邮报》等报纸也对工党进行了类似的攻击。面对保守党的进攻，工党虽然有些惊慌失措，但大多数人还是充满信心。大选投票那天，史密斯在离开他爱丁堡的家时说，当他再回来时已成为财政大臣了。他已经认同了财政部的一项关于汇率政策的声明，这声明在大选过后将被提交讨论。

1992年4月9日，大选投票。到了这天晚上，金诺克和布莱尔的悲观看法很快就被证实是正确的了。晚11点后，巴西尔登的选举结果公布出来了。这是一个保守党的边际席位，虽然有大量的工人阶级，但他们多数都是保守党的选民。竞选中，工党在此地花了很大功夫，但还是无济于事。金诺克看着电视，对他的妻子说：“情况竟是这样。”他预感到他当首相的梦想结束了。

布莱尔又一次在自己的党失利的时候取得了好成绩。他在塞奇菲尔德的多数票增加到14859张。但保守党候选人——前保守党总督导师迈克尔·骄普凌的儿子尼克拉斯·骄普凌也以高出一个百分点增加了他的得票份额。自由民主党在该选区的地位被保守党取代了。

这次大选，保守党和工党都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工党的得票率上升了3.5个百分点，达到总票数的35%，所得席位也由上次大选的229席增加到271席；而保守党的席位则由376席下降到336席，在下院的多数席位仅有21席，而1987年时有102席。工党的成绩得益于过时的选区划分，而且它在边缘选区进行了一场高效率的竞选运动。保守党在国家处于经济衰退并且经费不足的情况下仍能赢得大选，实现四连冠，也是很难得的。自由民主党等小党的表现不佳，在1987年时，它们总共得了45个席位，而这次只得了35席。

但是，不管怎样，工党毕竟是输家。作为一个议会政党，不能上台执政，

就没有机会去实践自己的纲领和政策，任何美好的计划和打算都是纸上的东西，而且，党内的活动家们也没有机会去展示自己的治国才能。对布莱尔来讲，大选失利证实了他事先的预见，也证实了他对工党的看法，这就是工党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不能再丧失时机了。

八、经受新的考验

布莱尔虽然深受金诺克的青睐，并被选定为接班人，但是工党领袖的更替是经过民主选举的，而不是由前任领袖指定的。到 1992 年金诺克下台时，布莱尔在党内的威望还没有达到可担任领袖的程度，他还需要时间。

对大选结果作客观分析

1992 年 4 月 10 日，大选投票后的第二天，凌晨 5 点钟，在位于伦敦泰晤士河南部的工党总部大楼的台阶上，金诺克勉强承认了失败，同时也意味着他不得不辞去领袖职位。他说：“我当然感到极度失望。这并非是为了我自己，因为在我个人的生活中，我是幸运的，而且非常幸运。但是我为我们国家的许多人感到失望和悲哀，他们并不分享这种个人的好运气。他们应该享受比他们在 1992 年 4 月 9 日所选择的更好的运气。”

金诺克在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的妻子格莱尼斯就站在他的旁边。站在格莱尼斯旁边的布日彦·古尔德，此时神情严峻，正在考虑他下一步的行动。他有意竞争工党领袖的职位，但很清楚史密斯是目前最合适的接替金诺克的人选。不过他清楚金诺克本人是倾向于他的，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打破已有的党内力量对比状况。但是金诺克认为古尔德竞争不过史密斯，他希望古尔德能成为党的副领袖。

对工党的许多领导人来说，连续第四次失败的打击太惨重了，他们没有精神准备，他们曾坚信工党会入主唐宁街 10 号，所以忍受不了事后的调查分析。只有布莱尔能清醒地对待这次失败。就在 4 月 10 号早上，金诺克刚刚发表了认输讲话后，布莱尔就在塞奇菲尔德为 BBC 电视台“92 大选”节目提供了他对大选结果的分析：“我们明显的失望感必须由成就感来平衡，那就是我们在全国的不同地区获得了相当多的议席。但是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现在情况已经很明显——从像我们在 1987 年后那样做起，一直到实际赢得压倒多数。”布莱尔早已下了决心，如果工党失利的话，他会有所表示，现在是他畅所欲言的时候了，他已将近 39 岁，而且差不多当了 10 年的议员。他已经接近了工党的最高层，但是，如果工党仍处于反对党的位置上，那是没有用的。对于工党所犯的错误，他已有了清楚的认识，而且对一个新工党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也有了一个大致的看法。他感到，工党必须进行比 1983 年以来更大的变革，等待是没有用的。他还客观地分析了大选失利所带来的影响，他写道：“工党最大的危险就是它输掉这次大选。它好像被当头浇了一桶冷水，这使它感到震惊，于是它说道：‘关于这种情形我们最好得做些什么。’后来它全身就干透了，太阳也出来了，它随之就会说：‘噢，这样并不太坏。’这种情况发生于每一次大选。”

布莱尔虽雄心勃勃，但却谨慎无比。这一点，他与布朗不同。布朗就缺乏耐心，而且布莱尔知道布朗可能随时放弃政治，返回法律界。大选一过，领袖选举的竞争就已经开始了，而且选择一位什么样的领袖，直接关系到工党的发展方向问题。布莱尔知道这种情况，但却不做任何评论。当有人问他金诺克是否应该退位时，他还是这样来回答：“这件事这时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他获得了我们极大的尊重、感谢及支持。”1992 年的领袖选举形势与 1983 年和后来 1994 年一样，对于谁能够赢得领袖选举几乎没有什么大的

疑问。真正的问题在于，新领袖将采取什么样的方向？谁将成为他的副手？最后，谁将代替他原来的位置？每一次，这些问题都会把工党的政治家们折磨得精疲力尽。就在大选后不久的一个周末，布莱尔与高登·布朗，还有代表纽卡斯尔的下院议员尼克·布朗，在布莱尔德汉姆的家附近的乡下散步，三人谈起了领袖选举的形势。高登·布朗当时被认为是史密斯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他否认他想与史密斯争夺领袖职位。一些人认为布朗将会成为史密斯的继承人，但是他这次不会成为史密斯的副手，因为南部的工党组织不会同意让两个苏格兰人组成一个领导集体。布朗以及其他与此事有关的人也接受了这个事实。布莱尔的情况与布朗相同，看来他也没有机会竞争副领袖之职了。

放弃副领袖职位的竞争

在领袖竞选期间，人们议论最多的还是副领袖的人选。《观察家》杂志报道说：“史密斯先生乐意赞同玛格丽特·贝科特作为他的副手。”但贝科特却告诉记者和她的同僚，说她不打算竞选副领袖一职，甚至还向史密斯建议其他诸如布莱尔和布朗那样的竞争者。好像布莱尔又有了希望。另外还有两个竞争者，一个是古尔德，一个是约翰·普雷斯科特。但史密斯没有看中他们。古尔德很久以来一直与史密斯对立，他们俩在欧洲问题上的分歧太大，而且古尔德还有意与史密斯竞争领袖职位。普雷斯科特也是个欧洲怀疑论者，反对英国加入欧洲汇率机制。

贝科特退出竞争后，布莱尔必须尽快决定是否把自己推向前台。他为此犹豫了好长时间，请教了许多朋友，多花了不少电话费。他感到很为难。从史密斯一方来说，他曾试探过布莱尔，如果贝科特退出竞争的话，他就会选择布莱尔。但这就引发了布莱尔与布朗的关系这个很尖锐的问题。党内的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催促布莱尔站出来。而金诺克和哈特斯利则劝他不要这样。催促他站出来的人主要是考虑布莱尔是坚定的现代派，他当副领袖有助于促使史密斯带领全党走向现代化。否则，难以保证史密斯不走回到传统的道路上去，至少他会成为缺少攻击性的现代派。

金诺克和哈特斯利反对他出山的动机各不相同。金诺克想让古尔德取得工党副领袖一职，尽管他对古尔德的一些政见持有异议。他认为古尔德和布莱尔一样，聪明、善辩，而且是个现代派。金诺克说他与古尔德之间“没有任何能够描绘得出的裂痕。我非常喜欢像古尔德这样的人，有思想、能言善辩、生机勃勃。”他否认关于古尔德与他疏远了之类的传言。金诺克认为古尔德能够取得副领袖职位，而对布莱尔来说则时机还未到。据有人说，史密斯也有些动摇，打算接受古尔德为副领袖，因为这样古尔德就不会与他竞争领袖一职了。一心想当影子财政大臣的高登·布朗则积极说服史密斯不要接受古尔德为副手，认为接受是错误的。

哈特斯利反对布莱尔竞争副领袖之职的理由则具有更多的个人感情色彩。他说：“我敦促他不要出山竞选副职，是由于我认为他应当在将来的某一天出任工党领袖。我相信他是约翰（史密斯）的天然继承者，而非高登（布朗）。我曾假设约翰将在两届议会中担任领袖，并且我们肯定赢得下次大选。但布莱尔只作为副职，他将一无所获。曾当过副领袖的每个人都认为那是个遭透了差的差使，他们告诉他们的朋友们不要去干。每个人都告诉我不要去干，

但是我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托尼一定得采纳我的建议。我想他现在很烦恼。”

布莱尔的妻子切丽希望布莱尔出山，不过并未产生重大影响。对布莱尔作出决定，影响最大的还是高登·布朗与他的关系。与布莱尔关系密切、不赞成他出山的少数人暗示：布朗不可能接受布莱尔超越他而充当工党副领袖这种想法。这些人想以此原因来使布莱尔丧失信心。不过也有内部消息灵通的人士明确否认了布朗把布莱尔当成敌手的看法。他们认为：不是金诺克，也不是史密斯，而是布莱尔和布朗代表了现代派，问题是谁将被更好地安排来做什么。麻烦的是，他俩像是一对双胞胎，而在这个家庭中又没有任何其他的人。布莱尔在考虑了史密斯的试探性的建议后，明确告诉史密斯，如果双胞胎中必须有一个竞选副领袖的话，那应当是布朗。

然而，布莱尔又受到了他的一些最亲密的顾问们的压力。他们要同布朗绝交，无论如何也要把布莱尔推向前台。然而，对布莱尔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他能否获胜。尼克·布朗是工会问题和选举问题专家，他的看法是悲观的。当时，在工党领袖与副领袖选举团中，工会占有40%的比例，而且采用集团投票制，大工会的领导人在选举中起着关键作用，而布莱尔在处理工会法问题上一定程度上得罪了他们。此外，两家最大的工会已经在史密斯和贝科特作为正副领袖候选人这一问题上达成了谅解。在选举团中，选区工党占有30%的比例，选区工党代表着工党个人党员的态度，而布莱尔在党员中的支持率还没有得到验证。在议会党团这30%中，则基本取决于史密斯的态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在所有推测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史密斯能否说服贝科特改变想法而投入竞争。史密斯不真正想让布莱尔或布朗当他的副手是有根据的，因为他们将来会权高盖主。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选择就是让贝科特出山。从史密斯的观点来看，她不是个领袖人才，因此不会对他的地位构成威胁。此外，她忠诚、称职，而且还是个女性，有助于树立领导层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形象。更为重要的是，她是个左派人物，担任副领袖，有利于工党左右两派的团结。

最后，玛格丽特·贝科特决定出山。尼克·布朗受布莱尔和布朗之托，并以他们的名义去试探她。他与她约定在4月14日，星期二上午10点30分在下院她的办公室里会晤。当尼克早几分钟到达时，碰上了正从她房间往外走的史密斯。史密斯告诉尼克：“玛格丽特已经决定出山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第二天，贝科特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改变了她的立场：“在星期日我说过我不会往前走了。与前排来比，我落在了后面，但是我得往前排移动。”

普雷斯科特宣布参加副领袖的竞选，他说决定参加是因为他认为贝科特早已退出了。布莱尔在塞奇菲尔德宣布他将不做候选人，并且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表示支持史密斯和贝科特为正副领袖候选人。他说：“约翰和玛格丽特显示出了杰出的领袖才能，这是很重要的。他们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都是前工党政府官员，最重要的是，他们将执行使工党脱胎换骨的措施，来保证我们的思想和组织适应于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布莱尔的话寓意深刻，对贝科特的评价实际上是在对她进行讽刺。

从大选结束到宣布不参加领袖竞选，这5天是布莱尔政治生涯中最难熬的一段时间。对他来说，是否应该参加竞选太难决断了。但有一件事他肯定

是做错了，那就是犹豫，因为这给了史密斯和贝科特决定问题的时间。对一个有雄心当领袖的人来说，确实很难判断当副领袖是好事还是坏事，按哈特利的话说，副领袖不是一个好差事，在副领袖职位上当上领袖的例子确实不是很多，包括保守党。但是，如果当上了副领袖，他就会被看成领袖当然的接班人，就会更有利于展示自己，他也会在党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布莱尔对副领袖竞选的犹豫所产生的一个重要后果可能是改变了他与布朗之间平衡。在 1992 年大选之前，在人们的印象中，布莱尔是布朗的小弟弟，在很多事情上，他都是听布朗的。但是现在，这种关系开始发生了变化，布莱尔成了拿主意的人，在两人中，他呈现出更为大胆和不耐烦。他看起来热心于向前冲，坚持他的信仰，而相反，布朗似乎不愿意冒险。这种状况在以后的两年中变得更加明显。

被认为是工党领袖的错过者

副领袖的候选人产生后，史密斯便开始了他的竞选工作。此时的史密斯还只是一个名誉上而不是实际上的现代派。自从工党政策反思运动开始后，党内逐渐形成了主张对工党进行脱胎换骨的革新、使工党走向现代化的现代派，布莱尔和布朗就是现代派的中坚力量。史密斯很清楚这两位新星是工党新思维的重要来源，他决定抓住他们，让他们归到自己的阵营中来。史密斯过去对党内的改革不是很热心，但是现在他很清楚，要想竞选成功就必须举起改革的旗帜，而且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党内选举制度的改革，必须废除工会的集团投票制，实行一人一票制。史密斯的主要竞争者布日彦·古尔德也把宝压在了选举制度改革上，他说如果他当选的话，那么他可能就是最后一次由集团投票而选出来的领袖了。史密斯被迫做出反应。布莱尔和布朗抓住这个机会，将党内的舆论引向这个问题。

辩论主要在“现代派”和“传统派”之间展开。传统派在提出工党失败原因的时候把矛头直接对准布莱尔，他们争辩道：“工党失败就是因为它变得太多，而不是太少。”他们攻击现代派说：“现代派们是这些人，过于强调想象，因此帮助工党输掉了上两次大选。所以，工党应该通过确信来重铸其意识形态的信条。”但是传统派没有弄清这些信条是什么，是 1983 年大选时的那些原则？或者可能是 1979 年大选时卡拉汉的维持现状的信条？还是 1945 年大选时的信条？现代派的力量在于他们的思想是工党内最具凝聚力的思想，而且史密斯又是一个名誉上的现代派，把推进党的现代化作为自己竞选的主要纲领。

在领袖一职竞选中，古尔德很快发现自己没有获胜的希望。但是他还有成为副领袖的可能，因为他同时竞选正副领袖两个职位，而且他在党内拥有很强大的支持力量。然而，古尔德同时参加两个职位的竞争其实是个失策，因为这首先就表明他自己对当选为领袖信心不足，而且还分散了自己的精力。他的竞选代理人戴维·布拉克特曾建议他撤出领袖竞争而集中力量于争夺副领袖一职，但是他仍坚持“古尔德—古尔德”的竞选班子。随着竞选的进行，古尔德越来越向传统派的阵营靠拢，由于他惊恐于现代派在党内强大力量给他带来的威胁，他把唯一的希望放在了经营党内保守派联盟所控制的集团选票上。这决定了他在竞争副领袖一职上也是以失败为结局。

经过 3 个多月的竞选和各部分选举团的投票，1992 年 7 月 18 日 约翰·史

密斯和玛格丽特·贝科特分别当选为工党的正副领袖。第二天早晨，很有影响的《星期日泰晤士》彩色杂志登出了一篇长达5页的人物介绍，题目是：“托尼·布莱尔——等待中的领袖。”该文的发表并不是巧合，也不是保守党新闻机构的挑拨离间。这是关于布莱尔的最长、最有名的一份介绍，并且大受欢迎。在按语中说：“昨天工党选出了一位新领袖。人们感到这个党应该跳过一代人而选择托尼·布莱尔，至少人们认为他应该竞选副职。”同一天，《星期日快报》发表了一篇报道，说约翰·梅杰及他的许多同僚推断：布莱尔将来某一天会是领袖职位的接替者。还有的媒体评论道：“在一长队聪明、带有年轻人朝气的工党前座议员中，布莱尔是新来的一个，他令人悲哀地被称为‘工党领袖的错过者’。”

受到新领袖的重用

不管媒介怎样评论布莱尔在这次领袖竞选中的表现和他未来的前途，他毕竟没有成为金诺克的接班人。情愿的也好，不情愿的也好；应该的也好，不应该的也好，他必须在史密斯手下做事。他还需要韬光养晦。不过在影子内阁的安排上，他还是如愿以偿。在史密斯当选为领袖5天后，进行了影子内阁的选举，布朗和布莱尔以第一和第二名进入影子内阁。布朗被安排为影子内阁财政大臣，布莱尔为内政大臣。现代派得到了一定的补偿。

1992年7月，在影子内阁重新改组期间，布莱尔与他的导师罗伊·哈特斯利进行了磋商。哈特斯利是即将离任的副领袖兼影子内阁内政大臣，他后来说：“布莱尔来同我商量应该做些什么工作，因为他很想做内政事务工作。我告诉他担任此职。在政府里，内政事务是个糟透了的工作，而作为反对党，那可是个相当不错的职位。在反对党一方，你所想的就是大量的议会工作。作为反对党，你所需要的就是获得一种资历，即当过影子内阁内政大臣。在政府里，你每天都担心某人从监狱中逃跑，而在反对党中，你总是希望有人将会从监狱中脱逃，因为这样你就可以抱怨政府了。”布莱尔听从了导师的意见。不过当时也别无选择。最令人向往的影子财政大臣的职务很显然将由布朗承担。布莱尔在某种程度上对影子外交大臣感兴趣，但他不是国际政治家，虽然他对美国、澳大利亚及欧洲大陆的政治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哈特斯利的建议是对的，在影子内阁中，外交大臣一职并不是什么美差，在批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长时间过程中，影子外交大臣不得不与执政党保持一致，而影子内政大臣则可以紧盯着执政党的一举一动，寻找政治机遇。两年的影子内政大臣经历使布莱尔受益非浅，在1994年工党领袖选举时，布莱尔曾对影子内阁的一位成员说：他在这两年所学到的东西相当于他过去10年所学。也正是在这两年中，布莱尔与布朗之间的力量平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布朗获得影子财政大臣职位是合乎逻辑的，无论是内阁还是影子内阁，财政大臣的地位都高于其他大臣，甚至比副首相还重要。然而布朗是塞翁得马。影子财政大臣一职成了他的祸根，他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直到1992年12月英镑贬值前，他还为工党坚持加入欧洲汇率机制而战，当英镑贬值后，他的声誉也一落千丈。布朗是冤屈的，当时，英国加入欧洲汇率机制已是大势所趋，不过许多英国人却反对这样做，就连保守党内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持“欧洲怀疑派”观点。几乎与此同时，布朗在税收问题上也犯了错误。他答应，一个工党政府不会为了自己的缘故而征税，“我们只征这样的税，如果它能

增加个人的机会或为了全体利益的话”。他有些离谱了，甚至说：“如果我们能够减税，而这样做是经过慎重考虑过的，我们会的。”同时他又拒绝直接说明高收入者是否在工党政府任内得多交税。党内的人发现，布朗的税收政策甚至比他坚持依附于“马约”更让人困惑。

向克林顿学习

布莱尔在影子内政大臣的职位上努力为自己创造政绩、树立形象、提高声望的同时，又在积极谋划对工党的进一步改革。比尔·克林顿在1992年美国大选中一举击败现任总统布什，由一个小州长一跃而成为大总统，并使“左派”的民主党成为执政党。这件事引起了舆论界一阵轰动。布莱尔当然想得更多，他总结道：“我们得从实际出发，现实就是在以前的大选中我们输掉了多次。我认为克林顿州长的成功对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那不是选民的错，党本身有某些毛病，我们确实需要去变革了。”

其实，还在美国大选进行过程中，布莱尔的两位最亲密的助手就注意到了克林顿的竞选运动。他们就是菲力普·古尔德和彼得·曼德尔森。古尔德曾在1992年大选中在幕后为工党作了很多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飞到克林顿的家乡——阿肯色州的小石城，在克林顿竞选大本营里工作。他在美国一直呆到1992年11月3日的大选投票日，学习到了一些成功的竞选活动的经验。这次大选是自1976年吉米·卡特大选获胜后，“左翼”的民主党首次取得的大选胜利。

古尔德取到的第一条经验就是“快速反应”。古尔德帮助克林顿竞选班子的头詹姆斯·卡维尔策划了一次商业电视节目，在24小时之内击退了布什竞选班子的一次进攻。布什竞选班子照抄了一份英国保守党的政治广播，声称如果他们的对手获胜，那么人们就要付特别税，而且还说出了精确的数字。古尔德从工党失败的教训中知道，此种指控必须得马上予以回击。卡维尔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古尔德的帮助下，他们向布什的竞选班子发起了猛烈进攻。卡维尔把布什的竞选活动描述成是基于谎言和歪曲的一种进口的抄袭活动。他还说：“我们和工党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做出反应。工党从不这样做，所以失败了。”布什在1988年大选时曾许诺不增新税，但他食言了，所以他在税收问题上攻击克林顿时就显得苍白无力。民主党迅速做出反应，提醒选民，共和党在这方面没有资格说别人。

彼得·曼德尔森在1987年大选时曾与古尔德一起工作，他从克林顿的成功中吸取了另一条经验。他说：“美国人决定选择克林顿，是因为他们相信了他所许的不向人民征收难以负担的税的诺言。而且他还许诺，所征的税肯定会用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生产、促进繁荣。工党也能够这样做，但肯定要在税收问题上得罪人们，问题是得罪多少人，多了和少了都会导致工党的失败。”

曼德尔森间接批评了史密斯影子内阁的预算。这个预算得罪了年薪22000英镑以上的人，也就是说每6个人中就要有一个人得多交一些税。而克林顿的税收计划只涉及到年薪20万美元以上的人，这些人在美国纳税人中只占1%。曼德尔森的批评起了作用，美国大选结束一周后，影子内阁财政大臣布朗就悄悄地抛弃了原来的提高税收的政策，并说在长时间的衰退中这些政策是不合适的。

克林顿赢得美国选民的拥护，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以一个“新民主党”的形象来参加竞选的。因此，曼德尔森和古尔德建议布莱尔在下次竞选中以“新工党”的面目出现。布莱尔任领袖后，立即就打出了“新工党”的旗号。工党现代派从克林顿的政治策略中获益不浅。

1993年1月，布莱尔和布朗拜访了克林顿的顾问。后来成为布莱尔主要助手的鲍威尔，努力向一位美国记者解释他们来访的重大意义，说这是工党内两名最能干的政治家。为了使对方相信他，他还求助于正拍摄他们两人访问纪录片的BBC制片人汤姆·雷斯特里克。雷斯特里克表示赞同鲍威尔的观点。

布莱尔和布朗的华盛顿之行引起了一番争议，因为能从克林顿的胜利中借鉴到什么这个问题，正在工党内部使现代派与传统派之间的矛盾更趋升温。传统派在影子内阁中的领导人普雷斯科特开始先发制人，他声称党内有些人已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他们肯定会从克林顿的胜利中得出错误的结论。他说现代派的真正目的就是“把工党转变为社会民主党，进而实行比例代表制，屈服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与工会决裂”。普雷斯科特把克林顿与马约和比例代表制联系在一起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在与工会决裂或至少是友好地分手方面，布莱尔的观点与克林顿的向“特殊利益”进攻的观点肯定是一致的。就克林顿竞选班子而言，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理由就是因为工会反对它。

传统派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中的代表克莱尔·肖特则更为坦率，认为现代派是一个密谋的“克林顿情结”集团，正在背叛工党最深层次的价值。他激昂地说：“工党的所谓现代派们已经被麻醉了。他们制造出关于克林顿为何获胜的神话，是为了按照他们所设想的方式来改变工党。我认为他们几乎不懂工党的传统及其力量，他们根据投票记录来找出党的缺点是什么，他们乐于割裂许多事情，但没有意识到他们什么东西也没剩下。”克林顿最具震撼性的诺言之一就是通过在接收福利津贴上安排一个两年限制来“结束我们所熟悉的福利”。不久肖特就看到布莱尔和布朗对工党在养老金和儿童福利方面的承诺表示怀疑。这使她确信布朗对1992年工党税收政策的抛弃是在反对贫穷斗争中的一种背叛行为，因为这意味着扔掉了已说出去的要帮助穷人的诺言。她说：“我们所理解的暗示就是：抛弃穷人。看上去他们似乎在说：‘工党被看作是穷人的党，这使你不可能得到主流，抛弃穷人吧。’那将毁了这个党。像我这样的人并不想属于一个干那种勾当的党。”

与美国的一致性加强了她对现代派的怀疑，因为那是与舆论控制选举、金钱政治相联系的。布莱尔和布朗都已受到怀疑，因为他们通晓美国政治。尤其是布莱尔，还与美国有着家庭上的联系。布莱尔的岳父托尼·布斯在自己的自传《真想不到》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当我21岁时，我告诉我的父母我要在戏院碰碰运气，我父亲跟我说：‘如果你走出这个门，就永远不要回来，我们不想同戏院打任何交道。’一个姓布斯的人在戏院中最近的一次表演是一场灾难，它使我们全家都受牵连。我祖太爷的哥哥就是刺杀林肯总统的那位演员约翰·威尔克斯·布斯的父亲。”

布莱尔自己对美国政治的了解基本来源于1986年对美国的一次访问以及1984年对美国大选的观察。1984年，他在电视上看到了罗纳德·里根被重新提名为共和党候选人，这件事对他震动很大，他后来说：“我将永远不会忘记1984年总统选举之前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有一个人拿着竞选政纲

说：‘你们什么时候听说过民主党曾对任何人说过一个“不”字？’那是对民主党的一个断然批评。他们被自利者集团所包围，所以他们从来不说‘不’。最后你感觉到，共和党代表了整个国家的利益，而民主党只代表这个充满美妙幻想的小集团的利益。无论克林顿能否获胜，他的力量将使他摆脱那种东西。”

1984年大选之后，阿肯色州州长克林顿与其他一些著名的民主党人一起成立了“民主党领导委员会”。该组织是党内的一个现实主义者的派别组织，后来成为克林顿竞选的智囊班子。它的目标之一就是向人们发出这样一个信息：民主党是一个“人民党”，这个党能反映大多数人的价值观。这就意味着要抛弃党应该代表一系列利益集团的想法，同时这也表明：民主党要“对权力讲实话”。这句浮华的美国词语因克林顿在竞选活动中大力倡导而变得人人皆知。

1986年，布莱尔和布朗在访美时拜访了“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领导人艾尔·弗朗姆，弗朗姆向他俩解释了这个派别组织的真实目的。他说：“在‘民主党领导委员会’中，我们所想做的就是将民主党重建成为全体人谋利益的党——这才是党向上的动力。在本世纪40到50年代，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如果在这个国家里你想往前走，那你是一个民主党人。到了80年代，如果你想往前走，你可能看见了共和党人。我们得改变那种情况。”克林顿成功地改变了那种情况。他的竞选口号就是：“代表被遗忘的中间阶级，他们工作辛苦、按规矩行事。”在英国，布莱尔也面临同样的情况，几乎有2/3自认为是工人阶级的人，实际是英国的中等收入者。他说他要报答这些“工作既辛苦，做事又出色的人”。

弗朗姆的思想来源于民主党的右翼，但是在克林顿竞选活动中，他却与民意调查人、知识分子左派斯坦利·格林伯格相互联手。他们的结合体现了当时社会思想的两个组成部分，与英国工党内的“现代派”相似，这就是具有创造力的右派和现实主义的左派的联合。在80年代中期，格林伯格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从传统的左派中分离出来。他对密歇根州底特律郊区的麦考姆县进行了一项研究。这是个传统的“里根民主党领地”，在1980年，这些蓝领工人抛弃了卡特而选择了里根。在英国的巴西尔登，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格林伯格据此得出结论，就是民主党已经失去了同它自己人民的联系。他说，直到冷战结束后，像他和弗朗姆这样有不同思想倾向的人才能够在一起工作了，因为他们在核军备竞赛问题上的分歧已逐渐失去了重要性。到1992年大选时，几乎有一半人口居住在郊区，上面提到的两种人都看到了麦考姆县是民主党问题的焦点。在里根—布什时代，共和党是郊区的主导力量。

弗朗姆站在“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角度一直观察英国1992年的大选活动。他注意到，梅杰是在一个远离城市中心的一个地方开始他的竞选活动的。弗朗姆把这种地方称作“郊区五金杂货店”。同时他也注意到各界对梅杰此举的反应：“新闻界去了那里，而工党肯定会嘲笑他那样做。但是他肯定知道他在干什么。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选票。”

“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看到了它的任务就是迫使民主党与社会变革发生联系，他们把这个过程叫作“现实疗法”。该组织的一个重要成员保罗·白格拉把这个过程看得很简单。他是一位策略家，曾是卡维尔的政治事务磋商上的伙伴，还为克林顿起草演讲稿。他说：“我们得从现实出发，现实就是：以前我们输掉了多次选举。我认为克林顿州长最大的远见就是：那不是投票

人的错。党肯定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异常，我们必须得进行变革。”这些正是布莱尔和布朗所要说的话。

弗朗姆谈到了税收和福利问题。他说：“我向克林顿建议，不要在他（在阿肯色）多少次提高了税率上进行辩论，而是要抓住他要结束我们所熟悉的福利这个事实。”其实税收和福利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克莱尔·肖特所担心的那样，削减税收就意味着一定要削减福利，工党削减福利的主张只是为了同保守党削减税率的作法相竞争。弗朗姆说：“在我看来，你们将不会通过辩论来使美国人民或英国人民信服：‘我们只想把税收提高到这么多而不是那么多。’你们所表明的就是你们与大多数人民，即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利益相一致，如果你那样做了，人们就会说：‘噢，他们将会明智地花掉我们的税款。’”

美国之行促使布莱尔形成了一系列观点，这些观点后来成了他的“社会伦理主义”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此外，从1993年1月开始，布莱尔的演说就散发着克林顿经济学的味道。他攻击“利益扩散”这种主张，即让富人的财富向其余的人扩散；他重复克林顿关于“变革”的言词，这种“变革”意味着“大多数人在一生中应有六、七个工作，而不是只有一个”，“失业并不只是关于你为什么失去了前一个工作，而是为什么你不能发现一个新工作。”

吸收澳大利亚工党的经验

布莱尔的新思想观点并不是完全从克林顿那里照搬过来的，有许多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工党的经验。在他和布朗访美两年前，他们俩去澳大利亚旅行并取经。这次他们会见了澳前总理鲍勃·霍克，以及后来撵走他的财政大臣保罗·基廷。8年前，布莱尔曾访问过澳大利亚并发表了许多重要演讲。这8年间，澳大利亚工党发生了很大变化，重新创造了自身。1983年大选期间，工党抛弃了它的领袖比尔·海登，他是许多变革的始作俑者，但是缺乏对选民的吸引力。党在霍克的领导下连续3次赢得大选胜利。一位评论家把澳大利亚工党的“新模式”描写为“非常实用，反乌托邦和非社会主义的”。霍克有句名言：“在政治上，获胜并不意味着任何事情，但是它是任何事情的开始。”到1990年布莱尔访问时，霍克和基廷已在推行一套私有化和非国家干预的措施，这与英国保守党撒切尔夫人所采取的政策类似。澳工党的这些政策被描述成是“市场社会主义”，在党内招致了强烈反对。不过，在政治上，澳工党努力维持政府、雇主与工会之间的“一致性”，这是一种社会契约。它把目标定在“一致”和社会稳定上。

总的来讲，克林顿的经验对布莱尔影响更大。不过布莱尔坚持认为，他并没有简单地从一个政治文化不同的国度移植来一种理想，他只是把“新民主党”生动的、大众化的语言应用到他早已大规模开发的一种思想中去。克林顿选举胜利的经验既陈旧又很重要，那就是所有的政治就是一场争夺中间地带的战役。这种看法在工党内久已有之。克林顿证明，一场争夺中间地带的成功竞选也会引起它的天然支持者的兴趣。英国的大选也证实了这一点。赢得大选的党在中间地带和它在大本营赢得的选票一样多。在1979年和1983年，工党不仅在中间地带而且在其铁杆支持者中失掉了选票。

布莱尔长期反对工党作为无产者的党，他在1993年5月激动地表达了这

种观点：“当我们说我们在为最底层而不是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说话时，我们中在玩托利党的游戏。事实是，如果你允许你自己融入那个角落，你就要输掉选举。而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从我自己的选区得知，激情把大部分人联系起来，这比试图把人们分成集团重要得多，也比说工党的任务就是争取处于社会安全福利系统的人并代表这些人的利益重要得多。这些人不想要也不需要这些。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通过给这些人以机会来表明我们怎样支持全社会的繁荣。”

克林顿的胜利表明，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联盟是能够建立起来的。不过，克林顿执政头两年的效果并不好。当被问及 1994 年中期选举，克林顿领导的美国民主党为何惨败时，布莱尔暗示道，克林顿总统的政府缺乏追寻“新民主党”政策的决心，你不要以一种方式为基础开始竞选而又以另一种方式进行统治。克林顿的麻烦就在于此，他以两种基础开始竞选，既求助于传统的、自由的民主党人，又使中间地带的选民确信他确实是一个“不同类型的民主党人”。但是，执政以后，他既不能履行“新民主党”诺言，进行福利改革，也不能兑现对传统民主党支持者作出的承诺，实行普遍的医疗监护。

布莱尔和布朗的美国之行，收获是很大的，这为他们已经开始的党内变革增加了新的动力，注入了新的养分，同时也提供了一些竞选战略、策略上的经验教训。

九、党内改革的急先锋

从 1992 年到 1994 年这两年间，布莱尔在党内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自己确立了党内现代派主要代表人物的声誉，其间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对党的选举制度的改革，即废除工会的集团投票制，实行一人一票制。

旗帜鲜明地主张改革

1993 年初，就在布莱尔访美回来 10 天后，党内围绕实行“一人一票制”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斗争。工党现代派提出要废除选举领袖和议员候选人的“选举团”中工会所享有的集团投票制，代之以更能体现民主精神的“一人一票制”。此案一经提出，立即遭到大工会领袖和传统派的反对，他们攻击这是一个阴谋。布莱尔旗帜鲜明地站在现代派一边。他在 BBC 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中宣布：“实际上有一个阴谋，这个阴谋能使工党赢得下次大选。”他不仅大胆地接受了正在从事阴谋活动的指控，并且还声称“在工党内绝大多数人都参与了这个阴谋”。布莱尔认为，如果工党再不改变它的内部民主机制的话，它将不会赢得一次任何方式的选举。他很直率他说：“我们用集团投票来决定任何事情这种做法，再也不能继续进行下去了。”布莱尔不顾党内的各种异议，坚持主张在党内所有重大问题上都实行一人一票的简单原则，工会在决定工党的事务时必须通过它的具有个人党员身份的会员的投票。

布莱尔的这种鲜明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他有可能因此而失去势力强大的工会领袖们的支持。就在那次电视节目之后，史密斯警告布莱尔说，他可能正在冒着失去成为党的领袖的机会的危险。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布莱尔的这种冒险是值得的，它帮助布莱尔成了现代派的最主要代表人物。在以后的任何领袖竞争中，现代派的第一候选人只能是布莱尔。在这一点上，他已比布朗拥有优势。

与史密斯的分歧

在实行“一人一票制”问题上，开始时布莱尔与史密斯有点分歧。从个人关系讲，史密斯对布莱尔是友好的，这可以通过在公开场合史密斯常常谈起布莱尔当领袖的机会反映出来。史密斯虽然觉着布莱尔的现代派的雄心壮志不可能实现，但是对之持纵容的态度。布莱尔则觉着自己的领袖在选举制度改革问题上有些太谨慎了。按史密斯的想法，只要给那些非工党个人党员的工会会员一定的对党内事务的发言权就行了。

布莱尔的“阴谋”就是想让史密斯明确答应实行“一人一票制”，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被选为领袖。从某种意义上说，工党内绝大多数人参与了 this 阴谋，这是真的。一项调查表明，4/5 的党员同意“工党领袖应该由一人一票制度选举产生”。但是，立即将一人一票原则引进党内，这还没有被多数党员们接受。不过，集团投票制已经遇到了挑战。

向既得利益集团发动猛攻

布莱尔向维护集团投票制的力量发起了猛烈进攻。他把他的反既得利益的理论用在了工会身上，他说尽管他过去支持工联主义的原则，但他坚持认为工会太可能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了，它们是在牺牲失业者及整个社会利益的基础上来追求它们自己成员的利益。他说：“我不认为工党将切断它同工会的联系，我也不认为它应当这样做。”布莱尔认为，工会与工党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相互理解，而不应是机构上的联系。“机构上的联系”那种“关系”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很清楚地论述了那种关系不能继续下去的原因：“我认为必要的就是，在下次大选，工党向人民发表施政纲领时，它是有能力的、自信的，它可以这样说：‘我们向全国宣布我们是一个党，我们将在全国利益的基础上拿出我们的政策及施政方案。’”

布莱尔的观点是有说服力的，就连那些维护集团投票的巨头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但是一些工会领导人又提出一种观点：每当劳工的利益与中产阶级相冲突时，工党总是与劳工站在一起。这种观点是绝对冠冕堂皇的，要是在以前，布莱尔是不敢与之对立的。可是，克林顿的成功激励了他。克林顿的成功就在于他采取了临时联盟的形式，明确反对美国工会的宗派利益。在塞奇菲尔德，布莱尔也表示，工党要想成功，就得把工会会员即集体党员变成个人党员。他说：“现在对我来说，那是体现与工会联系的最佳方式。然后把这些人放在并非反工会的位置上。我们应该是亲工会的。当我们与工会的关系处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时，我们就更容易是亲工会的。”

布莱尔的讲话受到了当地工党人士的热烈欢迎。那时，塞奇菲尔德工党在全国是党员人数最多的选区工党之一，有 1200 名党员，超过全国平均数的三倍还多。这里所有的工党政治家们都磨破了嘴皮来动员更多的人加入工党，并且一直认为这项工作为解决集团投票制问题的关键。自从 1979 年大选后，十几年来，工党的个人党员数目一直在下降，从本世纪 50 年代的 100 万人降到 1992 年时的 25 万。高登·布朗曾提出过一个使党员队伍回升的办法，就是吸收那些为工党的财政做出过贡献的工会会员，即集体党员为个人党员，同时降低入党时交纳的党费额度。布莱尔大力赞成这个办法，并在自己的选区进行了实践，结果是成功的。这使布莱尔认识到，如果工党有大量的党员，它就可以不在组织和财政上依赖工会。这也是他支持实行“一人一票制”并反对工会作为工党的一个机构的依据。

在“一人一票制”上的斗争实际上是与党内左、右两派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的。早在 40 年代，左派的巴巴拉·卡斯尔就提出实行一人一票制，因为那时工会都为工党右派把持着。到了 80 年代，角色颠倒了，大工会都为左派所控制，右派试图通过实行一人一票制来削弱工会领袖的权力。1984 年，在金诺克当选为领袖后的第一次工党年会上，他就试图在议员候选人的选举上引进一人一票的投票法。会议为此进行了表决，结果是既反对实行一人一票制，又反对保持现状，实际上还是保持了现状。1987 年大选后，金诺克又重提此议，最后达成妥协，工会中的个人党员可以作为个人来投票选举议员候选人，但是在选举议员候选人的选区工党选举团中，由地方工会集团投票所决定的票数仍占 2/5 的比例。虽然这是不太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毕竟使一人一票的原则占据了一个桥头堡。

1992 年大选后，工党领导层中在一人一票制问题上已基本达成了共识：史密斯一直认为工党的内部工作需要改革，所以他不需要说服就接受了现代派们提出的建议；党内的另一个实力派人物布日彦·古尔德早在 1992 年竞选

领袖时就说过，如果他当选为领袖，那将是最后一位由工会集团投票选出来的领袖；金诺克早就是一人一票原则的推行者，他还是经集团投票制选下去的最后一位领袖，对该制度存有怨恨之情，还在离任之前，他就试图利用领袖的权威来说服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同意在议员候选人选举上废除集团投票制。然而，普通党员和工会会员并不理解实行一人一票制的意义，他们对作为党的机构的“工会”仍抱有忠诚的感情。传统派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抵制现代派的改革。传统派攻击现代派搞一人一票制是想把工党搞成第二个社会民主党，而社会民主党在 11 年前是由一群工党的“叛徒”建立起来的。有一个叫东·迪克松的极端传统主义者甚至说布莱尔是一个“真正的托利党人”。他不仅在影子内阁会议上与布莱尔尖锐冲突，而且还在电视上攻击布莱尔。他吼叫道：“我认为你不能明确建议应从工会运动中分离出来。因为如果你要那样做，你所创造的就是一个‘第二社会民主党’——一个没有任何根基的党。”

面对传统派的攻击，布莱尔总是坚持说他并没有建议工党应该同工会脱离。为了给自己找到有力的证据，他搬出了他于 1982 年在澳大利亚演讲中所阐述的观点，就是：当社会民主党的创立者们“把他们自己同有组织的工人隔绝开来时”，他们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但是，他私下里却认为工会现在已无路可走。他还认为一人一票制是削弱工会作用的一种方式，在党内是反对工联主义者的一种方式。对他要创造一个社会民主党式政党的指控，他反驳道：“坦率地讲，我发现这种争论很荒唐。社区的绝大多数人并不是工党的成员，我们将怎样为工党赢得支持力量呢？当我们向 21 世纪前进时，我们说道：‘一个激进的、现代的、进步的、左翼中心的党看起来像什么？’回答就是，看起来像这样一个党，与当地社区紧密相联的党，因为当地社区是党的一部分。”

被领袖委以重任

就在这场斗争的进行过程中，布莱尔在党内的地位又提高了一步。在领袖选举中曾被史密斯击败的布日彦·古尔德突然辞去了他在影子内阁和全国执行委员会的职务，他还是党内重要组织“与工会联系考察小组”的成员，于是，史密斯任命布莱尔来接替古尔德在该小组中的职务。不久布莱尔又与布朗和金诺克一起被选进了全国执行委员会。这个结果意味着在影子内阁和全国执行委员会这两个最有权威的机构中，现代派的力量得到了加强，同时也表明领袖史密斯更加倾向于现代派。

许多工党的重要人物都是“与工会联系考察小组”的成员，其中包括后来与布莱尔竞争领袖职位的副领袖玛格丽特·贝科特和约翰·普雷斯科特，还有史密斯领袖竞选的总管罗宾·库克，左派代表克莱尔·肖特，工党内 4 个最大工会的代表，还有《有争议的联盟》（一本有关工党与工会关系史的书）的作者里维斯·民肯，他是该小组中唯一不是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当布莱尔第一次参加该小组的会议时，他惊恐地发现，小组的人几乎一致反对一人一票制。副领袖贝科特令人惊异地表示，她不保证把史密斯的公开意见体现在小组起草的报告中。普雷斯科特甚至自封为传统派的头面人物。在布莱尔加入该小组前，只有机械工会的尼格尔·海瑞斯独自一人要求将一人一票的原则应用于党的所有决定中。其他 3 个大工会的代表都坚决反对一人

一票制。

在小组的会议上，民肯对现存工党的组织结构进行了解释和捍卫。他从党的起源开始，党作为“劳工代表委员会”是由工会建立的，由它向议会推举候选人。因此，党是以一个联邦性的实体开始的，工会和其他组织，诸如费边社和合作党，都是其分支机构。他们的观点由一种代表他们成员数目的集团投票来体现。民肯进一步解释说：集团投票在许多组织中都存在，如世界银行及一些贸易公司。所以工党实行集团投票制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情况变得复杂起来，当时工党开始允许人们以个人身份加入。从那时起，党就有了两种形式的民主，类似于油和水的混合物。一方面，各个组织通过其当选代表来表达协调一致的意见，这些代表都对他们的行动负责。另一方面，个人党员也享有平等的投票权。直到1993年的改革为止，第一种形式居于统治地位，但是它所存在的基础却正在死亡。因为各种原因使个人的自我意识提高了，各组织的代表在参加工党的会议时并不总是表达他所代表的组织的意志。

然而，要想剥夺工会在工党内所享有的权力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工会是工党的主要财政支持者。大约400万工会会员（大约是全国工会会员的一半）每周都要交纳1便士的“政治捐款”。对工党来说，这是比25万个人党员的捐款更为重要的一笔资金来源。现代派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工会会员成为工党的个人党员。在废除集团投票制问题上，党内现代派与传统派、工党领袖与大工会的领袖们陷入了尖锐的冲突状态中。而现代派的急先锋布莱尔则成了这场斗争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同时也成了许多人攻击的对象。在这种时刻，前领袖金诺克给布莱尔以极大的精神上的支持。1993年7月，金诺克来到塞奇菲尔德的一个工党俱乐部，参加庆祝布莱尔当选为下院议员10周年的一个聚会。布莱尔高度赞扬了这位前领袖，而不是像金诺克自己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在个人和政治生活中都是一个失败者”。同时，金诺克也表示，他坚决支持这位未来领袖的所作所为，并说他“对工党来说是一笔最大的财富”。他忠告塞奇菲尔德的人们说：“你听到他受到的攻击越多，你就必须越爱护他，因为在未来的10年中他将有一个艰难的岁月，这因为他是非常出色的。而在政治游戏中，当你玩得很出色之时，也正是对手想把你整垮之日。”他们俩人之间体现出了政治生活中相当罕见的真正的温暖之情。

史密斯的突然袭击

1993年7月14日，议会大厦里，“与工会联系考察委员会”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开始时，能取得什么样的结果，形势仍不明朗，因为维护集团投票制的人占多数。会议进行中，史密斯突然来到了会场，并明确表示了态，才使形势得到了扭转。史密斯的这种举动被称作是使锅炉制造者们引以自豪的野蛮的政治方式。这正是史密斯的特点，古尔德曾一度把他比做藏在海底里的甲壳类动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是如此地安静以至于你忘了他在那里，当他开始行动时，那速度确实是非常快的。”在一人一票制这场斗争中，史密斯虽然支持布莱尔等现代派，但态度一直不是很坚决、明朗，直到出席这次会议。史密斯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密谋”之中，连布莱尔都没有想到。会议又进行了6个小时，经过激烈辩论，最后终于在两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一个是在选举领袖和议员候选人时实行一人一票的原则；另一个

是，选举领袖的选举团中，工会、选区工党和议会党团三部分所占的比例各占1/3。此外，会议还对史密斯的一个要求进行了讨论，就是只有他自己才能代表这个小组讲话。

5天以后，“与工会联系考察小组”所产生的文件在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以20票对7票获得通过。但是斗争并未就此结束。参加“考察小组”的工会代表并不是本工会的第一把手，他们并不能完全代表工会领袖们的意见，而且各大工会在夏季已开会决定捍卫集团投票制。史密斯不得不承认，“这些新的建议仍没有被工人运动所考虑，我得向他们推荐”。史密斯的提案虽然被全国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但还得在工党年会上通过。现代派和传统派还要有一番较量。

史密斯采取了在其他问题上向工会作一定让步的策略。他一方面仍然坚持一人一票的原则，另一方面又极力使工会相信他内心深处是装着他们的利益的，在某些问题上可以按他们的意愿行事。1993年9月7日，在全国工会的联合组织——职工大会上，史密斯发表了演说。在谈及经济政策时，他做出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变动，在工党的一系列口号中，他把“充分就业”的目标放在首要位置上。他说：“充分就业的目标仍然是工党为英国考虑的核心。工党的经济战略将保证宏观经济管理的所有部门保持运转，以达到持续增长和就业率上升，不管它是否影响到利率、交换率或借贷水平。”史密斯的策略非常有效，很快，他获得了许多工会人士的赞扬，对他的抵触情绪缓解了。但是布莱尔和布朗对史密斯的做法不满意，他们认为史密斯对传统派的让步太大了。这样，在一人一票制的斗争中，又交织上了经济政策上的斗争。

年会上的决战

1993年9月下旬，工党年会在布莱顿举行。在大会开始前的一次外围会议上，布莱尔、布朗、金诺克和已经改变了态度的普雷斯科特都讲到要集中力量支持一人一票制。参加会议的人逐渐增多，原先预订的会场太小了，很快挤满了人，更多的被拒之门外。金诺克表示，无论发生什么事，斗争怎样激烈，工党都应采取更民主、更现代化的措施。布莱尔强调，他与其他人不同之处在于他重复他的观点：一人一票制并不只是关于清理工党组织的，而是关于政治革新的。

在整个会议期间，好像维护集团投票制的力量占着上风。史密斯和现代派的人做着艰苦的游说工作，但效果不显著。在会议的最后时刻，史密斯得到了一支意想不到的援军。在这天的午饭时间，来自制造、科学和金融工会的代表们在一起开会讨论，如何在这次会议中就一人一票制投他们的集团投票。开会前，绝大多数代表都不知道会议地点，因为保密，他们只被告知在上午的会议之后等待指示。有一个左翼代表因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去了一趟洗手间，差一点儿找不到会场，当他从洗手间出来时，发现他的同事们都不见了。这些代表被人领到了一个教堂的大厅里，只有一小批记者跟上了他们。多数记者都跟着该工会的书记罗格·莱恩斯来到了一家饭店，可是没有注意到他从后门溜走了，在饭店里傻等了半天。该工会事先已做出了决定，反对一人一票制，所以直到工党年会快结束时，这些代表中的大多数人仍明确反对一人一票制。然而，在这个会议上，一位名叫安·基伯森的代表提出了一

个新论点。在这次工党年会上，将要表决的议案实际上是一个一揽子改革方案，其中包括一人一票制，还有一个是关于提高妇女在党内地位的方案，即：要求一半已赢得议席的选区工党都推举一位女议员候选人。后一个内容是工会所支持的。基伯森认为：由于这个议案中既有工会支持的内容，也有工会反对的内容，所以在当天下午的大会表决时，他们应该投弃权票。她解释道：如果他们投反对票，就等于背叛了工会里所有的女性，因为这些女性都曾投票支持推举女候选人；而且，推举女候选人在全党都赢得了广泛的支持，而一人一票制则没有。基伯森很受该工会左翼代表的信任，被看作是工会平等机会政策的保护人。经表决，基伯森的建议以 19 票对 17 票被通过，该工会代表团决定在大会表决时投弃权票。这“一票”是决定性的一票，成了现代派“密谋”的一张牌，因为该工会的集团票在年会表决时占总票数的 4.5%。当史密斯得到这个消息时，脸上立刻露出了微笑，而且彻底地松了一口气。他曾想过要失败。

在投票前，约翰·普雷斯科特的一番即兴史诗般的演讲也打动了许多人的心。他呼吁大会要信任约翰·史密斯。他说：“无疑这位先生，我们的领袖，当他说他强烈相信工会和工党牢不可破的关系时，他把他的头放在了集团投票上。他把宝押在那里了，现在是表决的时候了，给我们一点信任，让这次投票通过吧。”史密斯曾表示过，如果一人一票制不被通过，他就要辞职，所以普雷斯科特说史密斯把头放在了集团投票上。布莱尔也有过与史密斯类似的表示。

对这次胜利，最为高兴的是领袖史密斯，因为这无疑增加了他在党内的威信和力量。他的女儿莎拉·史密斯写道：“到了星期三，经过许多紧张和前途未卜的日子后，投票获胜了。爸爸处于狂喜之中。”“那天晚上他与家人及同僚们共庆胜利。而且对于爸爸的庆祝来说，就像他做别的事情一样，从来不半途而废。尽管他喜欢告诉我们还不能充分享受，但他创造了类似的环境。那真是一个奇妙无比的庆祝场面。有数不清的人，有无数瓶香槟酒。他感到作为领袖，最大的考验已经过去了，强有力的党有了充足的空间来大干一场了。在这长夜结束时，他敲定了一项协议：“下一次真正大型的庆祝将安排在大选的那大晚上。”

布莱尔的地位受削弱

布莱尔虽然也很高兴，但很快就被史密斯对工党进一步改革的态度所抵消了。经过这次“冒险”和艰苦的搏斗，史密斯觉得再也不能干这种事了。布莱尔认为，刚刚赢得的胜利只是一个更广泛改革程序的一部分，但史密斯不同意他的观点。史密斯把党的团结放在第一位，认为为了迎接下次大选，必须同传统派修好。他还认为，在到大选前的这个过渡期，正确的姿态就是少使工党再发生动荡，让梅杰继续做糟糕的事情吧！这样，布莱尔的要加紧干的愿望与史密斯的休生养息的打算发生了冲突。

然而，不管怎样，集团投票制的废除对工党来说确实是一个决定性的突破，它意味着工党与工会的关系开始发生基础性的变化，其影响将不仅局限在组织问题上，而是要深入到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基础。这次改革使工党看起来更加是一个公开的民主机构。有人说，史密斯改革真正戏剧性的效果就是在他死后允许党选出了一位激进的“现代派”领袖。这种评价虽然不很

确切，但是一人一票制的实行确实使布莱尔在不到一年后的领袖选举中有更大的机会展示自己的才能，因为工党的领袖选举已经有了大选的味道，而布莱尔具备了这种公开竞争所需要的各方面的品质。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次“密谋”的胜利使布莱尔在党内的地位不是加强而是削弱了。史密斯又同传统派修好了，普雷斯科特成了传统派的首领和史密斯的宠儿，布莱尔和布朗越来越感到孤独。以后的3个月内，布莱尔与史密斯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淡起来，史密斯对现代派想使他再次陷入麻烦之中的改革主张感到恼怒。直到1994年1月，史密斯与布莱尔才在一个午餐会上的会晤中达成和解。但布莱尔仍感到孤独。甚至到了4月份，史密斯去世前1个月，布莱尔对他自己和工党的未来还持悲观态度。他告诉他的朋友说，事情是悲惨的，他不认为工党甚至能够在下次大选中获胜。

不过，布莱尔是过于悲观了，史密斯还是十分看重布莱尔的。5月9日，就在史密斯去世前3天，他在他的办公室里进行了一场可怕的谈话。他同他最亲密的顾问戴维·卧德谈起了他应该小心他的心脏病并注意减肥，当卧德问道：“如果你发生了什么意外，你认为那将特别可怕吗？”史密斯明白卧德所指，回答道：“那必定是托尼，不是吗？”史密斯和布莱尔共同的朋友亚历山大·欧文后来回忆说：“在他生命的最后6个月内，约翰·史密斯在几个场合向我明确阐述，他赞成布莱尔做他的接班人。”

十、一颗升起的政治新星

布莱尔是个异常幸运的政治家，一个非政治性的因素大大加速了布莱尔这颗政坛新星的升起过程。出乎他本人，甚至所有关心布莱尔前程的人的意料，史密斯的心脏病竟成了布莱尔成长的加速器。

意想不到的机遇

早在史密斯任领袖前，他就患有心脏病，所以当上领袖后，他的病情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媒介甚至把这一点当成了工党的一个不利条件，因为这随时都可能引发党内领袖职位的竞争，从而影响党的团结并分散党的注意力。1994年4月10日，当“史密斯”和“医生”这两个词出现在同一篇报道中时，工党上下陡然感到一阵寒意。不过这是一场虚惊，原来是史密斯在苏格兰爬山时扭伤了脚。然而，史密斯的身体状况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1994年5月12日，星期四，上午8点5分，史密斯心脏病复发，1小时后，在伦敦圣巴萨罗缪医院宣告去世。为了有充分的时间通知他的家人，关于他去世的消息直到10点30分才发出。人们都承认，史密斯留下了一个比60年代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加受欢迎、更加团结、更加为英国人民信赖的工党。在工党内部，史密斯赢得了那些曾经想反对他的人的忠诚。他成功地使自己找到了现代派与传统派之间的平衡点，而这在双方看来都是不可能的。作为一个现代派，他改变了工党内部的民主政体；作为一个传统派，他重建了工党历史上的自豪与自信。他还最终确立了工党观念上的决定性的转移，即对欧洲大陆由怀疑转向亲近。在处理党内关系上，史密斯采取了与金诺克不同的策略：金诺克为了提高个人威信而抛弃了强硬左派；史密斯则是着重工党的传统，通过让左派感到自己是党内合法的一股力量而使他们保持中立。史密斯去世那天，布莱尔正在阿伯丁从事欧洲议会的竞选活动，是布朗打电话告诉了他这个消息。午餐时分，布莱尔发表了电视讲话，表达了对史密斯的敬意：“他集诸多非凡的才能于一身：力量、权威、幽默、仁爱。我们所有与他个人有过亲密接触的人都会悼念他。我想我们整个国家都会感到这是一大损失。谨向伊丽莎白（史密斯夫人）致以我们的慰问和祈祷。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打击呀！”

也许此时，布莱尔还没有意识到史密斯的去世会给他带来什么影响。不过他的岳父托尼·布斯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后来说：“在那一刻，我认识到这对他将意味着什么，对我的女婿，还有我的女儿，以及我的外孙们。”布莱尔的支持者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立即从原先的半隐蔽状态下活跃起来，曾有一段时间，这些人在党内处于孤立境地，并且感到万般无奈。

布朗成为最大障碍

不过，对布莱尔来说，要竞争领袖职位，首先遇到的一个障碍就是高登·布朗。当一位朋友向切丽·布斯提议布莱尔应当挑起大旗时，切丽表示她很担心：“因为托尼坚持认为他自己不应与高登竞争。在前12个月里，他的立场似乎有所动摇，但他从未真的说过他会与高登竞争。这一直是他多年来的一块心病。”切丽说得很对，布莱尔确实有些为难。在史密斯去世后的几天内，

他都保持着低姿态，这一方面是为了悼念刚去世的、令人敬佩的领袖，同时也是在进行慎重的考虑。他的政治导师罗伊·哈特斯利催促他必须尽快做出决定，不能再犹豫不决。哈特斯利后来对别人说：“有两个理由促使他必须这么做。其一，很明显，他会赢得竞选，他是最好的领袖人选。其二，如果他不参加竞选，那么再不会有人在政治上严肃地对待他了。我记得他当时对我说的话，他说：‘可是高登那么想要得到那个位置，远甚于我曾想要的。’”我对他说：‘好罢，有许多人想来领导工党，他们只是习惯于去打那些他们并不能真正去做的事情的主意。高登只不过是许多杰出人物中的一个。’”

其实，布莱尔只不过是在做出一种给人看，特别是给高登·布朗看的姿态。他打心眼里是想要竞争领袖职位的。布朗的支持者也明白这一点，他们告诉布朗说：“他在等待时机。”不过，在史密斯去世后的头4个星期内，领袖竞选活动都不是公开进行的。头一周是工党治丧时间，丧事抑制了对工党领袖继承人问题的公开讨论。随后的三周，工党忙于欧洲议会选举，领袖竞选活动仍不是主要议题。在这些事情结束之前，事实上的领袖候选人一直摆出不是候选人的姿态。

舆论倒向布莱尔

然而，从史密斯去世那天起，舆论就纷纷倒向了布莱尔。事实上，布莱尔和布朗在党内的地位早已决定了他们两人中的一个最终会成为史密斯的继承人，而布莱尔在1992年大选后就已超越了布朗。在史密斯去世的第二天，《每日邮报》发表了一篇最为引人注目的赞扬布莱尔的文章，上面写道：“布莱尔先生是一位才能卓绝的人。更可贵的是，在当代政治中，他以他的诚实和正直赢得了毫无瑕疵的声誉，甚至赢得了他最难对付的对手的尊敬。”这篇赞扬布莱尔的文章出自《旁观者》杂志的副主编、撒切尔夫人的信徒西蒙·哈佛。当《每日邮报》的编辑保罗·达克里问到他“谁会成为工党的领袖”时，他回答道：“如果他们有一点判断力的话，那就会是布莱尔。他会把保守党人吓得屁滚尿流。”于是才有了上述那篇文章。而在此之前，也就是史密斯去世的当天，已经有两家媒体发表了认为布莱尔会成为工党领袖的报道。

布莱尔与布朗不仅是好朋友，而且还是政治盟友。从他们俩同时踏入国会的大门时起，他们一直是互相支持、互相信赖，而且在党内几乎是同步上升。然而，在他们俩人都达到接近领袖职位的时候，他们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他们同意，如果在领袖职位竞争中，他们俩彼此对立，那将是灾难性的。在1992年时，他们达成共识，认可布朗处于较强的地位，尽管后来布莱尔超越了布朗。所以才会有布莱尔夫人切丽所说的，布莱尔有些为难的局面。史密斯去世3天后，这两位特殊的竞争对手碰了一次头，第一次进行有关未来领袖选举的正式讨论。这是一个痛苦和困难的会谈。据布朗的一位支持者说，布莱尔甚至准备同意由布朗去赢得领袖选举，但他又坚持认为，他布莱尔更有优势去赢得下一次大选。

民意测验一致倒向布莱尔。就在布莱尔与布朗碰头的那个星期天，有三个紧急民意测验都显示布莱尔是最孚众望的领袖人选。这种民意测验在工党领袖的选举中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因为这个选举过程是全体党员都参与的。

此外，《星期日快报》还登出了一个由 150 位支持工党的工会会员参加的民意测验，布莱尔以获得 43% 的支持率而遥遥领先，处于第二位的是来自工会的普雷斯科特，他获得了 22% 的支持率。

在拥有领袖候选人提名权的 270 位工党议员中，支持布莱尔的人也占多数。还在史密斯的葬礼举行之前，工党议会党团中压倒多数的意见是支持布莱尔而不是支持布朗。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布莱尔那儿。支持布莱尔的议员主要有三种人：由哈特斯利领导的老右翼，也称团结派；金诺克派，该派的思想观点已经转向现代派；1992 年大选后新汇集起来的一股支持布莱尔的力量。

5 月 20 日，在苏格兰爱丁堡举行了史密斯的葬礼。工党的要人，包括前领袖卡拉汉、富特和金诺克，都参加了葬礼。现任首相梅杰和保守党前首相希思也参加了葬礼。这之后，工党领袖的竞选进入了半公开状态，尽管由于面临欧洲议会的选举，领袖选举的日期还没有定下来。大约一个星期后，一份关于领袖选举的最完整的民意测验由 BBC 电视台的“排行榜”节目制作完成。这份调查考查了工党的普通党员、下院议员和欧洲议会议员等对象。结果是布莱尔无可置疑地高居榜首。差不多与此同时，BBC 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搞出了对工会的民意测验，结果也是布莱尔领先。这样，布莱尔在领袖选举团的三个部分中都占有优势。不久，盖洛普民意测验又报出了工党党员个人对各位准备参加领袖竞选的 5 个人的支持率：布莱尔 47%，普雷斯科特 15%，布朗 11%，玛格丽特·贝科特 5%，罗宾·库克 3%，未确定者为 18%。

布朗自我牺牲

到此时，布朗的领袖梦已完全破灭。5 月 31 日，星期二，两位特殊的竞争对手在布莱尔居住的伦敦北部伊斯玲顿的一家叫格林尼达的小餐馆里共进晚餐。在餐前，布莱尔还不知道布朗要说些什么。这顿饭被人称为是值得纪念的带有政治传奇色彩的“最后的晚餐”，是布朗做出最大自我牺牲的时刻。但了解内情的人明白，这种“牺牲”实际上是布朗对布莱尔的认输，当然也存在不使现代派自相残杀、顾全大局的因素。布朗的心情很沉重，他吃的不多，因为早些时候他又出现在位于威斯敏斯特区的一家叫罗丁的餐馆里，又进了一次晚餐。布朗正式退出竞争、给布莱尔让路的决定是在“最后的晚餐”前一天的晚上做出的，他的竞选活动负责人尼克·布朗向他汇报了争取新的支持者的情况，随后讨论了他们所面临的形势。高登指出：他要想获胜，唯一出路是“向黑势力和恶势力求援”，但这不是他想做的，因为这意味着要将布莱尔描绘成一个社会民主党分子、一个反对工会的人。如果这样，将会有有一个不愉快的竞选运动，这会损害工党赢得执政的机会，也将损害他自己。7 月 1 日，布朗发布了一个正式公告，声明他将不参加领袖竞选并将支持布莱尔。消息一出，金诺克立即在电视新闻中表示：由于不必再从他们两个人中间作出选择了，他感到松了一口气。

布朗的自我牺牲为布莱尔赢得领袖选举胜利扫清了道路，他已是不争自胜的候选人了。不过，这并不等于说就没有竞争者了。就在布朗与布莱尔共进晚餐的第二天，普雷斯科特出现在 BBC 电视台的“问答时间”节目中，明确表示他将参加领袖竞选。他说“所有的选举都需要有候选人”，还批驳了

让布莱尔没有对手地参加选举的提议。然而，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可能战胜布莱尔，所以同时又把眼睛盯上了副领袖职位。决定参加领袖职位竞争的还有原来的副领袖、现在的代领袖玛格丽特·贝科特。她的此举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按照工党的规则，现任副领袖参加领袖竞选，就意味着放弃了副领袖的职位。几乎每一个党的高级官员都建议她放弃领袖竞选，但她对之全然不顾。也许她想效法 1975 年时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在领袖选举中来个一鸣惊人。可是，她也像普雷斯科特一样，同时竞选领袖和副领袖两个职位，这本身就表明自己对竞争领袖职位信心不足。

一举夺魁

1994 年 6 月 10 日，星期五，是工党领袖竞选运动正式开始的日子。当天上午，普雷斯科特和贝科特在下院分别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他们正在寻找提名人。两个人都在自己的发布会上发表了演讲。普雷斯科特的演讲给人的印象是他有些怀旧，而贝科特则使她自己显得比较羞怯。她一方面声称两年来她做过 5 份工作，她对此感到光荣，她还声称她“收到了数百封来信，要求她加入到竞选行例中来并继续领导工党”。但另一方面，她承认她正在冒既得不到领袖职位又失去副领袖职位的风险，而且“我完全同意我可能会失败”，摆出了一副听天由命的架势。来打探情况的布莱尔的支持者在人群后面听完两人演讲后，声称他们没有发现这两个新闻发布会会有能对布莱尔今后 6 个星期的竞选进程产生威胁的任何东西。

第二大，布莱尔正式发动了他的竞选运动。与另两位候选人的竞选方式不同，布莱尔先来到他的选区塞奇菲尔德的特里姆顿工党支部——1983 年他就是在这里被提名而成为议员的，宣布了他的竞选纲领。在此，他打出了“新工党”的旗号。当他步入会场时，与会者报以热烈掌声，并且欢呼跳跃。当他们坐下来后，布莱尔说：“早上好，各位。”然后发表了他的演讲。他表示要扫除大量的失业现象，清除腐败，打倒过时的保守党，如果“新工党”过时了，也要把它打倒。最后他说：“今天上午我要宣布我参加工党领袖的竞选。”

由于布朗退出竞争并且全力支持布莱尔，所以布莱尔获胜已是十拿九稳，主要的竞争则转移到了普雷斯科特和贝科特之间在副领袖职位上的竞争。布莱尔倾向于让普雷斯科特当副领袖，这比较符合工党的传统，即正副领袖分别由左、古翼的人士担任，便于协调党内关系。当然，贝科特也属左翼，但她不如普雷斯科特有威信。

1994 年 7 月 21 日，工党领袖选举结果揭晓，布莱尔以绝对优势获胜，得票率为 57%，其竞争对手得票情况为：普雷斯科特 24.1%，贝科特 18.9%。在选举团各部分中的得票情况如下：

布莱尔：议会党团（包括欧洲议会议员）60.5%；选区工党 58.2%；工会（包括参加工党的各种政治团体）52.3%。

普雷斯科特：议会党团 19.6%；选区工党 24.4%；工会 28.4%。

贝科特：议会党团 19.9%；选区工党 17.4%；工会 19.3%。

在副领袖竞争中，普雷斯科特以 56.5%对 43.5%的得票率击败贝科特。

这天刚过晌午，投票结果就公布出来了，在一个大厅里，当“托尼·布莱尔——工党领袖”几个字被投射到一个屏幕上时，大厅里的人都欢呼起来，

其中包括一名保守党人——托尼的父亲利奥·布莱尔。

工党的一次革命

7月21日的这次选举是工党历史上的一次革命。这是工党第一次用可称得上真正民主的方式产生自己的领袖的，自此，工党的政治家们可以放心大胆地指责保守党领袖选举方式的不够民主了。新当选的副领袖普雷斯科特在选举结果揭晓后发表了讲话，他将“英国政治史上所有政党在内的最大的民主动作”与“185名议员选出约翰·梅杰”做了对照，而且对后者还加上了一句“在他们充满烟雾的屋子里”。

使这次选举更带有革命意义的是，它选出了一位非常不一般的工党领袖。这位工党第15位领袖年仅41岁，是工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领袖，也是最不尊重传统的领袖。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仅有11年议会生涯、19年党龄的人却是历届工党领袖选举中得票率较高和英国历史上主要政党领袖所获支持率较高的。舆论界对他评价很高，将他与哈罗德·威尔逊，甚至与美国的约翰·肯尼迪相比较，有人说如果他当上了首相，将会使英国发生像1945或1979年那样历史性的变化。

约翰·普雷斯科特在他的讲话中对新领袖给予高度赞扬：“这个人，我们的新领袖，具备他所应具备的东西。他有魅力，令人肃然起敬。他拥有足够的能量和活力去赢得人们的支持，使他们倒向工党。”他还特别加上了一句：“他把托利党人的生命力都吓没了。”普雷斯科特并不是没有根据地吹大牛。这次选举的确与以往不同，在以往的领袖选举中，工党过多考虑意识形态上的因素，而不是从争得执政地位出发，因而没能选出一个让保守党最害怕的人来。而这次则开了一个先河。在一份保守党中央办公室的内部备忘录中写道：“如果布莱尔脱颖而出，向他看上去的那么好，我们就有麻烦了。”玛格丽特·撒切尔说布莱尔是“30多年来最令人畏惧的工党领袖”。

布莱尔在选举结果揭晓后也发表了演讲。他向人们承诺：“不实现使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党重新联合起来，在下次大选中胜利，决不罢休。”随后，他给他的前任史密斯以高度赞扬，说史密斯“给了我们国家一些重要的东西，并给了我们党一些珍贵的东西。他向英国人民展示了公共服务仍然是一个理想，它给英国政治注入了新的希望。”

这最后一句话更适合于他自己。对工党和英国人民来说，布莱尔确实是一个全新的面孔，能给人带来希望。与以往的工党领袖相比，他有着完全不同的思想意识和政治素质。从思想意识上看，布莱尔对工党传统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更缺少眷恋之情，改革的愿望更强烈。同时他也更少受工党的传统观念和陈规陋习的束缚。有人说布莱尔的思想具有社会自由主义的倾向。一位党内人士对他评价道：“这个年轻人没有最起码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而且他也不打算去理解他所领导的党的思想。”对这种评价，布莱尔表示同意，并进一步发挥道：“工党看起来好像是热衷于阶级斗争，实际上它是一个基

严格意义上说是第5位。工党从1978年开始才正式有“领袖”一职，在此前，从1922年起，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称号是“党的主席和领袖”。在1906—1922年间，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称号是“议会党的主席”。

—作者注

约翰·任托尔：《托尼·布莱尔》，第4页。

本上由正派和诚实的人所组成的党。”正是由于布莱尔有这样的思想意识，当他当选为工党领袖时，保守党的舆论在承认他将对保守党构成严重威胁的同时，又对之表示了超过对以往任何工党领袖的热情欢迎。党内有人给布莱尔送的绰号——“托尼·布乐”和“托利·布莱尔”——也很能说明布莱尔的思想倾向。他任领袖后所提出的新政策基本都是撒切尔—梅杰保守党政府和美国克林顿民主党政府所实行政策的复制品，因此有人说布莱尔是在“学克林顿，偷撒切尔”。

从个人领导素质来看，布莱尔比其前两任更具备驾驭全党组织机器的能力。英国舆论界认为他是一位哈罗德·威尔逊似的强势领袖人物。他本人也十分欣赏威尔逊的一句名言，并对之身体力行：“工党是一部列车，如果你驾驶它高速运行，车上所有的人不是异常兴奋，就是眩晕呕吐，这样你就没有任何麻烦。但是，当你停下时，他们都会从车上下来并争论车子该向什么方向开。”布莱尔对比自己和在党内处境困难的梅杰说：“我领导我的党，而他则是跟随他的党。”布莱尔非常赞赏撒切尔夫人的所作所为，希望自己也能像她那样使英国振兴一下子，同时使自己的党更加兴旺发达起来。

1994年7月21日这一天，对布莱尔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因为按英国的制度，反对党领袖就是潜在的国家首相，在大选时，如果本党获胜，党的领袖就自然成为首相。所以，领袖选举真正是个人之间的竞争，而大选则只是两大政党的角逐。下一步，布莱尔所要努力奋斗的，就是如何改造工党，确保工党在下一一次大选中获胜。实践证明，布莱尔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成功的。

“布乐 Blur”为“使……模糊不清”之意；“托利 Tory”为保守党的别称。——作者注

十一、改造工党

布莱尔当选上领袖后，便着手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针对工党进行全面的改革。当然，他的改革继承了他的前任们的改革成果。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工党着手探索走出泥潭、重新崛起的道路。然而这一过程是曲折的、艰难的，经过了三代领导人的努力和两次大选失败的痛苦。

金诺克的 9 年努力

1983 年大选惨败后，富特辞去领袖职务。属于左派的尼尔·金诺克当选为新领袖。金诺克是矿工的儿子，早年受过阶级斗争学说的熏陶，在工会中做过多年教育工作，当过 13 年工党议员和 4 年工党影子内阁教育大臣，是一个深为工会喜爱的左派议员。他受过大学教育，当过讲师，为人灵活机敏，能言善辩，总是给人以朝气蓬勃、春风满面的印象。他任工党领袖时年仅 41 岁，被认为是一位哈罗德·威尔逊式的强势领袖。金诺克任领袖后的首要任务就是使全党团结起来。他为此做了许多努力，比如支持中右立场的罗伊·哈特斯利任党的副领袖，两人同心协力团结党内左右派，尽可能平息党内多年的内江，取得一定效果，到了 1985 年的年会上，左右派都一致抨击撒切尔政府的高失业率，而不是互相攻击。然而，到 1987 年大选失败以前，金诺克仍是站在左派的立场上，右派的牵制仍然存在。在处理党内关系上，他的方针是力图同党内右派修好，同时压制极左派。在 1985 年的年会上，他狠批了党内极左派，受到年会大多数代表的热烈欢迎。

1987 年 6 月英国大选，工党从保守党那里夺回了一定数量的选票和席位。工党得了 1000 多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 30.8%）和 229 个席位（占总席位数的 35.2%），保守党则得了近 1400 万张选票（占 42.3%）和 376 个席位（占 58%）。大选结果表明，工党的状况同 1983 年时相比已大为改善，但是与保守党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保守党仍以 102 席的绝对多数蝉联执政地位。

大选失败使金诺克认识到了工党坚持左派的政策没有出路，但是向右转又违背他的初衷，于是他采取了向中间摆动的策略，并开始了工党的重建工作。用金诺克自己的说法是建立工党的“新模式”。在政策方面，他逐渐摒弃难为大多数选民接受的左派的政策，并同左派进行了坚决斗争。在 1987 年 10 月的工党年会上，他呼吁全面审查党的政策。国有化是工党左右翼分歧最大的问题，左派历来坚持国有化方针。然而国有化方针已声名狼藉，“国营”与“亏损”几乎成为同义语，1987 年年会的决议承认了国有化企业缺乏进取性和首创精神，并且表示工党如果再度执政，它将实行一种公私合股的“社会所有制”。1988 年 2 月，他发表了题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价值》的声明，直接表明了工党的政策变化。声明中提出党的宗旨是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这就等于放弃了原来党纲中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的提法。声明还放弃了国有化的方针，承认和肯定了私营企业之间的竞争和市场经济。在 1988 年的年会上，经过各派激烈较量，在妥协的基础上，金诺克再度当选为工党的领袖。他对工党的政策又做了进一步调整。在国有化方针问题上，他明确表示放弃过去的政策，实行混合经济模式。这次年会以压倒多数否决了煤矿工会领导人提出的把撒切尔夫人实行了私有化的企业再重新国

有化的提案。

在外交政策上，金诺克也放弃了他早年的激进立场，开始严厉地谴责苏联的极权专制制度，支持英国加入欧共体和实现欧共体的一体化。工党左翼历来主张退出欧洲共同体。在 1988 年的年会上，金诺克明确表示英国应留在欧共体中，工党要制定政策以迎接 90 年代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的挑战。

在防务政策上，工党左翼所坚持的单方面放弃英国核威慑力量的政策已为多数英国人难以接受，但由于左翼力量仍很强大，金诺克采取折中的办法，一方面呼吁争取消除英国的核武器，另一方面又不对单方面核裁军承担义务，而把政策重点放在支持和争取实现国际裁军上面。

在组织方面，他逐步排挤党内左派，尽力吸收中间派和右派进入影子内阁，同时采取一些措施削弱左派的势力。此外，他还采取一些措施，加强了领袖和议会党团的权力，扩大个人党员的权利和作用，进而削弱了工会的影响和作用。经过几年的努力，工党在完成了政策转变的同时，也基本上实现了党的团结。1992 年 4 月大选，工党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又一次败北，但所获席位有明显增加。工党获 271 席，比保守党少 65 席（1987 年工党比保守党少 147）。而在大选前的民意测验中，工党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迫使保守党领袖梅杰将原定大选时间推迟。这表明工党的地位和力量有了明显恢复。但是大选结果同时也表明工党在选民中的威信还没有完全恢复起来，工党的改革还远未完成。

史密斯的作为

1992 年大选结束后两天，金诺克引咎辞职。经过 3 个多月的磋商协调后，在 7 月 18 日的党的特别会议上，选举出了新领袖——约翰·史密斯。史密斯任领袖时 53 岁。他是工党资历最深的党员之一，16 岁就加入工党，60 年代开始进入政界，从 70 年代起一直是下院议员。在 1975—1979 年的威尔逊——卡拉汉政府内曾任能源和财政大臣。他在党内享有极高的威望，被选为领袖时得到 91% 的选票。史密斯任领袖后力图“改错、变革”，弃旧图新。一方面他试图改掉过去工党内部派系林立的状态，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合作的领导集团。另一方面，他提出要进行党的自身变革，彻底改变工党的形象。

史密斯的改革继承了金诺克时期的改革成果。他继续调整党的政策，向中间阶级靠拢，同时削弱工会在党内的权力。史密斯最成功的一个举措就是取消了工会在选举工党领袖和议员候选人中的集团投票制，实行一人一票制。工会的集团投票制是工党与生俱来的，就是工会在投票时以某个工会集体为单位，若赞成则全部赞成，若反对则全部反对。这种制度有很大的弊端。由于绝大多数工会内部都缺乏民主机制，所以投票实际上为工会领袖所操纵，这就为工会领袖左右工党内部事务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在 1993 年的年会上，史密斯提出要实行一人一票制。针对这个问题，党内以布莱尔、布朗为代表的现代派在史密斯的支持下，同以大工会领袖为主的传统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史密斯的提议以 47.5% 对 44.4% 的微弱多数票获得通过。同时还决定，工会政治基金的交纳者（即工党的集体党员）只有在成为个人党员之后才有在选区工党参加投票的资格。但是这些人在成为个人党员时，可以按折扣费（每人 3 镑）交纳党费，而标准费为 15 镑。

在这次年会上，史密斯还实现了将党领袖选举团中 3 部分的票数比例改

为各占 1/3。托尼·布莱尔就是按新的票数比例和一人一票制选出的第一位工党领袖。

同金诺克的改革所不同的是，史密斯注意拉开工党同工会间的距离。他认为工会在选民中的形象和声誉不好，同工会保持过密的关系会影响选民对工党的支持。在史密斯的领导下，工党已更加团结，更加有活力，因此才在 1994 年 5 月的地方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5 月 5 日，英国举行全国地方议会选举，结果大大出乎保守党人的预料。在改选的总共 198 个地方议会的 5,071 个议席中，保守党只赢得 888 个席位，得票率仅占 27%，控制的区议会仅为 13 个，比原先减少了 17 个；而主要反对党工党则得到 2769 席，得票率为 41%，控制的区议会增加到 89 个；就连自由民主党也远远超前，得票率为 28%，控制的区议会增加到 18 个。保守党的战绩不仅同其老对手工党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而且还被自由民主党甩到了后面，屈居第三位，这在最近 50 年中尚属首次，据此，有的媒体称保守党成了英国第三大党。保守党不仅失去了对 17 个地方议会的控制权，而且丢失了包括被保守党控制了 100 多年的伦敦南部克罗伊登区议会在内的几个很重要的根据地。在苏格兰，保守党所得议席甚至被挤到了第四位，排在工党、苏格兰民族党以及自由民主党之后。选举前，舆论界和保守党自己都认为，保守党在地方选举中肯定表现不佳，然而，损失如此之惨重却出乎人们的意料。舆论界称这是保守党地方议会选举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

可是，正当工党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史密斯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使工党失去了一位深孚重望的领袖。很多观察家都曾认为史密斯会成为英国下届首相。英国首相梅杰说：他对史密斯的突然逝世感到“极为震惊和悲痛”，“史密斯的逝世，不仅使我失去了一位强有力的对手，而且使我失去了一位我所喜爱和尊敬的人”。撒切尔夫人说，史密斯的逝世是英国的一个巨大损失。工党对史密斯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将党总部的办公大楼命名为“史密斯大楼”。

经过金诺克和史密斯两代领导人的努力，工党的形象已大为改观，团结状况也大有改善。但是如果完全走出泥潭，真正复兴，在同保守党的竞争中不再处于劣势，它必须进行脱胎换骨的全方位的改革，走向“现代化”，而金诺克和史密斯的改革距离这一目标还相差甚远。彻底改造工党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到了新领袖布莱尔的肩上，而布莱尔本人也具备担负这一任务的条件。

修改党章

布莱尔上台后，首先调整了工党的重要领导机构——全国执委会，然后便开始对工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提出建设“新工党”的口号。

建设“新工党”，最关键、最困难的一项改革就是修改党章。工党的章程写于 1917 年，于次年的代表大会上通过。其中第四条第四款集中体现了工党的宗旨。这一条款被英国媒介和政界简称为“公有制条款”或“第四条”。它成为工党实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也是工党推行国有化和福利政策的理论基础。1959 年，盖茨克尔曾提议修改该条款，由于反对派的抵制没能成功。1994 年 2 月，还在史密斯任领袖时，工党前任领袖金诺克就在一次电视讲话中敦促工党放弃党章第四条。当时史密斯担心引起党的分裂，拒绝了这

一提议，虽然史密斯从心里赞成金诺克的提议，并暗示过修改的意向。7月布莱尔当选为工党领袖后，他曾宣称将不优先考虑修改党章第四条问题，因为当时他的当务之急是巩固自己的地位。

在10月的年会上，布莱尔在打出“新工党，新英国”旗号的同时，提出了修改第四条的动议。这一举动使多数与会者为之震惊，当然也立即遭到党内左派的反对。左派首领托尼·本说：“我只想改动第四条中的一个字，就是把‘从事体力或脑力劳动的工人’这句话中的‘或’字换成‘和’字。每个人劳动时都要同时用到体力和脑力。托尼·布莱尔用他的手写作，而矿工们劳动时要用脑。”来自格拉斯哥的代表米·摩恩斯在发言中疾呼：他以“社会主义”为荣，以工党为荣，以第四条为荣。工党就是要搞“社会主义”，让我们高举鲜红的旗帜，让红旗继续在这里飘扬。

10月6日，在经过激烈辩论后，就是否修改第四条进行表决时，布莱尔的提案以41.9%对50.9%的票数被否决。不过布莱尔不但毫未气馁，反而从不太大的票数差距中看到了获胜的希望，修改党章的决心更加坚定，而且认为现在已不是能否修改的问题，而是如何修改的问题。

11月下旬，布莱尔和工党副领袖约翰·普雷斯科特起草了一份修改第四条的文件，文件中将第四条第四款改为：“本党赞成在公共利益基础上管理的强大而来源丰富的公共服务，这种服务的存在既是公正社会也是有生命力的成功经济的重要基础；本党既需要一个有社会责任感和适当控制的私有因素，也需要奠定在效率和公正基础上的公有制。”为了推动第四条的修改，赞成修改的人组成了党内派别组织“新第四条运动”。党内左派与之针锋相对，组织了“保卫第四条运动”，并于1994年12月份专门召开会议，成立了有关组织机构，向工党党员寄发了5万多份信件，声称要在1995年4月29日的特别会议上与布莱尔决战。1995年1月9日，有32名工党欧洲议会议员在修改第四条问题上公开向布莱尔挑战。左派甚至还声称：即使布莱尔达到了目的，由修改第四条而带来的后遗症将会在本世纪余下的时间里一直困扰着工党。托尼·本还指责布莱尔意在创建一个目的是只想上台执政的全新的党，“根本忽视了工会和社会主义传统”。势力强大的工党左派如此顽强地捍卫党章第四条，使英国舆论界都感到吃惊。《泰晤士报》评论道：“工党是所有政党中最保守的。”确切地说工党左派是最保守的。曾向布莱尔提出挑战的欧洲议员之一斯坦·尼文就以工党在1945年时的政绩作为自己的根据。

以布莱尔为首的现代派为修改第四条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1995年初的头6个星期内，布莱尔向3万多名党员进行了25场演讲。同时，他还利用各种机会阐明修改第四条的必要性。在接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时，他说：“工党党章中无选择地主张实行国有化是很愚蠢的。事实上，工党已不再相信它，况且10年来也未曾承诺要真正的扩大国有化。”布莱尔还把修改第

[英]《独立报》1995年1月17日。

[英]《卫报》1994年10月6日。

参见王凤鸣：《英国工党关于党章修改问题的争论》，载于《当代世纪社会主义问题》1995年第3期，第47页。

[英]《泰晤士报》1995年1月11日。

[美]《时代》周刊1995年3月27日。

四条与未来的大选直接挂起钩来，多次警告，如果工党要结束自 1979 年以来连续 4 次在大选中失败的局面，就必须放弃其已近 80 年历史，放弃实行大规模国有化的承诺。他认为，除非工党放弃其过时的意识形态，否则选民们不会把权力交给工党。第四条容易被公众错误地理解，也容易被保守党人利用。

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斗争，以布莱尔提出的内容为基础的新条款在 1995 年 4 月 29 日召开的全党特别代表大会上终于被通过，以布莱尔为首的工党现代派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一胜利不仅巩固了布莱尔的领袖地位，提高了他的威信，而且改变了党的形象，使工党更易于吸引中间阶级选民，尤其是企业主阶层。党章修改的成功还是工党内左右派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重要标志。在对待修改党章问题上，党内除了主张修改的现代派和极力反对修改的强硬左派外，还存在大量的、摇摆不定的温和派。他们有的对修改第四条持冷漠态度，觉着这是无聊的行为，甚至认为争论这个问题会分散党的注意力。还有一些朴素的对党忠心耿耿的党员，他们需要知道为什么而奋斗，如果取消了第四条，取而代之的将是什么。还有一部分人虽然也主张修改第四条，但新条款中应该承认充分就业、公有制的作用和累进税，继续保留工会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就是在坚决反对修改第四条的人当中也有区别：一部分人属顽固分子，把第四条看成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教条；另一部分只是对布莱尔等党的领导人有成见，想通过保卫第四条来给布莱尔制造麻烦。布莱尔在斗争中注意争取温和派，做出必要的妥协，同时分化反对派，终于使两派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转化。

布莱尔在取得修改党章的胜利后，并未陷于盲目乐观之中。他在 1995 年 4 月 29 日工党特别会议上说：“变革和现代化并不止于今天下午 4 点，它将继续下去，不管是在党的发展，还是在政策演变上都是如此。”

刷新政策

党章修改成功后，布莱尔更加大胆地修改党的政策。他在多处场合都表示，未来的工党政府将不改变现保守党政府所推行的政策，工党政府不再实行它以往所实行的诸如国有化、扩大福利等措施。1996 年 7 月 4 日，工党发表了它的题为“新工党，英国新生活”的政策声明，描绘了它未来执政时治理英国的宏大方案。这个文献除了体制改革方面的内容外，在内政上同保守党的纲领政策没有多大区别。据此，舆论界评论道，工党正在偷走保守党的衣服。保守党以不受理论教条的束缚、政策灵活多变为一大特征，它经常“拿”过其他政党行之有效的政策，以吸引选民，以达到一门心思执政的目的。50 年代初开始的“共识政治”，就是保守党“拿”过工党政策的典型例子。保守党人自己颇为自豪地宣称：“保守党人不在乎趁着对手洗澡的时候穿走他的衣服。”工党经过几十年的磨难，终于学会了保守党的这一手。

与企业主联姻

布莱尔在改革工党的纲领政策的同时，还在组织和社会关系上进行了大幅度的革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拉大同工会的距离，同时向中产阶级靠拢。布莱尔上台后，继承了史密斯对工会的政策，继续削弱工会在工党中所拥有的权力和影响。通过一系列决议，工党已将工会在党的年会上所拥有的代表

委托书数量从 90% 降至 50%。布莱尔的目标是在大力发展个人党员的基础上结束工会集体参与工党事务的状态，将工党建设成直接由党的领袖控制的中央集权领导体制的党。布莱尔还一再表示，未来的工党政府将不会像过去那样关照工会的利益。而与此同时，布莱尔却利用各种机会与企业主靠近。1995 年 11 月中旬，在伯明翰举行了“英国企业家联盟”的年会，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和保守党副首相迈克尔·赫塞尔廷都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与会的代表们虽然给双方的讲话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可是，给布莱尔的却比给赫塞尔廷的时间长出达 15 秒钟，而赫氏一向被看成是深受企业主们欢迎的政治家，因为他在任贸工大臣时政绩斐然，给企业主们创造了很多机会。更有甚者，英国一家大糖业公司（泰特—莱尔公司）竟于 95 年 10 月 9 日决定向工党捐款 7,500 英镑，而同时却将给保守党的资助由 25,000 镑减为 15,000 镑。企业给工党捐款，这是破天荒的事情，尽管上述那家公司给工党的资助还十分有限，但这却是一个由无到有的质的变化。联系到工党纲领政策的变化，使人感到它原有的红色变得模糊起来，工党在企业主们心目中的形象改变了，使他们觉得未来的工党政府不再会向从前那样侵害他们的利益了，甚至会比政绩不佳、欧洲怀疑派占主导地位的保守党更能保护他们的利益。据一个名为管理协会的组织于 95 年 11 月 15 日公布的一份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查显示：在被调查者中只有 42% 的人表示要在下次大选中投保守党的票，而在 1992 年大选时，这个比例为 60%；相比之下，有 32% 的人表示要支持工党，而 1992 年却只有 12%。虽然在这一群体中，支持保守党的人仍比支持工党的多，但上述数字的变化却很能说明问题。有人说保守党正在失去它的“天然老板们的政党”这一头衔。托尼·布莱尔本人也曾在公开场合向企业主们声称工党已经是实业界的政党了。

吸纳新党员

布莱尔改革工党的另一重要举措是扩大个人党员队伍，大批招募新党员。这一举措的寓意是要促进工党摆脱工会作为工党集体党员的作用和影响。工党个人党员的成份是很复杂的，从社会经济特征看，在工党个人党员队伍中明显地存在着两部分人，一部分是相对贫穷、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另一部分是相对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这两部分党员分别成为工党内部左右派的组织基础。1994 年 7 月，布莱尔任领袖时，工党个人党员数仅为 25 万多，1995 年 10 月年会前，布莱尔在他的议会下办公室里亲自为工党的第 35 万名党员发了党员卡。到 1996 年 7 月，工党全国执委会制定出新的政策声明时，工党的个人党员已达 40 万，接近保守党的党员队伍（保守党 1995 年时有 50 万党员）。也就是说，现在工党有 1/3 的个人党员是布莱尔上台后入党的。虽然不能肯定这些新党员都属中间阶层，但是中间阶层出身的党员日益增多将是一个发展趋势。工党的一个积极分子曾报怨道：“许多讨厌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人正不断加入到工党中来。”工党的党员队伍正在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布莱尔还加强了党的纪律。在一项新通过的纪律准则中规定：如果工党

[英]《经济学家》杂志，1995 年 11 月 18—24 日。

约翰·任托尔：《托尼·布莱尔》，第 426 页。

的议员们使党的名誉受到了损害，党的领袖有权把他们开除出党。

经过布莱尔两年多的努力，工党已革心换面，从一个意识形态色彩较强的政党变成了以上台执政为主要目标的纯议会政党。工党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

集中权力

然而，布莱尔并未就此罢休，为了确保工党能成为一个可以完全与保守党平分秋色的政党，并在执政后能使党的政策得到贯彻执行，不再陷入过去那种在工党执政时抵制党的政策的力量主要来自于党内的误区，布莱尔还要进一步对工党进行改革，使工党更加“现代化”。

据1月12日的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布莱尔最后一个阶段的改革计划是针对工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即年会的，其主要内容有：提高年会的工作效率，将年会作出决策的时间由目前的5天减为2天；削弱年会的权力，取消年会对于工党政府的表现作出评判的资格，年会将不再讨论重大的政策问题，而是对两三个问题作深入的探讨，并为政府提出长远选择方案；邀请政府外面的专家，诸如企业界和学者，其中包括不支持工党的人给年会代表们做报告，以表明工党同现实世界保持着紧密联系，同时听取各种不同的声音；为了防止工党内部因经济政策而发生争吵，进而影响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内阁大臣在向年会代表们做情况介绍时要在没有新闻媒介参加的非正式的秘密会议上进行，而且只做简要介绍；成立政策讨论会，负责研究讨论党的政策，将目前年会在制定政策上的一些权力转交给这个讨论会。

这个改革方案的主要意图是削弱工党年会的权力，使党的权力更加集中，以防止将来工党上台后党的其他机构对内阁和首相有过多的干预和制约。不过这些措施一提出就遭到了左翼的愤怒和反对。因为从党内民主角度讲，这些改革是民主的倒退。来自东布伦特的议员肯·利文斯通攻击布莱尔是要把所有的权力集于一身。有人说政策讨论会是个“清谈馆”。还有人指责布莱尔是要对工党实行“斯大林式”的控制。不过从历史上看，布莱尔的这些改革措施对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有益的。有人称这个改革方案是“执政党计划”。

十二、与保守党的决战

随着大选来临，工党和保守党都开始为大选做准备工作。1995 年底，保守党和工党都提出了自己的税收政策，向选民们许诺要大幅度减税。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在向选民讨好，意在大选。就此，英国两大党都拉开了竞选的序幕。同时，“当了 18 年反对党的工党能否上台执政？保守党能否实现五连冠的宏愿？”就成了一个热门话题。

与对手的力量对比

英国是个典型的两党制国家，在正常情况下，都是一党单独执政，而且具备执政条件和能力的政党只有两个。所以，英国的大选基本上就是保守党和工党的擂台赛，谁胜谁负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比，而不是某个政党自身是否比以前有进步。具体讲，决定比赛胜负的主要因素是：双方的纲领和政策、政党和领袖的形象、党的组织力量、竞选战略和策略、以及政党制度的作用。

工党虽然经过三代领导人的改革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但保守党有其固有的优势。在英国经济陷入困境，英国成为“欧洲病夫”的情况下，保守党的撒切尔主义挽救了英国，使英国在 80 年代振兴了一下子，于是选民以让保守党“四连冠”作为回报。到了 90 年代，虽然撒切尔主义不像以前那么灵验了，但还是有效的。英国经济在经历了 90 年代初的危机后，先于西欧其他国家走出低谷，而且一直保持较好的势头，主要经济指标都好于欧盟其他大国。从 1992 年起的 5 年来，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 2.8% 的水平；失业人数已下降到 200 万以下，失业率为 7.6%，低于欧盟主要成员国的水平；通货膨胀率为 2.8%，虽然未能降到保守党政府力争达到的 2.5% 的水平，但大大低于欧盟其他成员国；职工的实得工资正在以 80 年代繁荣时期以来最快的速度增加；房屋价格正在上扬。据此，经济学家们认为，目前英国的经济正处于“低通胀的稳步增长阶段”。国际盖洛普公司于 1996 年底在全球范围内所作的一项调查报告称，英国是欧盟国家中经济前景“最为乐观”、竞争力最强的国家。经济形势较好，无疑在大选时对执政党有利，而保守党领袖梅杰也正是把大选获胜的希望放在了经济上了，1992 年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所采取的战略就是突出经济问题。梅杰说：“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哪一届政府在即将参加大选的时候经济状况有现在这么好过，未来的前景也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好过。”他还说：“这样的记录，以及我们借助这样的记录能为英国国民做些什么？我们正是要把这些东西作为我们在大选中的吸引力的基础。”英国《卫报》评论道：“假如健康的经济永远能使一个政党在大选中获胜的话，那么保守党现在已经取得了一半的成功，而不是像民意测验表明的那样毫无希望地落在后面。”

但是，保守党在选民中的威信几年来一直不如工党，从力量对比来看，工党还是占有明显的优势。

从 1993 年起，梅杰政府不仅内部丑闻迭出，而且在内政的其他方面和外交上都不成功，从而在选民中的威信不断下降。从 1994 年初开始，保守党几乎在所有的选举活动（包括地方议会选举、欧洲议会选举、国会补缺选举）中都惨遭失败，而且有时候成绩比自由民主党等小党还差。这些选举活动虽然不能直接影响保守党的执政地位，但却表明了选民们对执政党的态度和评

价。1996年5月的地方选举，保守党只得到27%的选票，比工党的43%相差甚远。一些观察家对此评论道，如果按这个得票率，在大选中，保守党只能得到120个左右议席，工党会得到绝对多数席位，而且会比反对党多出200席。工党副领袖普雷斯科特说：这次地方议会选举的结果表明现政府和梅杰首相不称职。近几年的各种民意测验也显示，保守党的得分率远远低于工党。

政绩不佳、威信下降使得保守党逐渐失去实业界和新闻界的支持，而这两支力量一向被看作是保守党的两大支柱。实业界的资助是保守党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可是这种支持到了90年代逐渐减弱，以至于1994年保守党出现1600万英镑的赤字。据1994年的一次统计，中产阶级对工党的支持率比保守党高14个百分点，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自1990年以来，新闻界一直对保守党持批评态度，有时比工党的前座议员的批评还激烈。来自新闻界的如此持久而激烈的批评态度，对保守党来说，在本世纪还没有过。

保守党失去传统支持力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内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危机。近几年来，保守党内离心倾向严重，叛党现象时有发生，派别活动加剧，领袖地位不稳。以党内右翼为主体的“欧洲怀疑派”常常同梅杰唱对台戏，甚至向梅杰发出挑战。1994年11月，有8名“欧洲怀疑派”议员在议会中违背梅杰的意志，并无视梅杰的事先警告，在投票时不同梅杰保持一致，引起一阵轩然大波。最为严重的是，党内的各种反对派经常表示出对梅杰的不信任，不断刮起“倒梅”风，终于导致1995年7月梅杰不堪忍受党内反对派的攻击，愤而辞职。

这次梅杰辞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以退为进，英明果断。他在随后的领袖选举中击败竞争对手，重新当选为党的领袖。这为巩固他的地位、恢复党的团结提供了转机。梅杰借此机会改组内阁，加强自己的力量；同时选举结果本身也表明党内目前还找不出可以取代梅杰的人来，全党不得不服从梅杰的领导，团结在梅杰的周围，正如梅杰辞职时所说的那样，让反对派都闭上他们的嘴。这之后，党内反对派对梅杰的挑战的确有所收敛。

梅杰重任领袖后，保守党和他本人的状况有所好转。1995年的年会开得比较成功，给人一种团结一致的印象。年会过后，一些观察家们认为，保守党已停止了退却，再加上英国的经济形势比较好，所以保守党在选民中的支持率有所回升。1996年5月的地方议会选举，保守党虽败，但得到的选票比去年增加了3个百分点，而工党则相应地减少了3个百分点。1996年的年会，保守党开得也很成功。特别是在党内享有很高威望和影响力的撒切尔夫人公开站出来为梅杰助威，号召全党放弃从前的分歧，为了迎接即将来临的大选，团结在领袖梅杰的周围。年会过后，保守党内的战略家认为，撒切尔夫人对梅杰的认可和对他是很大的鼓舞。撒切尔夫人后来又对保守党内的活跃分子说，由梅杰领导、国家万无一失。在撒切尔夫人的带动下，许多原先与梅杰有分歧的内阁大臣也都表示要在争取赢得大选的目标下团结起来，与领袖保持一致。

保守党在经历了几年的内乱后，终于在“赢得大选”这个大目标下团结起来了。这无疑给那些保守党的坚定支持者增强了信心，动摇了那些准备背离保守党而投向工党者的决心，同时也使下次大选的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使工党更加感到有危机感，因为对工党来说，这次大选

的胜败关系更大。

1996年7月4日，工党发表了它的题为“新工党，英国新生活”的政策声明，描绘了它未来执政时治理英国的宏大方案。这个政纲的标题“新工党，英国新生活”已表现出了它的立意有别于以往的政纲。从内容上着，新政纲确实比过去的政纲有了许多新的语言。现将该政纲的主要点与工党1983年和1992年的政纲做一简单比较。1983年政纲是党内左派占统治地位时制定的，1992年政纲是史密斯任领袖时制定的，这时工党已开始向中右方向转变。

在经济政策上，1983年政纲提出要创建经济和工业计划部，实行外汇和进口控制，建立一个有权力的价格委员会来降低物价；1992年政纲提出建立国家投资银行和地区发展署；1996年政纲则提出扩大英格兰银行的独立性，严格限制政府借贷，给长期失业者发放补助金。在社会保障政策上，1983和1992年政纲都提出要大幅度增加给儿童的津贴，并且使之与各方面收入的增长同步；1996年政纲虽提出保留给儿童的津贴，但不保障其价值和水平，在这方面要走公私合作的道路。在防卫政策上，1983年政纲提出取消三叉戟导弹的配置，单方面裁军，拒绝布置美国的巡航导弹；1992年政纲提出保留三叉戟导弹，结束核试验，停止扩军；1996年政纲提出保留三叉戟导弹，支持北约。在欧洲问题上，1983年政纲提出要在工党政府第一任期内撤出欧共体；1992年政纲提出参加社会宪章，将扩大欧盟放在优先位置上；1996年政纲则提出在欧洲发挥领导作用，签署社会宪章。

同工党以往的政纲比较起来，新政纲确实有很多新语言、新内容，然而若同保守党的政纲比较起来，则显得不新鲜了，工党提出的所谓新政策基本都是保守党已推行的政策的翻版，除了个别细节外，没有多大差别。所以有些观察家说，若只从政纲上看，已分不出保守党和工党哪个是“左”翼哪个是“右”翼了。

保守党能在英国政坛称雄数百年，老而不衰，其中最大的一个奥秘就是它轻视意识形态和思想理论，它可以摆脱任何理论教条的羁绊，一门心思地去实现执掌政权的目的。因此，它在政策上显示出了很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一点也不“保守”。只要某项政策能得到选民的拥护，能争取到选票，能有利于它上台执政或巩固执政地位，不管这项政策是出自何党何人之手，它都会把这项政策拿过来为己所用。现在，舆论界评论道，工党正在拿过保守党的政策。早在1995年初，约翰·任托尔就发表文章探究布莱尔的思想根源，说布莱尔“正在学克林顿，偷撒切尔”，意思是布莱尔正在从自由主义的美国民主党和撒切尔的新保守主义那里吸取营养。难怪撒切尔夫人在1996年的保守党年会上鼓动选民说“不要接受二流的东西”！

就纲领政策和竞选战略来讲，工党并不比保守党有多大优势，甚至还有一定的劣势。就组织力量来看，可以说双方是势均力敌，工党略占优势。在竞选中，各个党的党员队伍是一支中坚力量，它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宣传党的政策、动员选民投本党的票。工党经过布莱尔几年的努力，已使个人党员队伍扩大到40万，而且年龄结构比较合理，年轻人较多；保守党有近50万党员，从数字上优于工党，但年龄结构不合理，老年人偏多。此外工党还有300万集体党员（主要是工会会员），虽然近几年，工党拉开了同工会的距离，

见英国《经济学家》杂志，1996年7月6日第53—54页。

英国《独立报》1995年1月18日。

削弱了工会在工党事务中的权力，但从感情上讲，多数工会是倾向工党的。

就政党和领袖的形象来看，工党虽有优势，但不很突出。布莱尔与梅杰比较起来，布莱尔虽显得更精明强干、有魄力、口才好，但梅杰忠厚实在的形象也能吸引不少选民，1992年大选他就得益于此。布莱尔曾嘲讽梅杰：“他是在跟随他的党，而我是在领导我的党。”但自1995年重任领袖后，梅杰在党内的处境已大为好转。经过几年的改革，工党虽已改变了形象，充满活力，但它从前内争不已、保守僵化，选民们仍记忆犹新，撒切尔夫人攻击工党接过保守党的政策是在“演戏”，保守党喊出了“新工党，新危险”的口号。

工党自1979年下台以来，就一直与政权无缘，长期的在野历史已使工党上上下下都憋足了劲要在1997年来个大翻身，它无时无刻不再为大选做准备工作，积蓄力量、谋划选举战略和策略；但保守党毕竟也在临近大选前团结起来了。

在这次大选中，对工党最为有利的一个因素就两党制的作用。两党制经过300多年的发展、运作，已深深扎根在英国的政治结构和公众的思想观念中，两党轮流执政已被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有人称英国议会是一个动荡的摆，英国的民主制就是依靠“摆的伟大法则”来运转的。有人将从1868到1979年间英国议会左右两边的席位数做了统计，惊人地发现，以保守党为一方，以自由党、工党及其盟友为另一方的席位总数几乎相等。英国的政治之摆几乎是不偏不倚地摆动着。保守党已连续执政18年，一个党连续执政这么长时间在近150年来还是首次，选民对保守党人的面孔已经实在是太厌倦了，单凭这一条就已构成了改朝换代的理由，英国两党轮流执政这一“摆的伟大法则”不能轻易被破坏。笔者曾调查过许多英国人对这次大选的看法，很多无党派倾向的人都认为工党会赢，其理由非常简单，就是保守党执政时间太长了，“该换一换政府了”，否则英国的议会民主就完蛋了。若说工党上台后能比保守党好多少，这些人也道不出个所以然来。英国的两大党都有较稳定的选民队伍，而且旗鼓相当，大约各占选民总数的1/3，其余为自由民主党和其他小党的选民和不稳定选民。不稳定选民的倾向主要是受两党的政策、党和领袖的形象、党的竞选工作和上述摆的法则的影响。由此看来，保守党在这次大选中早就输定了，尽管它在大选前实现了团结，尤其是又存在“经济继续增长，通货膨胀保持低水平，房价在上涨，消费者口袋里的钱增多了，失业率下降了”这些对执政党有利的因素。保守党所能力争的就是输得更体面一些。

保守党可打的几张牌

保守党在大选前一直打的一张牌是，他们认为选民们在大选中对保守党比较偏爱。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地方选举和民意测验中，选民乐意把选票投给工党，以表示对保守党的不满，或者觉得工党善于管理地方政府；但是到了大选时又把选票投给保守党，因为保守党善于管理中央政权。80年代以来的3次大选（1983、1987、1992）都是这样。然而，情况并不像保守党人所想的那样乐观。据1996年9月份《每日电讯报》所载的一次盖洛

参见安东尼·桑普森：《最新英国剖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1—42页。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1996年9月28日，第19页。

普民意测验显示，工党领先 33 点。有的观察家认为，尽管工党在民意测验中的领先程度在 1995 年保守党领袖重选后有所下降，但保守党力量的恢复犹如冰河运动般缓慢，无论如何是不可能 97 年大选时赶上工党的。96 年 9 月 20—23 日的《泰晤士报》对近 4 次大选前的莫里民意测验结果进行了统计：1981 年（大选前 1 年多时间），保守党领先 11 点；1986 年落后 2 点；1991 年领先 2 点；而 1996 年落后 23 点。这样大的差距，保守党要想在几个月时间内将之抹平，是难以想象的。

大选前保守党可借以为自己打气的另一张重要的牌是，他们自己声称，很多迹象表明，许多口头上说要投工党的票的人正在改变他们的主意。事实也不容保守党人乐观。1996 年 5 月份的一次莫里民意测验显示，工党的支持者中有 67% 非常强烈地坚持他们的立场，而保守党方面只有 57%。莫里公司的鲍勃·华塞斯特说：“保守党正陷入深深的困境之中。”

英国的民意测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意，同时也体现出了新闻媒介的倾向，这种倾向又会进一步强化早已存在的民意倾向。新闻媒介倾向的形成同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力量对比有关，但也同“摆的法则”的作用有关。在英国，有一种说法，政府同公众，包括新闻舆论有一个“蜜月期”。这也形象地体现了“摆的法则”。政府和执政党不可能永久地取得“新娘”的欢心，它表现得再好一些，“蜜月期”就长一些，否则就短一些。所以，梅杰不应该抱怨，为什么英国经济形势好转了，公众还不说他好。

从保守党内反对派对领袖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在保守党内，对赢得大选胜利早已信心不足。1996 年 5 月地方选举前，一些观察家就预测保守党会在选举中大败，并且这会促使梅杰下台，现任副领袖赫赛尔廷将接替梅杰。但赫氏很快就出来制止这种传言。5 月 1 日，赫氏在托利改革集团（保守党内中右性质的派别组织）的集会上发表讲话，宣称“大胆而勇敢”的梅杰有能力领导保守党获得下次大选的胜利，我们应帮助他实现这一点。梅杰本人也说，他会让位给赫氏是一种幻想。众所周知，赫氏在保守党内属左翼代表，且较有威望，他早有抢夺领袖宝座之心，曾经同撒切尔夫人及梅杰多次竞争过领袖职位。而现在他不愿向梅杰挑战，是因为他明白即使他当上了领袖，也难逃在下次大选中失败的恶运。

大选前，就连很多保守党议员也认为保守党将在下届大选中失败。1996 年 4 月 11 日的补缺选举（保守党失败）过后，《星期日泰晤士报》对 100 名保守党后座议员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2/3 的人认为自己的党将不会在下次大选中取胜，1/3 的人预言工党领袖布莱尔将成为下一任英国首相。从 1996 年下半年起，保守党政府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很多观察家认为，英国随时有举行大选的可能性，因为这时保守党在议会中只有一席多数，如果保守党议员中再有一人死去或叛党，保守党就会失去议会中多数席位党的地位，梅杰就可能被迫提前宣布举行大选。而主要反对党工党不会放弃任何可使自己提前上台执政的机会，正如布莱尔对 BBC 记者所说的：“当然，如果推翻政府的机会来了，那么它就不会仅仅是个机会，而是我们作为反对党去努力推翻他们的一种义务。”他在与克林顿总统会谈时也表示，他将抓住在议会举行信任投票的机会，加速举行大选。

与梅杰针锋相对

1996年底，为了越来越逼近的大选，保守党领袖梅杰在新年之际向选民做出了一系列承诺，而工党与之针锋相对，逐一对之进行驳斥。在税收问题上，梅杰承诺：在1997年要把基本税率从33%降到23%。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要将税率降到20%，工党作出了支出300亿英镑的承诺，但是没有说，这笔钱将来自何处。”工党反驳道：自从1992年以来，直接税和其他税收一起呈上升趋势。而工党的目标是争取起点税率为15%或10%，关于300亿英镑承诺的说法是保守党的谎言。工党所作的所有承诺是完全能承担得起的。事实是，保守党政府既没有自己吹得那么好，也没有工党说得那么遭。几年来，它把收入税的基本税率降低了10%到23%，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它又把附加增值的税率增加了一倍，从8%增加到了17.5%，而且把附加增值的范围扩大到电力和天然气领域，同时对保险费和航空业又增加了新的税收，还对公司汽车征重税和对银行征收暴利税。

在价格问题上，梅杰许诺说：“我们将严格控制通货膨胀，工党没有提出控制价格的计划，而且也没有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工党反驳道：“我们一旦执政，将提出降低通货膨胀率 and 使之保持稳定的计划，在保守党执政期间，英国的通货膨胀率按国际标准来看仍然算是高的。”实际情况是：英国当时的通货膨胀率为2.7%，大体比德国和法国高出一倍。在撒切尔夫人下台以前，1990年英国的通货膨胀率曾一度上升到9.5%，到1993年时，由于经济极度衰退，通货膨胀率曾下降到1.6%，后来又再度上升。

关于住房抵押问题，梅杰说：“通过降低利率和通货膨胀率，我们将确保人们完全能够偿付得起住房的款项（住房款是住房拥有者每月最大的一笔开支）。不能相信工党能保护人民的抵押权。”工党说：“在梅杰的领导下，利率高达15%，住房市场崩溃，住房成为负资产并达到了创记录的水平，而且许多住房被收回。而这些都是工党上台后计划要解决的问题。实际情况是，在90年代初，英国负资产住房拥有者的人数上升到了创记录水平，达到了1.7%，许多人由于住房被收回而失去了住房。1996年9月时，抵押率降到了30年来的最低点，为6.45%，后来又开始上升。”

关于失业问题，梅杰说：“我们将继续帮助各企业创造就业机会，特别是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工党实行最低限度工资和社会宪章只会破坏就业机会。”工党驳斥道：现在的失业比1979年又多了100万，而且大部分新工种都是低工资和不保险的。工党将建立一个由雇主和工会参加的低工资委员会，以确保最低限度的工资是现实的。事实是：在保守党的领导下，1986年的失业人数达310万，后来开始下降，1993年降为290万，到1996年11月降到190万，到该年底时失业率为7.7%，几乎是保守党1979年从工党手中接过政权时的两倍（1979年时失业率是4%），但大大低于欧盟中的大多数国家，不过比日本和美国高得多。

关于欧洲问题，梅杰许诺：“我们将为一个在全球具有竞争性的国家组成的欧洲而不是一个联邦欧洲而奋斗。工党将破坏我们对那些有损于我们国家利益的政策说‘不’的权利。”工党反驳道：梅杰由于领导不力和渐渐采取欧洲怀疑主义立场而使英国与欧洲疏远。工党将不会放弃在一些涉及到根本利益问题上投否决票。实际情况是，梅杰通过谈判决定不参加货币联盟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社会宪章。在所有欧盟成员国中，英国在执行单一市场

和遵守欧盟的贸易规定方面的记录是最好的。

谋划竞选策略

在西方议会政治中，特别是在大选时，政党领袖的形象所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随着电视等现代新闻媒体使用，英式大选愈来愈具有美式大选的特征，所以在竞选时，各党都特别注意塑造领袖的个人形象。1996年圣诞节时，在距大选还有4个多月的时候，曾两次帮助克林顿竞选总统成功的美国竞选专家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专程来到伦敦会见了布莱尔，为布莱尔的竞选出谋划策。他向布莱尔提出了5点建议，其中多数都是如何塑造个人的形象：要充分发挥夫人的作用，但是要使她表现得像一位热爱家庭、喜欢烹饪的贤妻良母，而不是一位有政治野心的律师；让孩子参加进来，发挥他们的作用，不过布莱尔不太情愿利用他的三个孩子帮助他竞选，尽管几个月前他同意报纸登了他的全家福照片；在公开场合要多带感情色彩，使自己显得更为脆弱，有同情心和人情味，要多提他过去所受过的苦难，如童年时父亲中风给他带来的痛苦；多到电视台同节目主持人聊天，谈一些有关足球、音乐等老百姓热心的问题，尽可能不接受关于政治问题的令人厌烦的采访；利用一切机会攻击保守党人，把他们描绘成极端右翼分子，让选民相信，如果保守党继续执政，就意味着社会福利和医疗保健开支的大幅度削减。

迎得报界的大力支持

1997年3月17日，梅杰宣布了大选日期——5月1日。与此同时，梅杰向媒介表示，保守党一定能赢得大选。可是，对保守党和工党都有了解的人明白，梅杰这只不过在做出一种姿态，因为作为一个执政党的领袖，不可能不战就降。在此之前，3月16日，民意测验结果还是工党领先25个百分点，在短短的40多天内，保守党几乎不可能根本扭转局面。也许是报界有意不给梅杰面子，就在宣布大选日的第二天，英国的几乎所有全国性大报，包括《太阳报》、《泰晤士报》、《卫报》、《独立报》、《金融时报》和《每日电讯报》，都发表文章和评论，表示支持布莱尔。这无疑是对梅杰的当头一棒。报界出现这样在大选中一边倒的现象在历史上是很罕见的，而且许多大报在平常都是支持保守党的。

这次报界对保守党的“倒戈”，其始作俑者乃是曾在1992年大选中为梅杰摇旗呐喊过的《太阳报》。该报在这一天的头版发表了以《太阳报支持布莱尔》为标题的文章，称：“梅杰是个正人君子，他已尽了最大努力。”但是保守党内部的腐败和严重内讧已使其不击自溃；保守党需要休息，因为它实在是太累了。文章还说，目前英国需要的是一个能激发人们创造力，而且具有远见、决心和胆识的领导人；人们寄希望于布莱尔。

《太阳报》是英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它在竞选活动刚开始时就来了个

英国大选是因为是以政党在议会中的议席数定胜负，政党领袖在本党获胜后自然成为内阁首相，所以实际上是政党之间的竞争，领袖个人的作用相对不太重要；而美国的大选是以总统候选人所获得的选举人票数定胜负，当选总统所在的党就自然成为执政党，所以总统候选人个人在大选中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大。

—作者注

180 度的大转弯，给梅杰以致命一击，无疑会在精神上给保守党以重创。有消息说，该报早在 4 个星期之前就得到了报业大王默多克的授意。17 日下午 4 时，该报总编图尔特·希金斯把报社的副总编和版面主编们召到他的办公室，通报说：18 日本报将发表支持布莱尔的文章。并说，梅杰已不值得我们支持。《太阳报》的举动引起了许多读者和编者的不满，他们认为，虽然“我们历来认为梅杰能力较弱，在有些问题上也倾向于工党的观点。但是公开站出来支持布莱尔，是违背《太阳报》的一贯立场的”。他们还表示，对《太阳报》“迷上了龇牙咧嘴的布莱尔”这一举动“感到羞愧”。

布莱尔让报业大王默多克“迷上”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他们的初次见面是在 1994 年 9 月，即布莱尔刚当选上工党领袖不久。尽管默多克似乎本能地憎恨工党的社会主义色彩，却又嫌执政的梅杰感情脆弱、优柔寡断，但他为布莱尔的能言善辩、革新进取的形象所吸引。于是两人后来有了多次交往。1995 年夏，布莱尔应邀出席了由默多克的亲信在澳大利亚主持召开的一次国际研讨会，并在那次会议上发表了深受默多克喜欢的演讲。布莱尔为这篇演讲花了不少精力，可谓是精心炮制。他的最初目标是，使默多克所控制的舆论传媒不再对工党像原来那么仇视。于是，布莱尔在那篇演讲中用了大量篇幅大谈工党倾向于搞市场经济，以至于当时有人评论说，这篇演讲简直就是撒切尔夫人的信徒做的。这篇演讲达到了预期效果，给默多克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引起了工党左翼的不满。从那以后，默多克又多次与布莱尔接触，并对布莱尔越来越喜欢。媒介评论默多克此举指出：“默多克摒弃梅杰这一惊人的举动显然着眼于他的报业。”这位世界上最具实力的报业大王正在与英国未来的首相“联姻”。而这种联姻，使今年大选的竞选活动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

一帆风顺

4 月 3 日，工党公布了它的竞选宣言。媒介评论这个竞选宣言是平淡的、过于谨慎的，没有过多的承诺，更像是执政党的竞选宣言。在公布这个宣言之前，布莱尔在 BBC 的“今日”节目中说：“我们不做国家财政负担不起的承诺。”好像连续执政了 18 年的是工党，而不是保守党。倒是保守党的竞选宣言向选民做出了很多诱人的许诺。工党的竞选口号是：“英国理应更好。”与保守党的“使人们拥有他所没有的东西”比起来，倒是后者更有激进的味道。不过，竞选宣言对竞选过程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工党几乎是一帆风顺，在每周的民意测验中都是遥遥领先，除一次外，都领先保守党两位数。虽然 4 月 23 日《卫报》公布的民意测验，显示工党只领先保守党 5 个百分点，据此有人预测，保守党有可能在大选中战胜工党，并声称保守党是“迎合英国人心的”，从而给竞选增添了一点惊险气氛；但工党的支持率并未下降多少，受保守党冲击的主要是自由民主党，而且不久，4 月 26 日，《星期日镜报》公布的民意测验结果是：工党得票比保守党又多出 24 个百分点。更有甚者，在英国最畅销的《世界新闻报》在这一天公开宣布支持布莱尔，并称布莱尔是“新世纪的领袖”，这无疑给处境已十分困难的保守党雪上加霜，连保守党的高层领导都承认败局已定。

十三、新首相与“新工党”的执政前途

随着工党在大选中获胜消息的传出，布莱尔就成了一颗举世瞩目的耀眼的政治新星。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关心他和他的党的执政前途，他能领导工党政府创造辉煌的业绩吗？他能连任吗？工党能得几连冠？

非常幸运的政治家

布莱尔在领导工党赢得大选胜利，结束 18 年在野生涯，破灭保守党的“五连冠”梦的同时，就在英国政治生活中创造了两个第一：他是英国近 180 年来最年轻的首相；工党在这次大选中取得了本世纪历次大选中所有政党的最好成绩。这后一个“第一”对执政党来说非常有意义，这意味着执政党可以完全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可以放心大胆地推行自己的既定纲领政策，用不着顾忌反对党的态度和反应，只要执政党团结一致。拥有下院 3/5 还多的席位，这是一个太有利的条件了，布莱尔真是个幸运的首相！他的通往权力的道路充满了幸运。他很幸运地在工党正陷入泥潭之时加入了工党；他很幸运地在求职过程中认识了亚历山大·欧文，并通过他结识了约翰·史密斯；他很幸运地在争取议员席位的过程中得到了“著名的五人”的支持；他很幸运地受到金诺克的宠爱；他很幸运地由于史密斯的突然去世而没有为领袖职位等待太久；他很幸运，在竞争领袖过程中，布朗主动退出竞争并全力支持他；他很幸运，在工党上下都觉醒了，认识到必须对党进行改造之时当上了党的领袖；他很幸运，保守党这几年表现不佳……当上首相之后，布莱尔还会这样幸运吗？

工党的政治定位

布莱尔非常赞赏撒切尔夫人的所作所为，希望自己能像她那样使英国再振兴一下子，并使自己的党也来个几连冠。他能否实现自己的宏愿，人们还不敢做出乐观的预言，因为工党现在看起来虽然比较有力量，但它有其先天难以克服的弱点，这些弱点制约了工党的发展和作为。最首要的一个弱点就是它的政治定位，在这一点上，它处于两难的境地。

英国工党是工会创建的党，是工人运动的产物。对工党的阶级基础和性质，学术界一直有争议，有人坚持列宁的说法，说它是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也有人认为它是改良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考查工党的阶级基础和性质，必须把它放到英国社会、政治现实环境中去，必须同其竞争对手——保守党加以比较，还要同时代及工党自身的变化联系起来。在工党走向“现代化”之前，同保守党比较起来，在如下几个能够反映党的阶级基础的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首先是党的起源。党的起源和历史是反映该党阶级基础的一个重要方面。毫无疑问，工党是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英国工人运动的产物，是工会和一些社会主义组织缔造了它。它产生后便成了英国工会和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致力于社会改良运动。而保守党则起源于英国议会中的一个派别，是议会中激进与保守两派斗争的产物。在保守党的前身——托利党形成时（17 世纪 80 年代），它是代表当时的保守势力——土地贵族的利益，而它的竞争对

手——辉格党则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资本主义有了较大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而土地贵族的力量变得相对弱小。这时，议会必然地越来越关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作为议会两党中的一党——托利—保守党也必然要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资产阶级，向资产阶级靠拢，否则它就无法在议会中立足，更不可能在议会斗争中战胜对手。一直到90年代，有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保守党人同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及一些财团有着密切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是非正式的；相比之下，工党则同工会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工会无疑是工人的群众性组织，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

其次是党员队伍。党员队伍的构成更能体现党的阶级基础。保、工两党党员队伍的构成特点有个明显的对照。对两党来说，议会中的党员都是党员队伍中最重要的部分，特别是后座议员。从历史传统看，议会中的保守党人多数来自于英国社会的中上等级。因此，他们本来就是有地位、有权势的人，议员的身份并没有使他们的地位和权势有所改善。他们普遍地有着高贵的出身、良好的教育，并被人们所注意。而工党人士，虽然也不乏有和保守党人同样出身的人，但绝大多数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工党议员都出身卑微。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经过努力使自己成了名流，而且有的人还养成了在工会运动中发号司令的习惯，但这不是主流，也不具有典型性。直到本世纪70年代中叶，在衡量、比较两党个人党员的差别时，上述的那种鲜明对照仍然清晰可见。英国著名政党问题研究专家杰克·布兰德在1992年时写道：“甚至在今天，当一般的工党党员受过更好教育，并且在甚至同自己的领导人的争辩中，非常自信地持着自己的观点时，他们的保守党对手无疑地都有更好的职业和教育背景。”“一般保守党后座议员的社会出身和先前的职业仍然明显地高于一般工党后座议员。”“在目前的议会中，73.1%的保守党议员有研究生以上的学历，而工党议员只有57.6%。更有意义的是，有62.7%的保守党议员毕业于条件优越的私立中学，而工党议员只有12.7%。”总之，尽管保守党党员中出身卑微的人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工党中这种人相应减少，两党党员队伍的社会背景仍然有很大差别。

第三是选民。选民的倾向性也可以反映出政党的阶级基础。一般情况下，在选举中，尤其是大选中，某个人把选票投给某个党就表明此人支持该党。两党比较起来，保守党的选票主要是来自于富人，而工党则更多地得到穷人的支持。比如，在本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保守党仅能吸引1/3的工人阶级选民，而有3/4的中产阶级选民支持保守党。1970年大选中，选民构成定势仍然如此，有79%的中间等级，59%的中下等级，35%的熟练工人和33%的非熟练工人及社会福利依赖者把选票投给了保守党。到了1983年大选时，上述的选民构成定势仍无大的变化。有69%的中上等级的选民投保守党的票，而只有7%的人投了工党的票。相反，在不熟练工人中，有47%投了工党的票，只有30%支持保守党。

选民的倾向从两党力量的地域差别上也能体现出来。保守党所得选票绝大多数来自比较富裕的英格兰东部和南部，而相对落后的苏格兰地区和穷人较集中的伦敦市区则是工党的天下。

第四是党的财政来源。从哪里得到财政资助也能体现政党的阶级基础。

通常情况下，人们不会把钱资助给他所不支持的政党。在获取财政资助的方式和渠道上，英国议会两党也形成了鲜明对照。工党主要依靠工会的资助。例如，据 1953 年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在党的年会上的报告，到 1952 年底，工党共收入 30 万镑，其中 12.6 万镑来自于工会缴纳的党费，只有 2.7 万镑是来自于各选区党组织的党费。而保守党的财政来源则与工党大不相同。在 1948 年以前，保守党仅仅从几百个富人那里得到资助，而且在财政事务上采用秘密的政策。关于党的中央总部在财政支出、收入、需求等方面的情况，选区党组织官员、议员、议员候选人和普通党员都一无所知，而且也毫不相干。弗烈德·伍尔顿勋爵（二战时出任保守党的食品大臣，后成为保守党的核心人物之一，并领导主持了保守党的财政制度改革）在 1947 年的保守党年会上警告说：保守党不应该只是富人的党，党不能仅仅满足于从有钱人中吸纳议员候选人。1948 年，保守党在财政制度上作出重大改革，规定：任何人在向选区党组织捐款时，每年最多不得超过 25 镑；议员每年不得超过 50 镑。固然，这一改革对保守党有重大意义，它使党的群众基础有了极大的扩大。但是，两大党在财政来源上的差异仍是很明显的。工党对选区党组织每个党员的认捐额规定了一个最低限，1953 年是 6 先令（1 先令 = 1/20 镑），1993 年是 15 镑，确实有困难者可交 5 镑。而保守党却对认捐额规定了最高限。奇怪得很，在当今世界，极少有政治组织拒绝其支持者多给它钱的。

第五是党的政策。更能体现政党阶级基础和倾向性的是政策。尽管我们很难在工党政府的政策和保守党政府的政策之间截然划出一条线，因为任何一个党上台执政都必然照顾到全体选民的利益，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找出这两种政策的不同倾向性来。没人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是工党而不是保守党二战后在英国建立起了福利制度。很难做出这样的假设：如果保守党在 1945 年上台，它会干出工党所干的事情来。尽管保守党在 50—60 年的几次执政期间继承了工党的政策，但是到了 70 年代，福利政策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遇到麻烦时，是保守党比工党更快地放弃了这些政策。在英国，如果你同任何一个比较关心政治的人讨论税收问题时，你都会被告知：每一个政府都要向人民征税，但是保守党政府总是向全民征税，而工党政府则主要是向富人征税。可见工党是尽可能地杀富济贫，而保守党则是极力维护富人的利益。

最后是党的纲领和理论。最能直接而又明确地反映党的阶级基础和立场的是党的纲领和理论。保守党的理论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而且保守主义也不是铁板一块式的统一体。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的保守主义流派迄今为止，都是在坚持着伯克的信条，以伯克的思想为基础。特别是像迪斯雷里这样的议会政治家所建立的流派。伯克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如果变革有必要的话，那必须是逐步的、缓慢的和渐进的。而工党的费边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虽然也主张逐步的、渐进式的变革，但却同保守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工党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是对现存制度的批判，认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理的，应该改变，但不能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而是逐步改良。工党的奋斗目标是通过改良建立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无阶级社会。而保守主义的渐进式变革的前提是对现存制度的承认，认为现存社会制度是合理的，要尽力维护它，变革是迫不得已而为之，要极力让这种变革对统治阶级利益的损害达到最低限度。在英国，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是十分明显的，撒切尔夫人任首相后，就曾宣称要在英国消灭社会主义（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它把 60—70 年代困扰英国的“英国病”的病源归于工党政府所推行的

民主社会主义政策。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说，英国两大议会政党的阶级基础是不同的：保守党的阶级基础曾经是土地贵族，后是大资产阶级，而现在则是垄断资产阶级；而历史上的工党，其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工党自本世纪初诞生以来，就一直以社会主义和工人政党自居，并以党章第四条中所写的实现公有制社会为奋斗目标。在本世纪前半叶，它高举这面旗帜，使自己不断壮大，跻身英国政坛，取自由党而代之，成为在英国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之一。自 50 年代以后，西欧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的性质都在发生变化，由工人阶级政党向劳动群众联盟的党演变。而英国工党的这一演变过程却比它的兄弟党缓慢得多。然而，正是工党未能随着英国社会和阶级关系的发展变化而改变自己的纲领政策，及社会关系和阶级基础，才使得它在与保守党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从 1951 年起至 1997 年 5 月前的 46 年间，工党总共只获得 4 次大选胜利，累计执政时间才 11 年。特别是从 1979 年开始，工党连续 4 次大选失利，持续 18 年在野。这一情况就充分表明：工党原有的优势已经丧失，它必须改变自己的面貌，重新确定自己在英国社会中的位置。形势所迫又促使工党进行全方位的改革，走向“现代化”，工党的现代化是经过了长达 18 年在野的磨难、三代领导人的艰辛努力才实现的。

然而，工党的改革也给它带来了新的问题和困难。首先就是纲领、政策。按目前工党的改革趋势，它同自由民主党甚至保守党的界限就越来越不明确，这样，工党就有失去原有的阶级基础和选民队伍的危险。工党如何给自己在英国社会中定位，对它将来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影响。1996 年 7 月，工党公布了它的政策声明，但主要东西与保守党现行政策没有多大差别，据此有人说，布莱尔只是大胆地改变了工党，但并不想改变英国，尽管工党发出了要“重建我们的社会”的豪言壮语。

与工会斩不断的关系

布莱尔所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处理工党同工会的关系。英国工党与工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种特殊关系在世界政党中是罕见的。可以说，没有工会就没有工党。然而二者之间在进行合作的同时，又充满矛盾和冲突。

英国的工会最早产生于 19 世纪中叶，起初多数都是自由党的拥护者。1867 年，伦敦工人协会首先作出了向下院选送“劳工代表”的决定。翌年大选时，它派出了 3 名候选人，但是首次出师无法得胜。1868 年全国职工大会成立。这是英国的主要工会组织，也是后来工党的主要创建者。据 1980 年的统计，职工大会下属 109 个工会，有会员 1,200 多万名，占了英国全国工会会员的大多数。

职工大会的成立，促进了工会的联合意识，一些工会联合成立了“劳工代表同盟”。它在 1874 年大选中共提出了 13 名候选人。结果两人当选，英国首次有了“劳工议员”。以后历次大选中，“劳工议员”的数目缓慢地增加着：1800 年 3 人；1885 年 11 人；1892 年 15 人。名义上“劳工议员”有他们自己的院内组织，宣称对有产阶级两大政党保持独立；但在实际活动中却越来越紧密地靠拢自由党。同时自由党也尽可能地影响和控制工会的代表。而且，工会代表人数过少，没有自己的议会党团，在立法活动中对任何大党都形不成威胁，其作用只是加强了自由党左翼。1886 年，著名“劳工议

员”亨利·布罗德赫斯特甚至参加了自由党政府，任内务部副大臣。因此，这些“劳工议员”被称作“自由党劳工派”。他们由于是资本主义特权的受惠人，因此总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工人阶级建立独立政党。

上述事实从反面向英国工人运动中的先进分子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应当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以启发工人的革命意识，引导工会摆脱自由党的影响，建立工人阶级独立的政党。在这期间，一些社会主义组织在英国建立起来，主要有民主联盟（1881），费边社（1883）和独立工党（1893）。这些组织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上起了重要作用。

1900年工党创建时，工会在整个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正因为如此，工会与工党有着极特殊的关系，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工党。首先，在组织上，工会以集体名义入党。在1918年以前，工党不吸收个人党员。工党党员在70年代时有680万，其中集体党员（绝大多数是工会会员）约占610万。其次，工会的资助是工党经费的主要来源，工党中央约4/5和全党约一半的财政收入来自工会。再次，在选举上，工党也依靠工会的帮助，工党一半以上的议员由工会赞助，一大部分选票来自工会。最后，在工党的各项重大事务中，工会都发挥着直接的作用，在1993年以前，工会在工党的各个机构中的作用如下：（1）在工党年会的选举事务中，几个大工会的票数约占总票数的2/3以上；（2）在工党全国执委会中，工会代表占有相当大的地位，1993年全国执委会有28名成员，其中工会代表就有12人；（3）在选举工党领袖和副领袖的选举团中，工会占40%的票数；（4）在选举议会候选人的选区一级选举团中，工会也占40%的票数。

可见，工党对工会有很大的依赖性。所以有人说，工党只不过是工会在政治上的代表，工党和工会本是一家人。在英国，工会与工党素有劳工运动两翼之称，工会为产业翼，工党为议会翼。工会以工党为自己的“议会代表”，通过工党发挥其政治作用；工党则以工会为群众基础和力量的主要源泉。工党在本世纪上半叶获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到了工会的鼎力支持。英国多数工会都是工党的集体党员，并以工会政治基金的名义向工党提供财政资助。不仅如此，工会还直接参与工党的决策及其他重大事务。

在60年代以前，工会与工党一直是密切合作、团结一致的。1945年大选后工党上台执政，许多工会代表也随之进入议会和内阁。历来被保守党和自由党绅士们所把持的议会，突然出现了一大批衣着随便，说话带着浓厚地方口音的工会代表。在392名工党议员中，就有120人直接来自工会。由20人组成的艾德礼内阁中，有6人是著名的工会领袖。外交大臣贝文原是英国最大的工会——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的主席，劳工大臣艾萨克是全国职工大会的主席，而教育大臣维尔金森则是全国店员工会的领袖。

可是，到了60年代以后，工会和执政的工党很难再维持原有的密切关系了。工党政府要从全国利益角度制定政策，不可能只照顾工会的利益。而工会又不肯忍受工党政府的有损工会利益的政策。二者时常发生冲突和对抗。工会的对抗曾两度促使工党政府下台。

1964年，威尔逊工党政府上台。开始，职工大会对工党政府采取合作态度，表示它愿意参加由政府、工会和资方三方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制定发展经济的全国性计划。职工大会还作出让步，声明它接受一项适当限制工资增长的收入政策，其条件是这项政策不能是立法性的。工会坚持政府不能以立法手段来干预工会与资方的谈判，限制工会与资方就工资问题进行直接的、

自由的谈判的权利。然而，形势的发展出乎职工大会领导人的预料。威尔逊政府在英镑危机的冲击下，无力执行振兴经济的全国计划。由于国际支付状况日益恶化，政府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限制工资增长。1966年7月，政府宣布对工资实行6个月的冻结。工会对此极为不满。1967年，工党政府被迫宣布英镑贬值，导致通货膨胀加剧，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压力加大，结果罢工频频发生。工会的压力迫使工党政府放弃执行限制工资增长的政策，但同时感到必须通过立法来限制工会的权力。1968年12月底，首相威尔逊和就业大臣巴巴拉·卡斯尔夫人主持制定了一项题为“代替冲突”的政府白皮书，其主要内容就是用法律手段来限制罢工。白皮书规定：应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协调劳资纠纷；如果调节无效，工会要举行罢工，在罢工前应有28天的缓冲期；如果某工会要罢工，就业大臣有权决定由工会会员用投票方式来决定是否要举行罢工；就业大臣还有权裁决工会内部的某些纠纷；凡违反这些规定的工会和工会领导人将受到扣除工资之类的惩罚。这个白皮书如果经下院通过，就成为法律。这个文件一出台，就立即遭到几乎所有工会的反对，威尔逊未敢把这个文件提交给议会。工会对工党政府的不满，促使工党在1970年大选失败。

保守党希思政府对工会采取对抗的政策。这促使工会与工党又开始重新接近，使双方都感到有加强合作、争取工党上台执政的必要。1973年，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协议：工党表示执政后将修改希思政府实行的劳资关系法，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加强经济计划化，强化需求管理；工会将在增加工资问题上作适当节制，但有一条，决不接受政府以立法方式限制工会的权利和增加工资。这就是有名的所谓“社会契约”。可是1974年工党上台后，工会希望工党政府按“社会契约”办事的希望落了空。当时正值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能源危机和经济危机接踵而来之际，英国的情况更遭，通货膨胀率猛增，工业投资急剧下降，失业人数突破100万人大关……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契约”是不可能实现的。工党政府虽然开始也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工人的政策，如增加社会福利开支，但不久就再度实行限制工资增长的政策。从1975年夏天起到1978年，威尔逊—卡拉汉政府先后实行了4个阶段的收入政策，引起工人和工会的不满，终于导致1978年底到1979年初的罢工浪潮，即英国人所说的“不满的冬天”。这次罢工浪潮的规模和激烈程度超过战后任何时期。罢工不但涉及工业部门，而且遍及铁路运输、政府机构、医院、学校、环卫等行业。在工人的强烈不满声中，工党政府再度在大选中失败下台。

工会与工党对抗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工党进入了长期在野时期，陷入严重危机；而工会则迎来了自己的真正克星——撒切尔保守党政府。撒切尔夫人对工会恨之入骨，她认为工会活动早已超出劳资争端的范围，它是为了争权而来，工会问题不解决，英国经济结构调整、生产合理化、改革福利事业都将成为空话。于是她挥舞法律、经济和舆论三根大棒，对工会进行猛烈攻击。经过保守党政府的打击，工会在社会中的作用下降，会员人数明显减少。1979年底属于工会的工人为1330万，但到1985年底这一数字降到1070万，减少近20%。英国最大的工会——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的会员数减少了31

%。1984年煤矿工人大罢工是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斗争最激烈的一次，然而却遭到极惨重的失败。工会运动进入低潮时期。

在这期间，工会与工党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工党在大选中的失败对工人运动本身是个打击，按说工会应该吸取教训，同工党重新联起手来。可是1979年以后，工党和工会内部斗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工党这方面是左翼掌握了领导权，而全国职工大会的领导权却转入了工会温和派手中。工会和工党左翼之间历来存在工资第一还是社会主义目标第一的矛盾。在工党左翼当权，党内极左派势力活跃的情况下，职工大会领导人注意拉开同工党的距离，强调自己的任务是进行经济斗争，拒绝卷入工党的政治活动。二者的矛盾和疏远削弱了工会的地位和影响，也使工党丧失了许多选民，使投工党票的工会会员急剧减少。1964年大选中，把选票投给工党的工会会员占会员总数的73%，1974年降为55%，1979年又降至51%，1983年只达39%。1964—1983年，英国职工大会的成员增加了200万人，而投工党票的工会会员却减少了200万人。1983年，工党有工会集体党员600万人，在大选中投工党票的工会会员只有400万人。而1983年投保守党票的工会会员竟高达会员总数的30%。

1983年大选惨败后，工党新任领袖尼尔·金诺克极力改善工党同工会的关系，在共同反对撒切尔夫人的反工会法的斗争中。双方加强了联系。工会仍是工党的主要基础。然而，从70年代中期开始，工会在英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坏，内部的不民主、领袖专断独裁，动辄罢工而不顾全社会的利益等现象，使人们对工会十分反感，尤其是1978年的“不满的冬天”使工会成了众矢之的。再加上撒切尔保守党政府利用舆论手段对工会进行打击，更使工会成了英国社会中的撒旦。所以，尽管金诺克领导的工党同工会恢复了蜜月关系，工党还是输掉了1987和1992年的两次大选。接替金诺克任工党领袖的约翰·史密斯认为同工党保持过密的关系反而会吓跑许多选民，于是开始重新调整同工会的关系。他一方面注意拉开同工会的距离，另一方面开始削弱工会在工党重大事务中的权力和作用。

史密斯所采取的最重要一个举措就是取消了工会在议员候选人选举和党的领袖选举中的集团投票制，代之以一人一票制。在1987年以前，工党议员候选人的产生过程是：在每个选区中，工党的支部负责提名，选区工党（即工党的选区党组织）总委会负责遴选并确定被选人名单，选区工党总委员会拥有投票选举权，最后工党全国执委会正式认定。在1987年的工党年会上，这一制度被改变，选区工党总委员会的选举权被剥夺，代之以一个由选区工党全体个人党员和所属组织构成的选举团。选举团中，工会和其他政治组织（主要是工会）占总票数的40%，个人党员占60%。各工会所拥有的票数和会员数成正比，并采用集团投票制。

在1981年以前，工党领袖和副领袖都是由工党议会党团选举产生。1981年改为由一个选举团选举产生。选举团由工会（及其他政治组织）、选区工党和议会党团组成。其中工会占总票数的40%，选区工党和议会党团各占30%。各工会所拥有票数和投票方式与选举议会候选人相同。

约翰·凯利：《工党与工会》，伦敦沃苏出版社1987年版，第9—11页。

R. M. 普尼特：《选择党的领袖——比较关系中的英国》，伦敦哈维斯特·维特西夫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108页。

布莱尔任领袖后，继承了史密斯的对工会的政策。

不管工党怎样同企业主拉关系、同工会拉开距离，工党同工会的关系还是斩不断、割不开的。工党对工会还是有很大的依赖性。

首先，在价值观上，工党同工会还有许多共同之处。工党虽修改了章程，但还是打着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号，在英国还是被看成左翼政党。工党同工会的几十年合作，使工党的党员队伍同工会会员之间在政治观点、态度和立场上都十分接近，而且相当一部分党员都是工会会员。

其次，在党内事务上，工会仍然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尽管取消了集团投票制，工会仍在领袖和副领袖选举上拥有 1/3 的投票权，在议员候选人的选举上拥有 40% 的投票权。此外，在年会代表和党的全国执委会中，工会的人仍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再次，作为集体党员，工会仍然是工党的一支重要组织力量和选举力量。工党的个人党员现在只有近 40 万，比保守党少（50 万）。党员队伍在各种选举活动中是一支重要的中坚力量，党员们通过宣传、游说和劝导等方式对选民施加影响，促使其投本党的票。从 70 年代以来，尽管有很多工会会员在大选中投了保守党的票，但相比之下，工会会员中投工党的票的人还是占多数，工会还算是工党的一支重要选举力量。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工会的资助是工党最重要的财政来源。自 1913 年开始设立的工会政治基金在经过了几次考验后，仍然是联系工会和工党的重要纽带，并构成工党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据统计，在 1983 年，英国在册的工会有 409 个，共有会员 1,100 万；其中 98 个工会，1,000 万会员加入了职工大会；而设置政治基金的工会有 58 个，这 58 个工会共有会员超过 800 万名，这 800 多万名会员中，交纳政治基金的占 76%。其中最大的工会是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有 155 万名会员，交纳政治基金的人达 98%。

工会政治基金的主要用途就是资助工党。资助形式有三种：

(1) 工会每年向工党交纳集体党费。从理论上讲，每个工会交纳的款额基本上依据该工会交纳政治基金的会员数而定。1982 年，交纳的款额是每个会员 45 便士，到 1983 年上调到每人 50 便士，1985 年又调到 70 便士，到 1994 年，这个款额涨到 1.80 镑。但实际上，多数工会并不是严格按照实际交纳政治基金的人数来交纳党费的。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打了折扣。当然，有时是工党限制了一些大工会的集体党员人数，以削弱它们在工党年会中已有的巨大影响，因为在年会中某个工会所掌握的投票权是由其注册的集体党员数，亦即交纳的党费款额决定的。因此，几个大工会的集体党员数都少于其实际的会员数。如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有会员 155 万名，集体党员数为 125 万名；第二大工会——工程工人工会有会员 944 千名，入党人数为 854 千名。但不管怎样，工会交纳的党费构成了工党常规年收入的主体部分。据统计，从 1973 至 1983 年，每年工会交纳的党费都占工党年总收入的 42—83%；其中 1977 年，工党年总收入是 1,536 千镑，工会的党费是 1,268 千镑，后者占前者的 83%；1983 年，工党总收入为 6,200 千镑，工会的党费为 3,000 千镑，后者占前者的 48%。

(2) 对工党竞选的资助。每到大选时，工党要设置大选基金，以提供工党的竞选费用。大选基金的主体部分来自于工会的捐赠（党费以外的）。从

1978年起，大选基金的筹集工作由一个在这一年建立的名为“工会会员争取工党胜利”的组织负责。所有加入工党的工会都被要求加入这个组织。该组织不涉及政策问题，只关心如何在财政上资助工党，同时也关心党的组织、宣传和政治教育。在大选以外的时间里，该组织还在补缺选举及日常事务中帮助工党。1983年，该组织从工会那里为工党筹集了2,200千镑。其中捐赠超过100千镑的有：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500千；普通和市政工人工会280千；全国矿工工会225千；公共雇员全国联合会220千；混合工程工人工会150千。更为有趣的是，据工党全国执委会1983年的报告，从未加入过工党的电讯管理协会在1983年还捐赠了18千镑；另一个未设政治基金的银行保险金融工会也捐赠了500镑，该工会曾明文禁止自己进行政治捐赠，宣称自己将不属于任何政党。（3）对工党地方选区组织的捐赠。这笔捐赠主要是用来资助议会候选人。在1933年黑斯廷斯工党年会上，工党做出决定，限制加入工党的组织对选区党组织捐赠的数额。关于这方面的具体内容，集中体现在广为人知的“黑斯廷斯协议”这个文件中。后来这个文件几经修改，到80年代时，规定：工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承担议员候选人所需要费用，其最大限额为全部费用的80%。此外，工会还可以承担每年选区协会的组织 and 登记费用，其最大限额在乡村选区要高于城镇选区。在雇用专职代理人的选区党组织，工会每年的捐赠最高限额可以提高到能够支付代理人的薪金。在1983年，得到工会资助的工党候选人有170人，其中122人当选为议员；1979年相应的数字为191和150。很明显，得到工会资助的候选人比没有者在竞选中获胜的机会大得多。1992年工会资助了173个候选人，其中143人当选，当选率为83%；而在没有被工会资助的461个候选人中，只有128人当选，当选率为28%。也就是说，在1992年的大选中，一多半工党议员和1/4多的候选人得到了工会的资助。当然，很多得到工会资助的议员和候选人本身就是工会的人。1983年，有24名议员来自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其他几个大工会所拥有的议员数分别是：矿工工会14人；工程工人工会12人；普通和市政工人工会11人；铁路工会10人；科学、技术和管理人员协会10人。

总之，工党对工会的依赖性还是很大的，二者的关系是一个难解的“结”，它如何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对工党来说仍是一个关系到党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虽然工党改革了同工会的关系，但是二者之间的特殊关系，实际上是斩不断、割不开的。就与工会的关系来说，“新工党”虽然改变了模样，但并没有完全脱胎换骨，它还不得不带着“旧工党”的很多痕迹，而且这些痕迹是很难去掉的。历史经验表明，同工会保持过密的关系对工党自身的发展和独立决策非常不利；但是若失去工会的支持，工党不仅在组织上会被大大削弱，而且在财政上也会出现问题，而没有雄厚的财政基础，工党是很难发展壮大的。如何处理好同工会的关系，使之有一个最佳的度，对目前的工党来说也是个重要的难题。

窝里斗的传统

组织问题是布莱尔面临的又一个难题。工党内部左右两派的斗争和派别

参见乔尼·拉文达斯基、皮琶·诺瑞斯：《工党与工会——在布莱顿年会之后》，载于《政府与反对党》第29页，1994年春第2号，“政府与反对党”有限公司出版，第202—203页。

组织活动是个生来俱有的问题，而且其激烈程度是世界政党中少见的。在英国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英国的社会矛盾不是通过议会中左、右翼两党的斗争而是通过工党内部斗争来体现的。工党的党内斗争曾给工党的发展带来了非常消极的影响。目前，工党看来是比较团结，1994年的领袖选举和1995年的党章修改虽有斗争，但没有引起党的分裂。然而，这不等于说矛盾已经解决了。历史的经验是，当工党长期在野，全党面临危机时，左右两派的斗争会缓和一些，以便共同努力争取上台执政；但是，一旦工党执政了，左右两派会因政策分歧而重开战火，从而造成严重内耗。如何在执政以后继续保持党的团结也是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体制改革是把双刃剑

布莱尔面临的另一难题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工党的1996年政策声明还提出了一些体制改革的内容，诸如对苏格兰和威尔士实行权力下放，改革贵族院即上议院，通过立法使政府更开放一些，制定一个权力法案使法官在保护个人自由上有更多的权力，等等。工党的意图是给自己树立一个改革的形象，以区别于保守党，同时这些改革也是建设“英国新生活”的重要内容。然而，工党所提出的改革内容若实行起来，都会引起正、负两方面的效应。英国是一个保守主义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家，任何激进的改革都不会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虽然英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着很多不民主、不合理的东西，如上议院议员非经选举产生，中央政府过分集权等，然而这些都是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演变形成的，要改变它，势必要进行宪法性的改革，而宪法性的改革会引起英国社会一系列的变化甚至动荡，这是多数英国人所不喜欢看到的，尽管他们都抱怨这些不合理的东西。更何况改革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既得利益者的抵制。正因为这样，在工党新政策声明制定出来后，保守党立即抛出了攻击工党的重磅炸弹，喊出了“新工党，新危险”的口号。

更为重要的是，工党在提出体制改革方案时，“漏”掉了一个最值得改革的内容，即改革英国的选举制度，变简单多数制为比例代表制。简单多数制在英国实行了几个世纪，其不公平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使1/4左右的选民难以通过大选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和选择。比如，1992年大选，保、工两党的得票率为76.3%，但却获得了93.2%的议会席位；而其他党，特别是自由民主党虽拥有相当数量选民的支持，但所得席位却寥寥无几。很明显，现行选举制度十分有利于轮流执政的两个大党。正因为这样，尽管自由民主党等小党极力倡导改革选举制度，但却得不到执政党和主要反对党的响应，而国家的任何改革不能没有这两个党的参与。托尼·布莱尔就曾明确表态，他反对实行比例代表制。然而，许多观察家认为，不改革选举制度，其他改革都难以奏效，工党在改革问题上正在冒浪费时间和政治资本的危险。因为不改革选举制度，工党就很难达到它预期的通过改革来进一步改善自己的形象，进而吸引选民的目的。选民们会发出疑问，工党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

可是，改革选举制度更是一个宪法性的改革，选举制度的改变有可能促使英国基本政治体制的改变。人们都知道，维系英国两党制存在的一个重要纽带就是简单多数制，否则，早就有可能出现第三党崛起，同两大党分享政权的局面了。就目前的工党来说，虽然实现了上台执政，但能够像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那样来个连续十几年执政，并政绩斐然，使英国有很大改观，

却是相当困难的。而能否成功地连续执政两届以上，是一个议会政党成熟与否的标志，而工党还没有这样的历史。不过，不管怎样，工党在 80 年代初所遇到的将要被第三党取代的危机已经过去。将来一段时间内，工党和保守党仍将是英国政坛上的两支主要力量，两党制将继续运作下去。

十四、布莱尔主义

布莱尔任工党领袖后，随着他对工党的改革，传媒中不断出现“布莱尔主义”、“布莱尔思想”、“布莱尔现象”等名词。与以往工党领袖相比，布莱尔确实有一套很有特色的思想，这些思想就构成了他改造工党、制定政策的理论基础。

模糊政治的设计者

布莱尔的思想轨迹和工党所走过的路线差不多。在 80 年代初，他也支持过单方面核裁军，也曾跟随工党呼吁从欧共体中退出，也曾喜欢过强大的国家指导和干预。自 1983 年后，他开始在党内积极倡导党的革新，宣称如果工党没有大的变化，它就永远不会赢得大选。他说：“我确信，我们如果不变革，如果不回归我们的价值，不从过时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我们就不能改变这个国家，我们就不能获胜。”他的这些言论曾受到左翼的攻击，但却得到支持者的鼓励。正如媒介称他是“模糊政治的设计者”，他的思想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抹掉工党的阶级烙印，不从阶级利益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一特点可以从价值观、经济观、政治观和党建观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社会—主义”价值观

价值观是一个党的理论核心，作为政党，它必须明确核心价值后，才能根据这些价值制定党的目标，规划党的具体政策。布莱尔认为，工党应该在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的核心价值基础之上，建构工党的价值观。

布莱尔执掌工党帅印后，提到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时，经常用“社会—主义”（Social—ism）来代替。1995 年 3 月，他在一本杂志上把“社会—主义”定义为：“不是阶级、工会或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它是一种人们为了把事情办好而工作在一起的一种学说。”1995 年 7 月，在费边社举行的庆祝 1945 年工党大选胜利 50 周年大会上，他又解释了同样的意思，主张用“社会—主义”一词取代“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基于这样一种道德主张，每个人都是互相依存的，他们之间互尽义务，完善的社会支持其内部个人的努力，共同的人性要求给予每个人一个能发挥作用的舞台，只有认识到他们互相依存，个人才能成功。”因此，他主张，整个社会应当为每个人的成功而携手共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以促进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

在布莱尔看来，社会主义永远基于社会，尤其是建立一个好的社会的理论和实践。人类具有社会的属性，人们之间互相联系，人类生活在社会关系的网络、信任、合作之中，伙伴关系是他们的最佳选择，而不是竞争、贪婪、欺骗。个人和他们的家庭虽然作为人的本能，都希望成功，但是，这并不与在一个社会里互相尽责任相矛盾。社会主义不只是对人类本性以及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探索，它还是对一种能促使每个人充分发挥能力的社会结构的探

索。

布莱尔经常提到的一个词汇是“社区”。他认为，社区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核心概念。他说：“左翼与右翼的区别在于，个人的发展需要集体的行动，即互相依赖性，这意味着我们准备行动在一起，提供作为个人所不能提供的好处。社区的概念与其说是一个地理概念，毋宁说是一种人的本性。”社区这个概念是对阶级概念的替代，也是对原有的官僚国家主义的一种放弃。“社区意味着在一个社会里人们相互支持”，社区虽然需要国家来扶持、构建，但不是国家的同义语。布莱尔认为，在过去的日子里，社会主义越来越被界定为国家的一种东西。在本世纪初，这是完全自然的事情，当人们要求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时，国家是获取这些东西的最佳途径。而如今，社会分层越来越多，选择各异，这虽然不排除国家的作用，但国家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比较困难。布莱尔反对旧式的国家干预，那种国家干预把责任与个人割裂开来。布莱尔强调“社区”的另一层含义是公民之间的责任。他说：“社区概念的重要性在于它界定的关系不只是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还是人们生活在其中的人与社会关系；不只是享受权利，还要尽义务；不只是给予权利，还要服从。自尊在某种程度上来自对他人的尊敬。”权利和义务是密切不可分的，社会行动的目标不是取代个人的责任，而是使其更容易实现。要让每个公民得到发展的机会，又要让他们都能尽责。布莱尔认为，自由可以通过社区的积极活动获得，个人的机会可以通过工作在一起的人们的集体行动而增加。对社区的承认反映了工党为了共同利益相互团结、集体行动的社会价值。工党的任务就在于，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发现一种新型的关系，超越那种老式的集权主义和粗鲁的市场教条。

伦理社会主义

从工党上次执政到布莱尔时期，工党最重要的哲学变化是布莱尔把社会主义重新界定为一种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而不是物质利益。当布莱尔 1975 年加入工党时，社会主义主要强调的是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布莱尔掌权后，又把工党的指导思想调整到了伦理社会主义方面来（英国报刊称之为社会伦理主义）。他说：“我们不能生存在一个道德真空中，如果我们不学习，不教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价值，那么，我们将生活在一种伦理混乱当中。”他经常使用法律与秩序、家庭和责任这类概念。在他看来：第一，社区有责任给予人们更好生活的希望；第二，人们也有义务给予社区回报，并遵守它的规则；第三，相互尽义务起源于家庭中的责任，所以必须强化家庭意识。社会的训练很大程度上起始于家庭中的训练，责任意识要从那里培养。社会的现代释义——权利和义务结合在一起的家庭是社区意识的生长点。布莱尔对社会的责任、个人的义务以及对家庭的重新估价，人们称之为社会伦理主义，有的又称之为社会保守主义。

布莱尔是一名基督教徒，他 1992 年参加了“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的组织。他在为该组织出版的题为《重申基础》的论文集写的前言里写道：“基督教是一种强大的宗教，虽然它不是永远现实可行的，但它现在可行，它强

〔英〕《新政治家与社会》，1995 年 4 月 28 日。

约翰·任托尔：《托尼·布莱尔》，第 291 页。

调我们的责任，促进我们自我完善，关注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的社区。它不是功利主义的。……当我们环顾我们今天的世界的时候，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我们将毫不犹豫地作出判断，然后坚定不移地跟随着它——那就是基督教社会主义。”1994年10月1日的《卫报》上登载的一篇未署名的文章说，布莱尔不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他甚至也不是自由民主党人，他实际上是一个基督教民主党人。布莱尔的传记作家约翰·任托尔认为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全对。他认为：布莱尔从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传统方面可以说是社会民主党人；从他相信工党会赢得第三党支持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他是自由民主党人；从他的政治信仰是基于基督教伦理和社会团结这个角度，可以说他是一个基督教民主党人。布莱尔曾经把社会主义的四根支柱概括为“机会、责任、公平、信任”。在另外一个场合，他把社会主义的价值分为社会正义、自由、机会、平等、民主、国内外的团结和相互尽责几个具体方面。在布莱尔及其同僚的努力下，工党通过的新党章第4条基本上概括了布莱尔及工党的价值观。那就是：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我们能够成就我们单个人所不能成就的事业，从而为我们每一个人创造出能使我们的真正潜能得以发挥的条件，并为我们所有人建构这样一个社区，在这个社区内，权力、财富、机会是掌握在多数人手里而不是几个人手中，我们享有的权利反映着我们的义务，我们以团结、宽容、尊重的精神自由地生活在一起。

放弃国有化目标

布莱尔为工党制定的总目标是建设充满活力的经济、正义的社会、开放的民主、健康的环境。

在经济目标方面，布莱尔主张建设一个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充满生机的经济体。在这一经济体内，市场的进取精神和竞争的严酷与伙伴关系和合作的力量融合在一起，创造国家所需的财富，并为一切人提供工作和致富的机会，那里私营部门繁荣，公共服务质优，那些对于公共利益至关重要的事业或由公众所有、或向公众负责。在布莱尔的努力下，工党第一次在党纲里对市场、私有制持肯定态度。

在所有制问题上，布莱尔继承了50年代盖茨克尔、克罗斯兰等人的意见，认为公有制只是获得自由、平等的目的的一个手段。他认为，原有党章中关于实行大规模国有化的承诺在实际没有什么意义。他甚至说，工党在党章中写上实行国有化的主张是很愚蠢的，工党已不再相信它，除非工党放弃国有化的主张，否则选民们是不会把权力交给工党的。

过去，支配工党理论政策的费边社会主义主张国家干预，到了50年代“修正主义者”那里，虽然对国有化提出了异议，但仍然认为国家是个中性的东西，通过政治民主影响国家机器，就可以改变经济的性质。到了布莱尔这里，实际上已放弃了原来的国家主义战略。尽管他仍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市场需要国家规范，正义、自由、平等需要国家来维持，但国家不能包揽一切，其范围是有限的。在他看来，有两个重要的方面影响工党的国家观：一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分化越来越多，公民在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又产生了其他各种各样的要求，国家很难解决这些问题；二是世界经

济全球化与相互依赖的新环境，使得民族国家在控制经济方面遇到很大挑战，因此，在世界范围内重蹈国家保护主义或以邻为壑的民族主义老路是没有前途的。在国内，由国家进行事无巨细的管理是徒劳的，因此，需要转换国家的作用，调整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努力做到公有与私营的混合平衡。

布莱尔放弃国有化目标，减少国家干预以后，主张一种什么样的所有制呢？他主张建设“参与制社会”，或曰“人人所有的社会所有制”。他认为，中间力量和中左力量，应集中精力去创造一种“参与制经济”，这种经济要求吸收每一个人参与决策，而不是让少数几个特权人物或者占居民总数 30—50% 的富人主宰一切。布莱尔的“参与制经济”实际上是既不想通过国有化和计划经济在英国创建“社会主义的耶路撒冷”，又不愿如同保守党那样推崇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是要遵循近百年来人们为之奋斗的价值原则，协调私有制、追逐利润和下放决策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吸收每个社会成员、每个公民，作为“潜在的伙伴”参与社区事务和公共事务的决策。被接纳的个人，不论属于什么社会阶级，既享有一定的权利，又承担一定的义务，权利和义务相辅相成，并以一系列自愿接受的规章或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布莱尔认为，在本世纪前半期里，集体主义达到了高峰，政府的权力和影响增大，而本世纪 80 年代以来，个人主义又达到了高峰。今天工党的任务就是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去除传统的左翼和右翼的界限，开辟非极化的新领域，每个人都是股东，每个人都参与市场经济框架的经济活动，建立一种“共同利害关系社会”。

市场经济

在市场问题上，布莱尔改变了过去认为市场是低效率和不公正的根源、在道德上是恶的传统观念，认为市场本身是中立的，它是特定商品分配的有效手段。但是，在存在着垄断以及需要提供公共商品的地方，对市场的放任是危险的。所以，布莱尔认为他的观点不同于把市场看作是恶的传统观点，也不同于保守党把市场看作是善的新右派观点，而是认为市场在一般情况下是有效的、公平的，但在一定时期、一定情况下，它是不公平的、非有效的。因此，需要对它进行监控和规范。布莱尔认为，左、右翼在市场问题上的分歧不是谁相信市场，谁不相信市场，而是在于怎样利用市场。右翼采取的是自由放任态度，左翼则致力于增加对工业和教育的投资，赋予工业增长的活力以应付日益变化的市场。

布莱尔相信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道理，他曾说过，“我从政的目的是与非正义和贫穷作斗争，而不是财富”。因此，他主张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加国民财富。他认为，经济繁荣的源泉（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人的投资）是社会改革的基础。任何对英国社会不公表示忧虑的人士也应关心其经济的衰落。新工党的具体经济政策就是冷静探索和全面实施高工资、高技术、高投资与高就业的经济发展模式。只有社会向人员、智力和基础设施投资，个人和家庭才能得到发展。公、私营部门的相互依赖比它们之间的界限更为重要，要提倡公、私营部门共同为基础设施投资。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要想方设法刺激小企业的发展。要鼓励金融部门与工业部门建立长期的关系。

在欧洲合作问题上，英国政府应当发挥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作用。在社会问题上，布莱尔认为，经济效益应与社会道德同步发展，英国需要一套有效惩治犯罪的司法体制，但最有力的手段还是设法杜绝犯罪的根源。他的“严厉打击犯罪，减少犯罪根源”的呼声引起了国民的共鸣。布莱尔主张改革福利制度，认为“高涨的福利预算是经济失败的信号”。他主张实行多层次的社会福利制度，充分发挥国家、企业和个人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

矛盾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

工党像其他国家的左翼政党一样，是一个寻求变革的团体。然而，在英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它却表现得犹犹豫豫，在其近 100 年的历史中，很少向传统的政治体制发起挑战。与保守党相比，它显得激进一些，但与一些小党相比，它则保守一些。从总体上看，它奉行的是一种宪政保守主义。

托尼·布莱尔当选工党领袖前后，在英国资本主义宪政改革方面，并没有太多的承诺，布莱尔对战后第一届工党政府的反思中认识到，艾德礼政府不愿意使机构本身现代化，错过了一次改革的机会，埋下了严重的集中主义的种子。

布莱尔改变了过去工党领导人和思想家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的单向性的弱点。过去，许多人认为，社会和经济的任务胜过政治任务，不公正和剥削起源于经济关系，而非政治体制，政治平等和政治权利的价值在于其工具性，而非实质。在许多工党政治家、思想家看来，公民权分为三部分：公民、政治和社会。在过去 300 多年间，争取公民权的斗争已从第一阶段转向第二阶段，然后又转向第三阶段。平等的公民权已在 18 世纪争取到；19 世纪，政治权利又大大扩展；20 世纪，斗争的焦点已集中到社会权利上。布莱尔上台后，对这些观点作了一些调整。他认为，英国现在处于民主的第二个时代。经过长期的斗争，第一个时代（以 1928 年选举权扩大到成年妇女为标志）建立了普选制。然而，70 年代过后，社会和经济条件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在 1900 年，中央政府消费支出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9.7%，1930 年为 13%，而如今，已达到 42%。在本世纪中叶，英国的多数人口是阶级意识较强的工人阶级，他们支付不到 10% 的收入税，而如今，人口中的多数是中产阶级，所支付的收入税已达 40%。这些变化给民主宪政提出了新的要求。而许多机构和体制还是建立在第一个民主时代基础之上。议会工作的方式，有时看起来像是一个私家俱乐部，而不是一种民主的载体，上议院的组成，宪法和许多规定还是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这些，都使得英国政治变得不那么受人尊敬，不那么负责任。布莱尔还认为：改革政治体制不仅不像保守党人说的那样，只是爱唠叨的阶级语言，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是使大多数人民关心公共事业的途径；而且对其他目标，如强大的经济、好的贸易、好的教育和防止犯罪都有益处。

布莱尔同意《经济学家》杂志编辑沃尔特·巴奇豪特的观点，即：每部宪法首先要获得权威，然后利用权威；首先要赢得人们的信任和忠诚，然后，在政府的工作中付诸实施。布莱尔为工党规定的目标是：在人民和政治家之间建立信任、忠诚和现实估价基础之上的政府良好运行的伙伴关系。工党的

民主复兴目标有三个，第一，强化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第二，使决策更接近人民群众；第三，增加政府的民主信任程度。

民主的繁荣依赖于尊重权利、履行义务的丰富文化。除了政治家的统治和法院的范围以外，这些权利和义务都与社区密切相关，国家宪政的责任就是保护自由，鼓励责任的履行。而现实的英国，在这方面做的很不够，基层的权利，如信息权、司法平等、财产的安全经常被忽视。

工党主张，通过信息自由法案把欧洲人权公约与英国宪法结合起来。在重大决策问题上，应多倾听人民的意见，利用全民公决是一个重要手段。许多政治决策都与公民的地域有联系，加强地方政府的权力是使政府与人民群众接近的途径，地方政府的民主声音需要通过地方当局与选民的接触而加强。所以，布莱尔一再坚持伦敦市和其他大城市的市长应该由选民直接委任；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权力应加强；加强地方组织是改造英国权力结构的关键。

在某些方面，布莱尔仍采取相当谨慎的立场，未能做出大胆的许诺。布莱尔无疑有他的难言之隐。政治体制改革的某些方面，会涉及到工党自身的命运问题。例如，在选举制度改革方面，布莱尔曾说：“如果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现行选举制度是不是不公平的，我的回答是：是的。更困难的问题是，有没有较为公平的选举制度？我想，在比例代表制下，一些小党将会得到不合乎其比例的权力”。现存的选举制度对工党和保守党都较为有利，选举制度的改革，将对英国的政党制度产生强大的冲击。它不仅会影响政党的数目与政府的结构，也将影响它们的组织、意识形态、相互力量与选举互助。布莱尔虽然有时也提到大选获胜后，要履行约翰·史密斯的就选举制度举行全民公决的许诺，但骨子里，他并不希望实行真正的比例代表制。

把工党改造成“人民党”

布莱尔曾经说过：“我不是生来就是工党党员，是我选择了它。我从来没有加入过其他党。我信任它，我非常高兴作这个党的领袖，我将生活在这个党中，也许死在这个党内。”布莱尔在这里表达了他永不叛党的决心。实际情况是，他虽未叛党，但却改变了党。

布莱尔认为，工党组织上的分散、纷争、分裂以及基础狭窄是其竞争不过对手的一个重要原因。工党的组织在70年代像其理论一样，成了过时的东西，党这部机器已经成了被派别活动和宗派主义猎获的壳子，它看起来民主，其实不然，本应是在党和其真正要代表的人们之间关键的民主联系消失了。理论过时了，而党的组织机构无力清楚地证明并扭转这种局面。工党今天的任务就是围绕所追求的价值重构意识形态，然后创造一个适合并反映该理论的组织。布莱尔多次表示，要解决什么人参加工党，他们的利益如何表达，决策如何形成等问题。

布莱尔极力淡化工党的阶级性质，强化工党作为一个“人民党”的形象。前几任工党领导人虽然也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比较而言，布莱尔做的更多，声势更大一些。布莱尔在这个场合说工党是“人民党”，在另外一个场合又说工党是“工商业党”、“基督教党”，目的是给人们造成工党是一个

代表各方面利益的党的形象。布莱尔在一次会上公开表示：“要使工党变成一个开放的党，一个成员包括私营业主和无产业者、小商人和他们的顾客、经营者和工人、有房产者和住公房者、熟练的工程师以及高明的医生和教师的党。”他认为：“80年代以来，工党在组织上面临的最大的危险之一是党与其他地方团体相脱离”，“应该使党变成一个开放的，拥护它所寻求代表的社区的党。”为此，他疏远与工会的关系。布莱尔多次界定工党与工会关系的准则，他认为，工党与工会由于历史的原因保持一种联系是正常的，但时代变了，这种关系的性质也应该变化，工党与工会不仅仅是一种组织联系，而且应是一种互相尊重的关系。过去工党与工会那种特殊的紧密关系对双方都不利，工会应该在一个健康的、民主的社会中找准它的位置，工会应作为工人的广泛的代言人，而不是作为一个党的代言人而出现。1995年9月12日，在英国职工大会年会上，布莱尔毫不客气地向工会代表说：工党的决策，工会可以进行说服，但决策权必须由工党来掌握，工党要管理整个国家，不允许某个既得利益集团在内部支配它。在疏远与工会关系的同时，工党与工商界的关系则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1995年9月，布莱尔及其同僚开始了一场面对国内外工商界的游说旅行，专门与资方联系，力图得到工商界的支持。他对工商界巨头公开说：“工党是一个工商党。保守党已不再是工商党，他们财政上既不节俭，经济上又缺乏有效管理，那种认为保守党是工商党，而工党是工会党的看法完全过时了。”许多工商业头目都表示，他们对工党执政并不担忧。

布莱尔极力主张扩大党内民主，力主“一人一票制”。他认为，如果不改变工党内部的民主状况，工党将永远不会成为执政党。80年代初，工党议员奥斯丁·米歇尔曾把工党描绘成为“一个没有党员的大众党，一个没有共识意识形态的十字军，一个与人民割断联系的人民党”。布莱尔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工党党员必须在社区中扎下根。早在金诺克之前，他就力主在党的决策问题上实行“一人一票制”。他说：“在工党党内决策时，如果我们不能真正的信任普通党员，那么，我们如何在广泛的社区内为工党赢得支持呢？面向21世纪的一个激进的、现代的、进步的中左翼政党应该是什么样的呢？答案是：“一个与地方社区接触的党，因为它的地方社区是该党的一部分。”为此，应该让每个党员在党内都有表决权、发言权。布莱尔一直想通过党内民主的方法，削弱工会在工党中的强大地位。他企图建立一种联系，这种联系不是工党与工会之间的联系，而是工党与工会分子的一种联系。前任工党领袖史密斯在布莱尔等人的支持下，试图限制工会在未来领袖选举中的权力，工会会员党员应按个人党员来计，票数应在全国范围内统计，而不是按集团、工会集体来计算。布莱尔还从90年代初开始，力倡党内公决，就一些重大决策在党内进行表决。当时，党内许多人都认为这太民主、太愚蠢。然而，布莱尔上台9个月后，在关于党章第4条的争论中，在地方党组织中真的把是否修改第4条问题提交给了全体党员表决。布莱尔这些主张的意图实际上是想建立直接由党的领袖控制的中央集体领导体制，提高党的灵活性、创新能力和直接决策能力。用明显地创造党内充分民主空气，而同时文

托尼·布莱尔：《让我们面向未来》，费边小册子第571页。

〔英〕《泰晤士报》1995年9月19日。

约翰·任托尔：《托尼·布莱尔》，第319页。

不让他们掌握实权的办法来保持他们的热情。一方面在原则上把表决权下放给每位党员，但又通过议会党团所占的大的份额及每票的“含金量”不同，来使大部分党员的权力成为虚设，从而使议会党团、领袖享有最终决策能力。

工党现代化的产物

布莱尔的思想是工党几十年来现代化工作的继续和产物，是他改造工党实践的结果。

最先揭起工党现代化大旗的是盖茨克尔。他认为，工党需要在其组织和理论方面使自己现代化，使党不再是一个阶级冲突的党，不再主要依靠工人阶级的支持，而应使其成为一个全民党。这时，在费边社的主持下，一批身兼工党要职的思想家、理论家纷纷撰文立说，形成了所谓的“新思想运动”。这些“新思想家”又因要求“修正”工党传统理论和政策而被称为“修正主义派”。他们认为，工党社会主义思想缺乏系统的理论基础，尤其不能适应对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导致工党政策陈旧，拿不出吸引选民的政纲来，在竞选中屡屡落选。用克罗斯兰的话说就是：“正在昨天的战场当中，所用的战略的基础是已经过去的英国社会。”他们主张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重新审定社会主义变革的基本手段和目标，必须对社会主义的内涵作出新的解释。盖茨克尔于1959年工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动议修改党章第4条款，要求提出新的政策，更多地关心白领阶层，减少工党与蓝领工会的亲密程度。这个动议由于左派的反对没能通过。不过在盖茨克尔的提议下，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对第4条作附加声明，声称：“工党执委会承认在国家经济中，应该既有国营企业也有私人企业的地位的同时，建议继续扩大公共财产的范围，要考虑客观事实，适应客观状况，考虑有关工人和消费者的意见，逐步采取决定。”这样，实际上等于否定了第4条。50年代，工党内部这股修正主义思潮尽管未能修改第4条，但这是对传统的英国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模式发起的第一次冲击。修正主义理论在工党的行动纲领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不但抛弃了社会主义等于国有化的传统主张，而且把国有化仅仅看成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种不很重要的手段。这个问题虽然未能写进党章，但在以后的工党的现代化进程中则不断重复类似的问题。

把工党从一个阶级性政党变成一个人民党的尝试在威尔逊时期继续着。威尔逊虽然未直接向党章第4条挑战，但他逐渐把国有化问题从党的议事日程中取消了。在1964年大选中，工党的竞选宣言为《新英国》，该宣言主要突出经济发展和科学进步，强调经济增长、效率和技术革新的必要性，它要求的是计划化而不是国有化，表明英国工党是一个现代化的非阶级性的政党。英国学者豪厄尔认为：“威尔逊此举目的在于在民族象征意义的基础上动员大众的支持，以结束人们对这个党是一个阶级政党的看法。”这个阶段工党现代化战略的高潮是白皮书《代替冲突》的发表。这个白皮书企图限制工会的权力，并向工会一些不负责任的行动追究法律责任。这种试图通过把工会纳入法律框架来改革劳资关系，并限制它们分散的组织的破坏性影响的做法，是工党现代化进程中理顺工党与工会关系的一个重要尝试。威尔逊对工会的公开批评，实际上可以被认为是重塑工党为全民党的战略步骤。威尔

逊的这一举动，在工人运动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工会紧急动议，坚决抵制这一政策，终于迫使威尔逊政府放弃了这一企图。但从此双方的关系发生了大的裂缝。

随着《代替冲突》白皮书的失败以及左翼力量的加强，现代化在 70 年代处于停滞阶段。修正主义在 60 年代的失势意味着其意识形态的破产，右翼领导不再有许多支持者，也不再变革工党的幻想。自此，威尔逊采用了一种实用主义的路线，他允许左翼影响工党的纲领和宣言，然后在政府的实际行动中冲淡其影响，以便把党团结在一起。在卡拉汉时期，工党的现代化也无大动作，因为他力量较弱，在党内党外，都是以微弱的多数得到支持。

工党的现代化在 1983 年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83 年大选失败后，新任领袖金诺克认识到，工党要想获胜，必须重组该党，使政策变得让选民接受。在党的组织方面，他认为必须给领袖大的权力，以便能够控制整个运动，引导、协调全国的党的活动。为此，他提出了实行“一人一票”的选举办法，但未能成功。在理论政策方面，他引导全党就一些重大问题展开了讨论，特别是在 1987 年大选后，专门组织了有关问题的讨论。在防务、经济政策、工会政策、与欧共体的关系、环境、妇女、小企业的作用等问题上，都提出了一些新东西，不仅与左翼有区别，而且与以前的修正主义也有较大的差别。在所有制问题上，不再提大规模国有化，仅强调一些部门的国有化。开始重视市场的作用，强调在国家的帮助和干预下发挥市场的作用。更有甚者，1991 年金诺克还曾试图悄悄取消党章第 4 条款，印了一批没印有第 4 条款的党证，引来了说他是“叛徒”的责骂，那批党证只好作废。在工党现代化进程中，金诺克好像没作成什么大的事情，但实际上，他利用大选失败、他的左翼形象以及他的领导才能，向传统的工党社会主义模式发起了全面挑战，揭开了新一轮的改革序幕，为后来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史密斯任工党领袖后，以谨慎稳重的作风继续现代化的进程。在理论政策方面，他继续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攻击。1993 年 2 月 7 日，他在伯恩茅斯对工党议员发表讲话时说：“该党只有放弃它过去一贯奉行的由国家来掌管工业的社会主义方针，才能重新当选。”“党必须接受变革，把更多的重点放在个人的成就上。”“我们现在需要奉行一项新政策，把人民放在首位，反对教条和采取一些切实的通情达理的解决办法。”他还说：“多年来，我们一直围绕工业和劳务的所有权问题展开一场很大程度上是毫无结果的辩论，似乎私有化和国有化是经济政策中仅有的两种选择”，“在工党看来，我们显然认为混合经济具有很多优越性，国营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必须进行积极的和创造性的合作。”史密斯在这里虽然未提到党章第 4 条问题，但实际上触及到了该问题的实质。此外，在组织上，史密斯实现了实行“一人一票制”的改革。

布莱尔继任工党领袖后，提出了“新工党，新英国”的口号，在其一系列讲话中，“工党的现代化”成了出现率较高的一个短语。他认为：“总是生活在过去的一个党，注定要灭亡，忽视过去的党注定要失败，我们的工作是要尊重历史，面向未来。”他还认为：“这些年来，工党的一个缺点就是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我们却拒绝与其一起变化”。“意识形态和组织问

合众国际社 1993 年 2 月 8 日伦敦电：《工党领袖约翰·史密斯为他的党规划了新的前景》。

〔英〕《新政治家与社会》1994 年 7 月 15 日。

题，在 70 年代后期和 80 年代早期，几乎成了致命的问题，实质上，不论是理论还是组织都成了过时的东西，尼尔·金诺克、约翰·史密斯和我所寻求的就是要医治这些缺点，并在英国政治中实现中左的转变。”

顺应时代潮流

布莱尔的思想和工党的现代化，是英国工党顺应英国国内外形势变化的结果。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变化使得政府的工作愈加困难。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使得越来越多的生产和交易活动是通过公司而不是政府来进行的，政府对产品和贸易的控制越来越少；金融市场和银行体系近 20 年来扩展极快，随着汇率的浮动，政府已增加了他们的流通储备，这些更使金融市场反复无常，对政府的控制来说，更增大了困难；更多的国际组织也反对国家对市场的限制。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不开始转换国家的作用，调整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努力做到公有与私营的混合与平衡，并寻求公共事业的新的运行道路。这些对于一个寻求执政的大的政党领袖来说影响是巨大的。另外一方面，近些年来英国阶级结构和工人阶级内部也发生了一些大的变化。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间阶层占就业人数的比例越来越高；工人阶级内部以熟练工人、技术工人和服务性行业工人为主体的白领工人大大增多，传统的产业工人逐渐萎缩；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思想政治状况日益复杂化，劳动者阶层的分化日益明显，生活质量和个人发展成为日常话题；妇女工人的比例大为增加，其中许多妇女工人还是钟点工，钟点工、妇女工人和非体力职业是参与政治活动和工会活动最缺乏积极的群体；多国公司、跨国公司、服务性行业的增多，使得工人的联合性降低。房屋所有者、汽车所有者在增多，工人的空余时间也在增多，这些都腐蚀着过去工人运动的模式。布莱尔的社区主义，对责任和义务的强调等内容都是适应工人运动这些变化的产物。

自 80 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社会被认为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有人称之为“后福特主义”，有的称之为“后现代性”。文化的分野、个人主义的盛行、商业全球化都影响着左翼运动。布莱尔的思想试图把对个人人权尊重的传统与新的对市场经济的容忍和财富的创造结合起来，实际上，也是迎合了英国出现的一大批年轻的自由主义者的口味。这批人信奉“无政府资本主义”，他们是全球化的电视、波音 747、卫星通讯和个人电脑的社会化产物。布莱尔本人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集多种“主义”之大成

布莱尔思想的形成不仅有实践基础，而且也有理论渊源。“布莱尔主义”实际上是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混合物。

布莱尔主义的思想渊源之一是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一直存在于工党的血脉中。工党于 20 年代取代自由党成为国内主要大党后，自由党迅速瓦解，一部分人流落到工党里头。工党从一开始在思想上并未和自由主义切断联系。在英国，自由社会主义的传统根深蒂固。布莱尔曾经指出：“英国的民主社会主义确实是激进的自由主义传统的继承人，虽然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源、重点、原则和实践有其特色，但如果把它与其亲近的自由主义放在一起，

就可以发现其密切的联系。”不过，在自由主义中，对布莱尔的思想产生影响的主要还是新自由主义这一分支。在本世纪初，从原来的自由主义传统中分化出了一支新自由主义，以霍布豪斯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认识到 19 世纪的自由观念对于社会和经济改革的目标来说太狭隘了，所以，他们要扩展它。他们认为，如果人们没有能力来运用它，理论上的自由就没有多大用处。所以，他们表明，即便侵犯了传统的放任主义自由的正统性，也要通过集体行动，包括国家的行为去获得主动的、积极的自由。他们认识到，全社会创造的财富应该能为了社会目标而合法地使用，即使这需要变革现存的财产权利的秩序。这些思想一直影响着工党的思想家、政治家。正像英国工党议员彼得·海恩所指出的，“在英国，自由社会主义的传统有着深厚的根基”，“非集中主义、民主、大众主权等等都扎根于英国社会主义的传统中。地方社会主义、凯尔特社会主义，60 年代的新左派、70 年代女权社会主义、80 年代自治社会主义都有这些因素”。布莱尔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些思想的综合和继承。

在自由主义中，美国克林顿民主党的自由主义对布莱尔的思想也影响较大。还在布莱尔任工党领袖前，英国传媒就称布莱尔为“英国的克林顿”。布莱尔的“新工党”口号与克林顿的“新民主党”呼声遥相呼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社区主义”曾在 1992 年美国总统选举后，在民主党内十分盛行。这种学说强调，既要让每个公民都能尽责，又要给每个公民发展的机会。克林顿集团在鼓吹社区主义的同时，声称民主党应摆脱“压力集团”的控制，重新听取美国中产阶级大众的呼声，这与布莱尔对待工会的态度很有相似之处。布莱尔从克林顿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

布莱尔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英国社会主义中一直有宗教的倾向，前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曾说过，英国社会主义思想“生根落脚的土壤则是一望而知为英国的制度这种自愿的结合——工会、互助会、合作团体，以及同样重要的教会和政党”。布莱尔的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在牛津圣约翰学院读书时，布莱尔就对基督教的社会观念产生浓厚的兴趣。他认为，宗教不是纯神学意义上个人与上帝的关系，因而他开始以一种社会的观点来看待宗教。这无疑为他以后的政治道路奠定了某种思想基础。

布莱尔的思想还深受撒切尔主义的影响。撒切尔夫人领导下的保守党政府所实行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及相应的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甚至撒切尔夫人个人的政治品格和领导作风，对布莱尔的思想、个人作风都有影响。布莱尔曾经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赞扬撒切尔夫人。他认为撒切尔夫人时期的改革并非完全不可取。1994 年 6 月 6 日，他在《泰晤士报》上公开赞扬撒切尔夫人的坚定、明晰和有说服力。他曾多次承认，从撒切尔夫人那里取得了一些经验教训。在 1995 年 4 月 2 日的《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布莱尔说撒切尔夫人“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人，这是一种值得称道的素质”，“在政治上对方向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

布莱尔的许多思想直接来源于英国哲学家约翰·麦克马瑞。布莱尔在牛津读大学时，就深受麦克马瑞思想的影响，他自认为他的思想大多从麦克马瑞那里而来。麦克马瑞 30 年代在伦敦大学当哲学教授时，已经出名。当时，

托尼·布莱尔：《让我们面向未来》，第 571 页。

哈罗德·威尔逊：《英国社会主义的有关问题》，第 5 页。

现代西方哲学把个人放在第一位，而他则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人只有与他人有关系时才能生存。他的“他人中心说”不仅是对现代哲学，实际上也是对自由主义的一种挑战。他认为，自由本身是不完全的，因为人的本性是在家庭和社区里创造的。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和自爱是相同的，如果我们追求自我利益，我们将使社区得利。而麦克马瑞则认为：实现社区利益将使其中的个人获利。麦克马瑞的思想实际上是基督教社会主义和对自由主义批判的结合物。

布莱尔的思想灵感在许多方面受到国外一些左翼思想的启发。自从1979年大选失败后，在过去的18年间，英国工党不断地擦眼看世界，从其他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中吸取营养。在1981—1983年间，党内比较着重法国社会党的经验；1982—1991年间，许多方面又倾向于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模式；1987—1992年间，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又非常注意；在1984—1986年间，曾一度对新西兰工党的经验感兴趣。但相对来说，对英国工党有益的与其说是这些国家成功的经验，倒不如说是这些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运行的教训。相比较而言，对布莱尔的思想影响较大的还是澳大利亚工党的成功经验，而澳大利亚工党自1983年上台后，所奉行的是一套没有撒切尔夫人的撒切尔主义路线。布莱尔对澳大利亚工党提出的“全民工作”的就业计划、“全民创造”的文化计划、“澳大利亚未来网络”的有线电视计划，以及职业培训计划非常感兴趣，认为这些社会政策同他们信奉的“社区主义”十分投合。从1995年开始，英国工党与澳大利亚工党的交流十分频繁，人们可以看到两个工党在许多方面的共同点。

对于布莱尔的思想，英国和西方社会的报刊中称呼比较多，诸如“社会保守主义”、“准新保守主义”、“次保守主义”、“后社会主义”、“布莱切尔主义”（布莱尔思想与撒切尔主义的合称）。对于布莱尔的政策主张以及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保守党说是旧的工党穿起了伪装的新衣；时髦的共和主义左派认为是撒切尔主义换上了新装；自由主义者说它太保守；传统的宪政主义者说它太激进。有些老人说布莱尔这套东西以前就有过，60年代威尔逊时期的社会民主就是这些东西；乐观主义者把布莱尔看作是19世纪的探险家，似乎可以重新描绘出一张新的政治地图；悲观主义者则说成功的政治家只有拥有明确的思想才能执掌政权，而布莱尔在这方面并没有超出金诺克和史密斯所为；还有人评论布莱尔在改革工党方面要胜于他的英国改革计划；也有人认为，布莱尔呼吁的社区的价值看起来空洞无物，而权利共享的计划又模糊不清。

还是民主社会主义政党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布莱尔的思想体系呢？布莱尔的思想体系与英国工党过去的思想相比确有很大的区别。从风格上看，布莱尔上台后在理论改革和组织调整上，步子之大、胆量之高、措施之多，令人刮目相看。他没有背上历史的包袱，对工党的陈规陋习不以为然，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从内容上看，虽然他的前任金诺克、史密斯在理论改革和组织调整上也作了大量的工作，但没有达到布莱尔这样系统的程度，他力图把工党与国家、阶级、宗教、伦理、家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力图在全球经济中为民族国家争得一席之地。在党的价值观上，他倡导社区主义、伦理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放弃

了工党领导人几十年来一直想放弃但又办不成的党章第 4 条款，不再把公制作作为党的奋斗目标，而仅仅作为实现党的目标的一个手段，在党纲里第一次公开承认市场经济、私有制的合法性。在政策问题上，公开赞扬撒切尔夫人的领导作风和某些政策，承诺不推翻保守党政府的某些政策。在与资方和工会的关系上，公开采取拉一方、打一方的政策，亲近资方，排斥工会。在党的组织问题上，大批个人党员加入工党，他们的思想与传统的工党党员差距较大，党内决策模式也发生变化，中央领导的直接决策能力得到加强，同时基层党员民主又得到发挥。在党的形象上，工党有了较大的改观，人们普遍认为工党已成了一个温和型的政党，由原来的左翼政党变成了中左翼政党。

然而，工党尽管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它仍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在修改后的党章第 4 条，开宗明义地宣称，工党是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如果把工党和欧洲大陆上一些社会党相比，布莱尔现在的思想体系与改革的内容，其他一些社会党早就实行过，德国社会民主党早在 50 年代初，就在纲领里放弃了公有制的目标。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强大的工会的牵制，工党在形式上，显得比其他社会党要激进一些。从布莱尔提出的价值观、政策目标、组织制度上看，他从国外社会党借鉴的东西较多，大体上没有超出 1989 年 12 月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新基本纲领》和 1989 年 6 月斯德格勒大会的《社会党国际的基本宣言》的范围。布莱尔还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他所使用的“社会一主义”一词，实际上也与欧洲大陆上一些国家的社会党准备放弃“民主社会主义”一词而重新使用“社会民主主义”相一致。

布莱尔的思想体系的确与撒切尔主义有共同的地方。但如果从大范围看，这种趋同是比较正常的现象，正像在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前，不管是工党还是保守党，都执行了一条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加上英国“社会主义”的改良学说一样，今天布莱尔的思想轨迹，工党的政策走向与 40 年代后期保守党所走的路线大致一样。

透过近百年政党发展史可以看出，在价值观、目标、政策三个层次上，不同政党之间，尤其是在英国，呈现出如下这样一种现象：在价值观上，可能分野较清，互相对立；在目标上则互有交叉；在政策上则趋同，界限比较模糊。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和政党政治的特点，以及左翼政党的地位与任务分不开的，并不表明这些政党之间的界限完全消失。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余地还很大，虽然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和弊病继续存在，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但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自身调节和变革，得到一定的缓解和克服，并没有尖锐和激化起来，发展到无法解决的地步。摆在英国左翼政党面前的任务不是推翻资本主义，而是在照顾劳动人民利益的前提下维护、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种状况下，政坛上对立的两大政党处在同一个国家，面对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历史，同样的人民，同样的世界，政策调整的空间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宽阔，两党可供选择的发展模式差别不大。两党在政策上趋同，一定时期内左翼政党向右翼靠拢，或右翼向左翼靠拢，是英国资本主义处于发展的长期性、均衡化、常态化下的一种正常现象。

一个政党的政策不是想当然就能制定出来的，它要受国内阶级结构发展变化的制约，要受国际资本主义的影响。作为一个寻求执政的政党，它要考虑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不可能只考虑一个阶级、某个压力集团的利益；作为一个寻求在大选中获胜的政党，它要在照顾传统选民的要求的同时，尽

力拓展可以争取的空间；作为一个联邦性的民主的政党，它必须平衡内部各个派别和组织的利益。这样一来，工党的理论和政策在社会大趋势的压力下，在各方面利益的要求下，在一定时期只能与主流政策相趋同。战后英国政党的共识政治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 1945 年 7 月至 1979 年 3 月，是右翼的保守党向左翼工党的政策趋同；第二阶段从 1979 年 3 月始至今，是左翼的工党向右翼的保守党趋同。布莱尔上台后，正好处在第二个时期，一些事情不是他个人所能左右的，更何况他本人也不想与这个大趋势相对抗。布莱尔如果不采取这种政策，就不会上台执政，也不会利用政权这个工具去维护劳动人民的眼前利益。两党制的一个功能就是，促使每一个政党都避免走向极端，进而导致政治中间化的趋势。执政党为了连续执政，在野党为了上台组阁，都需要迎合尽可能多的人的利益和要求，都会毫不犹豫地将对手受人欢迎的主张改头换面，为己所用。工党作为一个以通过议会选举上台执政为目标的议会政党，布莱尔作为这样一个政党的领袖，也只有在这种共识政治的大前景下求得自己的发展，在发展中又保持其特色。

十五、政治生活之外

政治并不是布莱尔生活的全部。他爱好广泛、视野开阔、喜欢读书。在学生时代，他就爱好田径，是一个不错的校橄榄球队队员，还当过校板球队队长，以后又喜欢上了篮球和网球。到了成年，布莱尔对音乐仍有浓烈的兴趣，时常光临影剧院。他是个基督徒，对家庭尽职尽责。

浪漫的恋爱与婚姻

布莱尔从少年时代起就是一个多才多艺、让女性着迷的风流才子，他文过好几位女友，有的一直与他保持密切关系，而且还在他身边工作。他与妻子切丽·布斯的结识过程更具有浪漫色彩，那是1975年，他在申请伦敦律师协会的奖学金时。为了得到奖学金，必须接受奖学金评估者安排的会面。在会面前，候选人要在外面按姓名字母顺序排队等候。布莱尔发现紧排在他后面、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位年轻小姐，她就是切丽·布斯。切丽·布斯毕业于文法学校，据她的历史教师说：“她是我所教过的最有智慧的学生。”之后，她在世界知名的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读法律，以最好的成绩从该院毕业。她是那一年全国最杰出的学生之一。像布莱尔一样，她也对政治极感兴趣。不过，她却比布莱尔早3年，于1972年加入工党。当布莱尔申请在亚历山大·欧文的事务所当学徒时，他又偶然遇上了她。他们俩都成了欧文的徒弟，欧文很赏识布斯的才智。

1976年夏，切丽·布斯未负欧文的重望，以最高的成绩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布莱尔的成绩不太好，是第三级，不过也通过了。欧文的两个徒弟——布斯和布莱尔——现在为了取得欧文事务所中的永久职位而处于竞争状态。他们知道，事务所在他们学习结束时只能录用他们中的一个。然而，这种竞争局面不但未使他们成仇，反倒使他们更接近了。布斯说：“开始我常与别人在一起，但是到学习结束时，我不再同那人来往了，而开始同托尼一起外出。”这一年年底，在一次布斯搞的圣诞节晚会上，他们俩的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在晚会的游戏中要涉及一定的身体接触，布斯选择布莱尔为搭档。她做出这种选择不仅仅是因为他是她的职业竞争对手，还有别的含义。在布莱尔于1977年赢得那个职位后，他们的关系继续发展，两年后他俩订了婚。

布莱尔之所以能得到欧文事务所的职位，是因为切丽·布斯退出了竞争。她在事务所正式决定录用她之前，在其他地方得到了一个固定职位。不过，她是在欧文的事务所明确表态要录用布莱尔之后才接受那个职位的。这表明她是更喜欢在欧文事务所工作的，只不过是给布莱尔让条路，可见情谊之深。她找的职位是在一家最著名的诉讼律师事务所里，不太符合她的兴趣，因为她感兴趣的是家庭和就业方面的案件。所以她不久就跳槽了。

1980年春天，就在俩人都开始寻求进入议会的时候，他们举行了婚礼。婚礼是在切丽母亲的家乡，牛津圣约翰学院的教堂里举行的。切丽的父亲托尼·布斯是个出名的演员，曾因主演电视连续剧《鞠躬尽瘁》中的一个角色而享有盛誉。不过布斯先生曾一度过着花天酒地、放荡不羁的生活，他的两个女儿——切丽和妹妹林德西小时候差点被他遗弃。为此，姐妹俩一直不原谅他。直到1979年，他的大女儿出嫁的前一年，他因吃醉酒险些在一场大火

中丧命，才痛改前非、汲取教训，戒了酒，两个女儿才与他重归于好。布斯先生没见过什么世面，但却是工党的坚定的支持者。

切丽的家境远不及布莱尔。从家庭出身来看，切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是理所当然的。由于父亲不尽其责，姐妹俩是由母亲抚养大的。母亲盖尔出身于一个工人家庭，娘家人都是工党的支持者，而且笃信罗马天主教。盖尔也曾经是演员，为了抚养孩子，后来放弃了演员生涯，从事她力所能及的一切工作。她甚至在食杂店里当过杂工，出卖苦力。这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母亲吃苦耐劳的品格对两个女儿形成了良好的影响。切丽和妹妹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切丽很欣赏布莱尔的才华，但也不满他的一些小毛病，如吸烟。所以在他俩的婚礼上，布莱尔搞了一个非常有趣、别开生面的开场白。他说：“我和切丽在下午2点钟成婚，但我要于1点45分抽最后一支烟（即要戒烟），这是我妻子的主意，是我们俩之间的一项协定。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在我们俩的‘交涉’中，我占了便宜。”如果只因戒了烟就能娶到一位才女为妻，那可真是天大的便宜。

这一年，布莱尔26岁。这年夏天，他同新娘迁入了他们婚后的第一所寓室。地址是麦普里顿街5号，地处伦敦东北部的海克尼区。这是伦敦穷人较多的区，房价和物价都较便宜。切丽过去一直住这一地区，对这里很熟悉。布莱尔夫妇居住的房子是一所维多利亚早期风格的三层小楼，一排4套房子中的一套。布莱尔并不喜欢这房子的样式，他所喜欢的是不远处那种互相对称、拥有天井通道、四角耸立着直刺天空的塔形物的平房，不过那种房子可不是一般收入的人所能享用的。

切丽·布斯的才学和资历虽不低于布莱尔，但在事业上，她却处处把布莱尔放在第一位，首先尽自己的努力帮助他，然后才去干自己的事业。在布莱尔几次竞选议员时，布斯不但自己去为布莱尔助选，而且还动员她娘家的人去为布莱尔出一份力。他俩的政治观点相近，又都在一个党内，可谓是夫妻加同志。每当布莱尔有什么重大喜讯时，他都是首先打电话告诉切丽，让她分享他的快乐。而切丽却像他的参谋长一样，每当此时都提醒他注意不要得意忘形。1988年工党影子内阁选举过后，切丽就及时告诫布莱尔：成为影子内阁大臣意味着“我们开始得到更多的新闻媒介的注意”。

1984年1月，在他们婚后近4年的时候，切丽生下了他们的长子欧安·布莱尔。而在8个月前，布莱尔为获取塞奇菲尔德的议席而写的个人简历中还不不好意思地承认：“切丽和我还没有孩子。”英国是个很传统的国家，有没有子女象征着一个人是否有责任心和爱心，以及是否会有一个稳定的婚姻。看来，布莱尔是有责任心和爱心的，在欧安出生后，另外两个孩子——尼克拉斯和凯思琳以大致两年的间隔接连诞生。布莱尔有点传宗接代的思想，对几个孩子的出生都很重视。他自己说：“欧安和凯思琳出生时我都在场，只是错过了尼克拉斯的出生时间，因为他是早产儿。我当时在选区，而且必须连夜赶回伦敦。欧安出生时比较费时，用了一天左右的时间，最后不得不施行引产。凯思琳是个剖腹产儿，整个过程仅用了45分钟。那时你会感到自己很无用，但我高兴当时自己能在场。我认为这对我妻子有好处。目睹她经受了那么巨大的痛苦，我觉得自己真算不了什么，自惭形秽。”

在欧安出生的那一年，布莱尔家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他们买了房子。那是一座旧房子，但很大，位于特里姆顿火车站附近一所老矿工居住的宿舍

后面。这里也是布莱尔新一个阶段政治活动的中心地带。确切地说，有 4 个特里姆顿，相互距离不过几英里远：特里姆顿村庄，特里姆顿农庄，特里姆顿煤矿和特里姆顿车站。后两者目前已不复存在。迁入属于自己的房子后，布莱尔一家算是在伦敦扎下了根，不过这只是家庭生活，他的政治生活的根是在选区。按规定，议员必须居住在自己当选的选区，至少是在其附近，所以布莱尔在塞奇菲尔德又弄了一处住所，定期带着妻儿到那里住上一段时间。也好，那里成了他们家的乡间别墅。1986 年，布莱尔一家又从海克尼搬到了位于伦敦北部、海克尼西边的伊斯灵顿。把家安在首都伦敦是个明智的选择。布莱尔常去自己的选区，不过一家人总是在一起，使他能享受到家庭生活的快乐和由此而产生的饱满激情，而不像许多政治家那样过着让人萎靡的生活。

妻子也是位政治家

切丽并没有完全变成家庭主妇，她在工党内仍很活跃。1983 年底，她当选为工党协调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次年再次当选。工党协调委员会那时日益成为中左派积极分子为进入议会而选择的使自己在党内享有盛誉的讲台。切丽的 8 位同事后来都当上了国会议员或欧洲议会议员。然而，切丽在这一机构中工作了两年之后，认定一个家庭有一位政治家足矣，他听从了朋友们的建议，优先考虑“家庭和工作，政治摆在第三位”，从此放弃了进入议会的努力。如果不是这样，切丽也许会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政治家。不过，在所有英国首相的夫人中，切丽的文化和政治素质是最高的。

1984 年，英国爆发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斗争最激烈的一次煤矿工人大罢工，对工党左派来说，这次罢工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当时，作为工党协调委员会执委会成员的切丽·布莱尔是最反对这次罢工的。她与她的同事们的分歧不在于矿工们罢工的理由是否是正义的，而是在于罢工发动之前没有依照法律进行秘密投票。她阐明自己反对罢工的理由意在维护自己的声誉，因为她是个律师，懂得法律。而工党内许多人包括领导层的人此时却对事态的发展一筹莫展、无计可施，只会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尼尔·金诺克后来感到罢工那年在工党现代化历程中是“失败的一年”。托尼·布莱尔对此次罢工的看法与切丽一样。

直到布莱尔出名之前，切丽的知名度主要来自于她是演员托尼·布斯的女儿，而不是来自于托尼·布莱尔的妻子身份。她自己说过：“我过去是某人的女儿，现在是某人的妻子，我将作为某人的母亲而终结生命。”不过，她很快就进入了“某人的妻子”这一角色，因为布莱尔在进入议会仅 17 个月，就被提升到了领导岗位。

1992 年大选后，在是否出山竞争副领袖职位这一问题上，切丽曾表示希望布莱尔出山，他劝丈夫不要犹豫不决，看起来她比他更清楚地看到了机会。布莱尔来来回回与她通了很多次电话，商谈这个问题。不过最后布莱尔还是没有听从夫人的劝告，放弃了这次机会。后来有人说，布莱尔不参加竞选，是因为他得有更多的时间来照看孩子。切丽后来说：“当他决定将不参加竞选副领袖一职时，欧安说他很高兴爸爸选择了更多地呆在家里。”

在 1994 年领袖竞选时，切丽成了布莱尔竞选班子的业余成员，积极为布莱尔助选。她总是为丈夫的事业操心，就像他们的朋友查尔斯·法尔科内尔

所说的：“她完全投身于托尼的雄心大业之中。”就在史密斯去世前不久，她对人说：“如果我真的不相信托尼所从事的事业，那就太糟糕了。但我很为他骄傲。我想他有很多东西要奉献给社会。我真的希望他成功。托尼名气很大，而我没有，我一点也不为这个事实而苦恼。我在自己的领域有很好的报酬，并得到了较高的承认。”她虽然在为丈夫出力，但却不是公开的，她没有显出她已卷入这场领袖竞选运动的漩涡中。布莱尔也深知妻子是赞成她竞选领袖的。当有人问起他的家庭对他竞选领袖的态度时，他说他不会因为妻子的缘故而在竞选领袖上犹豫不决，“切丽毫不怀疑，为了工党，我这样做是对的”。在布莱尔竞选领袖获胜后，他在讲话中还特别提到要感谢切丽。

虽然切丽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把它放在自己生活的第一位置上，但是她仍强调自身的独立性，不单单当一个贤妻良母。她继续干自己的律师工作，1995年，她成了一名皇家法律顾问，这是英国律师最高的荣誉，而布莱尔由于从事了政治事业，没机会得到这个头衔。切丽说她还想当法官。除了为丈夫助选时外，在其他与自己事业有关的场合，切丽都用自己娘家的姓。就在布莱尔当选上工党领袖后，当有人问及她，如果布莱尔将来当上了首相，她是否还当她的律师，她的回答是不容置疑的。如果这样，她将是英国历史上首相夫人中的第一位职业女性。

他还有别的女人

布莱尔有一些女性追随者，其中之一就是他中学时代的女友安吉·亨特。亨特小姐在少年时代就是旧传统的叛逆者，这正是她与布莱尔结下友谊的基础。她直到30岁、已经结婚并有了两个孩子时才真正热心于政治。当时她正在布莱顿理工学院读学位，成绩优异，历史学和英语都得了第一级。那时，她下决心克服生活上的困难，完成自己中断了的学业。1987年大选后，她利用假期为布莱尔工作。1988年3月，布莱尔聘请她为私人政治顾问兼秘书，她在最后考试结束才一周后便来到伦敦，开始全力以赴为布莱尔工作。她追随布莱尔，正是因为她觉得他是颗新星，而且会升得更高。布莱尔当上影子内阁大臣后的全部岁月中，她一直是他的一位关系最密切的政治信任者和助手。1994年7月领袖选举后，布莱尔在他的答谢讲话中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安吉，他说：“我遇见安吉是在我17岁的时候，在一个晚会上，我们俩都在那儿呆了一整夜。”他还恶作剧地补充道：“那是我的第一次胜利。”

与布莱尔一直保持密切关系的另一位女友是阿曼达·斯道特。她是布莱尔中学时的同班同学。费蒂斯公学原本是纯男子学校，但在布莱尔的最后一年，学校破例接收了两名插班女生，其中一个就在布莱尔所在的班里，她就是斯道特小姐。这位漂亮的姑娘立即成了全班的小伙子们注意的中心。然而，不久她自己宣称她是布莱尔的女朋友，尽管布莱尔曾一度有过情敌。斯道特小姐后来一直与布莱尔保持友好关系。布莱尔在牛津当摇滚歌星时，许多少女歌迷都自称叫阿曼达。

当一个慈父

布莱尔和切丽现有3个孩子，两男一女，布莱尔与孩子们的关系都很好。在他们年幼时，他经常照顾他们上床安歇，为他们准备早餐。

在领袖竞选期间，《每日快报》报道了布莱尔和切丽准备把他们的长子欧安送进“伦敦礼拜堂”的消息。“伦敦礼拜堂”是一所传统主义的罗马天主教国立男子学校，该校曾借助保守党政府制定的法律摆脱了地方政府的控制。在领袖竞选期间发出这样的报道是想向人们说，布莱尔具有保守主义倾向，让自己的孩子去接受英国传统的教育。几天后，布莱尔在电视中发表讲话，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他说：“父母们要为他们的孩子选择最好的学校。我们不赞成政府为孩子们选择学校，但这不等于说孩子的父母因此也不能为孩子选择学校。”

从事政治事业就难免使自己的家庭受到影响。还在史密斯去世之前，切丽就表示过，她很担心公众对她家庭的兴趣会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我是个很讲究隐私的人，很想保护我们的孩子。当托尼送孩子去学校时，其他孩子们总是在说：‘我们昨晚在电视里看见你了。’我不想让孩子们长大后，仅仅因为他们爸爸所做的事情而感觉很特殊。”可是切丽的希望落了空。欧安才10岁，就已处在全国舆论关注的中心。党内的反对派利用给欧安选择学校这一点来攻击布莱尔，说他很虚伪，因为他一方面攻击政府偏袒某些学校，一方面却又利用这一点为他自己家庭谋好处。有人说，布莱尔不能为自己的政治价值观而牺牲自己的儿子。而布莱尔则坦率地承认这一点，他说：“任何父母都想为他们的孩子得到最好的东西。我不准备基于政治上的是非来为我的孩子做出选择。”为了给自己的行为辩护，布莱尔一再强调“伦敦礼拜堂”是一所国立综合性的中学，它在招收学生时不考虑能力或背景——除了宗教以外。但事实是，该校在孩子入学前要对他们进行面试，主要是评估家长和孩子的目标是否与学校的目标一致，从而使学校能够有效地以学习能力为标准选择学生。

看来，使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卷入政治生活，这还只是开始，尽管布莱尔非常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

后 记

本书为集体之作，参加本书撰写工作的有：刘建飞（中央党校副教授）、王凤鸣（河北师范大学副教授）、李红（中央党校讲师）、王海霞（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朱旭东（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宋毅（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全书由刘建飞统稿。

英国驻华大使馆为本书提供了大量宝贵资料，在此表示感谢。

本书借鉴了大量国内外学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约翰·任托尔先生著的《托尼·布莱尔》一书，在此特向作者及出版者致谢。

作 者

1997年5月20日

主要参考书目

- 1、〔英〕约翰·任托尔：《托尼·布莱尔》，英国小布朗出版社 1995 年版。（John Rentoul, Tony Blair,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5）
- 2、〔英〕艾瑞克·肖：《1979 年以后的英国工党——危机与变革》，英国牛津，1993 年版。（Eric Shaw, The Labour Party Since 1979,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xford, UK, 1993）
- 3、〔英〕彭尼·朱纳：《妻子·母亲·政治家——玛格丽特·撒切尔传》，花城出版社 1986 年版。
- 4、〔英〕代维·扣茨：《工党及其为社会主义的斗争》，伦敦，1975 年版。（David Coates, The Labour Party and the Struggle for Socialism, London, 1975）
- 5、刘书林：《麦克唐纳社会主义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 6、张契尼、潘琪昌编：《当代西欧社会民主党》，东方出版社 1987 年版。
- 7、殷叙彝主编：《当代西欧社会党人物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 8、李兴耕编：《当代西欧社会党的理论与实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 9、姜士林、郭德宏编：《当代社会民主党与民族主义政党论丛》，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6 年版。
- 13、冉隆勃、王振华等：《当代英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 14、胡康大：《英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 15、〔英〕亨利·佩林：《英国工党简史》，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7 年版。
- 16、〔英〕乔治·马尔科姆·汤姆森：《英国历届首相小传》，新华出版社 1986 年版。
- 17、〔英〕帕崔克·希德、保罗·怀特利：《工党的根——党员政治》，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Patrick Seyd and Paul Whiteley, Labour's GrassRoots, The Politics of Party Membership,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18、〔英〕杰克·布兰德：《英国议会政党》伦敦 1992 年版。（Jack Brand,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rties, London, 1992）
- 19、〔英〕安东尼·桑普森：《最新英国剖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 20、〔英〕阿伦·斯克德、克里斯·库克：《战后英国政治史》，世界知识出

